

倪柝声与上海教会殉道史

回应许梅骊、梁家麟、连曦等人的不实叙述

序

2009年7月30日，美国国会议员Chris Smith发表美国众议院国会纪录，公开表扬倪柝声是中国基督教界一位伟大先驱，以及他浩瀚的属灵成就。美国的《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杂志亦称倪柝声为二十世纪百位最具影响力的基督徒之一。今日中国有一亿以上的基督徒，其中数百万人认为自己是倪柝声的属灵后代。他是对西方世界基督徒最有影响力的中国基督徒，其著作《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在全球销售超过一百万本，成为二十世纪著名的基督徒经典之一。

倪柝声一生全然奉献，自1922年信主开始，到1952年被秘密监禁为止，三十年尽职期间，借着讲道、出版文字、办训练，殷勤为主作工。借着他直接和间接的尽职，多处地方召会兴起，不仅遍及中国，也扩展至东北亚和南洋等地。至1949年止，在中国各地兴起的召会约有四、五百处。1950年初，韩战爆发，中国投入抗美援朝活动，为防宗教成为隐患，政府要求所有的团体加入三自爱国运动，彻底切断与外国的关系。倪柝声和其他许多基督教领袖被扣上反革命罪名遭政府逮捕、监禁。倪柝声从此未被释放，先是被囚于上海的提篮桥监狱，后被送至安徽的白茅岭，最终于1972年死于劳改农场，享年七十一岁。临终遗留的纸条表明，在20年漫长的监禁劳改生活中，他从未否认那爱他并为他受死的主，倪柝声维持了他的信仰，向神忠信直到路终。这是他最末了的见证：“基督是神的儿子，为人赎罪而死，三日复活。这是宇宙间最大的事实，我信基督而死。倪柝声”。

在同一个时代背景下，因主缘故忍受污名，流血为主殉道的，还有许多诚实爱主的人。这些忠信的见证人借着他们的信，作了美好的见证，成了我们的云彩和榜样（来十一2-40）。然而近年来

有些当年离弃信仰，出卖弟兄姊妹，导致一夜之间，多位同工长老被捕、甚至殉道的人，以别人那里得来的第二、三手的传闻，伪装成自己亲眼见证的历史，以1950年代的政治宣传和控诉当作证据，恶意揣测一些无中生有的故事。这些写作无视已出版的资料和当事人的见证，偏颇地引用少数反对者的材料，再跟几位有心人士彼此引用，以还原历史之名，行诋毁之实。

这些有心人士的评论和攻击，本不是我们答辩的对象，主来时自会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图（林前四3-5）。然而，我们不忍看见那些因受倪柝声的职事帮助的基督徒，因这些虚假的谎言受亏损，甚至遭受属灵的死亡，因此愿意将收集来的第一手资料收录成书，包括倪柝声自己的见证、同工的见证、家人亲友的信件、以及当时在场之人的见证等，好留给后世一个关于倪柝声的第一手纪录。此外，我们也提供几篇研究型文章，帮助读者了解1950年代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环境，解析这些不实陈述背后不足采信的证据，以及漏洞百出的研究水平。倪柝声的历史应该身边认识他的家人、亲友和与他共事数十载的同工来书写。上海教会的历史，应该由那些忠信为主作见证的当事人和后代来书写，不该被卖主求荣之人联合外人来恶意中伤。

何子建

目录

序	1
目录	3
第一部分 倪柝声的生平、职事与殉道	5
得救与蒙召	5
装备与造就	8
所得的启示	11
所过的生活	20
负担与使命	27
生命的职事	29
苦难与殉道	37
同工及圣徒的见证	48
李常受弟兄的见证	48
张宜纶弟兄的见证	49
魏光禧弟兄的见证	51
张晤晨弟兄的见证	53
张郁岚弟兄的见证	56
赖教士的见证	59
亲友的见证和信件	61
万小玲姊妹的见证	61
吴友琦弟兄的见证	64
第二部分 上海基督徒聚会处简史及忠信圣徒的见证和殉道史	70
上海基督徒聚会处简史	70
忠心圣徒的见证及殉道史	71
关于张愚之弟兄的见证	71
关于陆道雄弟兄的见证	76

关于余道勝弟兄的见证	85
徐腓力弟兄的见证	87
第三部分 1950年代官方史料的背景研究	91
殉道者、洗脑者、被洗脑者：在1950年代政治思想改造中看对倪柝声的控罪	91
倪柝声的道德问题探讨	165
第四部分 回应许梅骊、梁家麟、连曦等人的不实叙述	178
倪徐恩秀论生化药厂与倪柝声弟兄职事的恢复	184
倪怀祖妻子倪徐奉先姊妹的访谈纪录	187
关于1942-1948年倪柝声停职之原因 及生化药厂经营问题之讨论[1]	197
李淵如姊妹的交通与见证并倪弟兄的回应	203
李常受弟兄对当时事件的记录与说明	205
徐腓力对许梅骊不实叙述的回应	207
张锡康对许梅骊不当引用其回忆录的澄清与说明	209
后记	216

第一部分

倪柝声的生平、职事与殉道¹

得救与蒙召

十六世纪起，更正教传教士到中国传福音，这些传教士带来三样宝贝：主的名（就是主自己）、福音和圣经。二十世纪初期义和团之乱，许多传教士和大批中国信徒殉道，这逼迫唤起了西方世界的圣徒为着主在中国的行动迫切祷告。借着这些祷告，一些中国信徒被兴起成为有能力的传福音者，他们的传扬达到了中国新一代的学生。一九二〇年前后，福音深入许多学校，全国从北到南有许多中学生和大学生被主得着。好些优秀的人才蒙主呼召，受主装备，作祂的工作。

在这些杰出的学生中，有一位名为倪述祖。他的英文名字是Henry Nee（倪亨利）。他的祖父倪玉成，就读于福州的美国公理会，并成为闽北公理会信徒中头一位中国人牧师。他的祖母是福州的美国公理会女子学院的学生。他的父亲倪文修，是第二代的基督徒，就读于福州的美国美以美会书院，在中国古文上受过良好的训练，并成为中国海关的官员。他的母亲林和平，也是第二代的基督徒，就读于上海的中西女塾。出生前，母亲就将他奉献给主。他在一九三六年说到自己的得救见证：

我是出身于基督教家庭。在我之上有两个姊姊。当家母生她们时，我的姑母不欢喜，因为我有一位伯母，一连生了六个女孩。按当时中国的风俗，是重男轻女的。所以当家母生了两个女孩之后，人说家母也要象伯母一样，生半打女孩后才会生男孩。那时家母虽未清楚得救，但也会祈求主。她对主说，“我若生一个男孩子，我就要把他奉献给你。”主竟然听了她的祷告，我就生下来了。日后父亲对我说，“妈妈未生你时，就已经应许把你献给主了。”

我是一九二〇年十七岁时得救的。我得救前，心中大有交战，要决定是否接受主耶稣作救主，也要决定是否作主的仆人事奉祂。多数人得救时所要解决的，是怎样从罪里被拯救出来；但在我，得救脱离罪与终生的事业是连在一起的。我若接受主耶稣为救主，同时也就要接受祂为主。祂不只要把我从罪中救出来，也要把我从世界里救出来。那时我怕得救，因为我知道一得救后非事奉主不可。因此，我的得救必须是双重的。我不能将主的呼召放在一边，而只要得救。要信主，就两方面都要有；不然，就两方面都不要。在我身上，要接受主，这两件事就要同时发生。

一九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晚上，我独自在房间里，有坐卧不安之感，问题是要信主还是不信。起先我想不信主耶稣，不作基督徒；但不信又不安，里面起了挣扎。后来我跪下祷告。起初没有话祷告，但过了些时，我看见有许多的罪摆在面前，并知道自己是一个罪

¹ 本转载并整理自《今时代神聖啟示的先見》

人。在我的一生中，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一面看见自己是罪人，一面也看见救主；一面看见罪的污秽，一面也看见主的宝血能将我洗净，使我洁白如雪；一面看见主的双手钉在十字架上，一面也看见主伸出双手来欢迎我，并对我说，“我在这里等候接受你。”这样的爱折服了我，我无法抗拒，就决定接受主作我的救主。以前看见别人信主耶稣，我就讥笑他们，但那一夜我不能笑。我流泪认罪，求主赦免。认罪之后，罪担就脱落了，人觉得轻松，心中充满喜乐平安。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知道自己是罪人，第一次经历喜乐与平安。以前或者也有喜乐与平安，但得救后的喜乐与平安才是真正的。那夜我一人在房间里，我似乎看见了光，我也不知道自己在那里。我对主说，“主阿，你实在恩待了我。”²

1920年，十七岁的倪述祖被主的爱折服，不仅接受祂作救主，也放下了原先的打算和前途，蒙召事奉主。当时他就读于福州圣公会的三一书院，这所学校中英文的水准都很高。他被主兴起执行主的使命之后，给自己取了新的英文名字Watchman Nee（倪傲夫），以及新的中文名倪柝声，意即更夫打更的声音。他认为自己是更夫，被兴起向黑夜里的人发出打更的声音。

现在座中至少有三位，是我以前的同学。其中有一位是魏光禧弟兄，他能见证我在校中是何等不得了的学生，同时也是了不得的学生。坏的方面，我是一个常犯规的学生；好的方面，神给我天生的聪明，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论文常是贴榜的。那时我是个青年人，有许多好梦，有许多计划，为自己的前途设想，以为自己的断案是好的。我谦卑的说，我若向世界去搅的话，很可能会有大成就；我的同学也能见证这件事。得救以后，在我身上有许多新的事发生，我先前的打算都空了，都完了，我的前途都断送了。这事在别人或许是容易的，在我却是艰难的，因为我有许多的理想、梦想与打算。从我得救的那一夜起，我开始过新的生活，因为永生神的生命进入我里面了。

我的得救与蒙召事奉主是同时的。自那夜起，我没有一次怀疑我的呼召。在那一小时内，我决定了我的前途，一定永定。我知道一面主救我是为着我，但另一面主救我是为着祂自己。主一面要我得着祂永远的生命，一面要我来事奉祂，并与祂同工。我小时候不知何为传道，但渐长时，在我心目中的传道乃是世上最轻微的事，是最下流的。那时的传道人，多是欧美牧师的雇工，须看牧师的情面，每月不过赚得八九块大洋。我根本无意要作传道，不但不作传道，也不作基督徒。想不到，今日竟然拣选了我以前所看为轻微下流的传道职务。³

倪柝声得救后有强烈的负担传福音给他的同学和同乡。有一段时间，他每周六禁食，为要得着能力，在主日早晨的传福音聚会中传扬福音。借着他的传扬，几乎他所有的同学都被带到主面前，并且在他的学校带来了一次复兴。以下是他的见证：

自从得救之后，自然而然的就有爱罪人灵魂的心，盼望他们能得救，因此就在学校中开始向同学传福音作见证。作了约一年的工夫，没有一个人得救。那时我以为话越多，理由多，就能救人。我有很多话来讲主耶稣的事，但没有能力，叫听的人不受感动。

² 倪柝声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八日的公开见证，倪柝声文集，第二辑第六册，217-219页，台湾福音书房。

³ 倪柝声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八日的公开见证，倪柝声文集，第二辑第六册，219-220页，台湾福音书房。

后来遇见一位西国的刘教士（Miss Groves，）她是和受恩的同工，她问我得救了一年，曾救了几个人。我怕她问，所以就低下头来，很惭愧的轻声答说，“我有传福音给同学听，但他们不喜欢听，听了也不肯信，这个罪就归在他们自己的身上吧！”她就很爽直的对我说，“你不能引人归主，是因为你与神有间隔，或有隐存的罪尚未对付清楚，或有亏欠人的地方等等。”我承认有上面的情形。她问我是否愿意立即清理。我说我愿意。

她又问我：“你是怎样作见证呢？”我说，“我乱拉人来听，不管人听不听，我就开讲。”她说，“这是不对的，你应该先对神说话，然后对人说话。你也要向神祷告，将同学的姓名写下，问神那一个是要你祷告的，按名日日为他们祷告。当神安排有机会时，就向他们作见证。”

与她交通后，我就开始对付许多罪，例如赔偿、还债、与同学和好、向人认罪等等。在笔记簿中就写下六、七十人的名字，天天为他们祷告，将每人的名字都题到神的面前。有时每小时为他们祷告一次，在课堂上也暗中为他们祷告。有机会时就向他们作见证，劝他们信主耶稣。同学常向我开玩笑说，“讲道先生又来了，我们来听他讲道。”其实他们是不听的。

我又去见刘教士，并对她说，“你所告诉我的方法都作了，但为何不生效力呢？”她说，“你不要灰心，还要继续祷告，一直到有人得救。”我靠主恩典，日日继续祷告，有机会就作见证，并向他们传福音。再经几个月后，感谢主，在我的笔记簿中的六、七十位，除了一位未得救外，其余的人一一都得救了。⁴

我记得有一日要去讲道前，打开圣经要找题目，顺手就翻到诗篇七十三篇二十五节：“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读后就对自己说，“诗篇的作者能说这话，但我是不能的。”那时就发觉我与神中间是有隔膜。

今日我的妻子不在场，我可以把我与她婚前的一段故事题一题。十数年前，我与她很有感情，那时她还未得救，当我向她题到主耶稣的事，并劝她相信时，她把我当作笑柄。我对她的关系到底是如何呢？说起爱来，我是爱她，但我让她笑我所信的主。同时我也想一想，到底是主在我心中有地位呢？或是她在我心中有地位呢？我能说，青年人一落到爱情中，就很难将所爱的人放下！我在神前曾表示肯放下，但在心中我不肯。我再读诗篇七十三篇时，对神说，“我不能说，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因在地上我是有所爱。”当时圣灵指示我说，“这就是你的拦阻。”

那一个主日我也讲道，但不知道所讲的是是什么。我对神讲道，要神忍耐，求神先给我力量，以后我才放下她。我请神慢一点来对付这事。但是神从来不同人讲理由。那时我打算到边荒的西藏去布道，并向神题出好些事，或者能使神不向我题要放下我所爱之人的事。但神的手一指到那件事，祂是不肯收回的。无论怎样祷告都通不过。在学校亦无心读书，追求圣灵能力又得不着。我的心难过，多祷告，我以为苦求能转变神的心。感谢主一

⁴ 倪柝声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八日的公开见证，倪柝声文集，第二辑第六册，221-223页，台湾福音书房。

直要我学习拒绝自己，放下天然的爱情，专心的来爱祂；不然，今日我在祂手中是无用的人。祂用利刀来砍断我的天然生命，使我在世学所未学过的功课。

有一早晨我讲道，下午回到房中很难过，对神说，下礼拜一要去读书；同时亦追求圣灵的充满，并基督爱的充满。两周之内，我仍不能说诗篇七十三篇二十五节的话。感谢神，祂的爱充满了我，我终于肯放下她，大声宣告说，“放下她吧！永非我的人！”这样宣告之后，我就能说诗篇七十三篇二十五节的话。那一天，虽未到三层天，可以说已到二层天。我看世界变小了，好像只有我一人腾云驾雾于天上。我得救的那一夜，我的罪担全脱落，但放下我所爱的人那一天（这是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三日晚的事），我的心中一点霸占的东西都没有了。

到第二个礼拜就开始有人得救了。魏弟兄（我同班的同学）能为我作见证，我本来是很讲究服装的，我穿有红点的绸缎长袍，那一天我就脱下讲究的衣履，而穿上老旧俭朴的衣履。我跑到厨房里，煮浆糊，拿了一大束的福音标语到街上张贴墙上，并分发福音单张；这在那时的福建福州，尚是首创之举。

一九二二年下学期，在学校中开始福音工作，有多人得救。我天天为记在簿中的同学祷告。一九二三年起，我们开始用借或租来聚会的地方，广传福音，那时约有数百人得救。凡名记在簿中者除一个未得救外，其余全数得救。这是证明神答应这样的祷告。神是定规你要为罪人祷告，他们才能得救，这数年中更能证实此事。⁵

装备与造就

倪弟兄一开始过基督徒生活，就殷勤研读圣经。他不仅按顺序研读圣经各卷，得着整体的概念，也专一研读一卷书，如创世记、但以理书、马太福音、罗马书或启示录，探索神话语中那一部分的深奥。他也会依照真理、字词、预表、寓意、比喻、数目、预言、人物、历史、诗歌等主题进行专题研读。他教导人每天读三章旧约一章新约，一年读完圣经一遍。他自己也在二十岁左右，约有一年之久，每周读新约一次。借着用许多不同的方式读圣经，倪柝声对圣经非常纯熟，也得着关于神的定旨、基督、召会以及救恩和生命之事的亮光。他表示：“神如果要借着我们去对别人说话，也是根据祂所已经说的话。我们如果不知道神已经说的话，神就不能借着我们去对别人说话，我们在神面前就成了没有用处的人”，“每一个要认识神的人，都应当好好地读神的话。每一个信主的人，一开始，就要知道读神的话的紧要”。⁶

倪柝声不只对圣经有卓越的研究，他也用心研读属灵书报。他有杰出的恩赐，能选择、了解、分辨并记忆适当的材料，并能轻易抓住一本书的要点。读基督教的书报，不只帮助他得着属灵的亮光与生命，也使他对召会历史和西方的基督教有丰富的认识。他熟识潘汤（D. M. Panton）、郭维德（Robert Govett）、彭伯（G. H. Pember）、宾路易师母（Jessie Penn-Lewis）、史百克（T. Austin-Sparks）等人的著作。他也收集了达秘（J. N. Darby）、

⁵ 倪柝声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八日的公开见证，倪柝声文集，第二辑第六册，225-228页，台湾福音书房。

⁶ 初信造就（上册），倪柝声文集，第三辑第二册，165页，台湾福音书房。

开雷 (William Kelly)、马金多 (C.H. Mackintosh) 等弟兄会教师的著作。此外，他还收集了许多别人的著作。他早年尽职时，收入的三分之一自己用，三分之一帮助别人，剩下三分之一买书。他与伦敦一些旧书店约定，只要他们收得他所订的书，就自动寄出。这样，他几乎收集了第一世纪起所有一流的基督教著作。他收集了三千本最好的基督教书籍，包括召会历史、杰出基督徒的传记和自传以及属灵著者的中心信息和解经。他二十三岁时，卧房里几乎都是书，地上也是书，甚至床上还是两排书，一边一排，只留下中间一条空处给他躺下。人常说，他是埋在书堆里的。他一面读这些书籍，一面勤读圣经，这不只使他对圣经的内容多有学习，更使他的观点得着平衡。这样的研读使他比前人认识更多真理，这大大加强并充实了他的职事。他从教父的著作，以及各世纪一直到现代所有著名作者的著作中，采取了所有合乎圣经的观点，把它们汇集在一起，摆在他基督徒生活的实行与召会生活的实行中。

除了从圣经和属灵著作得帮助外，倪柝声在基督徒生活初期也从和受恩 (Margaret E. Barber) 那里得到许多属灵的造就和成全。和受恩是圣公会差到中国福建的宣教士，她对主有活的认识，对十字架有深的经历，并且一直操练十字架的功课。她住在倪弟兄的故乡福州市的市郊，为着主在中国的行动多方祷告，并帮助那些因追求主而到她那里寻求指引的人。和受恩对青年人的管教极其严格，经常在许多事上责备来接受她帮助的青年人。倪柝声每次去见和教士，她总是责备他。她经常指出，青年人事奉主，不能这样不能那样。但是，她越责备，倪弟兄越回去受责备。因着有意把自己送去给她责备，他得着许多帮助。借着和受恩，倪柝声认识并经历什么是背十字架，并学习如何接受十字架的破碎，以成就神的旨意：

一九二三年我们有七位同工，我与另一位比我大五岁的同工是领头的。我们每周五有同工聚会，其余五人都是听我们二人争执。那时我们都年轻，各有各的看法。我说他错，他说我错。那时我的血气未受对付，常发脾气。今日 (一九三六年) 我会笑，那时我很少笑。二人争执时，我承认错多，但有时候他也有错。我对自己的错容易赦免，对别人的错却不容易赦免。周五我们相争，周六我就去去年长的和受恩姊妹那里，控告比我大五岁的那位同工。我说，“我告诉那位同工某事应当那样作，但他不听，你要向他说话。”和姊妹说，“他比你大五岁，你应当听他的话而顺从他。”我说，“是不是有道理或没有道理都要听他呢？”她说，“是的，圣经说年幼的应当顺服年长的。”我说，“这样我是作不到的，基督徒也该按道理行事。”她说，“你不要管有理或无理，圣经是说，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我心里生气说，圣经为什么这样说？我要发脾气又发不出来。

每次周五起争执之后，我就去见她，向她诉苦；但她又引圣经的话，要我顺服年长的。有时周五下午相争，晚上我哭了一场，第二天就去见和教士，向她诉苦，以为她能为我伸冤，但周六晚我回家时还要哭一场。我是恨自己为什么不早一点出生。有一次的争执，是我有好的理由，我以为去告诉她，她必定会看出我的同工是错的，并支持我。但她说，“某某同工错不错是另一件事，今天你在我面前这样控诉弟兄，像不像个背十字架的人呢？像不像羔羊呢？”给她一问我实觉惭愧；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我的言语和态度，的确不像一个背十字架的人，不像羔羊。

在这样的光景中，我学习顺服年长的同工。那一年半里，我学了一生中最宝贵的功课。我的头脑充满许多的理想，但神要我进入属灵的实际。那一年半给我认识什么是背十字架。今日（一九三六年）我们有五十多位同工，若不是在那一年半中学了顺服的功课，恐怕我无法与任何人同工。神将我放在那样的环境中，要我接受圣灵的管治。在那十八个月中，我没有机会出主张，只能哭泣并痛苦的忍受。若不是这样，我永远不会承认自己是一个难受对付的人。神要将我的七棱八角磨掉，这是不容易的事。但感谢神，赞美神，靠着祂的恩典将我带过去了。

我现在可以对年幼的同工说，你若经不起十字架的磨炼，就不会成为有用的器皿。只有羔羊的灵—温柔、谦卑、和平，才是神所喜悦的。你的雄心、大志、干才，在神面前都是无用的。我走过这条路，我必须常常承认我的错处。我一切的事都在神的手中。问题不在于对不对，乃在于像不像背十字架的人。在召会中，对与不对都没有地位，算得数的乃是背十字架，并接受十字架的破碎。这才能流露神的生命，并成就神的旨意。⁷

和受恩帮助倪柝声认识基督徒的工作不在于外面的恩赐或能力，而在于灵与生命，基督徒必须看重里面神圣生命的运行，过于外面的工作（腓二13）。他有时与和教士一同去听基督教里的人讲道。他总是欣赏讲者的口才、知识、热心、才干或天然的说服力。和教士就会向他指出，他所羡慕的不是出于生命，也不是出于灵。他所羡慕的也许能把人挑动起来，推动人作某些工作，但绝不能将生命供应给人。借着这样属灵的诊断，他受了教育，分辨并分别生命与工作的不同。

许多人认识和受恩教士，都能见证，她很特别。你到她那里，在她面前坐一会，然后从那里出来，你就知道你有错。你觉得她有的，你没有，你会羡慕要得着她所有的。我在十五年前（主后一九二一年），刚信主时，非常骄傲（外面骄傲的人少，里面骄傲的人多），读一二章圣经，以为不错，就到她那里，要讲给她听。等我和她祷告几句，她还没有责骂我，我就知道自己的骄傲了...⁸

我初得救的时候，很注重讲解圣经，我研究如何分段、如何引经、如何用比喻等。我听别人讲道，就批评他讲的好不好、对不对；我也盼望多得别人的材料，看看自己能不能讲的那样好。就是听和受恩姊妹讲道，也是持着这样的态度。有时候我很不佩服别人讲的道。那时我还不能分别什么是生命，什么是死亡，总以为思想、道理才是要紧的。我一直听和受恩姊妹讲道，两年之后，有一次她叫我讲，要看看我讲的如何。我就用心的豫备，自己觉得很好，思想很毅，条理清楚，解释详尽，比喻也用得好。讲完以后，我以为她会一两句称赞的话。但是她什么也没说，好像没这件事一样。我心里在说，就是不好，你也应该批评一两句才对。但是她就是不说。有一天，我和她一同在院子里散步，她对我说一句话：“你若是有一天能毅看见，光是思想是不毅的，那就好了。”我听了之后，莫名其妙，而且也不能佩服这些话。心里就说，你讲道不也是引用比喻，引用圣经的么？和我讲的有什么不同呢？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但是今天我知道了。她讲道的话里面带有生命，

⁷ 倪柝声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八日的公开见证，倪柝声文集，第二辑第六册，228-230页，台湾福音书房。

⁸ 特会、信息、及谈话记录（卷二），倪柝声文集，第二辑第二十二册，12页，台湾福音书房。

而我讲道的话里面只是思想，却没有生命；她讲的道能叫人摸着生命，而我所讲的不过叫人得着知识。⁹

一九二六年，我办基督徒报第二期，讲到但以理第二、四、七章，帖撒罗尼迦前书，以及启示录。那时候我说到这些豫言，因为学得不多，所以写得很简单。序也写了，也就印了。我自己觉得好，也没有多少要懊悔的地方。我又收到三百几十封读者的来信，说他们读过以后，觉得非常好，也很得着帮助、鼓励、并警戒。我自己也觉得得意。有一天，当我与和受恩姊妹在一起时，我就问她：“你收到我写的基督徒报没有？你觉得内容如何？”她一点都不在意，只和我说到她的茶和鸡蛋糕等。我几次要引起她对我的基督徒报的注意，但她还是说她的茶、饼干和糖。后来等到我要走的时候，她才对我说了一句话，她说，“弟兄，有一天你就会知道，好的，不一定好。”我就问她：“你是不是指基督徒报第二期说的呢？”她说，“是。”她又说，“我若是有十期的基督徒报要写，我也不愿意把那些东西放进去，我要写些别的东西。”当时，我不能佩服这些话。但一天过一天，我认识了，不是你能拿出多少，也不是自己作了多少，乃是神作多少。无论是口才，无论是智慧，或者是能力，一切出于人的都是无用的。¹⁰

我曾问和受恩教士，有没有一两本论十字架道理的书可以借阅。她回答说，有这样的书，但你现在的情形不能读，读也没有用。过了几天，我觉得忍不住，就在谈话中探出书名，后来获赠该书，立刻阅读。但读后一面得着帮助，另一面大失所望，因为该书不能解决我对十字架的问题。我那时以为该书若原原本本的写就好，但那些书不是这样写法。我的头脑总想把神学道理搞清楚，但神所要的给人的却是灵与生命。俞弟兄所译盖恩夫人的书，里面从来没有查经，但读过之后却能叫人得着帮助。读这些书，生命得着滋养；读知识的书，生命得不着滋养。我们作主的仆人，必须在生命方面多供应人，不是在道理上给人教训。¹¹

和受恩于一九三〇年到主那里去。她在遗嘱里把自己的圣经，里面有她读经的笔记，留给了倪柝声。借着和教士的推介，倪柝声阅读了郭维德、潘汤和宾路易师母等人所写的顶尖属灵书报，得知关于解经和召会历史最好的书籍，这些都为倪柝声的基督徒生活和事奉打下美好的根基。

所得的启示

倪柝声熟读圣经，并得助于近两千年来对于圣经讲解的名著，不只晓得圣经中字句的道理，更认识圣经中真理的原则、灵意、生命和圣经的灵。因此他讲经传道，无论由口述，或藉写作，都是照着他从圣经中所看见的神圣异象，和属灵的启示。一九二七年，他在《基督徒报》

⁹ 特会、信息、及谈话记录（卷四），倪柝声文集，第二辑第二十四册，181-182页，台湾福音书房。

¹⁰ 特会、信息、及谈话记录（卷五），倪柝声文集，第二辑第二十五册，205-206页，台湾福音书房。

¹¹ 特会、信息、及谈话记录（卷五），倪柝声文集，第二辑第二十五册，97-98页，台湾福音书房。

第十三/十四期的发刊辞中写道：“圣经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标准。若是圣经纯正的道，我们绝不因人的反对之故，而怕传；若不是圣经的道，就是有了众是我们也不敢赞同”。

倪柝声相信一切真基督徒所持守合乎圣经、基要的信仰。他相信圣经是神的圣言，字字都是神所默示的。他相信神是三一的一父、子、灵一三者有别，却完全是一；从永远到永远同时并存，互相内在。他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神自己，成为肉体来作人，兼有属人和神圣的生命；祂死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第三日带着身体从死人中复活；祂升到天上，登了宝座，得着荣耀为冠冕，被立为万有的主；祂要再来提接跟随祂的人、拯救以色列并在地上建立千年国。他相信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会蒙神赦免，为祂赎罪的血所洗，因信称义，由圣灵重生，并借恩得救。这样一位信徒乃是神的儿女，并基督身体的肢体。他也相信每一个信徒的定命，乃是构成召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并神的家的一部分。

除了这五方面基督徒基本的信仰以外，他进一步得着亮光，看见另外五十三项合乎圣经的教训，这些教训对充明白并实行基督徒信仰都很要紧。倪柝声离世后，他的同工李常受将倪所恢复的真理要点记录如下：

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三二年

1 得救的证实

主首先向倪弟兄启示的基本项目之一，乃是信徒得救的证实。当时在整个中国，很少基督徒团体照着圣经教导得救的证实。然而，倪弟兄对这件事非常清楚，他向基督徒传福音，帮助他们看见自己得救了。他能用圣经明言的话给人看见，信徒对自己的得救，可以有完全的把握。他会帮助有疑问的人读一节圣经，如约翰三章十六节，把这节加以消化，直到他们感到这话是确定的，他们绝不会灭亡了。他也向他们指出，神的灵住在他们里面，与他们的灵同证，他们是神的儿女（罗八16）。倪弟兄进一步从约壹三章十四节举出得救的证实：“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2 恩典与律法的区别

当时基督徒大多没有得救的证实，因为他们不知道恩典与律法的区别。倪弟兄得着主清楚的启示，看见得救单单是借着恩典，不是凭着律法。得救若是律法的事，就是在于我们自己的行为。但救恩乃属乎主的恩典，只在于祂的所是，并祂为我们所作的。

3 得救与得胜的不同

有些基督徒不知道得救与得胜的不同。这是不确定自己得救的另一原因。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的那一刻，我们的救恩就一定永定了。但得胜乃在于胜过罪、世界、肉体、己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一切消极的事物。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借着简单地相信耶稣基督，就得着救恩，我们永远的定命是永远稳固的。但得胜乃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并且与时代的赏赐有关。

4 得救与得赏赐的分别

基督徒若不清楚得救与得赏赐的分别，对自己得救的证实就会有难处。这区别向倪弟兄完全启示出来。得救是靠着恩典，借着信（弗二8）；得赏赐是照主的旨意工作的结果（太十六27，林前三14）。

5 诸天的国与永远生命的不同

有些基督徒不敢说自己得救，因为他们不清楚得永远生命与进诸天的国是不同的。当一个人相信主耶稣而得救了，他就得着永远的生命。但要进入诸天的国，他必须在诸天的管治下过日常生活。这样的生活在现今召会时代是一种操练，使我们有资格在国度时代有分于主千年国里的管治。这样的有分乃是对于在属天管治下过生活的赏赐，而不是永远救恩的事。在这事上，倪弟兄领受了透彻并清楚的启示。

6 国度的真理

倪弟兄也全面地看见新约中关于国度的真理。他看见新约说到诸天的国与神的国是有分别的。神的国包括神整个的掌权，从已过的永远到将来的永远，但诸天的国是神的国里面一个较小的范围，乃是现今召会时代里信徒中间属天的管治（太五3、10），又是要来国度时代里的赏赐（太五20，七21）。所有重生的信徒都在神的国里（约三5），但只有那些在属天管治下过生活的人，会承受国度时代为赏赐。神的国与救恩有关，而诸天的国与赏赐有关。

7 被提

随着国度的启示，主也给倪弟兄关于被提的启示。今天基要的神学告诉基督徒说，只要他们是得救的，就能一同有分于普遍的被提，全召会都要在灾前被提。但倪弟兄看见，不是所有信徒都同时被提。有些信徒在灾前作了成熟的得胜者，所以就首先被提。然而大体信徒后来才成熟，所以晚一点被提。国度是赏赐的事，被提是成熟的事。被提可比作收割。农作物还青嫩的时候，不会收割到仓里；必须先成熟，才能收割。所有的基督徒也必须生命成熟；当他们成熟时，主就把他们收割，并带到属天的仓里。有两点必须清楚记在心里：（1）国度是给得胜信徒的赏赐，（2）被提需要得胜者的成熟。

8 基督教的偏差

倪弟兄和几个年轻的信徒，得救后不久，借着研读圣经，就开始发现今日的基督教是何等不正常；那时他们还是学生。主给他们看见今日所实行的基督教，几乎每一点都偏离了神在祂圣言里所命定的。

9 召会，艾克利西亚，基督的身体

主给倪弟兄关于祂的召会清楚的启示。他传讲并教导说，召会不是建筑物，不是组织或基督教的差会。召会乃是生机体，是活的身体。另一方面，召会是艾克利西亚（ekklesia），就是蒙召出来的会众。

10 召会的两面

倪弟兄看见召会有宇宙的一面，也有地方的一面。全宇宙中只有一个召会，就是神的召会（林前十32）。这独一的召会在地上显于许多地方，在每一个地方就是一个地方召会。宇宙召会由所有地方召会所组成，地方召会就是宇宙召会的实际显出。马太十六章十八节启示出宇宙召会，而在马太十八章十七节，我们看见地方召会。若没有地方召会，就无法有分于宇宙召会，无法过实行的召会生活。在使徒行传、书信并启示录里，召会乃是显为地方召会，就如在耶路撒冷的召会，在安提阿的召会，在以弗所的召会等等。召会的行政不是宇宙的，乃是地方的。

11 宗派

倪弟兄得着关于召会之启示的同时，也看见宗派的邪恶。宗派把基督的身体分裂成许多组织。这是圣经所定罪的（林前一11~13）。

12 圣品制度与宗教组织

倪弟兄也得着亮光，看见圣品阶级与平信徒制度的不对。这种制度包括任何一种形式之基督教中的组织、圣阶与地位，这种基督教已经沦为一种人为的组织了。罗马天主教里有神父、主教、大主教、红衣主教以及教皇。圣公会里有牧师、主教、大主教，以统治的君主为元首。更正教里有牧师。这种圣品阶级制度显然与新约的启示相对，并抹煞了基督身体上肢体的功用。宗派使基督的身体支离破碎，圣品阶级扼杀了基督身体上所有肢体的功用。

13 普遍的祭司职任

这普遍的祭司职任是另一项向倪弟兄启示出来的真理。他看见新约中的祭司职任与旧约的不同。旧约的祭司职任至终是在亚伦的子孙身上，产生一种与平民不同的圣品阶级。但新约的祭司职任是给所有信徒的（启一6，彼前二5、9）。新约中没有圣品阶级与平信徒之分，人人都是祭司。

14 正当的长老职分

倪弟兄从圣经领受清楚的启示，看见召会该由一个长老团来治理。每一个地方召会都需要一班老练的弟兄们作带领人和监督，照顾召会一切的活动。在圣经中，这班人称为长老或监督。

15 职任与恩赐的不同

倪弟兄从圣经看见召会的职任与恩赐的不同。召会的职任包括长老与执事，是地方一面的（腓一1）；恩赐包括申言者、传福音者以及牧人和教师，是宇宙一面的（弗四11）。

16 受浸与擘饼

主向倪弟兄启示正当的受浸方式乃是浸入水里。主也给他看见合乎圣经的擘饼之路。受浸是信徒见证自己老旧的生活已经了结，并且他已经从世界分别出来，归给主和主的身體。擘饼乃是记念主，也是见证祂身体的合一与交通。

17 蒙头与接手

倪弟兄也看见蒙头和真正实行接手合乎圣经的意义。蒙头是显示召会里对基督元首权柄的顺服。接手是联合的行动，指明将身体里的一些东西分赐给身体上另一些肢体。借着接手，就将属灵的恩赐分赐给一些肢体，也实化了基督身体肢体间的交通。

18 信靠神的生活

倪弟兄看见真正事奉神的人必须过信靠神的生活，而不该受雇于宗教组织。在倪弟兄早年尽职的时候，信心生活的实行在中国几乎是不为人所知的。弟兄会中间没有雇用事奉主的人，但他们来到中国的时候，认为要教导中国人过信靠神的生活是不可能的。中国基督徒的观念里根本没有过信心生活这回事；然而，倪弟兄不仅教导这事，他也亲自这样实行。

19 神医

倪弟兄不仅相信圣经中的神医，他自己也经历到这事。对他而言，这不仅仅是外面神迹的恩赐，乃是里面的经历，叫人的生命得着建立。

20 基督的死与复活

主给倪弟兄看见，基督死与复活的专特启示。他看见基督的死有两面：客观一面，对付我们的罪性、罪行、世界、撒但和黑暗的权势；主观一面，对付我们的肉体、我们的己和我们的旧人。他也看见在基督的死里，旧造被了结了。这是十字架消极的方面。在积极方面，基督神圣的生命被释放出来，使新造有新生的起头。在我们主的复活里，祂神圣的生命释放出来，以重生信徒，使他们成为基督身体上的肢体。从祂的复活，召会就出现了；并且在祂的复活里，基督的身体正被建造。也是在祂复活的大能里，信徒能背十字架，并在同祂受苦的交通里，模成祂的死（腓三10）。主的子民享受着基督复活的生命，就得着加力，虽然行走在地上，过的却是圣别、属天的生活。这复活就是复活的基督自己，并且基督的灵是这复活的实际。

21 基督的升天

倪弟兄看见基督已经升到诸天之上，远超万有。地的吸力、鬼魔、空中掌权者的元首以及一切黑暗的权势，都不能阻挠或留住祂。这些现今都在祂的脚下。借着祂的升天，祂已被立为万有的主（徒二36），并且借着祂的升天，所有跟随祂的人也被带到诸天界里（弗二6）。祂的地位、祂的职事和祂的生命现今都是属天的。现今祂正在作工，将属天的生命并诸天本身供应到祂的子民里面，使他们成为属天的子民，在地上过属天的生活。

22 基督的再来

倪弟兄对基督的再来得着了清楚、透彻的看见。他看见主的来临（希腊文，parousia，巴路西亚）有隐密的一面，和公开的一面。对那些儆醒寻求祂，并等候祂再来的人，祂要在在大灾难以前，从诸天来到空中，象贼一样隐密地来到（太二四43，启三3）。但对那些沉迷于世界的人，祂要在在大灾难以后，从空中来到地上，象闪电一般来到（太二四27、30）。在祂隐密的来临里，信徒要被提到空中；祂公开的来临就要给地上的世界带来审判。

23 圣灵的内住

这位钉死、复活、升天的基督，如今乃是住在祂的子民里面，作生命的灵，使基督对他们成为实际。基督这内住的灵就是圣灵，也是神的灵。神圣的灵主要的功用乃是将神圣的生命分赐到神的子民里面，重生他们，膏抹他们，并用神的成分浸透他们，好圣别、变化他们。倪弟兄多方传讲这事。

24 膏油涂抹的教导

倪弟兄领受了关于圣灵的启示，同时也得着亮光，看见膏油涂抹的教导。膏油的涂抹乃是圣灵在我们灵里的运行与工作。膏油的涂抹从里面，在凡事上教导我们（约壹二27）。生命的律代替了旧约的律法，膏油涂抹的教导代替了旧约的申言者。我们乃是借着膏油涂抹的教导，住在主里面。

25 圣灵的浇灌

倪弟兄看见圣灵的两面：圣灵的内住，为着生命；以及圣灵的浇灌，为着能力。主从死人中复活的那天，就将圣灵吹到门徒里面（约二十22）。那时，圣灵进入门徒里面，就住在他们里面，目的是为着分赐生命。但在五旬节那天，圣灵浇灌在门徒身上（徒二4、33）。那灵的浇灌，目的是为着分给门徒能力。这是对那灵的第二种经历，圣经称之为圣灵的浸。大多基督徒没有看见那灵这两面的不同。然而，倪弟兄在这个区别上领受了清楚的启示。他虽然从未说过方言，但他一再得着圣灵浇灌的经历。

26 人的三部分

倪弟兄在他基督徒生活的早年，就已经看见人有三部分：灵、魂和身体（帖前五23）。他看见魂是人的个格；身体是人外在的部分，为接触物质的世界；灵是人最里面的部分，为接触属灵的世界。因为神是灵，所以我们必须在我们的灵里敬拜祂并事奉祂（罗一9，约四24）。信徒乃是在他们的灵里，为神的灵所重生；神的灵与他们的灵同作见证（罗八16）；主耶稣是与他们的灵同在（提后四22）；并且他们与主成为一灵（林前六17）。灵必须与魂分开（来四12），使信徒能在他们的灵里行事生活并工作（加五16、25），并作属灵的人（林前二14~15）。

27 因信成圣

在一九二五年以前不久，倪弟兄就看见因信成圣的事。就着卫斯理约翰有关成圣的教训，他得了亮光，并说卫斯理所教导的不是真正的成圣，乃是无罪的完全。他经过研究，

发现弟兄们在成圣的异象上，比卫斯理更进一步。但弟兄们对成圣的教训虽然准确，又过于客观，仅仅是一种地位的改变。弟兄们教导说，在世界里的金子是凡俗的，但金子一摆在殿里就成圣了。弟兄们进一步举例并教导说，羊群、牛群里的羊和牛是凡俗的，但一献在坛上就成圣了（太二三17、19）。此外，弟兄们还举例说，市场上的食物是凡俗的，但一放到基督徒的饭桌上，经过祝谢便成圣了。倪弟兄指出，这些例子全是指地位上外面的改变，没有包括里面性质上的改变。他教导说，成圣不仅是地位上的改变，更必须是性质上的改变（罗六19、22）。

28 基督作生命

基督对相信祂的人乃是生命（西三4），这生命就是在他们灵里生命的灵（罗八2）。凡信徒所作的，必须出于这内里的生命。每一个信徒都该凭里面这神圣的生命而活（加二20）。

29 生命之灵的律

信徒从主所领受神圣的生命乃是在圣灵里。圣灵乃称为生命的灵（罗八2）。这神圣的生命有它本身的律和特征，它的功用就是用神的神圣成分来规律我们，供应我们。这不是仅仅外面律法的字句，乃是神的灵在我们灵里所执行生命的律（来八10）。倪弟兄对这里面的律得着了完满的启示。借着这里面的律，就是所谓的生命的律，我们就得了释放，脱离了罪与死的律，能以过公义、圣别的生活。

30 罪和死的律

倪弟兄从圣经看见，罪和死乃是一个律（罗八2）。这律是在我们身体的肢体里（罗七23），并且是出于撒但邪恶的生命。每一个堕落的人都在它的权势下。但生命之灵的律比罪和死的律更有能力，能把我们从其中释放出来。

31 更美之约

主耶稣用祂的血为我们所立的新约，比旧约更美（来七22，八6）。旧约是按着旧约的律法，其祭司职任是照着属肉之诫命的律法；新约是按着生命的律，其祭司职任是照着不能毁坏之生命的大能（来八10，七16）。

32 基督得胜的生命

因为基督已经胜过撒但和宇宙中一切消极的事物，所以祂的生命乃是得胜的生命。我们若凭基督活着，祂的生命就为我们胜过一切消极的事物。

33 得胜者的呼召

倪弟兄得着启示，看见对得胜者的呼召。因着全召会都失败了，不能满足主的定旨，主就进来呼召祂信徒中的一些人作得胜者。这清楚启示在启示录二、三章的七封书信里。因为全召会偏离了目标，所以主就向那些爱祂的人发出祂的呼召，要他们胜过堕落的召会。

34 属灵的争战

一九二五年以前，倪弟兄就看见了属灵的争战这件事。他看见为了完成神在宇宙中神圣的定旨，至终在神和祂仇敌撒但之间有一场争战要成形。这争战牵涉神所有的儿女。他们若站在撒但那一边，就是背叛神；他们若站在神这一边，就是敌挡撒但。所有得胜的信徒都当看见，他们是在战场上，为着神的神圣定旨争战。信徒要打这场属灵的仗，就需要看见自己属天的地位。以弗所二章清楚说到我们是坐在诸天界里，以弗所六章也指明我们是与诸天界里的权势争战。信徒必须守住他们属天的地位，好使他们能击败神在诸天界里的仇敌。信徒的地位若是在地上，他们就在仇敌之下，他们也就失去得胜的地位。

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七年

35 地方召会的界限

一九三三、三四年之间，倪弟兄看见了地方召会的界限，乃是以召会所在的城市为界限。他指出一个城市的界限以内不该有一个以上的召会。这自然就把分裂除去了。

36 基督的中心与普及

在一九三三、三四年，倪弟兄也看见了在神永远的定旨里，基督的中心与普及。他看见在宇宙中并在基督徒的生活中，基督都该居首位（西一18）；他也看见在新人召会里，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西三10~11）。

37 地方召会的立场

一九三七年，倪弟兄开始看见地方召会的立场。这比地方的界限更往前一步，指明信徒不该为任何事所分裂。召会的立场就是一一的立场。我们无论到哪里或在哪里，都该与那地的信徒是一。一个城里只该有一个召会。召会不该是在某个家里的召会、在某家工厂里的召会、在某个校园里的召会、在某条街上的召会或有某种名称的召会。地方召会乃是一个城里的召会。若一个地方有一个以上的召会，那地方的信徒就会分裂了。

38 移民

倪弟兄从使徒行传清楚看见，有两条传福音的路：一是借着差派使徒；一是借着信徒的移民（徒八4）。在他的职事之下，这两种方法都曾用来传福音。

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二年

39 召会生活的实行

一九三九年倪弟兄进一步得着关于召会的亮光，这次是关于召会生活的实行。他从新约得着清楚的亮光，看见长老该如何实际地尽他们长老的职任，执事和女执事该如何服事圣徒和召会。他也帮助召会所有的肢体有分于召会的事务。

40 召会的实际

倪弟兄看见召会实行上的一面，同时也看见召会的实际。他强调召会的内容，必须是基督在所有肢体里面活着，并借着所有肢体活出来。任何不是基督的事物，就不是召会。实际上说，召会就是基督。所以，基督乃是召会的实际，召会该是基督的彰显。

41 召会的一

召会真正的一乃是那灵的一（弗四3）。真实的一不是道理、意见或某些作法上的一；真实的一乃是那灵自己。虽然我们可能在道理上和作法上一致，但我们若不在灵里，就没有真正的一。

42 看见身体

在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二年，倪弟兄一直有负担讲到基督身体的异象。他有负担帮助基督徒看见身体，不是在道理上的，乃是在实行上的。他不断着重地说，看见身体就不可能有个人主义。人一旦看见了身体，就会有团体的行事、为人。

43 身体中圣灵的权柄

倪弟兄看见基督的身体既是一个生机体，圣灵就必须在凡事上，在每一部分，都有主权。身体一切的活动，都必须在圣灵的权柄和指引之下。

44 圣灵的实际

圣灵是一切属灵事物的实际。除非圣灵亲自作每件属灵事物的内容和实际，不然，属灵事物这辞就是虚空的。圣灵乃是基督徒生命的实际，也是他们生活的实际。凡他们的所是和所作，都必须有圣灵作实际。

45 召会的权柄

倪弟兄看见，要有实际召会生活的实行，就需要有权柄。作头的基督所分给祂身体上某些肢体的权柄，就称为代表权柄。地方召会必须在这种代表权柄之下，有美好的秩序。这权柄对地方召会的建造非常要紧。借此召会就成了一个直立的器皿。因此，顺服是必需的。

46 召会的建造

主借着倪弟兄启示，信徒必须与别人一同实际地、在召会的权柄下建造在地方召会中。这种建造对真正的属灵乃是试验。人若不能与别人一同被建造在地方召会中，他的属灵就是有问题的。

47 召会生活中的配搭

倪弟兄所得着的另一个启示，与权柄和建造有密切的关系，就是关于召会中配搭的启示。地方召会中所有的肢体不仅需要与别人建造在一起，也要与别人配搭在一起。召会的事奉不能由个人来完成；所有肢体必须配搭着来服事。

48 身体与属灵的争战

在倪弟兄早年尽职的时候，他看见个人一面属灵的争战。然而，从一九三九年起，他看见这不仅是个人的事，更是身体的事。以弗所六章的战士不是单个的信徒，乃是基督的身体。倪弟兄强有力地着重说，信徒若有个人主义，就很难抵挡诸天界里的权势。要抵挡仇敌，我们需要身体。我们不仅需要在诸天界里，也需要在身体里。

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八年

49 圣灵的管治

在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八年这段期间，倪弟兄受了很多苦。在这段时间，他学习看见，为着重组我们这个人，并破碎我们外面的人，就需要圣灵的管治。他看见神主宰安排我们的环境，借着圣灵的管治，为我们效力。圣灵安排我们的环境，并借着我们的环境管治我们，为要用神圣的成分在里面重组我们。

50 外面之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

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八年，正当倪弟兄经过他那段长期受苦的时候，他就看见外面之人的破碎与人灵的出来。基督的灵住在我们的灵里。我们外面的人若没有破碎，我们的灵同基督的灵，就会被限制在我们外面之人的壳子里。因此，我们外面的人极其需要破碎，好叫我们的灵，连同基督的灵能得着释放，将生命分赐给别人。圣灵的管治拆毁我们天然生命的某些方面，同时也破碎我们外面的人。

51 运用灵

倪弟兄得着关于释放灵的亮光，同时也看见信徒必须学习如何运用他们人的灵。在供应话语、传福音、接触人时，甚至在日常生活的事上，信徒都必须先用他们的灵，不是用他们的心思、情感或知识。在这一切之前总得用灵。借着我们的灵，我们才能摸着别人的灵。信徒惟有借着他的灵，才能传输生命的灵，并将生命分赐到人里面。

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〇年

52 工作的区域

一九四八年，倪弟兄得着启示，看见召会是地方的，工作却是区域的。召会是地方的事，但工作乃是区域或地区的事。在彼得工作之下的众召会各在不同地方，但彼得的工作却是在一个区域里，这区域是由这些召会所在的地方组成。保罗的工作，以及借着他的工作所兴起的众召会，也是如此。

53 将一切交出来

倪弟兄看见，为使工作能达成目的，并使地方召会得以实际地建造起来，所有主恢复中的信徒需要不仅把自己交出来，更把他们一切所有的交给工作。借此，信徒就被释放脱离自私和个人主义。这也帮助信徒顺服主的权柄。这甚至给主机使用信徒的财物来为着祂的定旨，并赐给他们更多物质的祝福。

所过的生活

倪柝声不仅从圣经中看见神圣的启示，也愿意顺从圣经放弃传统，向着他所看见的真理而活，并学习活在主的同在中。他发现他与神之间的任何事物都是祷告得答应了的拦阻。那对于他为着他的需要信靠神，也是一种打岔，并使他与神的同在隔绝。同时他看见他必须向神彻底认罪，并且完全改正与人有关的任何错误。他在这两件事上非常严格，以维持无亏的良心（提前一5，徒二四16）。每当他为着某件事与神有来往时，神就会对付他，要他除去某些事物，以维持他与神的交通。他终其一生都是这样与神同行。

活在神的同在中

为了活在神的同在中，他对付罪、世俗、肉体、己、己的爱好和不顺从。在对付罪方面，他一再写信给圣徒承认他的错误、亏欠和过失，请求赦免。他在人面前和神面前都对付罪。在擘饼聚会中，许多时候人听见他在祷告中承认他是有罪的，并求主赦免他。他的良心对于在神面前任何罪恶的事物都是敏锐的，因为他一直在人和神面前对付罪，不留下什么是没有对付的，借此保守良心清洁，以维持与神亲密的交通。

在对付世俗方面，他除去生活中一切属世的事物，在他家中、在他的穿着上或是在与他生活有关的任何事上，没有一点世俗的痕迹。虽然他不是把这事当作律法来遵行，但他一生过的都是与世俗分别的生活。他不仅在生活上，也在工作上保守自己不属世。他所有刊物的设计都不带有世界的样式，他所引进召会中的实行也没有任何世界的味道。

倪柝声领悟肉体是堕落之人最坏的部分，总是与神的灵相争（创六3，加五17），因此总是抵挡他的肉体 and 天然个性，照着内里的膏油涂抹而行。他惧怕他的肉体，不愿照着他的肉体作什么；他乃是不断照着他的灵行事为人，使他不失去神的同在。

他也看见堕落的人被撒但浸透，并且很容易就能成为撒但的化身和彰显，如同彼得在马太十六章二十一至二十三节的经历。因此他在跟随主的事上，不断地否认己（太十六24）。他惧怕己，并且定罪己，过于其他消极的事物。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在他的工作上并在他与别人的接触上，总是背十字架并否认己。他也认识人堕落性情里己的爱好，他知道扫罗王因着己的爱好失去他的王位和宝座（撒上十五1~28）。他领悟己的爱好比罪或世俗更狡诈。因此他不允许己在属灵的事或主的工作上有任何自己的爱好。

倪柝声也从经历中学到，没有一件事能顶替顺从，甚至美好和属灵的事也不能。对他而言，顺从主就是忠于主所定的旨意；不象巴兰接受祂许可的旨意（民二二2~35）。任何事物偏离了主所定的旨意，就是不顺从。对他而言，不顺从是将他与神的同在隔离的幔子。他强调要从主接受亮光和启示，就需要没有帕子遮蔽的脸。和受恩教士告诉他，一小片树叶就能使人看不见满月，他也把这话传给他亲密的同伴。他既领悟不顺从会使人失去神的同在，他就定意不计任何代价顺从主的旨意和主的启示。

倪柝声认识，要保守与主的交通不受中断，就学习应用基督的血。惟有主的血能使人的良心脱离在神面前任何一种定罪。他倚靠主血的洗净，维持不断地与神同在。倪柝声彻底学习照着内里的膏油涂抹，住在主里面的功课（约壹二27~28）。内里的膏油涂抹乃是主在他里面的运行和工作。不顺从膏油涂抹就是不顺从主自己。惟有借着顺从内里的膏油涂抹，他才能最亲近、最密切地与主同行。

借着以上所有的实行，他一直保守自己在神的同在中。没有什么阴影得以介入他与神之间，他一直维持着与主的交通。在这样与主不间断的交通中，他一直接受属天的亮光和属灵的启示。他非常宝贵神的同在。神的同在对他乃是生命、亮光、能力和得胜。在神的同在中，他享受神供备的一切丰富。显然他从劳伦斯（Lawrence）弟兄所著的《与神同在》一书得着很大的帮助。在这事上，他也借着戴德生（Hudson Taylor）的传记得着很大的帮助。

过钉十字架的生活

不仅如此，倪柝声也认识要凭基督作生命而活，必须看见基督之死的主观方面。倪柝声看见他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活着的不再是他，乃是基督在他里面活着。要主观经历基督的死，就要背十字架，他必须留在基督的钉死里。留在基督的钉死里就是背十字架，不让旧人或肉体离开十字架。他知道要有这样的经历，神必须主宰安排他的环境，使其成为实际的十字架，让他背负。这就是神所作的。从他职事的开始，神就安排环境，叫他在其中背十字架否认己，凭基督作生命而活。

他一直是一个在十字架之下的人，愿意接受反对、弃绝、批评和责备。他不为自己表白，不原谅自己，不与人讲理由或说明事情，来减少所受的苦。他总是避免显露自己，不让人知道他为主作了什么善工，为人作了什么美事。他实在是过钉十字架的生活。

倪柝声早年尽职时，曾被他的六位同工革除。那时他的血气和肉体发作，要对他们的行动有所反应；与他们一起聚会的圣徒，也多数站在他这边，使他的这个倾向更为加强。当他出外作工的时候，有人写信和打电报告诉他说，他被革除了。他收到电报和来信时，里面有禁止叫他不读。但在回福州的船上，他读了这些信和电报，十分气愤。他觉得六位同工革除他是不公平的，打算回去为自己表白。然而，圣灵在他里面立刻使他清楚，主不许他为自己表白，他就因主而静默。他到了福州，许多弟兄姊妹到码头迎接他，他们禁不住告诉他，六位同工如何不公平地对待他。当天晚上，他们又从码头跟到他家里，他们的同情都激动他的血气，但主强力制止他，不许他有任何行动。那时弟兄姊妹挤在一起，等候他说明确的话；他说主不许他为自己表白，他第二天就要离家到别地去，离开那个局面。他叫他们安静，这使他们非常失望。在那艰难的处境中，他多方学习如何实际留在主的死里，背十字架，好凭基督并为基督而活。在那段受苦的期间，他写了以下这首诗：

- 一 我若稍微偏离正路，我要立刻舒服；
但我记念我主基督，如何忠心受苦。

- 二 我今已经撇弃世界，所有关系都解；
虽然道路越走越窄，但我在此是客。
 - 三 管他世人怒目白眼，我只求主笑脸；
群众虽然喜欢外貌，但我要主的“好”。
 - 四 我心所望不是伟大，不是今生通达；
我愿现在卑微事主，那日得祂称许。
 - 五 我今每日举目细望审判台前亮光；
愿我所有生活、工作，那日都能耐火。
 - 六 让你们去得着名声、富足、荣耀、友朋，
让你们去得着成功、赞美、从者、兴隆。
 - 七 但我只愿孤单、贫穷，在此不求亨通；
我心切望忠诚跟从我主到了路终。
 - 八 因我知道，主在此世不过得着一死，
所以现在我无他望，只望因祂失丧。
 - 九 我的荣耀还在将来，今日只得忍耐；
我决不肯先我的主在此世界得福。
 - 十 那日我要得着冠冕，主要拭我泪眼！
今日主既仍旧迟延，我要忠心进前。
- (诗歌四六八首)

倪柝声住在上海还未结婚的时候，他母亲来与他同住了一段时间。有人散播谣言说，有一个女人与他住在一起。一位先前帮助过他的姊妹刘教士 (Miss Groves) 听见这谣言，就来问他说，“听说有一个女人和你住在一起，是真的么？”他回答说，“是的。”于是刘教士责备他。多年以后，他把这事告诉他的同工，他的同工问他，“你为什么告诉她，那女人是你母亲？”他回答说，“刘教士并没有问我那女人是谁。”他就是不愿意为表白自己而向人说明事情。

倪柝声结婚以后，他妻子的姑母威胁说，他若不去她那里行拜访之礼，就要采取行动破坏他的名声。这样一来，他就不去拜访她了。她若没有威胁他，他还会去看她。但在她的威胁之下，他反而不愿应她的要求去作。他拒绝作任何事来减少别人对他的攻击。他相信一切事故都是出于神的手，愿意忍受任何的反对或攻击，作为十字架，为要过与基督同钉的生活。

一九四二年上海召会起了一场关于他的大风波。他不说一句话为自己表白，也不采取任何行动，来平息当时的局面或减少他所受的苦楚。再一次，他学习十字架的功课，凭着那活在他里面的基督过钉十字架的生活。

因着那一次的风波，倪柝声被迫停止他的职事六年之久。在那受苦的六年中，他没有作什么。他既未试图恢复他的职事，也没有试图开始别的工作。他完全静默，在神主宰手下，学习十字架的功课。在那长期的试炼之中，他把自己完全限制于基督的死里，经历基督作他的生命。经过那六年漫长的黑夜，黎明破晓时，主在一九四八年借着上海的一次复兴，恢复了他的职事，那时他请我们唱以下这首诗歌，说到葡萄一生的事。这首诗描绘葡萄不断受各种苦难和对付，但仍然结果子叫别人喜乐。其中三节说：

然而全冬之间，它酒却赐甘甜，
给那寒冷之中，忧郁愁苦之众；
但是葡萄却在外面，孤独经历雪地冰天，
坚定忍受一切，一切可疑、难解！
直到寒冬已过，它又预备结果，
重新萌芽生枝，再来放绿成姿；
不因已往所受磨难，心中有了埋怨不甘；
不因所失无限，而欲减少奉献。
它的所有呼吸，尽是高天清气，
并不半点沾染不洁属地情感；
面向牺牲，依然含笑，再来接受爱的剥削，
有如从未遇过损失、痛苦、折磨。
(诗歌四六五首)

这首诗指明他一直在苦难和对付之下，为要结属灵的果子，叫别人喜乐。经过那漫长的冬天，他又预备结果，不因人的恶待而生怨，也不愿减少自己新鲜的奉献。他告诉他的同工，虽然我们为着真理必须毫不犹豫地争辩，但当我们的行为和品格被人批评时，我们不该为自己表白。一九四八年在上海召会中有一位弟兄，因长期有野心要得地位却未得逞，就反对倪柝声。这位弟兄资助一位游行布道家，这布道家写了一长篇文章批评控告倪柝声。这篇文章广为流传，但倪柝声没有作什么为自己表白。他亲密的同工李常受见证：“我与他在一起这么久，从来没有看过他与人争吵、争论或争执。人总是从他得着一个印象，他是跟随羔羊的脚踪，活在耶稣的治死之下，好叫耶稣的生命得以显在他身上（林后四10）”。

过复活的生活

倪柝声也看见他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并且与基督一同复活。复活的基督带着那灵的丰满，作了他的生命。凭着内住基督复活的生命，他才能背十字架，有分于基督苦难的交通，并模成基督的死。凭着基督复活的生命，他撇下世界，丢弃前途，否认自己，得释放脱离罪，胜过缠累的罪行，克服撒但的试诱，战胜撒但邪恶的计谋，并打败撒但自己。他也是凭着基督复活的生命，事奉主，为主作工，完成主的使命。他在事奉主的事上，一直弃绝自己天然的力量，惟恐自己介入主的工作里。他不敢离开内住的基督而服事。他释放信息，接触人，写作，与圣徒通信，甚至处理琐碎的事情，都不凭自己，乃凭复活的生命。

他更进一步看见召会是基督的身体，乃是复活基督的扩大、扩展与彰显。他所看见在复活里的基督是召会的生命与内容这个异象，是独特的。他不只凭复活的基督服事，也把复活的基督服事给圣徒，好建造基督的身体。他常常强调，任何事若不是在复活里的基督，就不是召会；任何事若不是凭复活的基督作的，就是身体上的外来物。他服事召会，不凭别的，只凭复活的基督。他越尽职事，就越把复活的基督供应给圣徒和召会。复活的基督不只成了他的生命与生活，也成了他的信息与职事。他是一个不只认识复活生命，更凭着复活的基督、带着复活的基督生活并服事的人；他也是一个背十字架，有分于基督的受苦，并模成基督的死的人。我信乃是凭着过这样复活的生活，使他能以经过漫长的殉道，被监禁二十年，以至于死。

过得胜的生活

倪弟兄借着查读圣经，并阅读宾路易师母的著作，得着清楚的异象，知道什么是作得胜者。他在旧约和新约都看见这原则：每当神的子民失败了，神就呼召一些人回到祂原初的标准，胜过失败的情形，成就祂的定旨。这也是主在启示录二、三章给七个召会的七封书信中所一再强调的。倪弟兄看见召会的光景堕落了，他蒙主呼召在这个时代作得胜者，使主得以恢复祂对召会原初的定旨。神够用恩典之丰富的供备，使他能凭复活基督的大能，过这样得胜的生活。他得胜的生活，乃是过钉死并复活之生活的结果。凭着钉死并复活的生命，他胜过罪、世界、己、自怜、天然、肉体 and 撒但。凭着钉死并复活的生命，他也胜过了失败、堕落、偏差的基督教，及其一切形式和传统。同样的，他也凭着钉死并复活的生命，胜过基督教的批评、弃绝、反对和逼迫。借着过这样的生活，他跟随他的主人，就是羔羊，得胜地出到基督教的营外，忍受祂所受的凌辱。他过这样得胜的生活，跟随使徒保罗的脚踪，为基督的身体，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西一24）。至终，借着过这样得胜的生活，他成了基督活的见证人，不只在被罪侵袭的世界中，也在被撒但侵袭的基督教中，背负“耶稣的见证”（启一9）。他不仅自己活得胜的生命，也将这样的生命供应给圣徒和召会。他职事的负担之一，是主领好几次得胜聚会。这些特会中所释放之信息的目标，乃是发出得胜者的呼召。他的心意是要帮助圣徒过得胜的生活，也就是过钉死、复活的生活，为着主见证的恢复，在这世代中作得胜者。

在他一生并他尽职的年日里，倪柝声一直紧紧地联于钉死、复活的基督，活在得胜生命的实际里。在他人生的最后一段，表面看他因着政局的改变而不能尽职，实际上乃是神的主宰，将他放在一种环境中，使他有二十年之久，过得胜的生活。他的确是过这样的生活，得胜以至于死。

经历圣灵的管治

倪柝声和古时的雅各一样，在主手中经过许多对付。在他停止尽职这一段长期的试炼之后，我们在上海与他交通时，他经常说到圣灵的管治。他从经历中学了以下的功课：当神的儿女寻求祂的时候，无论他们身上发生什么事，无论源头是什么，无论对付的性质是什么，无论是如何发生的，一切都是神主宰的手所安排的。我们环境中这主宰的安排，就是圣灵的管治。神的灵借着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管治我们。

倪弟兄看见我们天然的所是算不得什么；惟有那灵在我们这人里面所构成的才算数。我们与生俱来的所是，无论好坏，无论有没有用，都是天然的，都是拦阻圣灵将神圣的生命构成到我们这人里面。为这缘故，我们天然的力量、天然的智慧、天然的聪明、天然的个性、天然的缺点、天然的美德和天然的属性，加上我们的性格和习惯，都必须被拆毁，好使圣灵在我们里面形成新的个性、新的性格、新的习惯、新的美德和新的属性。为了完成这重新构成的工作，神的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用神圣的生命光照、感动、引导并浸透我们；祂也在我们的环境里作工，安排我们处境里的每一细节和人事物，好拆毁我们天然的所是。祂也许将某个人安排在我们家里，为要拆毁我们天然的快或慢。祂也许安排某些事，废掉我们天然的聪明或迟钝。祂也许安排另一种处境，拆毁我们天然的智慧或愚拙。祂用各种人事物拆毁我们天然人的各方面，为要将我们模成基督的形像。

倪弟兄看见，在罗马八章，一面神的灵在我们里面作工，叫我们实化儿子的名分；另一面，在我们的环境里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使我们模成祂长子的形像。一切与我们有关的人和处境，都是神的灵所安排的，好配合祂在我们里面的工作，使我们被模成神长子的形像。那灵在里面的工作，是要为我们构成一个新人；而那灵在外面的工作，是要借着环境拆毁我们旧人天然的每一方面。

倪弟兄强调这事的重要。凡是我们天然生命的东西，都必须被拆毁，使我们这人由圣灵用神圣的生命重新构成。借着历年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事，他学知神的儿女需要圣灵的管治。他学习接受各种环境，没有抱怨、怨尤、怨恨或批评。他认为一切都是圣灵的管治。一切都叫他在属灵上得益处。他不愿错过任何机会学习功课，并得着益处。他经常问那些在受苦的人说，“你学了什么功课？你得了什么益处？”他没有教导我们任何人改良自己的性格，或改正自己的行为；他帮助我们众人学习圣灵管治的功课。

他不断地提醒我们，改良性格或改正行为不过是使天然的人好一些；而圣灵的管治是拆毁我们天然的人，构成更新的人。

我从未看见或听见他定罪任何人事物。他总是安静、平和，愿意接受任何一种环境。无论景况如何，他总是让圣灵有机会，拆毁他天然生命的某一方面，并用神圣的生命更新他。他总是预备好与内住的灵合作，让祂借着外面的环境施行祂的管治。因此，他总是与别人相和，在主里安息，并在生命里长大。

外面之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

倪柝声弟兄在他基督徒生活的早期，就学习如何背十字架，过钉十字架的生活，并且活在主的同在中。他所著《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一书，各章都是他早年所学习的功课。后来，他又学习圣灵的管治、外面之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等进一步属灵的功课。经过战争期间所受许多的苦难之后，在我们与他的交通中，他所强调的就是这三个主要的点：圣灵的管治、外面之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

毫无疑问，在他长期的受苦中，他学了许多功课，但在他的交通中，他没有指明其他的功课。他只说到外面之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这些经历也都是他的实际。一九四〇年代末期，他恢复尽职时，从他所出来的，给人一种印象：这是一个经过破碎的人，那灵借着他能完全得释放。

他经常分享说，虽然圣灵住在我们灵里，但我们外面的人若不被破碎，我们的灵绝不能得释放。住在我们灵里的圣灵，受我们外面之人的局限和拘禁。为这缘故，外面的人必须被破碎，使里面的人（带着圣灵的人灵）能得释放。这实际的圣经依据是林后四章十六节：“我们外面的人虽然在毁坏，我们里面的人却日日在更新。”

倪弟兄教导说，我们接触别人、传扬福音、供应话语或作见证时，需要灵的释放，使那生命的灵能我们从我们出来，将生命分赐给别人。在见证和职事里能分赐多少生命，在于有多少灵能我们从我们里面释放出来；有多少灵能释放出来，在于外面的人破碎了多少。这不仅仅是拆毁天然人的某一面；这乃是破碎外面的人。

倪弟兄接触别人时，不是运用他天然的洞察力，了解他们的情况。他总是运用他的灵，察觉他们在主面前的真实光景。每当他听人说话或对人说话的时候，首要的总是他得释放的灵，不是他外面被破碎的人。结果他对别人所说的，就不仅仅是知识或教训，乃是在他得释放的灵里所传输生命的供应。

他供应话语时，重要的是他灵的出来。他所关心的不是道理，乃是他灵的出来。

对他而言，除非有灵的出来，神话语的职事就是失败的。让灵出来对倪弟兄并不难，因为经过许多受苦的年日，他外面的人已被破碎。然而，我们这些与他在一起的人很难让我们的灵出来，因为我们外面的人仍然是完整的。

他与别人在一起或供应话语时，不需要花很长的时间预备让他的灵出来。在开头的話里，不要多少时间他就能让他的灵出来。他外面的人既被破碎，他就能随时让他的灵出来，除非他特意限制他的灵。我们其他的人不容易让我们的灵出来；但他很难限制他的灵，因为他外面之人的壳子已被破碎。

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不只是在灵里的行事为人，使我们能过属灵的生活；我们是说到灵的出来，使生命能我们从我们里面出来，供应且滋养别人。倪弟兄的交通与职事在生命上是丰富的。秘诀就在于，他外面的人已被破碎，并且他的灵很容易出来。

倪弟兄非常强调外面之人的破碎为着灵的出来。他说，外面之人的破碎不是在短时间内就能完成的。我们一生所有的情况和环境都是神所安排的，以成就这一件事。这是圣灵管治的终极完成。

在他恢复尽职后的日子里，他一再强调外面之人的破碎。他交通到主的工作时，指出在同工中间，功用有多少，果子有多少，所受的限制都是由于缺少这一件事：外面之人的破碎。借着多年的受苦，他充分经历了这破碎，并且在这事上立下美好的榜样。

负担与使命

倪柝声弟兄对圣经的研究，对许多属灵书籍的研读，使他在神的经纶上得着许多亮光。他接受负担为主作工，乃是照着他从主所领受的启示，所给他的使命。他的负担分为好几类：传扬福音、造就青年信徒、教导真理、作主特别的见证、建立地方召会。除了向同学传扬福音外，他也把福音带给家乡的人，数以百计的人得救，并且生活有所改变。

在传福音之后，倪弟兄有负担在其他五方面帮助青年信徒：(1)在他们基督徒的行事为人上；(2)在生命的长大上；(3)在认识圣经上；(4)在认识宗派的错误上；以及(5)在认识召会上。他指导他们如何向神彻底承认他们的罪；如何与别人和好；如何彻底清理已往；如何胜过罪；如何弃绝世界；如何将自己奉献给主；如何研读圣经；如何祷告；如何引导别人归主；如何与圣徒聚会并交通；如何寻求主的旨意；如何跟随内里的膏油涂抹；如何凭信而活；如何弃绝宗派；并如何保守身体的合一。为了达成这目的，他花了两年的时间，致力于发行一种叫作《基督徒报》的月刊，这月刊广为流传，每期印刷数千分，成百跟随主的青年从这些信息得着深远的造就。

倪弟兄也有负担帮助信徒正确领会与主权益有关的属灵事物，并教导他们圣经的真理。在他早期的职事里，他带人查读启示录。接着，他带领在上海的召会彻底查读马太福音，查读被提与大灾难、如何聚会以及好些别的题目。他既透彻明白圣经，就渴望一卷一卷地解释圣经，但主拦阻了这意念。之后，他领悟主给他的负担并托付，是在于两件事：(1)作主特别的见证；(2)建立地方召会。

他从主领受了特别的负担和托付，为这真理作见证。为着卸下这负担，他释放口述的信息，也于一九二二年底发行一种叫作《复兴报》的刊物，专一论到神深奥的事，由生命的信息组成，以主耶稣为中心，特别注重祂的生命、钉死、复活、代祷、身体、再临和国度，目的是为着栽培属灵的生命。历年来他也一再召开特别聚会，释放关于这些更深主题的信息。在一九二八年一至四月《复兴报》第一期公开的信中，他说：

乃是因为我们从神那里接受了使命，要我们专门在属灵的生命，和属灵的争战上帮助神的儿女的缘故，我们才发刊了这个小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所特别需要的真理。我们就是要借着《复兴报》为今时代的真理作见证。¹²

其次，倪弟兄终极的负担是要建立并建造地方召会。他的异象乃是：传扬福音、造就信徒、教导圣经真理以及为主作特别的见证，都当照着神的经纶，以建立并建造地方召会。前四者不是神的目标，乃是达成神目标的手续，神的目标就是建立并建造地方召会。神渴望照着祂新约的经纶得着众地方召会；这是祂永远的计划。这清楚且着重地启示在新约里，这也是新约启示的中心点。倪柝声弟兄和使徒保罗一样，对这启示有完全的负担和托付。他在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日福建鼓浪屿的一场聚会里见证：

¹² 一九二八年一至四月《复兴报》第一期公开的信，倪柝声文集，第一辑第八册，1页。

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三年中，各地都有复兴布道会。多人以为只有这样的布道会，引人归主，才算是为神工作。但神给我看见，神的目的是要蒙恩得救的人，站在地方合一的立场上，代表神的教会，维持神的见证。只是有一班的同工在教会的真理上看法不同。当我花时间查读使徒行传时，就看见神要在各城市建立地方教会。那时这个光临到我身上是相当清楚，给我看见神的目的是在此。

光一来就出了问题，因为有的同工未见这个光，大家对工作的重点不同，就有摩擦的事。有的同工觉得应该热心于复兴布道的工作，并且这个工作易见果效；但我的负担是要建立地方教会，对于复兴布道比较冷淡。有一位比我年长的同工常出外开布道会，我心中有时也受试探想开我自己的复兴布道会。然而，我没有那样作；当他出去时，我就照着我的异象去作，他一回来就把我所作的改过去，照着他的意思作。当他又出去时，我就改过来，照着我的异象来作，因此二人时常翻来覆去。在工作上所领受的光既然不同，工作的路也就不同。一条是专门复兴布道的路，一条是建立地方教会的路。主所给我看见的非常清楚，就是不久祂一定会在中国多处兴起地方教会来。我的眼睛一闭起来，就看见地方教会的产生。¹³

从生病卧床至得神的医治后，我更清楚知道神所要我作的工是什么。大约可分为下列四方面：

文字工作

当我生病之前，我不只到各地领特别聚会，我还有一个大雄心，要写一本最详细、最好的圣经注解。我打算花费很多的精神、时间和金钱，来写一部厚厚的、有一百卷之多的注解。在南京病时，写了“属灵人”之后，我知道解经的工作不是我的分；可是以后还是常有这试探。病愈后神给我看见，祂给我信息的中心，不是解经，不是传普通的福音，不是注重预言或外面的东西，乃是着重生命的活道。所以我觉得要继续出复兴报，在属灵的生命和属灵的争战上，帮助神的儿女。

每一个时代，都有那个时代所特别需要的真理。我们活在这末了时代的人，也必定有我们这些人所特别需要的真理。复兴报正是这个凭藉，好为今时代的真理担负见证。我深深的相信，现今是预备的时候了，神的儿女要被收割，必须先“熟”（可四29）才可。提接的时候已到，但是教会预备了没有，乃是最重要的问题。神在今日的目的，就是要赶快建造祂儿子的身体，也就是教会。正如经所记：“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作个荣耀的教会。”（弗五26~27。）借此仇敌能速速被除灭，并把国度带进来。我谦卑的盼望，能在神的手里，在这荣耀的工作上有一点分。我所写出来的一切，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读者完全在新造里归于神，在神手里作个有用的人。我现在专一的将我的文字、我的读者、和我自己，交托给那永远保守人的神，愿意祂的灵引导我们进入祂一切的真理！

¹³ 倪柝声弟兄三次公开的见证，倪柝声文集，第二辑第六册，238-239页，台湾福音书房。

召开得胜聚会

神使我看见，在各地教会须兴起一班得胜者（如启示录二、三章中所说的），作主的见证人。所以每年召开一次得胜聚会，将神给我的信息，忠心的传扬出去。

建立地方教会

主呼召我来事奉祂，不是重在各地开复兴布道会，使人多听圣经的道理；不是本身要作一个布道家。主乃是给我看见，祂要在各地建立地方教会，来彰显祂自己，并站在地方的立场上作合一的见证，使圣徒们在教会中各尽功用，过教会生活。神所要的不仅是个人追求得胜，追求属灵等等，乃是要得着一个团体的荣耀的教会献给祂自己。

训练青年人

若是主延迟回来，就需要兴起一班青年人，继续第二代的见证与工作。很多同工已经为这事祷告，盼望能预备合式的地方，为训练青年人用。我的意思不是要开神学院，或圣经学校，乃是要青年人，住在一起过身体生活，操练属灵生命。他们在这里受训练，得造就，学读经，学祷告，并建立良好的性格。在消极方面，训练是要他们学习如何对付罪、世界、肉体、天然生命等。到了适当的时候，这些青年人要回到各地教会，与众圣徒一同配搭，在教会里事奉主。我已经在上海郊外真茹，买了十几亩地，进行建筑计划，不久青年人就可以到那里受训。

今后我个人的负担与工作，大概是在这四方面。愿主能得一切的荣耀。我们自己没有什么，虽然作了一切主所吩咐我们的事，还只当承认自己是“无用的仆人！”（路十七10。）¹⁴

生命的职事

职事出自启示加上苦难。人若没有启示，就无法有职事，因为他没有什么可供应的。人也许有启示，但若缺少苦难，他仍没有职事。他有的也许是一种教训或恩赐，但这不是职事。教训与职事有所不同。职事是更高更深的。恩赐是肤浅的，价值低；职事是有分量的，价值高。你若从神领受了启示，祂就要将你摆在苦难中，为要使你职事。我们能供应别人的生命有多少，实际有多少，基督的丰富有多少，完全在于两个元素：我们领受了多少启示，以及我们为所得的启示经过了多少苦难。启示加上苦难，才使我们有职事。保罗说，“因此，我们既……受了这职事。”（林后四1）他不是说他有什么教训或恩赐，乃是说有职事。他又说，“我保罗也作了这执事。”（西一23）他不是说他成了讲员或教师，乃是说成了执事。执事是有真正职事的人；这职事是出自两件事—启示加上苦难。

借着苦难，启示作到倪弟兄里面，由此产生出职事。他的职事很清楚地有两方面：第一是基督，第二是召会。他的职事是完全、正确、平衡的。我从未见过任何人象倪弟兄，在基督与

¹⁴ 倪柝声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日的公开见证，倪柝声文集，第二辑第六册，248-251页，台湾福音书房。

召会这两面，这样完全且充分的平衡。他对基督有清楚的异象，对召会也有完全的启示。在他所释放的信息和出版的文字中，这两面总是适度平衡的。在美国许多人知道他出版一本又一本的书，讲到基督是生命，基督是一切。但你也许不晓得他也出版一本又一本的书，论到召会的事。

关于召会，在他的职事中包括两个要点：召会的内容与召会的实行，或说，召会的实际与召会的实行。召会的内容与实际就是基督自己。按照倪弟兄所看见的异象，基督不仅仅是为着个别的信徒，更是为着团体的召会。他的异象不象今天所谓属灵的人；他们坚持基督主要是为着个别的基督徒，却很少顾到召会。他们甚至害怕说到召会，因他们晓得每当提起召会的事，就造成难处，他们宁愿避开这一切难处。倪弟兄对基督的异象乃是，基督给个别的信徒享受，为要使他们在召会中被建造。至终我们所经历的基督，就成为召会的实际与内容。倪弟兄也看见，召会这实际也是可实行的，我们需要召会的实行。因此，他所供应的，乃是召会的实际与实行。召会的实际是其内容，召会的实行是其彰显。

基督不只是为着个别的基督徒，也是为着团体的身体。我们基督徒个别所享受的基督，完全是为着建造团体的身体。因此，基督是召会的内容与召会的实际。召会的实际就是由许多个别基督徒所团体实化的基督。我们要配得上这实际，就需要召会的实行。我们若留在家里，持守基督作实际，就不会有召会。即使我们能个别持守实际，我们也会缺少实行。基督徒需要来在一起同被建造；各人需要从他的小房间里出来，进入大房间里，在一个屋顶之下，实行召会生活。这样，我们就不仅有召会的实际，也有召会的实行。这就是倪柝声弟兄职事的两个要点。

倪弟兄关于基督作生命的职事，完全被人接受；但他关于召会的职事，经常被人弃绝。今天也是一样。在一九三五年七月所出版的《通问汇刊》第十二期里公开的信中，他强调这目标：“我们所明白的就是神要我们显出基督生命于地方的教会中。所以，我们工作的实际，是基督的生命。我们工作的外表，是地方的教会。”许多人从他关于基督作生命的职事得着帮助，但这些人不愿接受他关于召会的职事。许多书店备有他论基督作生命的书，却特意不供应他论召会的书。有些出版社出版他关于基督作生命的书，非常欣赏他这面的职事，却定罪他关于召会的职事。出版社和书店甚至尽量隐藏他关于召会的职事。我们完全赞同他论基督的书该出版，因这些书是了不起的。但隐藏他论召会的书，是完全不公平也不诚实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甚至有谣言传说，倪柝声改变了他对召会生活实行和召会立场的观念。这完全是不确实的。他所著《教会的路》一书毫无疑问地证明且显示，一九四八年后，他不只没有改变他对召会的观念，反而比从前更强地讲说他原初的异象。在这些信息中，有一篇是他下监以前不久释放的，他说他在一九三七年所看见关于召会的事，是绝对正确的。他反而证实他从前所看见的；他完全没有改变。他忠于主所赐，关于基督与召会的异象和使命。在他的一生中，他的职事是为着基督与召会，不是只为着基督，乃是为着基督与召会。

尽职专特的方式

在他三十年的职事里，他以多种不同方式尽职，将神给他的属灵丰富分享出去。他除了以一般的方式尽职，如传扬福音、教导圣经、出外尽职、接触人、与人通信等，也以专特的方式尽职，如开特别聚会、办训练以及出版书刊。他在一九二八年二月起不定期的召聚多次得胜聚会，人数虽然不多，影响和结果却是重大的。其余的称为特别聚会。从以下几段话里，可以看出他召开这些得胜聚会的目的：

我们顶盼望每一次在这特别的聚会里，只提及基督得胜的信息，而不说到其他的问题，因为这个信息是我们所特别负责传的。……实在说来，人若不是在信托并顺服上认识了神，就和他谈到许多别的问题是没有多大益处的。在忠心的人中，我们也提起那些问题，但是，在人还没有愿意忠心事奉神之前，提起这些问题，不过发生辩论而已。……我们“查经聚会”的性质就不同，乃是为着愿意忠心事奉神，而要对于圣经的真理有更明白的见解而设的。所以，在这个聚会里，就没有什么拦阻我们不提起一点我们在特别聚会里所不愿意提起的。所以，我们盼望在将来特别的聚会中，无论讲者、听者，都不在公众或者私人的面前提起关乎基督得胜之外的问题，好让神更能祝福我们。……这并非说别的问题是不要紧的；乃是说当人真要接受基督的得胜，而相信并顺服主的时候，那些外面的问题，主自然会叫他们注意，他们也很自然会顺服。……到了这样的地步，若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我们顶愿意在查经聚会里帮助他们。我们深深地感觉到，神的教会在今天所特别需要的，所绝对应当经历的，乃是基督的得胜，就是祂在祂的死里和复活里所表明的事实和原则。为着这个，我们要忠心，要持守，要专一地传扬。（摘自一九三一年九月至十二月，《复兴报》第二十二期。）

这聚会的目的，乃是为着联合各地同心的信徒在神的面前等候，并领受从神那里来的信息。在我们过去的经历中，我们都感觉到我们必须受更深的造就，所以，我们就不能不重看主所托付给我们“基督得胜”的见证。但愿主前的代祷者同心为这聚会祷告，使这聚会能真有圣灵清洁的能力，而没有一点属魂能力的搀杂。（摘自一九三一年七月，《复兴报》第二十期。）

关于这种聚会的性质，我愿意弟兄们知道，我们不是要注重圣经中枝节的问题，乃是要在圣灵里看见基督和祂的钉十字架。许多的问题，都有它们正当的地位。预言、教会的组织、圣经的解释、预表、受浸、按手、方言、神迹以及其他百十的问题，都有它们正当的地位。我们作基督人的，都不该不给予相当的地位。然而这些并不是圣经的中心；也不是圣灵生命的中心；神的中心只有一个，就是基督，就是基督和祂的钉十字架。我们每年这种的聚会，就是要回到这个中心来。所以在这个聚会里，我们一点不愿意提起任何枝节的问题，我们乃是光要注重神所注重的中心。……

我们这次的聚会，就是要继续以前那样的注重中心的信息。在我们的祷告中，我觉得神所给我对于这次聚会的题目乃是“神的得胜者”。会中的一切都要以此为中心。……

末了，盼望我们在这次的聚会中，是要求遇见基督，从天上得着亮光和启示，多充满生命，就是常人所不明白的生命，而非注意许多外面枝节的问题。“使我认识基督”（腓三10），这是我们所求的。（摘自一九三三年十至十二月《复兴报》第三十二期）

倪弟兄尽职第二种专特的方式，就是办训练。现在我们来看他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日在鼓浪屿所作第二次的见证中，论到这事所说的话：

若是主延迟回来，就需要兴起一班青年人，继续第二代的见证与工作。很多同工已经为这事祷告，盼望能预备合式的地方，为训练青年人用。我的意思不是开神学院，或圣经学校，乃是要青年人，住在一起过身体生活，操练属灵生命。他们在这里受训练得造就，学读经，学祷告，并建立良好的性格。在消极方面，训练是要他们学习如何对付罪、世界、肉体、天然生命等。到了适当的时候，这些青年人要回到各地教会，与众圣徒一同配搭，在教会里事奉主。我已经在上海郊外真茹，买了十几亩地，进行建筑计划，不久青年人就可以到那里受训。¹⁵

倪弟兄也在福州附近的鼓岭山上西教士夏季渡假的地方买了好些房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大多数西教士都离开中国，他们乐意以极低廉的价钱将房子出让。一九四八年有大约八十位弟兄姊妹在鼓岭山上，有一次四个月的训练。以下是其中一位受训者张晤晨弟兄的见证：

训练开始时，倪弟兄先有一篇说明。“第一，这次训练并不是一个神学校。所以不是给参加的人一点圣经知识，或一些作工方法。乃是帮助那些已在跟随主、走主道路的人，更往前去。我和李常受弟兄的职事有点不同。李弟兄能使无心的人变为有心，不行的人变成行，不走路的人起来走路。这点我承认我没有。二十年来，我只能叫那些有的人变为更多，要的人得到帮助。这次训练成功或失败，乃看你是哪种人。若你是有缠累，自满自足的人，就得不到帮助。真要走路的人，我能帮助你走得更远，有些光的人，我能帮助你更有光。我的职事不是叫你复兴、改变，乃是为已在走路的人领路，而不是将坐在家里不动的人拉出来走路。第二，这次训练要作四部分的工作：（1）怎样作神话语的执事；（2）怎样帮助初信的基督徒；（3）个人当有的注意及难处的解决；（四）如何治理教会的事务。”

倪柝声弟兄尽职第三种专特的方式，就是出版书刊。他撰写并印制福音单张，每年送出去的单张以百万计。他也按着不同的负担和需要发行各类刊物，如《复兴报》、《见证报》、《基督徒报》、《道路报》、《讲经记录》、《通问汇刊》、《敞开的门》、《执事报》、《佳音报》、《福音报》等。

倪柝声弟兄除了出版期刊以外，还出版许多书籍，以尽他的职事。这些书有的是在他的期刊上登过的信息，汇集成书出版的。这些书籍可分类成：关于福音的书籍、为造就初信者的书

¹⁵ 倪柝声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日的公开见证，倪柝声文集，第二辑第六册，251页，台湾福音书房。

籍、为着青少年的信息、给基督徒一般的信息、论到中心信息的书、论到召会实行的书、关于主工人的书、关于读经的书、英文属灵书籍的翻译，以及三本诗歌。

值得注意的是，倪柝声弟兄在文字工作上的需要完全仰望神的供给，他见证：

我将稿写好后，就开始为印刷费及发行费祷告祈求。神对我说，“你若要我答应你的祷告，你就要除去自己一切的拦阻。”……当我除去一切拦阻后，神就听我的祷告，感谢主！这是在印刷的事上我第一次经历神答应我的祷告。那时我们每日约分发千余福音单张，每年印发约二、三百万张，供应各地的教会。自开始文字工作后，数年中神都听我的祷告，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

主又要我办复兴报，免费供应人。那时全中国属灵的报都是卖钱的，只有我出的报是白送的。我的编辑室是一个小房间，我常在里面写稿，稿写好了就付印。没有印报款，就求神供应。……今日每次出版总在七千多本以上，所有的费用，都是象上面所述的情形，神按时供应我。我从来不作向人募捐的事，有时人还求我收钱。在这一切事上我一直是单仰望祂。¹⁶

倪柝声离世后，他的同工李常受将他生前所发表的文字和话语信息整理成六十二册的《倪柝声文集》，于1991年至1993年间陆续出版。在李常受为文集撰写的怀念简介里，他将倪弟兄一生所传扬并讲解的真理要点，大致整理为十二个项目：

关于神

他指出神是永远的，是自有永有，无始无终，在各方各面都是完全无缺的。神也是三一的，在祂的神格身位，祂乃是父、子、灵三者：父神是源头；子神是彰显；灵神是应用。子神是父神的具体化身；灵神又是子神的实际，将三一神应用实施于信入子里面的人。神又是圣的、义的：圣在于神内在的性情；义在于神外在的行动。神且是爱又是光：是爱乃在于祂内里性情的素质；是光乃在于祂外面彰显的素质。这位神有超凡的智慧，胜人的作为。

关于神永远的计划（经纶）

他指出这位有超凡智慧并胜人作为的神，祂所喜悦的心愿，乃是能有一班人，祂可与之联结为一，与祂同生命、同生活、同行动、同作为，使祂能从这一班人里面彰显出祂荣耀的自己。于是祂在已过的永远里，在祂自己里面，就豫定了祂永远的计划（经纶），要使得子神作祂这计划的中心与普及，得在凡事上居首位；并要创造一个宇宙，具有天地万物，好在其中创造有灵、魂、体三部分的人，作接受祂并彰显祂的器皿，祂能以祂灵的身分，进入人的灵里将人重生，使人成为祂的众子，与祂同生命、同性情，可作子神基督的众肢体，构成祂生机的身体，作祂团体的彰显，使三一神在这彰显里得着终极丰满的彰显，直到永永远远。

¹⁶ 倪柝声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日的公开见证，倪柝声文集，第二辑第六册，260-261页，台湾福音书房。

关于神的成为肉身

他指出神在创造人的时候，并没有将祂自己造到人里面，叫人有祂的生命和性情。乃是等到四千年后，祂在子神里，藉着灵神进入一个童女肉身里面，成孕而生为一个兼有神人二性的人，就是一个神人，是完整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将神带到人里面，在人的肉身里，在地上过人的生活，活出神一切的属性，作祂人性的美德，以彰显神。

关于基督

他指出神圣三一的第二者，在已过的永远里，被神立为基督，就是神的受膏者。祂到时间里，来完成神为着彰显祂自己所豫定的永远计划（经纶）。神要这位基督作祂的具体化身，在祂的永远计划中作中心、作普及，并在祂的创造与救赎里居首位，超越一切。祂所立的这位基督，就甘愿自卑，放下神的形状，取了奴仆的形状，成为人的样式，在地上过人式微的生活。祂这位基督最终到十字架上，为我们罪人完成了神永远的救赎，并释放出神永远的生命；又从死人中复活，由神的独生子变为神的长子，且成为赐生命的灵，进入祂的信徒，使他们成为神的新造，作祂的肢体，构成祂的身体，祂就作了祂这身体的生命、元素、和头，使祂在宇宙中得着一个团体的彰显，以彰显三一神。在要来的国度中，祂要作王，并使祂得胜的圣徒与祂同王，管治要来的世界。后在新天新地里，要作新耶路撒冷的中心与普及，成为神与人互居之所，作三一神在永世里丰满的彰显。

关于基督的死

他指出基督的死不是殉道的死，乃是代替我们罪人而死的死，具有多方面的意义：（一）为我们除去了罪；（二）为我们钉死了肉体，并结束了旧人；（三）为我们毁坏了掌死权的撒但；（四）为我们审判了在撒但手下的世界；（五）为我们废除了使我们彼此分裂的规条；（六）为我们满足了神的公义、圣别、和荣耀，在我们罪人身上一切的要求；并（七）为我们从祂里面释放出神永远的生命。

关于基督的复活

他指出基督的复活，乃是神藉着基督里面那神圣的灵，使祂全人带着祂的身体，从死人中复活。祂这复活使祂这神的独生子，成为具有神人二性之神的长子。祂这复活也使祂化身为赐生命的灵，就是那是生命实际的圣灵，好进入祂的信徒，重生他们，将他们的人性带到神性里，使他们成为神的众子，作祂的众弟兄，并作祂的众肢体，构成祂奥秘的身体，作祂的生机体，彰显祂这作三一神化身的基督。祂这复活的实际，就是那作生命实际的圣灵，成为祂的信徒今天在生活中得胜的大能，并作他们将来从死复活，身体变化得赎的无限大能。

关于那永远的生命

他指出圣经中所说那永远的生命，就是神非受造的生命，无论在时间上，或在性质上，都是永远的，完全而无残缺。神这永远的生命，是吞灭死亡、胜过死亡的，也是那

不能毁坏的生命。神这生命也就是三一神自己，来作我们这些信入祂儿子之人的生命，使我们凭这生命，作一个与神联结的神人，有人性，也有神性。

关于那灵

他指出那灵乃是三一神的应用。祂临到那信入子神，而接受祂的人，将父神在子神里面，应用到他们身上。祂乃是生命的灵，也就是生命的实际，且是赐生命的灵，将生命分赐给那些信入子神里面的人。如此，祂也是重生的灵，用父神在子神里面的生命，将信徒重生，使他们成为神的儿女。接着，祂就在他们里面作内住的灵，成为他们里面一切的实际；作更新的灵，用神那永远常新，永不衰老的生命，将他们这旧造的人更新为神的新造；作圣别的灵，用神圣别的性情，将他们圣别并圣化；并作变化的灵，用基督生命的成分，将他们变化成为与祂同形像的人。祂也是子神的信徒，享受神作他们永远之分，豫尝的初熟果子。祂更是浇灌在子神之信徒身上的能力之灵，作他们工作的权能。祂是三一神的实际，基督的实际，一切真理的实际，并基督复活的实际；人有了祂，才有三一神，才有真理，才有基督，和基督的复活。

关于基督的救赎與神的救恩

他指出基督的救赎，乃是藉着祂为我们罪人代死赎罪而完成的。我们罪人接受祂这救赎，就蒙神赦罪、洗罪、称义，而得与神和好。神的救恩是神根据基督的救赎，而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罪，称义我们，使我们与祂和好，并藉基督的复活重生我们，且藉着祂的灵更新我们，圣别并圣化我们，又藉着那是灵之基督的生命成分变化我们，将我们模成祂长子基督的形像，至终还要用基督所进入的神圣荣耀，荣耀我们。

神这藉着基督的死与复活，并藉着圣灵的重生、更新、圣别、圣化、变化、模成、与荣耀的工作，所完成的救恩，是与神在基督来时，所要给信徒的赏赐不同。神这救恩是本于祂与律法不同的恩典，不本于人在律法上的行为；神的赏赐是本于在基督裏的信徒，蒙赎得救后，藉着信，凭基督复活的生命，和圣灵赐生命的大能，所活出得胜的生活；并在基督里，靠着圣灵，所作出那建造召会，就是基督的身体，以完成神永远计划（经纶）的工作。神的救恩是永远的，包括拯救我们脱离我们已往的罪，和拯救我们脱离今生一切的罪缠、试诱、和失败，以及拯救我们进入新天新地时，新耶路撒冷中对三一神和祂一切的丰富终极的享受，并丰满的饱尝。神的赏赐是时期的，仅在于千年国度时，我们得在国度的实现里，与基督同王、同荣。

关于信徒

他指出在基督里的信徒，原是一神照着祂的形像所创造，有灵、魂、体三部分的人，为要人作祂的器皿，盛装祂，彰显祂，并代表祂，为祂掌权，管治祂所创造的万有。在创造时，神并没有将祂的生命和性情，造在人里面，仅为人造灵，要人用祂的灵接受祂这是灵的神为生命。但人中了撒但的试诱，未从神命，而受到撒但的败坏，有了撒但的恶性，而构成罪人。于是神就亲自来成为人，穿上堕落之人的肉身，称为耶稣基督，在祂的肉身里，为罪人受死赎罪，并将罪人的自己和撒但、世界、以及旧造一并结

束。死后，祂全人从死复活，在复活中化身为赐生命的灵，而进入相信接受祂的罪人里面，与他们联结，使他们得着重生，成为神的儿女，作祂的肢体，与祂联结，构成祂生机的身体，就是召会，作祂的丰满，而成为祂团体的彰显。

这些信入耶稣基督的罪人，就成了基督的信徒，而称为基督徒，就是基督的从者，属于基督的人。他们原是神的旧造，藉着信入基督得着重生，而成为神的新造，有神的生命和性情，凭着神的生命和神的灵，生活行动，并为神活着并工作，在灵里同被建造，成为神的召会，就是神的家，和基督的身体，就是基督的丰满，等候基督再来，将他们提接、变化，使他们进入祂的荣耀，与祂永远同在。他们中间在蒙恩得救后，肯凭着基督得胜的生命，并祂在圣灵里复活的大能，过得胜的生活，作祂完成神计划（经纶）的工作，在祂再来前先得成熟的人，要得着祂的赏赐，进入千年国度与祂同王，管治世界。他们中间那些没有这样先得成熟的人，要在千年国度时，受祂的管教，以致成熟，好在千年国度后，新天新地时，和那些先得成熟的信徒，同作构成新耶路撒冷的成分，有分于新耶路撒冷中神的救恩终极的福分和享受，直到永永远远。

关于召会

他指出召会乃是一切信入基督，而属于基督的人所构成的。这召会一面是宇宙的，一面又是地方的。在宇宙一面，这召会乃是神在宇宙中的家，也是基督在宇宙中的身体。在地方一面，这召会是神的家和基督的身体在各地的出现。这些在各地出现，许许多多的地方召会，集其大成，就成为在宇宙中那惟一的召会。这召会作神的家，乃是作神的家属，并作神的居所，使神得享作父者在儿女身上的称心快乐，并得着安居之所，使祂可以心满意足的得到安息。如此，祂就可以在祂这家中，随心所欲，彰显祂之所是、所有、并所能。

这召会作基督的身体，乃是基督在人群中，可以凭着生活行动的生机体，而活出祂包罗万有的自己。这身体也是基督的新妇，作基督的配偶，出于基督，也归于基督，以满足基督的情爱。这身体也是基督在祂自己里面所创造的一个新人，由祂的生命和成分所构成，来完成神永远的计划（经纶）。

这召会因着要存在于人群间，而分布于世界各地，成为许多分立的地方召会，各有长老治理，并执事服事，在事务上是自治、分立的；但在生命和性质上，仍是一个宇宙的召会，共同受使徒一致的教训，守使徒一统的交通，为基督作同一的见证，完成神一贯的计划（经纶）。

这样一个召会，就外面说，是由许许多多的圣徒，蒙神从世界里召出来所集成的；就里面说，是三一神将祂自己作到在基督里的信徒里面，并在其中生长的结果。所以是一个有生的生机体，绝不是社会中的一种宗教组织，更不是无生的物质建筑。

这召会在今天也是神的国，神在其中掌权，管治一切。

关于新耶路撒冷

最后，他还指出圣经所终极启示的圣城新耶路撒冷，乃是新旧两约中，所有蒙神救赎的人所构成的。她是三一神的帐幕，作祂在永世里与人同在的居所；也是三一神化身之基督的新妇，作祂在永世里的心爱配偶。这圣城且是神的至圣所，长宽高都是一样，由神和祂的羔羊所构成，作一切蒙神救赎之人，事奉神的场所并住处。其构成的成分乃是：（一）作三一神源头的父神，作她的本体，如同透明的精金；（二）作三一神彰显的子神，在祂救赎之死，和祂分赐生命之复活里，作她的入门，如同美丽的珍珠；

（三）作三一神应用的灵神，在祂对信徒的变化里，作她的墙与根基，如同各样华丽的宝石。三一神对她的构成，乃是祂与祂所救赎、重生、并变化三部分的人终极的联结，使祂和他们成为一体，在永世里作祂团体的显现和彰显。其中有羔羊为灯，光照出神的荣耀。在她的中心，也有神和羔羊行政的宝座，流出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流在一条螺旋的道路中，盘旋的经过全城，达到城周围的十二个门，灌溉全城；在河的两面长着生命树，每月都结新果，供应全城。如此，圣城新耶路撒冷乃是三一神，与祂所救赎的三部分人，联结的结晶，满了三一神的荣耀，在永世里彰显祂的丰满；也满了三一神在祂救赎里，对祂所赎之人的供应，在永世里使他们丰丰满满享受并饱尝那救赎他们之三一神的所是、所作、并所达到的一切。这就是倪兄所看见一切神圣启示中的异象，而传讲给我们的总结。

苦难与殉道

倪柝声为着新约职事的缘故，忍受了许多苦难。他绝对地跟随主，忠信地完成他所受的托付。因着他的忠信与绝对，他不断遭受人的错待，历经许多的难处。因着他不住为着主的恢复打仗，他就不断受到仇敌的攻击。同时，他也在神主宰手下。他认识神对他环境的主宰安排，不仅是神给他“肉身上的一根刺”，更是神对付他的凭借。他所受的苦难大部分来自以下五个源头：贫穷、疾病、公会的反对、地方召会弟兄姊妹的异议，以及诬告与监禁。

贫穷

在倪柝声尽职的早年，中国的经济状况非常艰难。但他操练单纯信靠神，不仅在生活上，也在为著主的工作上，都完全凭信事奉主。他拒绝受雇于任何人或公会。他早年在上海尽职的时候，有时除了一点馒头以外，什么吃的也没有。

疾病

他也因着经常生病而受苦。他在一九二三年以前就开始尽职，头十一年之内，他过着单身的生活，没有妻子帮助他。就是在这段时期他染上肺病，并因这病受了好几年苦。一九三四年，三十岁的倪柝声娶了一位真正的“帮助者”张品蕙女士。在后来的几年里，他还患有慢性胃病以及心绞痛（一种严重的心脏）。他的心脏病一直未能治愈。因着他的疾病，倪弟兄学到如何完全倚靠主。他学会如何凭复活的生命活着，好应付他身体上的需要。许多时候，他不是靠身体的力量服事，乃是靠复活的生命。以下几段是摘自《基督徒报》和《复兴报》中他所写的公开信，描绘了他的疾病和他借着疾病所学的属灵功课。以下是几封他在病中所写的书信

我在这年中的身体软弱，几乎是到处知道了；并且，有三个地方竟有我地上帐棚已经毁坏了的讹传。因此，我所得的代祷也比往常加多了。我真是感念着那些关心于我身上事的人！自然，往日的精力好象衰败了许多，平易的工作好象也很快叫身体觉得其担负；但是，感谢神，因为今年的日子究竟还是工作的日子。与其休息而生锈，何如劳碌而信靠。应许的力量在必需的时候，还是没有减少的，这是不能不感赞我主的。

果子的稀少，生命的虚空，灵性的依旧，身体的软弱，在在都足以使自己惭愧。其实，自己除了惭愧以外，也不应当得着别的。万事互相效力，使爱神的人得着益处，乃是真实可信的。乃是在我这样的光景中，这话才重新显为实在。（摘自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基督徒报》第二卷第十二期。）

自然我在病中的经历是与我自己顶有益处的。我从起初就是祷告说，但愿神使我在这次病中得着我所当得的。我真不愿空病了一场。回顾这过去年余，我能顶感恩地说，神这样地待我是不错的，没有一天是可少的。此次的经历自然有许多是不可以公开的，但我深信是为着我个人的富足，也是为着众人的益处。

我现在因着神无穷无尽的恩典，和你们不断地祷告，又再一次从死门回来了。我盼望神在合宜的时候，要叫我完全复原。我现今还是在作工里带着休息。我现在再一次将我自己奉献给神，遵行祂的旨意，并服事祂的圣徒。（摘自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复兴报》第十二期）

我身体的受伤，是多年积蓄所致的，另一方面，是因着写《属灵人》而加剧。但是，感谢神，我现在已经逐渐还原，能够再写几封信，再预备几篇稿子，再领几个查经班，再出去聚几次会。虽然我所盼望的并不只作这些事，但是，人虽然有许多不能作的，人也得因所能作的来感谢神。按着有身体知识的人来看，我已经是多次活不了的人，但是，感谢神，到底我还被留到今天。我盼望在我寄居的日子中，能够忠心地事奉祂和你们。（摘自一九三一年一至二月《复兴报》第十九期）

这数月来，因为心身稍受了伤的缘故，地上的帐棚又时有倾倒之虞。多少的时候，真是徘徊歧路，不知何从。许多的经历，按人而看，真是啼笑皆非。不过我们感谢神，为主没有什么事情是太难的，为主也没有什么代价是太大的。从信而顺服的眼光，在阴云密布的环境中看来，依然是青天白日。真的，“如果地乐消减，求你多给天；虽然心可伤痛，愿灵仍赞颂。”（摘自一九三二年五至六月《复兴报》第二十五期）

公会

倪弟兄坚定站住基督身体合一的立场，向公会造成的分裂作相反的见证，因此这使他受苦，这些苦难包括藐视、批评和反对、攻击、谣言、误解和误传。反对不仅来自本地的基督徒，也来自西教士。大部分西教士反对倪柝声，是因为他所作相反的见证。他们舍弃了自己的国家、家庭和事业，来到一个异教之地，帮助人得救，并建立他们差会的教会，因而对他的职事深深怀恨。在那种光景中，这个从未离开中国的年轻本地人，竟起来印发文字，攻击他们工作

的根基并他们所建立的公会。他教导说，所有的公会都不合乎圣经，只有一种召会是合乎圣经的，就是在地方上的召会。他对西教士把福音带到中国表示感激，但他强烈地反对他们把公会带来，并在分裂中建立他们差会的教会。他说所有公会的名称，就如长老会、浸信会、循道会、圣公会等，都必须拆掉。他将这信息印成文字，在全中国散布。他强有力地相信自己的观点合乎圣经，并且付了很高的代价来持守这观点。

一九三九年他参加开西大会，他所献上的祷告深深摸着与会者；后来，大会的主席，也是中国内地会的主席，跟倪弟兄谈起话来。倪弟兄抓住这个机会，觉得这是适当的时机，与传到中国最好差会的领头人有一次交通。在交通之间，中国内地会的主席赞同他，并告诉倪弟兄说，主托付倪弟兄在中国所作的，正是中国内地会创立人戴德生先生所接受的负担。他又说他们在中国的西教士反对倪弟兄，乃是错的。后来，他到上海召聚中国内地会的西教士，告诉他们，他们反对倪弟兄的工作乃是错的。他告诉他们，倪弟兄所作的正是他们所该作的。他劝他们从那天起，永远不要再作任何事反对倪弟兄。但是，他离开回去伦敦后，他们仍然不断反对倪弟兄。

公会反对他，攻击他，又尽所能地破坏他的职事。当倪师母的姑母反对她嫁给倪弟兄的时候，有些公会的基督徒与她姑母联合攻击他，尽所能地破坏他的职事。他们恨恶他，向他发动全面的攻击。反对倪弟兄的人攻击他的方法之一，就是散播关于他的谣言。这就是保罗在林后六章八节所称的“恶名”。谣言是最诡诈，最破坏人的攻击。谣言不是别的，乃是谎言。一些反对倪弟兄的人散播谣言，给他恶名，以毁坏他的名誉。当倪弟兄还是单身，住在上海的时候，他的母亲有一段时间来与他同住。有人就散播谣言说，他与一个女人同居了。这是何等邪恶的谣言！

倪弟兄也被误解并误传。倪弟兄形容人如何误传他时说，“他们所描绘的倪弟兄，我自己也会定罪。”陈明在人面前的倪弟兄，往往是经过不实消息的过滤，加上那些误会他的人带着怀疑的想像。因这缘故，那些这样陈明他的人，就使人对他有完全错误的印象。这也使他受苦。

弟兄姊妹

倪弟兄所受的苦难另一个来源乃是弟兄姊妹。这些苦在性质上比从公会来的苦更严重。因公会所受的苦是从外面来的，而因弟兄姊妹所受的苦是从里面来的。从里面亲近的人而来的苦，比其他任何种的苦更使他难受。

一九二二年倪弟兄在家乡开始实行召会生活，两年后他就被他的同工革除了。他被革除的原因乃是这样：他为着主恢复的真理站住，反对一位带头的同工接受公会差会的按立。他们认为倪弟兄的异议太强烈了，就把他革除。革除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这次他是在出外尽职时被革除的；大多数与他们一同聚会的信徒，都站在他这边，但主不容许他作任何事为自己表白。那对天然的人来说真是受苦。

倪弟兄一开始作工，就与一位比他年长的姊妹有交通。这位姊妹爱主，寻求主，也从主得着一些恩赐。她从多方得到基督徒的尊敬，就开始旅行布道。但她却成了不断对倪弟兄持异议的人。一九三四年一月，当他在上海带领第三次得胜聚会时，这位姊妹也在聚会中。倪弟兄讲道时，她不住地摇头。这对他是一种苦。这不是惟一的例子。多年来，在工作中并在众召会里，这种反对他的异议发生过好几次。

那些在召会生活中与倪弟兄一同作工并担负责任的人，在成熟与能力上没有一个能与他相比；这些人都不成熟，能力不足。在五十年前的中国，倪弟兄对属灵事物的认识，是独特不凡的。他比其他人不知前进了多少。他看见许多事物，是弟兄们没有看见的，他们的不成熟与无能使他受了很多苦。

弟兄们的顽梗也使倪弟兄受苦。有一天，一位有学问的青年人来上海召会聚会，并且得救了。他想到美国深造；不过，他盼望在离开中国前受浸。倪弟兄对他的情形很清楚，并同意他应当受浸。但一位较年长的同工却不同意。他的理由是这个青年人太陌生了，只来过聚会一、二次，并且快要去美国了；这样的人不该受浸。他的理由是倪弟兄自己教导说，在召会中作任何事都要在交通里，而他的交通就是这位弟兄不该受浸。他固执地抓住关于交通的这个点，用这点来坚持说那青年人不该受浸。他担心那青年人可能还未得救。倪弟兄告诉他，倘若给那青年人施浸是错的，他愿在主面前担负全部责任。但那位同工仍然顽梗地拒绝了。一九三三年倪弟兄开始发现，在召会的祷告聚会中没有姊妹们祷告，是很大的亏损。他很有把握，姊妹们在聚会中祷告是正确的。然而，当时在召会中领头的人顽梗地持守老路。这也叫他非常难过。

倪弟兄也因弟兄们对地位的野心而受苦。在头三位从开始就进到上海召会的弟兄中间，有一位很有野心要作领头的人。因着他的野心，他就引起很多麻烦。至终在一九四八年，在他进入召会二十年之后，他离开了。他在自己家里开始了一个聚会，雇了一位游行传道人。那位游行传道人后来写了一篇很长的文字攻击倪弟兄。这也使他受苦。好些中国的传道人来聚会，期望得到一点地位。但倪弟兄总是对人清楚说明，召会不是组织，没有地位给任何人。人问到关于地位的事，他就会说，“谁给我地位？没有地位。教会乃是生机体。”有的人到召会中聚会一段时间，期望在工作中得着一点地位。但至终他们就发现，他们无法得着所要的，他们就离开了，并成了反对者。

弟兄姊妹的背叛是倪弟兄受苦的另一个来源。有一位同工弟兄犯了不道德的罪；倪弟兄帮助那位同工所在的召会把他革除。他就反过来背叛、攻击倪弟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队占领上海以后，那位同工写信给倪弟兄，这些信的内容若被检查员揭发或发现，就会引起很大的麻烦。这是何等邪恶的攻击！

多年来，有好些人背叛并攻击他。最厉害的一次是在一九四二年，针对他作生意这件事，牵涉到上海的圣徒。大部分的弟兄姊妹，包括同工和长老，都背叛他并攻击他。这是他受苦的最大原因，迫使他不能尽职有六年之久。那是极其严重又漫长的受苦。

然而，借着这一切苦难，他学了功课。这些苦难不只帮助他信靠主，更为他效力，对付了他的肉体、己、魂和天然生命。就我个人对他的认识，他借着他的苦难所学最末了的经历，就

是在他职事停止的那六年期间，他学习了外面之人的破碎。他从来不会仅仅传讲教训或道理；他的信息中有他从受苦的经历所得着的实际。他从苦难所得着的经历，给我们众人极大的帮助，并成了主恢复中众召会丰富的遗产。这丰富的遗产是他付出极大的代价所换取的。

他所受的苦难也帮助他从主得着启示。往往经过了某种苦难，他就得着了某种启示。他的苦难往往成了主的启示。借着他所受的苦难，他就被炼净、对付、拆毁，圣灵就用神圣的生命来重组他。借着这种受苦的经历，他就得了装备，有地位来得着主的启示。

成熟

创世记启示，雅各临终时，得成熟成为以色列。倪柝声弟兄对主有了许多经历，又受过诸般的苦难之后，我们在他身上也看见成熟的生命。他的成熟显于好几方面。他与主是一，因为他的全人被主浸透。在他身上很难找到一丝天然的东西。他总是在灵里，绝不受肉体的阻挠，不为天然的人所限制。他总是预备好，将主供应给人。他不需要预备就能供应；他能常时并即时地将生命供应给人。他满有洞察力，能透彻地辨识人的光景。他有能力分解人的难处，彻底诊断他的情形。

他的心宽广，以背负别人的担子为享受。别人的担子对他不是重担；他对别人的照顾如同海洋一般，从不短缺。他完全背负主的恢复在中国建立召会的担子。然而，人看不出他在努力或挣扎，要完成他的使命。他待人甜美亲切又温柔，这都是自然的。他不造作，这些美德的馨香，只是自然地在他成熟生命的丰满里洋溢出来。他的见证乃是，他已经预备好，被提或是殉道。他曾说，“我的前途不是被提就是殉道。”

殉道

倪柝声在主的带领下留在中国，为主在那地的工作牺牲了他的生命，如同行传二十章二十四节，保罗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郑重见证神恩典的福音”。关于倪柝声的决定，许骏卿弟兄见证：

倪弟兄离港以前，李弟兄曾多次劝他勿回大陆。只是倪弟兄说，“倘若一个母亲发觉家中失火，而自己正在屋外洗衣服，她会怎样作？虽明知危险，岂不仍冲进屋内？我虽明知回去凶多吉少，然而多少弟兄姊妹还在内，岂能就此一去不回？”

倪柝声在一九五二年三月被捕。他受审讯，被诬告，一九五六年被判十五年监禁。他在一九七二年五月三十日死于监禁之中。在这段漫长监禁的期间他经历了什么，我们无法得知。下面八封信是他在监禁末期亲笔写的，我们惟有借此稍为得窥他受监禁时的受苦、感觉与期望。

信件一

品铮大姊：

收到你四月七日的信，知道你没有收到我通知你每次东西都已收到的信。你信上所提的东西，我都已经收到了，实在感谢你。

我身体情况，你是知道的，是慢性病，是器官病，发病就很难过，就是不发病，病依然在身上，只有发不发之分，没有好不好之分。夏天到了，多晒些太阳可以改变一点皮肤颜色，但不能改变病。但我维持自己的喜乐，请你放心。希望你自己也多保重一点，心中充满喜乐。祝你好！

述祖

四月廿二日

倪弟兄这封信是写给他妻子的大姊，就是他在信上所称的“大姊”。（译者注：以后各信称“大姨”。）这位姊姊住在北平，与倪师母约二十年没有见面了。就在她一九七一年探访倪师母的时候，倪师母从凳子上摔下来，断了两根肋骨。因着这次摔跤，倪师母的高血压上升，因而致死。因着这次极大的亏损，这位大姊觉得倪师母死后，她需要留下来照顾倪弟兄并送他必需品。“你每次东西……”，就是指这事。

“发病（慢性病）就很难过”，“多晒些太阳……不能改变病”，指明他仍受疾病之苦。

“但我维持自己的喜乐”，指明他实行使徒保罗在腓立比四章四节的话：“在主里常常喜乐”。“希望你……心中充满喜乐”，指明他不仅自己在主里喜乐，更激励他妻子的大姊要充满主的喜乐。这两句话给我们看见，他在受牢狱之苦时，信靠主并与主多有交通。他象使徒在坐监受苦时，仍在主里喜乐，并激励读他信的人也在主里喜乐（腓二17~18）。他这封信里没有引用圣经节，指明他没有自由这样作。这封信的日期是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就在他去世前三十八天。这封信的署名是“述祖”，那是他在亲友中间常用的名字。

信件二

品铮大姨：

明日是蕙妹逝世半周年之期（五月七日）。这半年来，变化实在太太大，回首前尘，展抚遗物，叫我不能不一直心感悲痛。二十年来，不能一次伺候她，总是终身遗憾。一切都是我对她不起，害她困难。我病已缠绵，经常反复。生活我尽量简单化，以免麻烦人家。病中实在想念自己的亲属，想要和他们一起。但我顺服环境安排。十余日来，深思蕙妹不能自己。

你身体如何？时常在挂念之中。年老的人只有多加保重。你还想南边来不想？我不知道如何说才好。我只有祝你好。

述祖

五月六日

这封信里的“蕙妹”，是指倪弟兄的妻子张品蕙。

信件三

品铮大姨：

你六日北京的信及十一日上海的信，均已收到。你此次来，望能多住一点时间，多休息一点。我病中也望能与自己的亲人多接触。此间山明水秀，有一特点，小孩长得特别好，比上海以前所看到的都好。望多休息一回。

蕙妹骨灰，的确是个问题，你来后再商量决定。

我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手电带一个来。

祝你好。

述祖

五月十六日

信件四

品铮大姨：

我和领导谈过，关于我的出场问题，他说，“北京上海不能去，要去小的地方、农村。只要有证明来，政府要按政策办事。不必我……谈。”

所以请你代我在亲戚中，找可以代为挂钩的人。可以向其说明，我有生活，希望他收留我，请公社证明我可到他地方，可收纳我。

希望能在亲戚中替我找人。马兴涛也是可以商量的一人。请你和他商量，或与别人。

拜六夜里又发一次，好几小时的心房颤动。后来吃了地戈辛，人能支持。礼拜睡一整天。我在病中心情极想回到自己亲人在一起，落叶归根。我和大家二十年失了联系，只好请你。

你来时带一斤太仓式肉松，一斤牛肉干。我因心肌梗死，医生说，不可吃蛋黄、肥肉、各种腑脏，以免加剧。故只好吃点瘦的。不吃，又缺少蛋白质的氨基酸补充。很困难。

祝你好。

述祖

五月廿二日

在这封信中，倪弟兄不只一次提到他的病。地戈辛是尼亚辛的商标名称，尼亚辛是一种烟碱酸。他所患的病是慢性的心绞痛，因着心肌缺乏血液供应而引起胸部疼痛。

“马兴涛”是倪弟兄一位表侄女的丈夫。在倪弟兄被监禁的期间，他的表侄女及其丈夫照顾身体不好的倪师母。他们都是主内的弟兄姊妹。后来这位表侄女过世，就剩下她的丈夫照顾倪师母了。

倪弟兄写上面这封信的同一天，也写了另一封信给这位亲戚（见信件五）。

信件五

兴涛侄婿：

我的情况，我想婶婶在世之日，一定对你谈。

你知道我是有大姊寄家用的，所以生活没有问题。我年老病多，极想到自己的亲人那里去，落叶归根，可以寻个归宿之处。我迫切希望，你能替我负责办妥这件事情。一切方面，全倚靠你。

婶母去世至今六个月半，我五内俱摧，过日为难。我希望你勉力为之，将证件寄到此处。婶母在日多次提到慧宜及其孩子，不知孩子们现在如何？念念。

听说到浙江去，粮票有问题。我想，我吃很少，有解决方法，不要紧。

廿多年未通信，常在念中。

祝你好。

述祖白

五月廿二日

这封信是倪弟兄写给他表侄女的丈夫。“婶婶”是指倪师母。“我的情况，婶婶……一定对你谈”，按全信的上下文看来，是指倪弟兄的健康和有关他被释放出监的事。“大姊”是倪弟兄的大姊陈师母，她住在香港，在他被监禁期间，就是她送钱到上海给倪弟兄和他妻子。因此这里说“生活没有问题”。

“极想到自己的亲人那里去”，指明他希望从监牢得释放，到他表侄女的丈夫那里。那时他看自己是“落叶归根”，寻求余生“归宿之处”。“替我负责办妥这件事情”，指明他请表侄婿为他预备住宿之处。关于这件事的“一切方面”，他完全倚靠这位亲戚。

“婶母去世至今六个月半，我五内俱摧，过日为难。”这显示倪弟兄因着妻子去世所经历深深的忧伤，以及他因此所受的苦。

“你勉力为之，将证件寄到此处”，可以指明倪弟兄希望这位亲戚将一分证明他们关系的证件寄到他那里，叫他能从监牢得着释放。

“到浙江去”，指明这位亲戚的家在浙江，倪弟兄想到那里度其余生。

“粮票有问题”，指明他在浙江买食物可能有问题，因为他在当地是外人。

这封信的日期是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二日，离他去世只有八天。

信件六

品铮大姨：

我将于明早调离枫树岭到山下坡农场去。你来的时候不要买票到枫树岭，要买票到山下坡下车，比枫树岭再远一点点，进去第二站。我曾蒙发一信给你，比这封早，不知收到没有。望早见面。

祝你好。

述祖

五月廿五日

这封给他妻子大姊的信，表明他在五月二十六日就要调离枫树岭农场，到过去一站的山下坡，另一个更偏远的农场。

信件七

兴涛：

我在枫树岭时，曾写给你一信，望你能替我办到公社的一张证明书，说明你们愿意收纳我，保证我的生活（你知道我有大姊寄家用）。你们态度要坚决明朗。

(.....)

我于今日从枫树岭调至白云山修养组。望你努力而为，给我一封回信，证明要直接寄给白云山农场第十四队，抬头是由公社写给安徽广德县白茅岭农场，但是你寄来时要寄到安徽广德县白云山农场第十四队收。

我极望回到自己亲人那里去。请你努力。

祝你好。

述祖白

五月廿六日

这是倪弟兄写给同一位侄婿的第二封信。日期是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在他去世前只有四天。

“我在枫树岭时，曾写给你一信”，指明先前那封信是在枫树岭写的。

“要寄到安徽广德县白云山农场第十四队收”，指明倪弟兄是死于安徽广德县的白云山农场。白云山农场可能就是信件六所提的山下坡。

“我极望回到自己亲人那里去”，指明他何等渴望得着释放，到他亲人那里。但他四天后就离世了。

以上每封书信中都没有提到主的名或神的名。这指明他没有自由这样作。

信件八

品铮大姨：

我调到山下坡十四队，这里离开车站还有十里路，还要翻一座山。你来实在不恰当。可以不必来了。

我病中心仍喜乐，请你不必挂心。我仍尽力促使自己，不要因病痛难过。

品蕙骨灰请你处理，一切都拜托你，我都同意。

纸短情长。祝你好。

述祖白

五月三十日

这是倪弟兄最后一封信，表明他去世时所在的农场颇为偏远，离车站十里路，还要翻一座山。他改变主意，不再想他妻子的大姊来看他，并且把处理他妻子骨灰的事交托她，这些似乎指明他感觉到自己快要离世。在同一天他就过去了。

我们无法追踪倪弟兄死亡的原因。然而，在他离世的时候，没有一个亲人、弟兄或姊妹在他身边。就人来说，这样的离世是何等可怜，又是何等的屈辱。关于他的死亡与葬礼，并没有正式的通告。他在一九七二年六月一日火化。只有倪师母的大姊接到通知说，他已经去世，并在一九七二年六月一日火化了。乃是她把骨灰收来交给倪弟兄的表侄婿。这位表侄婿就在自己家乡浙江省海宁县观潮那里，把倪弟兄的骨灰与倪师母的葬在一起。以下是倪弟兄一位侄孙女的记述：捡倪弟兄骨灰的时候，就是她陪伴着倪师母的大姊：

一九七二年六月，我们接到农场的通知，说公公已去世。我和大姨婆赶去农场，但到了农场才知道，他们已将他火化，只能看到他的骨灰了。……临离去前，他留下一张纸在枕头下面，那是用非常颤抖的手写下的几行大字，公公要用他一生的经历，来证明这个他至死都持守的真理——“基督是神的儿子，为人赎罪而死，三日复活，这是宇宙间最大的事实。我信基督而死。倪柝声。”当农场干部将这张纸给我们看时，我祷告主让我快速将它背下来记在心里。……

公公去了，他至死忠心地带着他血染的冠冕被主接去了。虽然神没有成就他最后的心愿，能活着出来与他妻子团聚，但主却预备了更好的——他们团聚在主前。

倪弟兄就这样结束了他在地上的年日。十七年后，一九八九年五月，倪弟兄的两位侄儿把他和倪师母的骨灰一起移到江苏省苏州市香山公墓，葬在“基督教坟场”，他弟弟倪怀祖及其妻的墓旁。

倪柝声弟兄是一个受苦的人。在他跟随羔羊的路上，他忍受了苦难。因着他的受苦，我们今天在主的恢复中有如此丰富的遗产。下面两节诗歌是我们诗歌本里第四百六十五首的结语；这首诗说到葡萄所受的苦，一九五〇年他在香港帮助我把这些话编成可唱的诗句，这乃是他一生的写照。

估量生命原则，以失不是以得；
不视酒饮几多，乃视酒倾几何；
因为爱的最大能力，乃是在于爱的舍弃，
谁苦受得最深，最有，可以给人。
谁待自己最苛，最易为神选择；
谁伤自己最狠，最能擦人泪痕；
谁不熟练损失、剥夺，谁就仅是响钹、鸣锣；
谁能拯救自己，谁就不能乐极。

在倪柝声被监禁的期间，他的职事却不被捆绑（提后二9）。在神主宰的安排下，他的书传遍了全世界，成了所有寻求之基督徒丰富的生命供应。虽然他地上肉身的帐幕被毁坏，但借他职事所带进之神家的建造，仍在全地上生长并蔓延。一九五二年他被逮捕的时候，在中国已经有约四百处地方召会被建立。此外，东南亚各国如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等，也有三十余处地方召会。今天全地超过两千三百处的地方召会，都是直接或间接借着倪弟兄丰富且忠信的职事所兴起的。

倪柝声的一生就如他自己的诗歌所说：“估量生命原则，以失不是以得；不视酒饮几多，乃视酒倾几何；因为爱的最大能力，乃是在于爱的舍弃，谁苦受得最深，最有，可以给人”（诗歌第四百六十五首）。为这缘故，他从不怜惜自己，他乃是背起他的十字架，交通于基督的苦难，模成祂的死，将生命倾倒出来，使别人能得着基督的滋养和丰富。

同工及圣徒的见证

本章包含六个人的见证，他们都是亲身认识倪柝声弟兄的，他们所写关于他的事，是根据他们多年来个人的认识和亲身的经历。

李常受弟兄的见证

从一九二五至一九五〇年，在我认识倪柝声弟兄的二十五年中，我对他的一些特点有深刻的印象。

向主绝对

他以主为他第一所爱的。对他而言，主在凡事上都是第一。对主的权益他从不妥协，也从不为着方便的缘故牺牲任何真理。他也不是只跟随主到半路。他对主的奉献是绝对的。

十分平衡

在认识圣经和召会的实行上，他十分平衡。他没有不平衡地跟随任何教训或任何实行，象公会里许多基督徒那样。他经常会将某件事的一个观点与其他观点比较，使他蒙保守不致落入某种极端。在他日常的基督徒生活中，他也实行同样的原则。

包罗一切

他阅读许多古典的基督教书籍，采取了许多不同的基督教团体一切合乎圣经的优点，将这一切都收集到召会生活的实行里。他从不因某个合乎圣经的优点是来自错误的源头，就加以拒绝。他甚至从极端的灵恩派采取一些好的项目。这样他就能将已过的世纪中，基督赐给祂身体的一切丰富，都带进当前召会的实行里。借着祂，我们如今能在地方召会中有分于这一切丰富，不是狭窄的，也不是宗派的，乃是包罗一切的。

认识圣经

在我一生中，我从未遇见另一个人认识圣经象倪弟兄那样深。他从已过世纪中许多最好的基督徒著者得着许多帮助，但他也站在他们的肩头上，从圣经中看见得更多。他不仅认识圣经的字句，他也认识圣经的灵。他探入深处，并摸着圣经的灵。他对圣经的认识充满亮光，也满有生命。他对圣经不仅有客观的见解，对神的话也有主观的经历。

认识主

他的确是个属神的人，完全认识主。他认识主的作为，也认识主的法则。他不只认识主的爱、怜悯、恩典、公义和圣别，也认识祂永远的定旨和祂当前的经纶。他对主有完全的客观认识，和鲜活的主观体认。他个人认识主，也在召会，祂的身体里认识主。

认识生命

他认识主是活的灵，住在他的灵里；他也知道如何运用他的灵。他操练拒绝他魂的心思、情感和意志，也操练在灵里举止行动。这样他就凭着主作他的生命而活。他不太在意工作；他一直在意生命过于工作。他一再说，工作该是生命的流露。他的职事不是工作的职事，乃是生命的职事，是借着生命执行的职事。他注意他的所是远过于他的所作。他的确是个生命的人。

认识召会

他清楚看见召会是基督的身体，以基督自己为其生命和内容，作基督的彰显。他也看见只有地方召会存在，召会才能是实行的；也只有在地方的召会才能完成神永远的定旨，使召会得建造，成为阴间的门所不能胜过的。他完全领悟，在正确立场上恢复正确的召会生活，是神当前的经纶。他不是仅仅教导关于召会的道理。他从新约领受了完全的启示，不仅是关于召会的内容与实际，也是关于召会的实行。历年来，在他的职事里，他不仅着重对基督的经历，也强调召会生活的实行。他的异象不仅是基督，乃是基督与召会。基督是他的生命，召会是他的生活。他为召会受苦，多于为基督受苦。从公会而来，临到他身上的逼迫，多半是因着他强调召会。他有负担执行他关于召会生活之实行的异象。他渴望看见中国每一城市都有地方召会。

时代的恩赐

我认为倪柝声弟兄是元首为着祂的恢复，在今时代赐给祂身体的一个独特恩赐。我绝对敬重他这样一位恩赐。我有充足的信心和把握，我如此为着主的权益，在地上主当前的行动上跟随这一位恩赐，乃是绝对出于主的。我说我跟随一个人，一点都不觉得羞耻，这人乃是今时代独特的恩赐，并今时代神圣启示的先见。

我非常感谢主，在我得救以后，立刻把我带进与倪弟兄这样有助益的关系中，并且在这么长的年日里，在这么多的事情中，在祂恢复的工作上，把我放在与他最亲密的关系中。我借着倪弟兄所看见关于基督、召会、灵与生命的启示，我从他所得着生命的灌输，以及我从他所学习关于工作和召会的事，需要永世来估量其真正的价值。（摘自《今时代神圣启示的先见》第三十三章）

张宜纶弟兄的见证

第一个是他内弟张宜纶弟兄的见证，他曾是洛杉矶召会的长老。

与倪弟兄的关系

倪柝声弟兄的祖母和我的祖母是同学，她们的友谊开始了我们两家之间的关系。我们的父亲也是同学，姊姊也是同学，后来我们二人也进了同一所学校。然而，我们之间不只是世人的友谊，乃是两个基督徒弟兄的关系；我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多年来一直持续着。我是借着一九二七年与倪柝声弟兄的交通，才清楚自己的得救。一九三四年他与我的姊姊结婚，虽然他成了我的姊夫，我们的关系还是基于我们在基督里的关系，而不是基于我们的亲属关系。

借倪弟兄得着得救的证实

我与倪弟兄的属灵关系开始于我得着得救证实的时候。他在那灵里将基督供应给我，带我进入对得救的证实又真又活的享受。他只问我：“你得救了么？”我回答说，“我不知道。”他又问：“你为什么没有得救？”我又回答说，“我不知道。”他又问：“你信约翰三章十六节么？”然后，他把这一节分成一句一句：“‘神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你相信么？”“我信。”“你相信‘一切信祂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么？”“我也信。”“你得救了么？”“我不知道。”于是他强有力地对我说，“但神这样说了。你若不信祂所说的，就是以祂为说谎的！”这话除去我心中的帕子，点活了我的灵。我立即感觉到里面膏油的涂抹，完全相信我得救了。

得着倪弟兄的服事

我好几次有个人的难处去找倪弟兄得帮助，他从来不责备我，他只是问：“你从主学了什么功课？”他帮助我领悟，万事都互相效力，叫我得益处，将我模成神儿子的形像（罗八28~29）。

有一次，我妻子进医院动手术。手术以后，仇敌控告攻击她，使她认为自己快要死去。消息传到倪弟兄那里，他就和我姊姊去看望她。倪弟兄知道我妻子正受仇敌的控告，就用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供应她：“弟兄们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并因自己所见证的话，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自己的魂生命。”然后他打电话给我，承认他已过没有帮助我留在主的交通里，以致给仇敌留了地步，攻击我的妻子，这是他的失败；为着这失败，他请求我的赦免。他十分明白，这争战不只是我妻子个人的事，更需要她的丈夫和召会；因此他请求我的赦免。他知道要与仇敌争战，我需要召会，而他已过疏忽了，没有和我站在一起。然而我告诉他，那不是他的错；错的是我不够奉献，是我爱世界，以致给仇敌留了地步。我立刻向主悔改。就在我悔改的那一刻，仇敌离开我的妻子，主就给她平安。第二天早上，当倪弟兄的母亲来陪她祷告时，她已经能够向主歌唱赞美，并享受主甜美的涂抹了。由这件事可以看出，倪弟兄认识神的法则。借着属灵的鉴别力，我的家得着帮助，我们的日常生活恢复了与基督完全的联结。

我对倪弟兄的印象

倪弟兄是一个完全被主浸透的人，也是一个活在主面前的人。经过和受恩教士多年亲手的成全，他的个性、性格和行为被变化了。他能聆听别人的说话和意见而不打岔。他这人内里的所是被主摸过，并且因着被主对付而得了丰富的经历。不然，象他这样的天才，很难与象我这样愚拙鲁钝的青年弟兄相处。以后，我与他很接近，一同作工，我看见他能听任何一种人讲话，不会给人印象他是优越的。他被变化到一个地步，能与任何人建造在一起；不管别人的情形如何，他总不会因人的缺点和幼稚而受挫。

我观察倪弟兄作工的方式，从来没有见过他强使他的权柄。反之，他亲自设立榜样：早起，工作时间有规律，不轻率从事，不随意行动，不怠惰。他从来不以自己为“老板”，也不要

求别人作他自己所不作的事。他亲手作工，并教导别人一同作工要温柔、有爱心、忍耐并合作。

今天，大体的基督教批评他，是因他关于召会的职事。但我能见证，他关于召会的职事不是道理、理论或行不通的计划。他不只将神所给他关于召会的启示教导人，他也将启示付诸实行。虽然在倪弟兄有生之年，还没有大规模地看见神启示给他之召会的实行，但今天，这实行已经完全得着表白。这是可行的。今天，成千的信徒能见证，他们是活在召会生活完满的实际里。

魏光禧弟兄的见证

魏光禧弟兄（一九八八年去世）是倪弟兄的同学，以下是他于一九七三年所写的见证：

我与倪柝声弟兄在福州城英国圣公会办的三一学校是多年的同班同学。我们二人是很好的朋友，常在一起读书和玩耍。在初中和高中时期，我们都是挂名的教友，满脑子圣经的知识，外面也遵守了基督教的礼仪，如受洗礼、领圣餐、作礼拜、读经和祷告等，但从来未曾由心中接受这位为我们的罪钉死十字架，第三日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作个人的救主。我们都贪爱世界，追求世界的虚荣。

倪柝声中文的造诣很深，常向报馆投稿，将所得的稿费用来买发财票。他也喜欢看影戏。我是喜欢运动，要得着名誉和人的称赞。

到大学一年级时，我发觉他的生活忽然改变了。他成为一个热诚的基督徒，脱离了以前贪爱世界的生活。他在学校里常向同学作见证，劝人信靠主耶稣。很多同学信了主，并且平时自动到学校的礼拜堂祷告。他在上课时，常常读圣经；但到考试时，每种课程几乎都得到最高的分数，并不因多读圣经而受影响。许多同学因为信了主，生活上大有改变；学校的舍监承认，有些顽皮不守校规的学生，因信了主，生活有大改变，以致他处理学生犯规的案件，减少了许多。

借倪弟兄得救

倪弟兄曾邀请我参加传福音聚会，但我推辞了，因我一心要追求成为闻名的运动家。但有一天，他来到我的房间，个别地向我传福音，劝我接受主耶稣作救主。当时我与他辩驳宗教问题，但他不与我辩驳，只问我几个问题：“你曾犯罪么？你知道你的罪得赦免么？你知道你得救么？”那时莫名其妙的，我心中觉得难过，以后才知道这是圣灵的工作。他向我传福音，说神如何爱我，将独生子赐给我，只要我真心相信祂，我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问我愿意相信否，我说，“愿意”。他就与我一同跪下祷告。他先为我祷告，我也祷告，求主赦免我的罪，并谢谢主爱了我，拯救了我。祷告完了，一起来，我心中充满了喜乐与平安。我的生活有了大改变，也结了悔改的果子。在他的祷告名单上，我是其中的一个；主答应了他的祷告，感谢主！

被倪弟兄恢复

一九二四年我转学南京金陵大学，受了新神学的影响，使我在信仰上起了动摇。那时倪弟兄正好也在南京，在一个弟兄家里养病，我去找他交通，他帮助我脱离了新神学的影响。当他的病稍愈后，我介绍他到金陵大学传福音，结果有两位同学清楚得救。

受倪弟兄造就

一九二八年我将离开大学时，有意全时间事奉主。我不愿意作一个受薪的传道人，但不知道如何过信心的生活，于是我去找倪弟兄交通。那时他非常孤单，极需要同心的同工。当我将此事与他交通时，他并没有因需要，或因人情，就随便鼓励我出来事奉主。他只对我说，不是等约但河水分开后才过去，乃是用信心的脚踏在河水里，河水才分开。他知道我缺乏这种信心，要等环境安排好了，才出来事奉主（五十年前在中国，几乎找不到象倪弟兄那样，过信心生活来事奉主的人）。因此，我就将全时间事奉主的事摆在一边，去教了八年的书。

一九三四年春，倪弟兄在上海召开第三次得胜聚会，上午讲基督的中心与普及，下午讲神的得胜者。借着他在这次特会中的信息，主使我得着启示，在我的属灵生活上有了很大的转机。结果，我一生第一次在大会中，站起来表示，要将我的一生奉献给主。那时我仍任教职。

一九三五年，倪弟兄在山东烟台重新经历圣灵浇灌后，到福建泉州开特别聚会。他约我前往参加。这次特会，他带领多人经历圣灵的浇灌，使人有能力与胆量，作主的见证人。他又传得胜生活的秘诀，就是让基督在里面替活，如保罗在加拉太二章二十节所见证的。这次的聚会，带进一次大复兴。

受倪弟兄印证并指派

一九三六年十月，倪柝声弟兄到福建鼓浪屿，召开同工聚会，他用电报邀请我参加。那时我已经清楚主的呼召，要放下教职，过信心的生活来事奉主；正在仰望主的带领时，收到倪弟兄的电报，知道是主的安排，所以立即前往参加。感谢主，给我这罕有的机会，听见倪弟兄的见证，就是我以后所出版的三篇见证。这次特别聚会后，倪弟兄和其他的同工就安排我先到广州开工，然后到香港开工。一九三七年，倪弟兄到中国西部云南昆明开工，建立了教会；不久他要离开，盼望我能去帮助那里的教会，我就接受了这个负担，携眷前往。我留在那里工作了三年，直到一九四〇年才回香港。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倪弟兄每次到广州或香港，我一定去找他交通。事前我记下许多问题要问他，但和他交通后，许多问题都不需要问了。每次的交通，我都得着丰盛生命的供应。

受倪弟兄训练

一九四八年，上海教会有一次特会，我又有机会参加。倪弟兄在会中说到“交出来”的事，话语刚强，满有圣灵的能力；聚会满有主的同在，多人得到复兴，愿将自己和自己所有的都交出来，并在教会中一同配搭事奉主。特会结束的最后一晚，因我要先返福州，倪弟兄在众人面前送我临别赠言如下：

基督本来只有一位，但是今天因着工人的观点与重点不同，就把基督分成许多个。若是工人不能将主所要我们摆出来的那一位基督彰显出来，我们的工作就是失败的。今天有许多人，的确与基督有很密切的接触，但另外有许多人只是在拥挤耶稣（可五24）。或者有人真的摸到主的背，拉到主的手，甚至撕裂主的衣服，但是在生命上一点没有与祂发生关系。在那么多拥挤的人中，生病的不只那一个血漏的妇人，但是在生命上得医治的，只有这一个人（太九20~22）。

今天有人实在认识一位在伯赛大的基督（可八22~26），在格拉森的基督（可五1~20），在以马忤斯的基督（路二四13~35）。他们在经验上真正看到神迹异能，甚至有人也能行这些异能，但是如果没有任何内里的启示，这些都没有用处。今天有人可以将以马忤斯的基督，富有感力地告诉人，他们能够对人解经，甚至人也实在心里火热，但是这些仍然无济于事。真正的工作乃是把一个启示的基督给人。这些话我不但对魏弟兄说，也对所有的同工并弟兄姊妹说。你我假若不能将一个启示的基督给人，我们的工作就是失败的。

在这里我们看见主的工人有两个基本不同的立场，一个是重在工作、解经、神迹、异能、祷告得答应等，另外一个乃是将一个启示的基督摆在人面前。

同年，就是一九四八年，从六月初到九月底，倪弟兄在福建鼓岭山上，有四个月的时间，训练全国的同工，我也有分参加。我们每日在倪弟兄跟前约有七小时，聆听并接受他话语的供应。我在属灵的认识与为主工作的原则上，得了很大的帮助。……

与倪弟兄最后的接触

一九五〇年初，倪柝声弟兄来到香港，不久李常受弟兄也来了。已往两位弟兄同时在一地教会带领聚会，是罕有的事。他们的职事给香港教会带进大复兴。原来只有三百多人的聚会，在短期内增至二、三千人，这是香港教会特别蒙恩的地方。

张晤晨弟兄的见证

张晤晨弟兄，台湾岛上一位领头的同工，乃是接受倪柝声弟兄训练的人之一，以下是他所作关于倪弟兄的见证。

借倪弟兄得救

我是一九三五年夏天，在山东烟台第一次看见倪柝声弟兄。那时我二十一岁。虽然我生长在基督教的家庭中，也在基督教的学校读书，外祖父又是一位循道公会的牧师，但基督教所给我的印象却非常坏，因此我成了一个不信有神的人。然而神有丰富的怜悯，祂使我遇见了倪柝声弟兄和李常受弟兄。主借着他们拯救了我。

我姨母很关心我得救的事，经过她的介绍，在李常受弟兄的客厅里，倪柝声弟兄接见了。他向我传福音，我们就开始辩论到底有没有神的问题。他举出许多理由证明有神，但我辩

论说，“我没有看见神，所以不能相信神。”他问我说，“你以为你的眼睛什么都能看见么？你看不见的东西就认为它不存在么？就如在这房间里有空气，有电波，你能看得见么？但确有它的存在。神并非物质，神是个灵。要接触神不能用你的眼睛，必须用你的灵。你要用你里面的灵来寻求神，就必寻见。”我就问说，“怎样用灵接触神呢？”他说，“你要照着你里面深处的需要和感觉向神求诉。”

我回家以后，就开始照倪弟兄的话祷告。感谢神！祂垂听了我的祷告，从里面改变了我。到了主日我就去参加聚会。那一天是李常受弟兄传福音，他的话是那样地有能力，征服了我，也拯救了我；我清楚得救了。

借倪弟兄的书报得帮助

我得救以后，就暗暗地将自己奉献给主。主对我是那样的可爱、宝贵，我世界不要了，愿一生作一个事奉主的人。以后十二年之久，我再没有看见倪弟兄，但主借着他所写的属灵书报，给我很多的帮助。

受倪弟兄训练

我是一九四八年倪弟兄在福州鼓岭山上第一期训练的受训者。我参加这次训练，约有四个月之久，得着他很大的帮助。有一次，我作见证之后，他给了以下的评语：

张弟兄，你说你在属灵的事上，有时爬不起来，里面也常感觉枯干。我盼望你今后不必再理这些，爬起来也好，爬不起来也好，让它去。你只要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相信主能作，主自然而然地会带你过去。许多难处不是我们自己能胜过，但我们瞻仰主、亲近主时，难处就过去了。

有一个百足虫走路的故事：一天，当百足虫要走路的时候，它一直看自己的脚，在想该先动哪一只。是左脚呢，还是右脚？是第八只呢，还是第十只？一直在那里打算。结果思想的难处就成为实行的难处。后来太阳出来了，它要跑去看；它索性不想，也不管先动哪一只脚，怎样走法都忘记了，结果就能走了。思想的难处没有了，实行的难处也就没有了。

里面枯干，有重担，爬不起来，你越想要去对付，就越对付不过去。你把它当作一件事情，它就变作一件事情。忘记它，让它去，就过去了。

有时难处的胜过，是借着争战，也有时难处的胜过，是借着忘记。有许多的事要借着能力、刚强，才能过去；但有时忘记一下，也就过去了。你夸你的软弱，放弃你的挣扎和你的方法，祂的能力反而覆庇你。

秘诀就在于此：求神稍微给你看见一点祂的丰富，或是借着读经，或是借着祷告，或是在聚会中，或是与弟兄们交通时，稍微看见主的荣耀，就自然而然地忘记了。里面的充满是靠着忘记，忘记是在于碰见主一下；碰见主，就不再看自己了。

我听了他对我见证的评语，就问他以下的问题：我生过肺病，痰中带血，卧病一年之久。有一天得着神的话，有了信心，病就得了医治。但有时又吐血，病状还会来，是什么原因？如何胜过？

倪弟兄的回答是这样：

关于病得医治的问题，要注意三点：(1) 不试探神；(2) 不承认病状；(3) 信恩典够用。

提摩太有慢性胃病，保罗劝他不要照常喝水。那时犹太人是在楼底下挖水池，装雨水，或将水引进去，水中生虫并不清洁。保罗劝提摩太稍微用点酒（提前五23），酒有温暖与活血的作用。保罗有医病的恩赐，也医治了相当多的病人，但他没有医治提摩太的病。提摩太自己也是有恩赐的人，却不能医治自己的胃病。神没有话，提摩太不能说，“我喝水也好，喝酒也好。”不！那是试探神，他不该喝泥池的水。试探神和相信神，外面的行为是一样的，不同的是有神的话或没有神的话。有神的话爬起来走，和没有神的话而爬起来走，外面看行为是一样的。没有神的话而行走是试探神，我去信神能医治我，这是试探神。有了神的话，什么卫生的律都不必管；但是没有神的话时，律就不敢违背。请看那枯干手的人。因为主对他说了话，他就不用等病状改变才信病好了。他能够不看病状，主叫他把手伸出来，他就伸出来。主的话是靠得住的，病状是靠不住的。瘫子不是等刚强了才拿褥子走，主叫他拿褥子回去，他就拿褥子回去。你有了主的话，就不要看脉搏好不好，热有没有退。何时没有神的话，就要守卫生的规矩。有了神的话，我们就是极端的人，什么都不怕。

然后倪弟兄作他自己病得医治的见证：

我自己有过病，神差祂的话来医治了我。我只知道和神的话发生关系，和神的话办交涉，不和病状办交涉。神说医治了我，神的话就挡住病。你如果再和病发生关系，神的话就失去效力。热度低一点我也不高兴，高一点我也不慌张。我的眼睛不在热度的高低上，乃在神的话上。热度高低，血球多少，都不是主，只有主是主。学习对热度发笑，高低无所谓；学习信神的话，不信病状。只有神的话是真实的，病状是虚假的。神的话说好了，就是好了。吐出来的是红的，那是信心受试炼的时候。要学习信神的话，不信病状，病就会改变。我起初也无法相信，因为没有神的话。但有一天，神的话来了，可是病状还是很严重；我就起来说，“主啊，如果病状是假的，求你责备病状。”这样不过一、二小时，病就好了。

我有肺病、腰子病、肝病、心脏病。一九二三年我有一次患腹膜炎，躺了一个多月，呼吸就痛，热度甚高，很是痛苦。那时缪弟兄请了一些弟兄姊妹来为我祷告。他祷告时我不觉得什么。当一位姊妹（和教士）祷告说，“主啊，坟墓里没有人赞美你，弟兄死了就不能赞美你”，我的心里就通了，但热度还是那么高，里面还是那么痛。到了天明我就起来，走到罗星塔编了一期《基督徒报》。你若没有神的话，就当小心保守身体；若有了神

的话，则千万不可再看病状。那些病状，只好当作是试探和谎言，它不能留在那里，必须离开。

有的病马上就好，有的病不一定。我有一次生病，求主医治我，主说，“没有这么快医治，但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主就叫我看见一件事：有一只船在江中航行，前面有一大块礁石，无法再开过去。主说，“你是要我把石头挪开，让你开过去，还是要我使水位增高，让你从上面开过去？”我里面清楚了主的意思，就说，“主啊，不是难处除去，乃要恩典加多。”

基督徒在世界上，断没有胜不过的病。你若有主的话，就不必管病状。必须信神是信实的，你只能和神的话接触，用不着请病状来帮忙，也不必怕病状来抵挡。虽然石头没有除掉，但水位增高了，并不是仅仅，乃是多多。这就是我们的路。

归纳起来说，有三件事：(1)没有神的话，不试探神；(2)有了神的话，不看病状；(3)若神的话是不立刻医治，则祂的恩典够用。祂绝没有意思让我们生病，又不给我们够用的恩典。保罗虽病，但他作的工比别人都多。疾病绝不会拦阻工作。要学习把自己交托给那忠诚、信实的主。

我去鼓岭参加训练之前的一个月，还大口吐血，住在上海的医院中，血一停了就去鼓岭，所以才问病得医治，病状还来的问题。听了倪弟兄给我的帮助、带领之后，主给我看见，宇宙中只有神和神的话是真实的，其他都是虚假的。我既然有了神的话，病就得了医治；病既得了医治，就不必再理病状。有了神的话语之后，病状也是虚假的。感谢神，从一九四八年六月直到一九九一年的今天，四十三年之久，我再没有吐过一次血，连一点血丝都没有见过。病状完全逃跑了，赞美主！

对倪弟兄的印象

每当有人问倪弟兄问题时，他的解答总是那样的实际中肯，又清楚又明亮，满有膏油又满带亮光。他的态度非常自然、敞开，他是那么平易近人，气度宽大，胸怀阔宏。在属灵的事上，他爬得高，摸得深；对神的法则和神的旨意，他有极丰富的认识和经历。他常被人误会，遭受毁谤，但他从不解释，更不表白。有一次，人问他说，“倪弟兄，有人误会你，为什么不解释一下，叫他们明白呢？”他说，“弟兄，如果人相信我们，就用不着解释；如果人不相信我们，就是解释又有什么用呢？”不只有人背后毁谤他，他不解释不表白，就是有人当面责备他，他也不分辩不辩论。

他对于钱财看得很轻。经过他手的款项，数目相当多；在主的工作上托给他分配的，以及他为主经营所赚的钱，都相当多。但他常是这一手进来，那一手就送出去。有一次他说，“我相信在中国的同工中，钱用到最后一块的，也许我是最多的一位。”确是如此。接近他的人知道，他常是两手空空，不为自己留下什么。但为着主的工作，为着召会的需要，他是什么都肯摆上去的。

张郁岚弟兄的见证

以下是倪弟兄一位亲密同工张郁岚弟兄的见证，他生前是台湾台北召会一位领头的弟兄：

对倪弟兄的印象

倪柝声弟兄是一九四五年三月六日到重庆，三日后再在重庆的教会请他爱筵。他在我家住过十天，我们共处有一年多。后来倪弟兄搬到附近的小龙坎。我们有些人每周必到他家一、两次，寻求交通，约有半年以上。我经常带着一些问题，一一问倪弟兄，许多难题因此得以解决。他总是给人非常甜美的感觉，可亲可敬，态度温柔谦卑，话中满有膏油。人与他见见谈谈，皆是叫人里面滋润，喜欢接近他。那时有七、八位弟兄姊妹，常常围住他又谈又问，数小时不倦。他的言谈与行动，叫我常有回忆，不能忘记。

关于属灵的教导

倪弟兄告诉我们，他在学生时代，每周必要送去给和受恩教士责骂一顿。有时没有可责备之点，和教士便故意发出问题要他回答；问出毛病，又责骂一场。他说因此得了很好的属灵教导。

一次，倪弟兄被他一位职员指脸拍桌责骂，约有四个小时，闹得邻居皆抱不平，但是倪弟兄坐在椅上，手持报纸，面不改色，若无其事，不时还要点一点头。那时我们看来非常不解，现在方知他是不住地从神手中接受管治，一直服在神许可的遭遇之下。

倪弟兄两眼常常忽然望天，口中念说，“祂是神。”含意一切遭遇皆在神主宰安排之下，他甘心接受顺服。

对于伤害他的弟兄，倪弟兄与一般人的观念不同。他有一次对我们说，“犯罪的弟兄好象家里跌落泥沟的小孩，衣发染污了，只要洗一洗澡就干净了。所有弟兄姊妹，在原则上将来皆是新耶路撒冷中一块透明的宝石。”

在重庆，弟兄们屡次请他参加擘饼聚会，他却只是坐在那里，默默祷告，而不吃饼喝杯。他的原因是：“上海教会中的问题尚未解决，不能在此擘饼。”我问他何时才可恢复职事，他回答说，“没有可能了”。

关于主对工作的引导，倪弟兄的辨别很敏锐，决定很迅速。我曾问他原因，他说，“若是错了，主会用墙用驴拦阻我，如同拦阻巴兰一样。”这种态度指明，倪弟兄行事为人，是一直服在圣灵管治之下的。

关于基督徒生活

倪弟兄有一次指示我们说，“基督徒需要逃避制度，对付制度比对付奉献更重要，在制度里奉献是无用的。”有人问到打牌不赌输赢可作不可作，他回答说，“基督徒没有绝对的是非，对某一人是可作，对另一人又不可以作。基督徒的是非，是根据生命程度而定；生命程度的高低，又是看他不能作的事有多少。”

祷告和与主交通

倪弟兄祷告时是慢慢的，一个字两个字，拉着尾音祷告的。我在重庆时无形之中学了他祷告的方式，觉得如此祷告，有主的面光停在眼前，一字一句皆是向着主说，里面有话语一直涌流上来。后来有位前面弟兄责我不该效法别人祷告，我才停止。但是直到现在，个人祷告之时，仍是一个字两个字地在神面前倾心吐意。这样祷告比较容易摸着膏油。

关于如何维持与主的交通，倪弟兄举了以下的例子：“火车从四川开往昆明，必须经过许多山洞，时暗时明；基督徒与主交通的经历，也是如此。若在黑暗之中，先要认罪；若不觉有罪，就要运用意志继续交通下去。”

生命成熟

关于生命成熟的问题，倪弟兄说过以下的话：

生命成熟需要时间。青年人只有大头脑，不会实际成熟。成熟的问题在于度量的扩充。你要让神有更多的时间，给你受你所不能受的苦难，以便扩充你的度量。有人吃亏五元可以赦免，五千元就不能了。有人可以赦免人二次三次，第五次手就抖了。生熟两种果子，分别是在于味道，生的酸涩苦硬，熟的才甜才香。盖恩夫人有成熟的味，她是老年人的先生，小孩子的朋友。基督徒的生命是自然成长的，不是闷香蕉般闷出来的。人子来，也吃也喝，有人一吃一喝就显出原形来了。生命不是灵修来的，有灵用不着修，无灵无从修起。百合花开花，飞鸟长毛，都不必预备；预备只能叫你作人间圣人，不能叫你作真正的基督徒。我们只要在消极方面有十字架的记号就够了，不必用力结果子。我们用力只会耽误生命长进，却不能促进生命长大成熟。要紧的是接受神在环境中的安排，这安排就是圣灵的管治。逃躲一次神的安排，就是失去一次度量被扩充的机会；如此我们里面生命成熟的时间便要延长，甚至要补课才能成熟。信徒经过苦难之后，和以前绝不会一样；不是度量被扩充，就是更加刚硬了。所以信徒遭受苦难时需要注意，要看见生命成熟是接受圣灵管治的总和。人只看见那人生命成熟，却未看见那人历年逐日暗中所接受加起来的圣灵管治。

属灵格言数则

倪弟兄有一次说，“一件东西放低一些比较稳妥，一只杯子放在地下最为保险。”含意为主作工的人，越将自己降卑越是稳妥。又一次说，“十字架漏了风，就会吹走。”含意背负十字架时，不可对人说什么，一说就失去十字架的意义了。

又一次说，“有人跌倒，是在楼上跌倒的；有人站住，是在楼下站住的。楼下站住的人，不可嗤笑楼上跌倒的人。”

一次谈到劝勉人的问题，倪弟兄说，“劝勉人有两个结果：(1)挽回他；(2)使他更加刚硬。如何认出劝得对不对呢？要看你所劝勉的人。若他不听便落在黑暗之中，那就证明你劝得对了；若他不听仍能与主交通，那就证明你劝得不对。”

有一次他对我说，“有些叫化子睡在屋檐底下，你可叫醒他们，请他们吃碗馄饨，向他们传点福音，你里面必会摸着膏油。”我到了台湾，遇见倪弟兄的侄儿倪苏夫，他说年幼时见过倪弟兄在路上遇见一团车夫，蹲在地上赌钱，他也就蹲在他们旁边，一同有说有笑。倪弟兄真是在什么人中就作什么人，为要得着人。

他的生活

我观察倪弟兄的生活，觉得他已学会如何处丰富，如何处卑贱，随事随在都学了秘诀。他初到重庆时，住在一间角楼上面，只有一床一几一凳而已。我去看他，登那角楼之时，木梯还会摇摆，又会吱吱作响。倪弟兄后来住入自己的工厂大楼，在他没有两样，态度依然如前。关于饮食，他有时一餐只吃一个馒头，喝点白水，有时也赴丰富的筵席。这些生活情况，他都不在乎。

赖教士的見證

赖教士（Elizabeth P. Rademacher）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上海的传教士，曾在美国加州亨丁顿滩（Huntington Beach）的召会中服事主。以下是她所作关于倪柝声弟兄的见证：

我最后一次见倪柝声弟兄，已经是四十八年前的事了。那是在一九四三年二月间，美国正与日本作战，那时在中国上海租界里的外国人，大都在日本人的管治之下。就在我和其他许多美国人（我的同工们是英国人）被拘禁的前一天晚上，倪弟兄到我们家里来，事先没有通知；他来看望我们四个西国人时常是这样。我们用茶点，享受了甜美的交通之后，他递给我一小瓶没有标志的浓缩维他命，是生化药厂制造的，他指示说，“每天服半滴。”对于一个即将被拘禁不知多久的小姊妹，倪弟兄竟有这样的预先设想和关切！

我第一次听见倪柝声这个名字，是在一九三四年，那时我对他毫无认识。在我的想像中他是一位长须白发的老人，殊不知他没有比我大多少——他那时不过三十岁左右。几年以后，我和一位比我年长的西教士到哈同路参加擘饼聚会和特别聚会，才在那里第一次看见他。

那灵的内住

一九三八年初，倪柝声弟兄在上海召会带领查经聚会，查读关于圣灵的事。我有灵恩派背景，但对灵恩派感到有点混乱和失望。我渴慕听听倪弟兄所说的，希望在几个困扰我的问题上得帮助。例如，为什么这么多人宣称得着圣灵的浇灌及其表显，生活却与此不一致？敬虔的生活在哪里？为什么我过的是失败的生活？

主借着倪柝声弟兄向我所说的话，对我的人生起了革命性的冲激。那天晚上，当我听见他说耶稣成了那灵住在我们里面时，天破晓了！以前主对我似乎离得很远，现今祂在我里面是那么真实。这解决了我基本的难处。如今我能在我里面找到祂。我进一步看见圣灵的工作有两面：外面是恩赐和表显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里面的一面，就是里面的充满，使生命得着变化。

他举了一个很有帮助的例子，给我不可磨灭的印象：一辆载重的车若是轮胎的气不足，发动起来可能会使车破毁。这是一幅适当的图画，描绘一个人经历了多次圣灵的浇灌，里面却没有与此相当的圣灵的工作。感谢神，我没有变成一辆“破车”。现在我明白，为什么有这么多我以前所认识的人，至终叫主的名蒙羞。

有一次他作见证，说到他所爱，又为着主放弃的女子。他引用诗篇七十三篇二十五节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他见证这话成了他的实际。这见证叫我惊讶，我从未听过或见过任何人，能诚实地说这样的话。

国 度

那次的查经结束了，但主在我身上的工作并未停止。在倪弟兄去香港和英国之前的主日晚上，我们六个人在一对传教士夫妇的家里，围绕着火炉聚集。我们以前就有过好几次这样非正式的聚集。通常有不少西国人聚集，一同用饭交通，很渴慕地听倪弟兄用流利的英语讲说国度的事，或回答别人就着他所释放关于圣灵的信息所发的问题。有一次我里面深处忽然有感觉：神站在这里说话！

这是他出国前最后一次的机会，交通他的负担。他开始说，“我想多说一点关于国度的事。”他在说话当中说了这句话：“主需要传报国度的人。”那时我受了感动，倪弟兄注意到我的反应，就说，“赖姊妹，不要怕。”就是这样借着主说话的大能，我改变成为另一个人。为着这样一位忠信、谦和、可亲的主仆，赞美主。

其他的回忆

我还记得一些事情，显示他非常实际并周详的爱的关切：有一天倪弟兄和倪师母来访，给我们西教士每人一床丝绵被；好几次被邀到他家吃饭，享受美味、精致的福州名菜；有一次我作了一个非常严重错误的决定，之后与他谈话时，他回答说：“有时甚至我们的错误也是对的”，叫我大得安慰。

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三年初，召会生活有一些改变，我们开始在城里不同的地区有较小的分区擘饼和祷告聚会。倪弟兄通常在主日上午和周三晚上供应话语，有时在周五晚上对初信者说话，此外也在特会中说话。我记得他常提到和受恩教士，说他在基督徒生活的早期从她得着很大的帮助。他话语的职事赐人生命，并且在我里面种下了许多不能磨灭的印象。例如，他论罗马十二章一至二节所说的话：“神的旨意不是为着那些未奉献的人。问题在于我是怎么样的人？我是否够资格认识祂的旨意？善良的不都是神的旨意，但神的旨意总是善良的。”又如，他对初信者所说的这段话：“得救而不奉献，就象铁路只有一轨。我们要在属灵的路上往前，二者都不可缺。”还有他论约翰十四章六节的这段话：“你所认识的真理，有多少是叫你得自由的？真理就是基督：真理对你若只是‘真理’，就是没有功效的。”

有一篇关于神旨意的信息把我完全征服了。这篇信息描述神从已过永远到将来永远的旨意。他所说的中心思想是这样：在起初只有一个意志—神不受抗衡的意志。然后撒但堕落了，在宇宙中有了第二个意志—背叛的意志。后来神创造人，给人自由意志，能选择与神是一或与

撒但是一。在将来的永远里，撒但被扔在火湖之后，宇宙中又再次只有一个意志；但这意志与起初的意志不同，乃是神的意志与人的意志完全调和成为一个意志。

信托他的带领

一九四二年间，倪柝声弟兄的职事停止了。起先我们不以为奇，因为我们对他的动向和他在别地的事工一向不是很清楚。一周一周地过去，虽然我还不知道他已经被请停止在哈同路尽职，但我开始觉得有一股暗流。不久，他们也请我们西国人不要参加聚会，我不知道这是因为日本人的占领，还是因怕我们被控作间谍。那些日子，倪弟兄有时会突然来看望我们，叫我们欣喜不已。他那时在经营生化药厂，还亲自带我们参观过那工厂。在他“织帐棚”的这段期间，不管别人的感觉如何，我们却只信靠并信托他的带领。我们怎能审判他？乃是因着他忠信地跟从主并宣扬主的话，我们几个人才被带进荣耀的召会生活里。

亲友的见证和信件

万小玲姊妹的見證

“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希伯来书第十一章18节）

——记倪柝声夫妇末后两三事——

“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祂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来十二：2）

“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启七：14）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那是神为大陆弟兄姊妹预备的一炉炼金的火。我的姨婆倪师母（张品蕙姊妹）年轻时毕业于燕京大学生物系，她一直是倪弟兄的贤内助。公公（倪弟兄）入狱后，她也曾一度入狱受审，出来后仍一直受监视。在文革中，因为公公的缘故，她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受到许多非人的折磨。婆婆身体很不好，有非常严重的高血压及高血压心脏病，但自始至终，她一直坚心仰望主，“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在宰羊的人手下默默无声。”

1966年夏的一天，她被一群红卫兵关在一个小房间里连续审拷昼夜，我们在外面只听得阔皮带一声声的抽打，并夹杂谩骂恐吓声，一声声像是抽打在我们心上，但却没有听见婆婆一声言语。过了许久，婆婆被押出来，眼睛被打肿得像青馒头，身上也多处伤痕。那期间她的眼镜被打碎几副，连最起码的人格都得不到尊重。多次她被揪斗、游街。有一次，她同另外两位老姊妹一起被迫高举双手，手上套着鞋子，头上戴着纸做的尖顶帽子，项上挂着牌子，被责骂、凌辱，勒令她们这样站着达数小时之久，目的是要她们放弃信仰不再信耶稣。但几个钟头下来，她们三位都一声不吭。最后红卫兵忍不住了，分别一一喝问她们：“你们到底还信不信你们的耶稣？”她们个个都坚说：“信！”红卫兵们气极了，拾起地上的皮鞋，一下一个扔到她们身上、头上，说：“带着你们花岗岩的脑袋见上帝去吧！”感谢神！在所有的逼迫中，神与她们同在，赐力量坚固她们。事后当她们谈到这次遭受的逼迫，都觉得很喜乐，因为她们算是配为主的名受辱。

红卫兵把所有的圣经、诗歌都抄家抄走了，但婆婆还是千方百计地藏下几本。有一次，外面小孩爬墙，发现屋檐下有两本圣经，婆婆又被定罪一次。我信主之后，一次偶然在大厨后面发现一本小圣经，真是欢喜万分，那也是婆婆藏的。在那些没有圣经的年代里，这一本小小的神的话，对于我实在太珍贵了。

每天早晚两次，婆婆被勒令要打扫弄堂，当时她虽在狱外，却真是比在监内的犯人还要惨遭凌辱和迫害。任何过路人，包括小孩子，都可以随意过去打她、唾她，因为她是众人所弃的“反革命分子”。有一次在斗争她的大会结束后，婆婆对我说：“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林前四：9）。圣经上早就命定了。”在所有的逼迫中，她总是在批斗她的台上一直不停地默默祷告，始终是靠主站住，没有羞辱主的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所有见过她的人

都喊她“白头发”，人人都知道，那位满头银发的老太太，是为了她和她丈夫的信仰，受到监督劳动和非人待遇的，为了主耶稣的名，成了一个众目共睹的美好见证。

1970年，当我被送去农村插队落户时（当时所有初中毕业生都被送到农村当农民），婆婆每天都为我祷告。1971年春，我临别上海前，婆婆流着泪对我说：“主耶稣是我们最宝贵的救主，你无论如何总要牢牢跟着主。”我在农村蒙了主很奇妙的带领和极大的恩典，我想这一定是与婆婆的代祷分不开的。

公公（倪弟兄）于1952年被捕之前，有机会为教会事宜去香港，当时有许多人都劝公公不要再回大陆，但是他受神的呼召，要“回大陆去，与弟兄姊妹一同受苦”，他很清楚神为他定的道路——“我的结局，不是被提，就是殉道。”他回来后不久，即被捕关入上海提篮桥监狱。1967年，15年刑期满了，政府要他公开声明放弃信仰，因为他们对外已经公开造谣说：“倪柝声放弃信仰了”。但这个考验对他又算得了什么？主对于他实在是太宝贵了！为了对主忠诚，他再一次放弃所谓的“人间自由”，在狱中十五年之后，甘心继续为主作囚徒。这一次公开表态引来了更大的逼迫，公公跟两个流氓刑事犯被关在一起，小流氓的任务就是逼他放弃信仰，他们越狠地虐待他，自己就越能立功。曾听狱中难友说，公公的一件棉背心也被他们打烂了，可想而知，为了不放弃信仰的表态，他吃了许多苦。当他们的目的不能达到，而他的刑期又满了，公公就被秘密押送去上海郊区的青浦县青东劳改农场。此期间，婆婆还被批准去看过他一次。然后又突然音讯全无好几个月，事后才知，公公又被押到更苦的地方——安徽深山里的白茅岭劳改农场。

1971年11月婆婆中风去世，在这之前已被允许与公公通信（曾有一段时期连通信都不准，所以无人知道公公当时的去向）。婆婆从中风开始到去世仅仅三天，这也正是她在世时向主所求的。她患有很严重的高血压及心脏病，知道最后总会死于中风，所以她一直盼望一旦发生中风就很快被主接去，既不拖累别人，也免得受长时间之苦痛。感谢主，听了她的祷告成就了她的心愿，从中风昏迷到去世只有三天，在医院里十分平安、全无痛苦地被主接去。

婆婆去世后，我们不敢马上报告公公，因为知道他的心脏很衰弱，恐怕一下难以承受如此的打击。过了一个多月，才断断续续写信告诉他。但是自从婆婆病危直至此期间，他似乎有预感，不断来信询问婆婆的身体情况。他信中十分迫切地想早点出来与婆婆团聚，好在病中服侍她。当大姨婆（倪师母的大姊）与孙女一起于1972年初去安徽看公公时，知道他的心脏极其衰弱，婆婆的去世是一桩使他万分痛心的事，因婆婆是他唯一保持联系的亲人。事后听同房间的难友说，公公一直有一个心愿，想早点结束他的刑期出来与婆婆团聚。他知道婆婆的身体非常差，他曾说：“我的刑期，像是与我妻子的生命在赛跑，如果我能在她还在世的日子出去，就可以好好服侍她，她为我受了许许多多苦。”

公公入狱前，为教会的事奉一直奔走于全国各地，入狱后一下又是二十年，他们两夫妇在一起的日子实在屈指可数。当公公被捕时，他们捏造了许多骇人听闻、莫须有的罪名，来诬陷他，当时蒙蔽了许多弟兄姊妹。但婆婆对他最了解，婆婆说：“他们说他的这些事，都是根本没有的。”公公为主的原因，承受了许多非人所能承受的冤屈。公公关在提篮桥监狱时，婆婆

还可以每月一次送去少量的食物及日用品，以后转去青东农场，婆婆也去看过他一次，再后就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了。为婆婆的离世，公公非常难过。听同牢的人说，他曾悲痛多日。四月二十二日从他给大姨婆的信中，知道他“维持自己的喜乐”。这些年来，一个又一个重重压迫，并没有使他气馁，因为他所仰望的，乃是这位叫我们永不失望的神。

1972年6月，我们接到农场的通知，说公公已去世。我和大姨婆赶去农场，但到了那里才知道，他们已将他火化，只能看到他的骨灰了。他的难友告诉我们，当时他的心脏病发作非常厉害，他们在他垂危时，将他放在一台拖拉机上拖去四十里外的农场医院。这四十里坎坷不平的山路，被拖拉机载着颠簸，就是身体好的人也受不了，更何况是一个最忌震动的心脏病垂危病人。在途中公公就被主接去了。临离去前，他留下一张纸在枕头下面，那是用非常颤抖的手写下的几行大字，公公要用他一生的经历，来证明这个他至死都持守的真理——“基督是神的儿子，为人赎罪而死，三日复活，这是宇宙间最大的事实。我信基督而死。倪柝声。”当农场干部将这张纸给我们看时，我祷告主让我快速将它背下来记在心里。

劳改农场干部还说，他写了许多笔记本的“反动日记”，那是他在狱中对于真理的新的亮光，但这些珍贵的手稿都无法从狱中拿出来，除非神特别保存它。公公在狱中有一难友将他的一些情况告诉我们，公公在世时一直为此人祷告，当公公去世后不久，他得救归主了。

公公去了，他至死忠心地带着他血染的冠冕被主接去了。虽然神没有成就他最后的心愿，能活着出来与他妻子团聚，但主却预备了更好的——他们团聚在主前。“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来十一：13）“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祂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来十一：6）

他们去了，如同许多的殉道者一样，是神为祂自己的名呼召出来的一班得胜者，是这个世界所不配有的人。如今他们安息了，但是他们的祷告、他们的果子，却一直在那里蒙神悦纳，在那里起着不息的功效，他们的脚踪也激励我们更忠心向着主。

吴友琦弟兄的见证

各位弟兄姊妹，各位属灵的长辈，我来自中国上海。我姓吴，名友琦。今年（二〇〇三年）六十八岁。我本来是中学教师，一九六〇年因为反对“三面红旗”，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关押在远东最大的监狱——上海市的提篮桥监狱。

倪弟兄是在一九五二年被捕，被捕以后就好象这个人从地球上消失了，没有人知道他的事情。感谢、赞美主，主怜悯我这个卑贱的人，祂爱我，留下了我，让我有机会把倪柝声弟兄在监狱中，凡我所知道的事情，可以告诉大家。

我和倪柝声弟兄相处前后一共九年（1963~1972年），其间曾分开过两年左右。感谢赞美主，最终又把我们带领在一起，直到他被主接走前三天，我们才分开。这么多年，有许多见证。倪伯伯也是个人，今天我要见证的是他属人方面的事。

一九六三年，因监房调动，把我和倪伯伯调在同一个楼层，同一个小组，并睡在同一个房间里。从此，我和倪伯伯结下不解之缘。

提篮桥监狱相当大，一共有十幢楼房，每幢楼房（即每个监房）有五个楼层，每个楼层有九十个房间。如果平均计算，每个房间关三个人，一幢楼就可以关一千多个人。这么大的监狱里，在几万个人当中，要遇到一个人并不是容易的。我和倪伯伯就在第三号监房里相遇，这是主的安排。

在我们这个牢房里，有倪伯伯、我，还有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小伙子，是个弱智，他讲话讲不清楚，一直哦哦哦，头不断地摇，右手总是在胸前放不下来，他也是一个反革命分子。

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们：当我进入这个牢房时，我对倪伯伯是非常不友好，我对他很反感，我对他非常敌视，我看不起他，我不愿意和他讲话。为什么？因为他当时是小组长。在监狱里，犯人有小组长。在我的眼里小组长都是拍政府马屁的，都是政府的走狗，都在犯人的头上捞稻草，踏在人家的头上往上爬，好让自己减刑、别人加刑。另外，我为什么被捕，我又不偷、不抢、不杀人、不放火，我就是讲几句话，你们就抓住我不放，所以我怕，我惧怕他，我不敢和他讲话。牢房里三个人，一个弱智不会讲话的，一个就是他，一个我自己。他每天在写东西，他不汇报我，汇报谁呀？我敢和他讲话吗？一天到晚二十四小时没有和他讲一句话。他坐在门口写东西，为什么坐在门口？我们被关的牢房宽一米五、六左右，我伸开手可以碰到两边的墙；长有两公尺左右；三面是墙，没有窗，前面是铁门。铁门口有一点亮光，倪伯伯要写东西就坐在铁门口。发给犯人的饭、水，都是放在铁门口，门不用开，我们手伸出去，就可以拿进来。他坐在门口，东西都由他拿进来的，我的饭、热水、冷水都是他拿进来的。我不愿意和他讲话，从来不感谢他，是他自己愿意做的，我们两人关系很不好。

后来有一件事情发生，这是主的安排。我只有一个亲人，就是我的妻子。她是上海水产大学毕业，在上海景岗中学教化学，我们有一个孩子是个女儿。犯人家属每个月可以探监一次，送来一点东西。我的妻子很爱我，她每个月都会来看我，我以为她在外面还一直在教书，其实她也发生了事情。

一天，学校校长叫她去问：“周老师，听说你丈夫是个反革命，现在关在提篮桥监狱？”她回答：“是。”“你必须和他离婚。”我妻子说：“为什么？”他说：“政府有规定，反革命家属是不能做人民教师的。你丈夫是反革命，思想反动，你和他接触在一起，你怎么能教好同学呢？所以你一定要和他离婚。”我妻子就说：“我和他结婚的时候，吴友琦不是反革命，他是上海市的拳击运动员，可以代表上海市出国比赛的。结婚以后才是反革命。如果我现在和他离婚，再嫁别人，这个很难保证，那人以后又是反革命，我又要和他离婚，再嫁别人？而且我们现在已经有个女孩，我还年轻，再嫁会另外有孩子，对现在的孩子成长很不利。再说，吴友琦被判七年徒刑，我可以等他，他出来以后照样可以建设社会主义，我们还可以做夫妻。”她这些话讲得非常讲道理，校长和教导主任都讲不过她。可能就此甘休吗？不可能。过不多久，校长又叫她去问：“那个问题你考虑好了吗？”她回答：“不考虑。”校长说：“那我们也不考虑，这是政策规定的，你把工作证交出来，你不离婚就离开学校。”当时大陆的情况和现在完全不同，离开学校就没有工作，不能自己做任何事。我妻子离开学校以后，一路哭着回家，头脑一片空白，今后怎么办？生活怎么办？女儿怎么办？回到家里抱着女儿痛哭，没有人安慰她。

过了不久，到了探监的日子，她来看我，她把她的遭遇一五一十地讲给我听。我听了以后，非常气愤，天下哪有这种道理？我无缘无故被你们打成反革命，你们还不肯放过我的妻子、不肯放过我的女儿！我的妻子说：“我今天是卖掉手上的手表，才来看你的，以后我不知道怎么办。”弟兄姐妹，我没有杀人、我没有放火、没有偷、没有抢、没有爆炸，我不是国民党、不是特务，我不是地主，我什么坏事都没有做，我叫什么反革命？我没有贴一张反动标语、也没有发一张反动传单。我“反”在哪里？我想不通。但是有什么办法？当时我的妻子哭得很厉害，我没有流一滴眼泪。我从小在红旗下长大，共产党教育我，在敌人面前是不能流眼泪的，今天我就不能流一滴眼泪给你们看。我本来不是你们的敌人；我是拥护你们的，解放的时候我才十二岁，我还给解放军带大红花。是你们把我推向敌人一边，我这个敌人是你们制造出来的。五分钟的探监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的妻子抱着小孩离开了；我站在那个地方看着我的妻子，我不晓得以后怎么办，我不晓得她会不会和我离婚。突然我妻子回过头来，大声叫：“你身体当心啊！”这叫声现在还留在我的耳朵里，是撕心裂肺啊！我没有任何办法，我不能冲出去，我不能窜出去，我没有机关枪，我不能和他们搏斗，我只能任他们宰割。

在狱警的推送之下，我回到牢房，我忍不住流出了眼泪。牢房里没有桌子、没有椅子、没有床，我靠着墙哭了起来。不久我发现我的一只手被人抓住。牢房里一共三个人，我知道一定是那个讨厌的倪伯伯抓我，我当时很气愤，他是最瞧不起的人，他抓我的手做什么。我连话都不和他讲，我不要他同情，心里想把他的手甩开。我是个拳击运动员，当时我很年轻，他是个年纪大的人，又有心脏病，只要我一甩，他整个人一定被我甩到铁门上去。但是，弟兄姐妹！真的很奇怪，这是一件奇迹，当时我的手竟然举不起来，倪伯伯并没有多大力气，我至少举了三次，就是举不起来。这时我听到倪伯伯在我的耳边讲：“友琦啊，哭出来，哭出来好一点，舒服一点。”他的这句话很打动我。因为在监狱里有监规，规定不能大声哭。为什么不能大声哭？因为犯人都很伤心，你一哭他也哭，在监狱里大家哭起来就不得了，这叫监潇，对改造不利。我想，倪伯伯应该要对我说，你不能哭啊，你哭是犯错误的啊，要好好改造啊，总该

这样讲才对。他是小组长，要站在政府一边。我万万没有想到他说，你哭出来，哭出来舒服一点。通过这句话我对他的看法有所改变。这时我放声大哭，我哭的非常响，我什么都不管了。就是监警过来，骂我、打我、枪毙我，死了算了，家里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死了也无所谓了。奇怪那天监警也没有来管我，后来我哭得没有力气了，倪伯伯拿毛巾给我擦脸，还倒水给我喝。我们两个人就坐在地上，从这个时候起，我开始和他讲话。我把自己的遭遇讲给他听，想不到倪伯伯非常爽直，他把自己的遭遇也讲给我听，把他家里的事情也讲给我听。从这天开始，我们的话越来越多。他告诉我他非常忙，他是基督徒。还告诉我，他的妻子非常爱他，他的妻子高血压非常严重，低压一百四、一百五，高压二百、二百以上，随时都有死亡的可能，都是主的扶持，主的怜悯。他希望他的刑期能够早一点满了，能够早一点出去，还能够和妻子见面，如果他的刑期长一点，他的妻子走得快一点，今世就永远不能见到他的妻子了。他的妻子像我的妻子一样非常爱丈夫。他还告诉我很多事情，我们两人的讲话越来越投机。他还说一个基督徒是不会反对国家领袖的，因为国家领袖是主让他做的，他向我传起福音来了。听了他的话，我心里想，我很清楚我自己是被冤枉的，这样看来他也是被冤枉的，他没有反对政府，基督徒不好反对领袖，你把他打成反革命，这不是冤枉的吗？所以，我就问他，你现在还信不信主？他回答说：“你们不信，我信；你们没有看见，我看见。”这是他的原话。很简单的话，我一直记住。

二十四年以前，有一个弟兄来找我，我把这一件奇迹讲给他听。我说，我想不通，当时我的手为什么举不起来，我这么大的力气，他握着我，我甩都甩不掉。弟兄讲得很有道理，他说，你这只手是举不起来的，主耶稣是不会让你举起来的。我一听就通了，是啊，我是一个卑贱的人，主找到了我，主拣选了我，我的手是举不起来的。

我们两个人关系好一点了，谈话投机了；旁边还有一个人，小弱智，他也高兴，在旁边一直笑。他讲话也多了，但是他讲的话我听不懂，最多百分之五十。倪伯伯全部懂，他做我的翻译，我们三个人就这样在一起苦苦地过日子。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有一天，监警把倪伯伯叫出去，过了很长的时间，中饭都来了，他还没有回来。现在我和他的关系好了，我就把他的中饭用棉被包起来。以前我是不会管他的，扔掉就扔掉，关我什么事。他回来后，我看他有点不高兴，坐在地上，我就问他：“叫你去做什么？”他说：“他们要我放弃信仰。”我说：“你答应了吗？”他说：“我没有答应。”他还说：“他们要我放弃信仰，如果我答应了，他们就让我回家。”我说：“你不同意啊？”他说：“我不同意。和我一起去的还有两个人，一个姓蓝的名叫蓝锡章，另一个姓张的。这个姓蓝的是上海一个很大的医院的院长；姓张的是上海一个县的县长。他们两个在天主教中都是比较有名望的。”我就问倪伯伯，他们两个怎么样？他说：“他们两个都放弃了，一会儿你就知道。”过了一会儿监房的广播喇叭就响了。监长讲话说：现在有两个犯人，通过政府的教育改造，思想转变了。表现很好，愿意公开放弃他们过去的信仰，放弃反动立场。现在他们两个人自己讲话。蓝锡章和张某就一个个讲话，他们先把自己臭骂一顿，又把天主教臭骂一顿，说天主教是帝国主义利用的特务组织，是反革命。他们是上当受骗，通过政府的教育，公开放弃这个迷信，脱离这个反动组织，彻底悔改。他们痛哭流涕。他们讲完了以后，监长就宣布，现

在经过狱长的批准（监长是监房的头头，狱长是整个监狱十个监房的最大的头头），他们两个人提前释放，今天就回家。弟兄姐妹，当时听到这些话，整个监狱的犯人都震惊了，我也很震惊！倪伯伯就在我面前，我两只眼睛盯着他看，你前几天还向我讲，你的妻子对你那样好，你们是那么恩爱；你的妻子身体是那么不好，那么危险，你那么想念你的妻子。今天人民政府让你回去，你只要讲一句话，说你放弃好了，只要开一个口就好了，就回去了，你都不愿意！一句话你都不肯讲，你这个人是怎样的人？你相信主，相信到这样的地步！你这个人我真是读不懂。弟兄姐妹，我从小就读过这样一首诗，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写的，他写道：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这说明自由是多么可贵呀！今天人民政府给你倪伯伯自由，你倪伯伯不要。倪伯伯为了主，生命不要了，爱情不要了，连自由也不要了。倪伯伯是三者皆可抛！他这么爱主，这么信主，我实在是受感动！共产党这个办法对倪伯伯是很厉害的。你不放弃，放走两个人给你看。倪伯伯无动于衷，触不到他的灵魂。但是我的灵魂倒是被触到了，我知道倪伯伯这个人不是傻瓜、不是弱智，他这样相信耶稣是有道理的，相信耶稣一定是很好的好事情；我也要相信耶稣，我也要跟着倪伯伯相信耶稣。从这个时候开始我觉得一定要信主，人人都要相信主，要脱重担要相信主，要得平安要相信主。

有弟兄姐妹问我，你是读了倪伯伯那一本书、那一篇文章才相信主，我说我不是读他的文章相信主的，我认识他的时候还不相信主，没有读过他的文章；我是读他的人才相信主的。中国有一句话，言教不如身教，我是看到他的实际行动，这感染了我，我才相信了主。倪伯伯是个人，我就是对他这个人的感性方面的认识才相信主。他的这件事对我的影响是非常非常深的。

我就是这样通过倪伯伯在监牢里得救的。倪伯伯在监牢里，他并没有站在一个很高的地方，把手一举：朋友们！你们都要相信主啊，于是几万个人都相信主啦。倪伯伯也没有在监牢里和共产党作斗争、斗到底，是英雄、是好汉；不是这样，这是谎言，没有这个事，他只是坚持不放弃信仰。我们说话要实事求是，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作见证。

我们第二次相遇是在安徽省的白茅岭劳改农场，在那里我们又在一起呆了五年。相遇时我们俩都很感动，我写了一首诗：

彼此依依相见晚，主有安排难预感；
本是同袍同泽人，皖地重逢叙忠悲。

那时他的身体已经很差，年纪又大，步履艰难。我们住的地方，离开食堂大概有六、七十米远。我们是住在低处，食堂是建在上面靠近公路的边上。到食堂去打饭，要爬过两个陡坡，过马路。这对倪伯伯来讲，根本办不到。所以每天三顿饭，都是我帮他打，带回来吃。忽然有一天，狱警把我找到办公室。他问我为什么天天帮倪做夫打饭。我说：“他年纪大了，身体不

好，两个坡他是爬不过去的，我帮他打饭，照顾他，是应该的。”想不到这个狱警把脸一沉，对我说：“胡说，他是装病，让他自己去打饭，以后不要你帮他打。”这很清楚，他们是在故意刁难倪伯伯，当然我不去理会他们的警告。

过了几天，有一次我又到食堂打饭，伙房里的工作人员对我说：狱警已经通知，谁都不能帮倪傲夫打饭，他要自己来吃。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只得回到宿舍里，一五一十地把情况告诉倪伯伯。我知道倪伯伯是一个知识渊博的人，我叫他赶紧想办法。我就坐在他旁边，等他拿主意。等了很久，他终于开口，他说：“我愿凡事顺其自然。”我听了他的话，大吃一惊，听其自然，一切顺从主的安排。我真是又气又急，没有想到他怎么讲这样一句话。“你不想吃饭啊？”我不想去顶撞他，只好把自己的饭分一点给他吃。就在分饭的时候，感谢、赞美主，主给我这个笨头笨脑的人一个好主意：我本来中午是吃五两饭，现在我可以对食堂伙夫说，今天我劳动累了，我要多买一两。食堂不会怀疑我。我就打六两饭，回来后，我把二两饭给倪伯伯吃。他年纪很大，二两饭就够了；我吃四两，虽然少一点，但还可以过得去。就这样，我们两个人每天分而食之，难关也终于渡过去了。

一九七一年，有一天狱警允许我把一封倪伯伯的家信带给他。原来信上写着，倪伯伯的妻子倪伯母从椅子上摔下来，断了两根肋骨，正在医院抢救。我一边劝倪伯伯不要着急，一边叫他赶紧打报告，要求回上海探亲，我可以陪他一同回去。照理，当时我和倪伯伯早已刑满，不是罪犯了。但是一九六六年，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到期的犯人一个都不释放；按照规定，我们每年可以回去探亲一次，为期半个月。我想，现在家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总可以让我们回去一次罢！

一开始狱警对倪伯伯说，让我们考虑考虑。后来又说，你心脏病这么厉害，路都走不了，怎么回上海？倪伯伯对他们说，我可以陪他回去。狱警说，再考虑考虑，这样一拖就拖了半个月。当我们再去问狱警时，这个监警干脆把脸一板说：“你回去干什么？你又不是医生。况且你老婆的病情现在已经好转，我们了解过了。我们研究过你要求探亲的报告，我们不批准。”倪伯伯一句话都没有同他们争辩；也不让我和他们讲道理，就和我一起回到宿舍，他默默地祷告。有人看到倪伯伯嘴唇在动，就问我：“老倪是不是在作祷告？”我说：“没有，他是在作气功。”后来狱警也来问我，我也照样回答他。但是我知道，倪伯伯一天也没有停止过祷告。

终于有一天中午，我收工回来，看到倪伯伯泪流满面，原来倪伯母去世了。倪伯伯很悲伤。我一面劝倪伯伯不要悲伤；一面鼓励倪伯伯再打报告，要求回上海奔丧。我想这一次总该批准罢。想不到左等右等，还是不批准。狱警说：“人已经死了，你回去有什么用？”弟兄姊妹，有谁受过比这个更痛苦的折磨么？倪伯伯心痛阿！他要主，坚决相信主，他忍受下来了。

当时他写了一首诗：

哭千声，唤千声，
卿声我惯听，缘何卿不应？

我看到这首诗，就在下面和道：

横报告，竖要求，
奔丧人长情，奈何不批准？

倪伯伯一生爱主，遭受了很大的痛苦。过了几天倪伯伯就从悲伤中脱离出来，他的生活恢复正常，每天坚持祷告。

九个月以后，他被调到白云山，那是一个皖东的僻野。一个连路都走不动的心脏病人，一个人坐在拖拉机上颠簸着和我们分别了。三天以后，传来了倪伯伯耗讯。

倪伯伯除了在身体上遭到折磨外，他在精神上更是忍受了难以忍受的摧残。他一生受了很多的苦，什么也没有得着，但是他得着了主。他让我们透过他看到了主！他是瓦器，但是在他这瓦器里有宝贝！

今天我们在这里可以自由地喊：“主啊，我爱你。”在中国大陆也可以随处喊：“主啊，我爱你。”但是当年在极左路线的统治下，是不能喊的。倪伯伯一生爱主，却有二十年之久受限制，人不准他喊一声：“主啊，我爱你。”你们想一想，如果二十年不准你喊一声：“亲爱的母亲，我爱你。”不准你喊一声：“亲爱的女儿，我爱你。”或者“妻子，我爱你。”你受得了么？然而，倪伯伯忍受了这一切。今天让我们因着他，一起高喊三声：“哦，主啊，我爱你！”“哦，主啊，我爱你！”“哦，主啊，我爱你！”

第二部分

上海基督徒聚会处简史及忠信圣徒的见证和殉道史

上海基督徒聚会处简史

主在上海的见证，起始于1926年，汪佩真姊妹看见主恢复的亮光，在她的住处新闸路赓庆里开始擘饼聚会。1927年，倪柝声弟兄和李渊如姊妹也先后参加赓庆里的聚会。同年3月，倪弟兄将福音书房从福州马尾的罗星塔迁往上海。1928年1月，上海基督徒聚会处迁入哈同路240弄文德里聚会。1927年至1942年这短短的15年时间里，上海成了倪弟兄职事工作的中心，他在这里出版属灵书报，召开友华村的训练。1942年，上海基督徒聚会处因误会将倪弟兄革除，之后有六年之久，聚会死沉、同工四散，没多久因日军侵略，聚会停止，会所关门。



原南阳路聚会处

1948年，倪弟兄复职，回到了上海，带进上海教会的复兴。同年，上海教会买地盖建可容纳3000人的南阳路会所。1948年到1951年，是上海基督徒聚会处最蒙福的阶段，圣徒同心合意，兴旺福音。

1956年，肃反开始，倪弟兄被判15年刑，上海基督徒聚会处主要同工与负责人多数被捕。上海基督徒聚会处作为教会的内涵、实质，也因1956年的肃反而结束。肃反检查队进驻南阳路会所，组织“信徒学习委员会”接管教会事务，并选出三位伪长老代表开除倪弟兄。两年后，也就是1958年，伪长老将南阳路会所奉献给政府，作为体育馆用，聚会处的信徒被并入陕西北路怀恩堂的三自联合礼拜。目前网路上流传的上海基督徒聚会处简史，内容多引用当年伪长老之一的任钟祥所写的“上海基督徒聚会处简史”。任钟祥歪曲事实，写出一篇满带政治性的聚会处历史。然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和新妇，与政治并无关系，上海基督徒聚会处的历史，应由那些因持守信仰，无畏苦难，甚至殉道之信徒来写，不该出自卖主求荣之人之手。

这两年有某些居心人士，以还原历史为名出书，为己博名。其中一位女士，在上海只有六年，从未深入核心事奉，并在最后两年出卖聚会处主要同工，导致张愚之、朱臣、蓝志一、李渊如、汪佩真、陈本微等多位同工于1956年1月29日一夜之间同时被捕。这样的人没有资格代表上海教会的圣徒，写上海教会的回忆录，她自己也承认放弃信仰廿四年。她的写作唤醒了我们这些沉默为主受苦的信徒，以及当年被捕、殉道之同工的子女，愿意站出来写上海教会圣徒们忠心的见证。

忠心圣徒的见证及殉道史

关于张愚之弟兄的见证

1949年中共还没有占领上海，由于李常受弟兄离开上海去了台湾，这时我的丈夫张愚之弟兄和其他弟兄姊妹一起照料上海地方教会就留了下来。1956年，中共在大陆掀起肃清反革命运动，上海聚会处约有30名弟兄姊妹被逮捕，并遭判刑，监禁。这时张愚之弟兄之所谓反革命罪强判12年，仅因他拒绝参加中共组织的“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三自”即自治，自养，自传），实质上三自运动就是要使大陆的教会由中共来掌握，教会的头是中共政府。

张弟兄被捕后，共产党对他轮番审讯，不准他睡觉，他受不了这种折磨，身体迅速垮了下来。有一次放风的时候，拾到一片碗片，企图切割脉管以自尽，突然间感到头边有个人对他说：“你所遇见的试炼，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会叫你受试炼过于人所能受的，在受试炼的时候，总要为你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林前十13）

有一次半夜，他们将他带到法庭，态度极凶暴，使他深为惊恐。突然他们厉声呵责，要他站起来。当他站起来时，他看到一个人身穿白衣靠近他身边站着，他心里充满了喜乐要笑，但是在他们面前是不准的，因此他只能在内心笑，喜乐。被捕的第一年中，他们提审他300多次，但神始终恩待他，让他平安度过。最后他们结了案，把他送到遥远的大西北青海。那里气候酷寒，他被强迫劳动，初期被派去制造瓦砖土胚，仅一星期的沉重劳动，他就病倒了，体温40度，但他仍得随队出工，到了工场他向看守员报告，他们发现他发高烧就叫他在地边坐下。这时天正下大雪，他支持不住而躺下，心里希望这个漫天大雪就此把我埋没了吧！直到大队收工回监房后，他才被允许到监狱医院去看病。他在第一封家信上告诉我们，他已入病监，并交替用链霉素和P. A. S.，进行注射和口服雷米风（Remifon）。我知道他已得了肺结核。我感到自己是那么无力，只能把一切交在主的手中。我很想去探望他，可是乘火车要三天到达，而我却必须天天工作来养活一家六口。我的大女儿刚14岁，最小的才9岁，而这时我们也不可能去看一个反革命罪犯的。感谢主为他预备了一位心地善良的护士，把他送到重病房去治疗。当他病情略有好转时，管教队长又来叫他出工劳动。这时，那位护士说，他是活动开放性的肺病，不能劳动。有一天监狱卫生所需要一名注射护理员，他们问谁能干，张弟兄里面有一个感觉他能。虽然他从来没有受过这方面的专门训练，仅仅有一次我在家中卧病不起，他曾试着给我进行过几次V. C. 肌肉注射。他也曾注意过我在他有病时怎样给他进行静脉注射。就这样，他们留下他做注射员。他每天要进行约240次肌注和近40次静脉注射。神保守他从来没有出过事故。当时他们用20c. c. 针筒一次就给10名患者注射同样药液而没有更换针头。

三年自然灾害来临了（1956-61年），中苏反目。给苏还债，劳改农场里大量的囚犯饿死了，每个囚犯一天只能得到二只青稞饼（每只二两重），所以他们把能弄到手的东西都填下肚去，有些不能想象的东西都吃了。囚徒们列队等着安葬自己的同伴，劳改农场当局顾虑到可能会引起国际上的抗议，因此把囚犯中的老弱病号及那些一向老老实实，家在农村的犯人假释回乡。张愚之弟兄也因此得到释放回家，但只准回到老家——浙江兰溪县农村，没有公安局的批

准，他不准到上海探望家庭。其后，公安局派人到他那里，告诉他必须为他们工作，他必须给他们汇报基督徒的活动情况。张弟兄当时就告诉他们：“你们还是马上把我送回劳改队去”。他写信给青海劳改农场的领导，表示愿意继续在那里改造。但这个报告退了回来，没有被接受。那位领导的信上说，农场不能再接收你，除非你重新触犯了法律，也不一定被送到那里。

1968年文化大革命达到了最疯狂的时期，共产党对张愚之弟兄的迫害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凶狠野蛮。在上海红卫兵搜查了许多基督徒的圣经和属灵书籍焚烧了，又焚烧了许多教堂。有一位弟兄在医药研究中心工作，他们强迫他跪在毛主席像前叫他叩头，（陆道雄弟兄与张愚之弟兄同日被枪毙）。他理所当然拒绝，被他们拷打了三天。到晚间，那位弟兄悄悄来到我家，问我可否进来。面对被残酷迫害的弟兄，我怎能拒绝他进门呢？但是我若让他进来，被共产党知道了，他们会给我扣上一个“支持反革命分子”的罪名。我请他坐下，他告诉我，他们会把他打死，所以他必然出逃。我告诉他：“你不能逃，如果你逃了，他们会想方设法抓到你，那样一来事情将变得更坏。在共产党底下，你是无路可逃，无处可躲。你将会失去你的工作和你的家庭”。但他说：“我受不了他们的迫害，许多专家都为我吃苦，跳楼自杀等，我心中比死还难过”。我劝他最多是坐牢。他说，在监牢里也要拜像的。我说，我不知道，因我没有听到。最后，他答应我不跑。但第三天，他偷偷写条子给张弟兄，请求他代祷，并请他为他调换一些全国粮票（当时在大陆没有全国粮票，出门是买不到吃的）。张弟兄就为他换了全粮托一弟兄带去。有人交代了这件事，被共产党知道了，因此就把我和弟兄一起由公安局，检察院批准隔离审查。

1969年公安局先找张愚之谈话，其后又同我谈。他们说，假如你们二人都放弃信仰，那么你们一切的错误就一笔勾销。否则，是关于杀头的事。你们回去好好考虑。他们骗我张愚之答应回去考虑。

1970年2月公安局派人到我家谈话说：“你对你丈夫的事是怎么想的？”我对他们说，自从他青海回来，一直住在农村，服从政府管理，奉公守法。他还自己买了一个扫帚，天天扫大街。如果你们认为他还不够，请你们批评帮助他。但他们说：“他是屡教不改的人，再帮助也没有用”。这使我清楚他们要下毒手了。在他们处死他的前一个星期，公安人员天天来我们家里。这时我正上夜班。以前我在厂里做医务工作，负责一个疗养所。他们把我隔离拘留将近九个月以后，就叫我到车间里监督劳动。我向神说，我不懂为什么，我从未见到他犯什么该死的罪，最多就是在你前不够忠心。神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向我说了话：“有人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杀……这些人都是世界所不配有的人”。“世界不配有的人”使我感到宽释和力量。自从共产党经管后，我觉得他是这个政权所不配有的人。他太诚实，像天国的子民。

因我是反革命家属，四类分子，他们工作八小时，我得干十小时。在上海每逢共产党要处死犯人时，他们总是向群众宣布死囚的罪行，其实他们早已定案。有一天，他们下班在车间讨论已经定案的人，故意大声地使我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在讨论张弟兄时说他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反革命，枪毙……当我听到后，我问神：“他在你面前如何？”神告诉我：“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罗八33）。这对我是何等的宽慰。在执行前一天，二名公安人员来问我有什么要求，我回答：“没有”。但

由于他们一再地问我，我就说：“我能不能见他一面”。我想我可以在主里给他一些供应。我向他们说，可或不可，不必回去研究，现在就答复我，他们还是说回去研究了再答复我。结果至今没有答复我。

我向神说，什么时候执行，我可以为他祷告。我是在公共汽车上听到那个消息的，因此，那天晚上，他们不让我上车，怕我出事故，叫我做准备工作。所以我就坐在墙角里，把麻布剪成块，堆在我身上为他戴孝。我整夜地祷告和唱诗：在主亲爱的，现在你去睡，安然可高卧在救主胸怀。亲友虽爱你，莫及耶稣爱，再会，再会，再会。另一首God Be With You Till We Meet Again。第二天是厂休，但他们不让我回家，叫我睡在专案组，并有几个人看守我。我求主叫我睡两小时，因我实在日夜都没有好睡。二小时后我一直为他祷告，直到下午一点半，里面就没有祷告了。到下午三点半，他们叫我起床，并向我宣读判决书，内容为：一、对信仰顽固不化，坚持反对立场（即不放弃信仰），并继续参与反革命活动；二、1963年他曾编写一些反动宗教书籍；三、当罪犯陆道雄企图逃亡时，他曾供给他粮票。因此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他们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没有。然后他们告诉我：“现在你可以回家了。你回去后做些什么”？我说：“我昨天夜班，回家吃饭，睡觉”。在乘公车回家途中，我心中感到释放和轻松，我想愚之已脱离了痛苦，悲伤，惊恐，不再有叹息，不再忧愁，也不再受任何的迫害，羞辱等。而我再把自己奉献给主，只愿一生事奉主。所以我在心中唱：“主使我更爱你”，“每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如果你收去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

我想，这次的打击，神从我那里将他收去，而把主自己给我的，这是如何的美好，是真利益。因此，每当家里有困难时，我想如果弟兄在，他会解决的。但是现在主与我同在，他比愚之弟兄更好。当我想到大陆是这样需要福音使者，如果愚之在，是多好。但我想到人的工作是多么有限，神是无限，大能，全能，专门处置人所不能的事。

当我回到家时，我才知道女儿乐晨也在休息天被他们关在单位里，才释放回家。当我告诉她，我祷告到一点半，里面就没有祷告，她说：“我也是”。可能在那时他已到主那里安息了。

第二天，我去上班，我的同事告诉我，他们中有一个人认识公安人员，她跳上囚车，正好就看见一老人（愚之），他的脸面是那样安详，宁静，与其他那些待决的死囚的苍白，青紫的形象完全不一样。过了一段时间，我女儿告诉我说，一位华老姊妹告诉她，老姊妹的儿子跟着囚车到刑场，目睹张弟兄在囚车上，很安详，就像在讲台上一样，又看到弟兄从警车上下下来唱诗歌，但他旁边的警察狠狠地踢他的腿，并大声叱着说：“你要死了，还开心什么？”那位弟兄一直看到愚之弟兄一瘸一瘸地走到刑场上。这消息不久传到了萧山，弟兄常去传信息的浙江省绍兴，那里掀起了一个大的复兴。信徒们说：“我们的弟兄回到主那里去了，我们要跟随他去。”那时他们受到共产党的厉害逼迫而害怕，胆小而隐藏起来。当他们听到这个消息，相反鼓励他们，因知道“弟兄胜过他，是因羊羔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生命”。（郦理英姊妹）

我出生于一个基督徒家庭，父亲张愚之是一位传道人，母亲也非常爱主。自幼我便知道有天堂和地狱，又有一位主耶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我也熟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时，我因为怕下地狱，所以大人若问我：“你信不信主耶稣？”我立即回答：“信”。我也常常长跪祷告（虽然多半时候会打盹的），求主耶稣帮我不致下地狱。

我的整个青少年时期是在没有爸爸的情况下度过的。一九五六年（那年我十二岁）一月二十九日，父亲和他的同工们因信仰（不参加三自）而被捕。两天后，新闻日报头版头条的大标题刊登着：“政府破获了隐藏在基督教内部的反革命集团：首犯倪柝声（已经在押）骨干分子李渊如，汪佩真，张愚之，蓝志一”。门庭若市的我家，一下子冷清了。爸爸在生活中消失了，也不常看到妈妈，她除了上班外，还要被审查。儿童聚会没有了，赞美诗声听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控诉会”、“展览会”和同学们的歧视、嘲笑。我不再谈论主的事，并且无神论思想使我的信仰产生摇动；我既不敢承认主，也不敢否认主，但有一句话常在我心里回响：“你若不认我，我也必不认你”。所以当有人问我：“你是不是基督徒”时，我总是极其含混地说“是”。我常常求主不要让人来问我这个问题，因为我心里实在没有把握。

大约七年之后（一九六二年），父亲保外就医，从监狱里出来，我与父亲重逢。当时我因出身不好，没有任何出路，只好上山下乡，真是苦不堪言。后来因病返家，心情十分苦闷，就常发怨言。但这段时期，我与父亲有很多的机会相处。那时父亲住在浙江的一个乡间，偶而他也会回上海来看我们。我常常观察我的父母，他们十分怀念以往擘饼聚会的情形，谈起主耶稣如何被钉十字架便要流泪。然而我却无动于衷，并且和父亲争辩，说：“你从小教我不要撒谎、不要贪心，我人太好了，主实在不应该让我下地狱！”有一天傍晚我陪父亲在河边散步，他说：“有时我看着你们几个孩子就要流泪，因为世界不要你们，神，你们也没有得着。”这句话勾起我满腹的怨气，我说：“你张开眼睛看看这世界有多好。”我向他述说世界的种种好处。他说，“人生是非常虚空的，一切都要过去。”然而我却顶撞他说：“你总是说虚空、虚空，人就是要死，但活着的时候，总要活得充实一些吧。”并说：“我所遭遇的一切，如果说没有神，那么只是我的命苦，我也不怪父亲，不怪任何人；但是既然有一位神，是他让我遭遇这所有的事，那么他怎么不来问问我，我到底愿不愿意把自己给他，同意不同意接受这样的命运？今天如果神来问我的话，我会很干脆告诉他：我不愿意！”那天我还说了许多别的话，也不给父亲插嘴的机会。最后，他问我：你说完了吗？然后他非常温和、宽容地说：“你因为不认识神，所以讲得出这许多抱怨的话；你若是认识他，这些话你是说不得出口的。你要求主开你的眼睛，赐你智慧和启示的灵，使你真的认识他。”

那天落日的余晖十分美丽，他的眼睛遥遥地望着远方，为我祈祷。父亲的信心无疑对我产生很大的影响。从那天起，我开始重新思索我的信仰。我想：神可能是全能和公义的，只是我还没有认识祂。我向神祷告：主啊，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能认识你。后来，神让我看见自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罪人，我求他救我。在祷告中，我听到他对我说：“我来本是要救罪人”。从此我知道他是我真正的救主，他拯救了我，并且把平安和喜乐赐给我。

父亲一生跟从主的道路上没有阳光，没有鲜花，而是撒满了血和泪，也充满了美好的见证。我和他总共相处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包括我的婴儿时期）。但他犹如散发着天上馨香之气

的没药，珍藏在我的心中。他一生许多美好的见证，也一直激励着我：父亲是个多病、生性怯懦、重感情的人，第一次入狱后七年的监狱生活对他来说无疑像火炼一般。记得父亲告诉我说：有一个寒冷的深夜，他被审讯后不久，刚刚睡着又被提审。一连反复三次，他冷得发抖，带着镣铐走在昏暗的监狱走廊里，心中感到惊恐。回牢后，想想死掉算了。忽然觉得有一个声音在他耳边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他还告诉我说：“又有一次，晚上提审员拍着桌子对我很凶，当时我心中害怕，忽然看到一位白衣使者站在我身边，顿时，我心中充满了喜乐，禁不住要笑，不知怎的胆怯的心一下子就消失了。”

父亲在青海劳改工厂劳改时，有一次他蹲在墙角晒太阳，眼前的沙滩上，夕阳快要西下。他面临着的是饥饿、孤单、劳役、逼迫，想到老母、爱妻，四个未成年的孩子，他心灰意冷，他想放弃，他想不再作传道人了，只作一个普普通通的信徒算了。突然，有一个声音说：“你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你。”（来十38）父亲的心深受感动，他流泪认罪，对神说，他不会作一个后退的人，他要紧紧跟随主直到路终。

一九六二年在浙江乡下，我常常读到他的一本用了几十年的皮面圣经。他在上面写了许多字。我印象最深的几句话是：“什么都不怕，只怕得罪神”，“总要相信神，被杀仍要相信。”人总是不愿意面对死亡的问题。但一旦这事发生在你最亲爱的人身上时，你就不得不面对它。廿七年前，政府认为父亲不肯放弃信仰，继续传福音，不服改造，再次将他逮捕，且判了死刑。父亲判死刑的主要“罪行”是“编写反动教刊，在反动教徒中疯狂地进行反革命宣传”。他写的东西我都看过，那并不是什么“教刊”，是他出狱后看到教会荒凉，弟兄姊妹冷淡的情况，心中很难过，就写了两篇心得。一篇是写马利亚如何爱主，而当代人却以电影院代替聚会，以小说代替圣经，以听音乐代替唱诗；另一篇是讲到启示录中七个教会的光景。失去父亲使我内心十分痛苦，信心又一次摇动。母亲要我把心里所有的感觉都告诉主。于是我在神面前尽情地哭诉，祷告，祈求。后来，神用罗马书八章三十五至三十九节的话来安慰我：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大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面对死亡，神把出人意外的平安放在父亲和我们的心中。原来父亲在一九六六年时曾说，他常常手脚发麻，可能自己会因高血压死去，想到死不免有些害怕。然而，主后一九七零年四月二十五日那天，他如一头被宰杀之羊一样，顺服地、默默地走上了殉道之路。听说他在赴刑前的囚牢里时，非常安祥，就像站在讲台上一样，且不断地唱诗。我相信他那时在唱：“主耶稣我爱你，知道我属你”。父亲爱主，爱的力量使他轻看羞辱，镇定自若、心甘情愿地献上自己的生命。感谢主，他以这样奇妙的方式带领我们经过了死荫的幽谷。同时廿七年来，这平安一直没有离开我。

我深信我和父亲只是暂时分离，有一天我还要再见他。廿七年后的今天，我同样面对死亡的威胁。我问自己：怕不怕？似乎有点怕。因为数千年来，许多人朝向这条路上走去，却没有一人回来告诉我们那边是怎样的情形。但是另一面，我也不害怕，因为我已有了永生的把握(约三16)。我对主充满了感激，我肉体的疼痛有麻药可减轻，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承受的是何等的痛苦！因着他肋旁流出的血和水，我得以安然进入天门，胜过了死亡的权势。

我到美国已有八年多，先生和女儿则七年多。我们来的时候年龄都已过四十，在休士顿也没有什么亲人，这些年来经过许多的艰难和困苦。虽然我曾多次想离开祂，但是祂并没有照我的本相来对待我；祂听了我父母的祷告，和我自己断断续续的祷告，以慈绳爱索紧紧地拉住我，用许多方法管教我，为要把祂自己赐给我，使我成为他的儿女。现在我虽身患癌症，也是主所许可的。弟兄姊妹们千万不要因此而对神产生疑虑，动摇信心。主的计划我们虽然不明白，但必有美意。我们仍要爱主，爱主是永远不会太过的。

不是我们爱神，而是神爱我们；我们亏欠神的爱，我们对祂认识太少。父亲患难中的见证极有力地说明了神的恩典。记得我和父亲分别七年以后，首次见面是在金华火车站。他看见我，便说：“你很瘦，最近生活怎样？”“苦不堪言”可说是我当时的心境。我看着他，发现六、七年的监狱生活也使他改变了许多，人苍老多了，声音也变了；如今站在我眼前的分明是一位身穿黑衣的老人，我心中不由一阵酸楚，对父亲的执爱和同情油然而生。然而，父亲和我谈话时，谈不到一半，眼里便充满泪水，几乎不能再语，哽咽地说：“我实在亏欠神的恩典！”我听了大吃一惊，心想：到底是神亏欠你，还是你亏欠神？是否监狱把你关糊涂了？

还有一次，我翻开圣经很直率地对父亲说：“神怎么这么不好？大卫已经吃了那么多苦，干嘛还要罚他，激动他去数点人数？”然而父亲却说，每次他读到这里便禁不住要掉下眼泪。他说：“大卫在三种苦难中，他都表示愿意落在神审判的手中，而不愿落在人的手中，因为他认识神有丰盛的怜悯和慈爱。”听父亲这样解释，我很惊奇：怎么同样一段圣经，我们的解释却如此不同？接着父亲又说不下去了，眼里充满泪水，好一会儿才又开口。他又一次说：“我实在亏欠神。”父亲曾两次这样讲，留给我的印象极深。

我们看到发生在我们或别人身上的事，常常会问为什么？为什么一个爱主的人会遭遇不幸？为什么有人为了传福音却失去性命？甚至他的儿女也受到迫害？为什么是我遭遇这些苦难？如果我们在这些问题上钻牛角尖，是永远不会找到满意的答案的。因为我们实在不能测度神的奥秘！“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祂的判断，何其难测！祂的踪迹何其难寻！”(罗十一33)但对于我们所遭遇的事，有两点是可以确信的：第一、这些苦难会使我们更认识基督，更亲近基督；苦难使我们脱离罪和老我的捆绑，使我们灵里更洁净；第二、苦难叫我们认识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过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永远的家在天上。基督徒的终点不是死亡，而是复活，这条路充满光明与荣耀，因为基督是我们荣耀的盼望。我们信主的人不是只在今生有盼望，因为基督已经复活了，所以我们的复活是有保证的。

自那次与父亲在河边散步之后，几十年风风雨雨已经过去了。几十年来，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始终存记在我心里。我体会到从永远到永远，神有一个计划。人在世上的一生不过是永恒

中的瞬间。祂是全能的神，这是何等超越的思想！我并不悲观，生命气息都在乎祂，我在地上还存多久，都在祂中。若我回天家，我也十分欢喜，在那边有主，有我父亲，还有许多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神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真知道他！（弗一17）（摘自张乐晨姊妹的遗稿，一九九七年三月）

关于陆道雄弟兄的见证

陆道雄是生长在一个贫困的信奉基督的家庭中，他父亲陆耀圣是个自由传道人，自幼就把他奉献给神。因为是长子，就对他要求特别严，长大后，不但要他刻苦读书，还要他在本地浙江富阳新登的小礼拜堂学习事奉站讲台，作出口。这时候他已经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愿意终身为主而活，虽然他未受过正规的神学训练，但在那偏僻的小山庄里，神亲自引领他，呼召他日后作一名时代的见证人！在他刻苦攻读自己药物专业之外，他还如饥似渴地拼命读圣经，预备自己日后为主所用，所以当他以优异成绩与1956年毕业于东北药物学院制药专业时，竟然能分配到上海医学工业研究院工作，这真是神奇妙的带领和特别的安排。

1956年正值全国轰轰烈烈搞肃反运动之际，陆弟兄来到我们中间（基督徒聚会所）参加各种聚会，他好象不受外界任何气氛的影响，很快就弟兄姊妹交通得很融洽，仿佛早就认识似的。在单位学习时他也从不落后，常有精辟的言论发表，同事们都尊重他，因他对问题看法很透彻。由于自己以往经历较坎坷，逼使他更多地亲近神，所以他说受苦是对他有益的。正因他在生活中经受许多贫困的煎熬，使他更珍惜神所赐给他的每一个机会，去爱每一位弟兄姊妹！去更好地为主而活！活出一个基督徒该有的生活，这是他的信念！



1、预备自己

他对自己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从不随便花钱买东西，有时我常想给孩子们买点玩具什么的，他总是拦阻我。如果有弟兄姊妹到我们家来交通吃饭，那是他最高兴的事，只要用在弟兄姊妹身上的，他从不吝惜。他很爱两个孩子，尤其对大女儿他爱得更深，但他仍然告诫我说：“我们为了主的见证，都得做好准备，现在能省就尽量积存一点，留给将来帮我们带孩子的人。”谁知我们辛辛苦苦所积存一点有限的款，被文化大革命两次龙卷风似的抄家，给抄得个精光，只剩下了一点“贴花”，感谢神！现在我们真的成为一无所有的人了！神就是要我们在这种光景中来跟从他！这真是他无限的美意！

弟兄好像在任何时候都在准备作一洁净的器皿为主所用。当时还没有什么风声时，他里面就警惕着，仿佛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似的，弟兄姊妹来时，他就把里面感觉重的话交通给他们，兹将当时最摸着他深处几句话记在下面：

“主今天所呼召的乃是时代的见证人！人若不肯为主的缘故撇下父母、妻子、儿女、房屋和自己性命的人就不配做主的门徒！主今天在这时代中所要特别拣选呼召的乃是一班不顾一切为他而活的人！主今天要得着的乃是为他摆上一切，撇下一切的时代见证人！”弟兄真是有主

的灵启示而说出这些话的，过不久，他果真实践了他自己所说的话，为了主作忠心的见证人，他撇下了一切来跟从他所爱的主！

2、接受信心的考验：1967—1968年暴风雨来临之际

感谢神，这是我们共同生活后第一次接受信心和爱心的考验，这突如其来暴风雨般灾难的袭击，是我们始终所未料到的，是这般的严峻和残酷，弟兄正经历着自己最爱唱的两首诗歌的内容（诗歌选本第222首和276首，尤其是276首更是他一生的写照）：

这些人乃是不顾得与失，随地成戏景，到处受藐视，
心中仍能涌美词，因有羔羊血洗净。

当动乱浪潮卷进医工院，单位领导勒令每一个批斗对象都得向毛主席挂像鞠躬请罪，陆道雄为了持守所见证的道，坚决不向挂像鞠躬请罪，于是就招来一顿毒打，记得在这个时候他曾叫我为此事去请教一位较年长的弟兄，“一个基督徒到底是否可以向人像鞠躬？”答复是：“若活着则可以，死了的像就不可以鞠。”陆道雄对这个答复里面通不过，就当权派表示，为了基督徒的信仰，他绝不向任何像鞠躬，为此，他们就加重对他的刑罚，一面强迫他搬运又重又大的石块，另一面又派了四个彪形大汉毒打他，直打到大门外的群众都大疾呼的喊着：“你们不可这样打死人，要文斗！不可武斗！”但神暗中仍然保护着他的性命免于死亡，虽被打得遍体鳞伤，却不致死亡，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感到无比荣耀！因为他是活在276首诗歌异象中的人！他忍受着再大的逼迫也不吭声，鼓励我别气馁，要跟从主就得忠心到底，他就像诗歌所唱的：这些人乃是忠心直到底，为求主笑容，汤火都不辞，虽经苦难仍坚持，因有羔羊血洗净。

3、别离

当文化大革命运动进入高潮时期，我们夫妻两人都在各自单位经受拷打和批斗，两个孩子则被撇在幼儿园里（一个6岁，一个8岁）冬天无棉衣，脚上还穿着凉鞋，礼拜天也没有去接，我当时正在接受两次隔离审查，一次为自己的信仰问题，一次为交代陆道雄的逃离问题，后来因我大女儿在幼儿园里天天哭着要妈妈，不肯吃饭，他们没有办法，只好去找我大嫂把我两个孩子从幼儿园接回家照管。

陆道雄背井离乡的经过是这样的：当时他因经不住拷打与迫害，于1968年3月28日撇下妻子儿女逃到温州避难，谁知后来判决书上竟写着他的罪状是：一贯披着宗教外衣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反革命分子，与反革命分子……等策反外逃投敌……。恶毒攻击党中央，阴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就此被判处死刑。（我们的主不也被列在罪犯中无辜被钉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吗？）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大于主人，祂走的路，我们也必须走！

他在逃离之前曾到幼儿园向他一对年幼的儿女告别，他轻轻把他们抱起来，默默地祝愿着他们平安的长大，想不到这竟然是他们父、子、女最后永别的一次会面。

3月27日我上夜班前，我们夫妻共进最后一次晚餐，当时我一点也不知道他当晚就预备逃离到温州，只感到他特别沉默，什么话也不说，光听我说话，我还以为他太累，而不愿说话，我也没有去问他，勉励他几句，就匆匆预备走了，他忽然放下手中的活儿，就跟着我走下楼梯，到了后门口时，他对我说了一句：“圣清，你多保重自己！”目送我一段路，他仍站在那里……想不到这一句话竟是他 在人间留给我的最后一句告别话，第二天我上完夜班回到家里，看到他留在桌上的一张便条上面写着他不得已才离家出走，叫我不要去找他，他带走一点粮票，一点钱，了他留下的条子，我悲痛欲绝，放声大哭！我不知道到哪里去找回我的丈夫？我的主啊！这惨绝的事竟临到了我的身上！今后我该怎么办？儿女又那么小，我实在担当不起这么沉重的担子！我立即把这件事向组织汇报，便条也一并交给他们看，谁知他们的结论是：我和陆道雄同谋策划帮他逃走，丈夫被迫逃走，还要问我要人！我的主，我的神！为此，我又第二次被关进隔离室审查，为交代陆道雄逃离问题而没完没了的受尽折磨！

4、撇下一切才能配做主的门徒

弟兄为持守所见证的道，不怕出任何代价，当他拣选逃离这条路时，就准备随时献上一切给主，当他逃到温州的第一站是仓坦俞弟兄的家，弟兄以主的爱接待他住一段时期，然后帮他再转移到第二家，第三家……最后转移到矾山一位弟兄家，前后将近一年，后被弟兄这一家女亲戚告发才暴露身份被逮捕回上海再判处死刑的。当时温州的弟兄们是以基督那测不透的大爱赔上自己的性命来接待他的，愿主纪念并报答这些为主的名显出爱心并作出牺牲的肢体们，陆道雄逃到温州虽外面的压力极大，但主内亲爱的弟兄姊妹仍用主的大爱接待着他，除供给他衣食住外，还让他过上肢体的生活，陆道雄在这一年期间曾被圣灵感动释放两个信息：弟兄要彼此相爱，教会要彼此代祷担当各地教会的难处。在艰难时期要用禁食祷告，才能击退撒但一切的火箭，制止一切不法的隐意。（这些话的内容是温州一位弟兄后来告诉我的）自这两个信息释放后，各教会带来帮助，彼此顾念，同心禁食祷告，不久风浪果然倏然而退，感谢神的大恩典，这是圣灵自己的工作！

当弟兄在温州时，众肢体用基督那无比的爱服事了他，甚至有一位引路的小弟兄在“四人帮”高压下被活活打死而保护了陆弟兄，爱主的俞弟兄因头一个接待并转移弟兄而被重判20年，张弟兄被判三年半，吴弟兄判四年，其他还有被撤了户口的，扣了粮食的，不计其数，所有这许多感人的事迹，都因基督的大爱激励我们，我们才肯为弟兄舍命，温州教会众圣徒为弟兄舍命的活见证，也如同云彩围绕着激励着我们起来奔那摆在前面的路程！

当我弟兄在温州矾山被捕时，身边只有一本圣经，一本诗歌及随身换洗的衣服，可四人帮却如临大敌似的派一队民兵去捉拿手无寸铁的无辜之人，他们为洗脱自己的罪名诬告陆是携带发报机、显影纸、压缩饼干叛国投敌的特务，把这些罪名横加在我们的弟兄身上。

感谢爱我们的神！主加给我的弟兄的力量，他仍面如坚石向耶路撒冷而去，他不后悔他所拣选的道路，因他所拣选乃是主耶稣自己。他将万事都当作有损的，为要得着基督为至宝。为忠心跟从主，他甘愿撇下一切，在所不惜！

5、信心最后的考验

1969年弟兄从温州逮捕回沪受审尚未判决前仍被“揪”回原单位医工院批斗，当权派一面在大会上宣布他的罪状，一面告诫他说，只要他肯改变原有思想（意即是放弃信仰）可以从宽处理给以出路，弟兄当场表示绝不放弃信仰甘受应得处分。

在粉碎四人帮后，我曾为申诉事找过医工院领导，他们告诉我说，为挽救陆道雄他们曾找过他谈，问他：“你不想看一看你的儿子女儿？”回答：“不要”“你的爱人，难道你不想和她会会面吗？”回答：“我都不要”。甚至在监牢里仍顽固到底，还要做祷告，读圣经，今天这个结果是他咎由自取的。

在他路程最后时刻即将走向终点时，仍然向着他的主忠贞不渝地见证主荣耀的得胜！他——我的弟兄不愧为主时代的见证人！

6、他被列在罪犯中——最后的见证

弟兄自1968年3月28日被迫离家直到1970年4月25日为主的名殉道，我们夫妻没有见过一次面，这一段记录是由弟兄姊妹看到他赴刑场时的光景后来告诉我的（有直接看到的或间接看到的）。

当时赴刑场枪决的共有51名“罪犯”，除了我的弟兄和神的仆人张愚之弟兄两名之外，所有的罪犯都吓得面如土色，惶惶不安，因为等待他们的将是永远的灭亡！

感谢神！张愚之弟兄和陆道雄同车赴刑，在他们脸上充满了属天的喜乐和平安！神态非常镇定安然，他甘愿为主献上了生命和一切！是的，他能安然见主面！当时围观的群众都喊着说：“看哪！两个相信耶稣的！两个相信耶稣的！就是不一样，一点都不怕！”是的，两个相信耶稣的就是不一样，因为等待他们的将是荣耀，将是冠冕！

他踏着先圣的血迹往前走，至终为他们所爱的主献上宝贵的生命是配的。

7、世上不配有的人

我的弟兄为了所见证的道，于1970年4月25日为主献出了自己宝贵的性命，正如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所说的：“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毫不动摇，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不失去信心，经历生离死别的严峻考验，仍守住了所信的道，他不愧为主时代的见证人！

他在教会中是默默无闻的普通信徒，是没有名望的小弟兄，但他向着主和他的名赤胆忠心，他和神的仆人张愚之弟兄同时为主的名殉道！但我深信他的名字在羔羊的生命册上同样的被纪念，蒙悦纳，得称许！

他是世界不配有的人，有一天在神的国里他同样的配得冠冕进入荣耀！

赞美我的父，我的神！他的旨意何等难测！他的道途义哉、诚哉！我的心哪！要起来敬拜他！直到永永远远，世世代代！

这些人乃是世界不配有，补充主患难工作先告休，
欢绕主前到永久，因有羔羊血洗净。
长驱直进新耶路撒冷光明境，因有羔羊血洗净，
长驱直进新耶路撒冷光明境，因有羔羊血洗净。
(诗歌276首第五节)

8、伸冤在神

自从弟兄为主的名殉道后，我从未想到要去申诉，要求平反，因为我相信伸冤在神，主必报应。直到有一天，大约在1978年我第一次收到俞郇民弟兄的妻子郑荔玉姊妹来信，信中提到她的丈夫俞郇民如何受陆案株连而被重判20年，现已坐牢12年，还有其他受株连的肢体很多，希望我能尽人事的责任，把陆案向法院申诉，要求澄清予以平反以解脱所有受株连弟兄姊妹的家庭，接着又有家住永福路的朱贞华姊妹带着她的女儿张燕来找我提出同样的要求，因她丈夫也因受陆案影响而迟迟不予解决，当时我带着这沉重的担子到主面前去向主呼吁说：“主啊！即或不为我这个孤儿寡妇的家伸冤，也求求你为着在温州这么多接待陆弟兄的肢体受株连的冤案伸冤吧！伸冤的神哪！求你速速起来为你的子民施行公义的拯救！地上我是一点没有路，求求你在天上为我开一条出路，因为在你没有难成的事！靠主耶稣全能的名求的！阿们！”接着，主为我在虹口区预备一位刘毓华老姊妹和我同心禁食祷告，直到里面清楚该怎么办？怎样申诉？怎么与有关方面联系？真的，主奇妙的手带领我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因为我是一无所知，一无所能，从未经历这种事的人，为申诉我跑高级人民法院一连数次均无回音，一次我仍空空而回，正走到大门时，神行的奇事终于发生了，里面忽然有声音叫我去找门卫问他有关办理陆案的承办员的姓名，当我站在这位素不相识门卫面前告诉他，我丈夫是一个基督徒，没有犯什么罪，却被四人帮活活的害死，现在我知道管理他案情的承办员的名字。希奇的事终于发生了，这位陌生门卫问清了陆道雄的名字后，立即为我打电话去联系，结果他将承办员的姓名和他接见的的时间都告诉了我，最后还叮嘱我以后来时先打电话与承办员约好时间免得白跑。神施恩的手是这样奇妙的带领我跨出了这艰难的第一步，我里面清楚地知道，他必赐我通达的道路，率领我直到我为他完成这艰巨的重任。

感谢全能的神亲手携着我学习如何依靠主的大能大力来成就这一件在人看来不可能的事，记得当我第一次见到承办陆案的同志时，他板着长长的脸给我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掌握着陆道雄的确凿罪状，四人帮判的案不是都错，我劝你还是回去好好把两个孩子带大，不必再来。”但我们的神垂听了众肢体的祷告，也顾念了我们的苦情，经三次申诉，无数次的奔跑高级法院与医工院，要求他们对陆案作出公正的判决，首先得重新复查案情的全部经过，才能实事求是的作出正确的裁决，感谢神赐给我属天的智慧，必胜的信念，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领导，我都毫不惧怕，因为与我同在的比他们大得多，我坚定不移依靠神的大能，驳斥原判中所有诬陷不实之词，陆案终于经过复查于1980年1月23日结果改判为：

撤消原沪军事刑字132号判决 对陆道雄免于刑事处分

此外还发给家属1500元补助费，我的大女儿顶替他父亲医工院单位工作，如此也减轻我不少经济上的负担，感谢神，惟有他知道我的需要，陆的冤案总算从不可能解决得到改判的判决，法院承认他们错判一个人死刑，但认为陆仍有非法宗教活动等罪行，故给免于刑事处分的判决。但这一次判决对所有受株连的肢体均未得到解决，但此时只因我的身体已经支撑不住，我已筋疲力尽跑不动了，但我的里面却充满了信心，我亲爱的弟兄姊妹的问题一天不解决，绝不罢休。我继续向神呼吁，求神为众肢体伸冤，一面我向法院当局表示，等我身体恢复，我一定要再来把陆的冤案彻底澄清。

感谢神，再经过无数次的奔跑，正好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政策公布后，我终于靠着神的大恩、大能大力，于1985年12月21日我为陆道雄案提呈最后一次申诉，当时我的心充满了喜乐和赞美！感谢爱我的主垂听了教会的祷告，顾念了孤儿寡妇的苦情，也替众肢体伸了冤，于1986年10月16日由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发给刑事判决书，宣告陆道雄无罪。

感谢我的主，我的神，惟有他叫死人复活，叫不可能的事变为可能，陆道雄宣告无罪。我所有受株连亲爱的弟兄姊妹的家庭全部得到彻底解决！

但愿我们的心都当起来称颂敬拜为我们伸冤的神，惟有他是又真又活的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以往独行奇事，今天他照样能行万事，惟有我们的神配受万口称颂！万膝跪拜，直到永永远远，世世代代！

9、后言

1986年12月19日星期五下午2时，陆道雄单位医工院为陆道雄弟兄举行追悼大会，当时医工院所有主要领导和生前友好同事，还有主内亲爱的弟兄姊妹以及家属亲友和我单位领导约200余人参加这次大会，会上由医工院领导宣布：经高级人民法院重审宣判：陆道雄无罪彻底平反昭雪。阿利路亚！一切的荣耀、权柄、智慧归给全智全能的神直到永远，阿们！

以下是我在追悼会上的致辞：

沉痛悼念我的弟兄陆道雄

陆道雄的一生是短暂的，却是光明磊落的，作为一个公民他是奉公守法的，作为一个技术员，他不仅克尽己责，并且对祖国的医学事业有崇高的理想，他常利用业余时间，刻苦钻研几种疑难绝症，特别探讨如何利用中西相结合的方法去治疗各种疾病，在这方面他曾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并作了详细的记录，由于苦心钻研，终于初步试制成功了抗癌药物与老年脱发剂的样品曾多次赠送给朋友使用试服均收到了一定的疗效，平时他对自己生活非常刻苦，省下的钱就暗暗地去搞试验，买参考书，以期有朝一日能为祖国的中西相结合的医药事业做出一翻应有的贡献。

陆道雄为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活生生的人。他对自己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对别人却是宽厚的，记得在大学读书时，他因买不起书也买不到书就拼命做笔记，考试的结果除了俄文外每门都得五分，直到自己工作成家后还舍不得为自己买一块手表，因他要省下钱来供给读大学的妹妹以及赡养年老的双亲，自己始终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从不虽波逐流，遇事他有自己的见解，认为对的就坚持到底，从不敷衍了事，对人也非常热情真诚！

我的弟兄仅仅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所不同的是耶稣基督忠实的门徒，对真理和正义有执着的追求并有一种不屈服于暴力的勇气，在那灾难的年代里，暴虐虽然夺走了他的性命。但历史是公正的，今天追悼会已经庄严作证，陆道雄是无罪的，暴力所强加给他各种罪名已经得到完全昭雪，所以陆道雄的死说明了邪恶虽能猖獗一时，但是它不会永远得逞，只有真理和公义是不可战胜的。

十八年前，陆道雄被列在罪犯中死去，但他临终前却显得那么平静和安详，这是因为他那坚定不移的信仰和纯洁的灵魂，使他绝不怕为真理和公义而死，他的躯体也许早已朽坏，但他得到的却是灵魂的升华，他的信仰不会落空，陆道雄一生的事迹，虽上不了史册，但是在我和我儿女的心目中，他永远是捍卫真理的战士。

陆道雄为了坚守真理，无比忠于他的信仰，至终献出他宝贵的性命和毕生的心血，撇下了双亲、妻子和儿女，他就像一粒普通的麦子，落在地里死了，被暴力践踏了，我相信他将会结出更多热爱真理，追求公义的子粒来，它将战胜黑暗和邪恶！

亲爱的道雄，安息吧！今天我带着你撇下的儿子与女儿，深切地悼念你，黑夜的尽头就是白昼的开始，请等着吧！在人生的彼岸我们一定会再见的！

当时有好些医工院的同事，听了悼词后都感动得流泪哭泣说：这悼词真感人！他们怎么懂得这并不是一般的悼词！这些乃是血与泪的结晶，是对祭坛底下被斩者之灵魂的颂歌！只有一切蒙救赎神的儿女才能领会！

愿一切的荣耀归给全能、全有、全丰的神直到永永远远！

诗歌选本222首

第三节：

活着我是爱你，死，我也爱你！

我口要赞美你，只要存一息！

无论或生或死，此心不稍改：

我若曾爱你，主，应当是现在！

第四节：

在那快乐无穷、荣耀无比地，

我要在你面前永远称颂你。

我头戴冠冕，还要唱出来：
我若曾爱你，主，应当是现在！

邵圣清

1993年11月8日

关于余道胜弟兄的见证

我（余李晋玲）是一个第三代基督徒，祖父祖母在山东烟台听见福音而信主。祖父祖母很爱主，每天睡觉前，两人先到西屋跪下祷告后，才入睡房就寝。父亲生病，祖母来看他，跪在地上为他祷告。我的父母也很爱主，我们家有家聚会。我小时候曾祷告，如果以后像父亲那样有钱，也要盖礼拜堂。一九三几年，倪弟兄来烟台讲道，我的父亲、二姊、三姊都去听，觉得很好。后来，堂姊去了上海，和倪弟兄一起聚会，参加过友华村训练。

一九四二年，我在上海读大学，暑假回到烟台，家母为我的得救禁食祷告。当时连着一周每天都有聚会，周六那天读圣经讲受浸，那些话一直跟着我，睡觉、吃饭，在我里面作工。我到一个人没有人的房间跪下来，一跪下就像浪子回了家，眼泪不停的流。主在里面就催促我去受浸谈话，受浸谈话时李弟兄问我，“李小姐，你爱主吗？祷告吧！”那个祷告真是甜美。第二天主日，我就受了浸。因着主在里面的带领，受浸之后，我的梳头发、穿衣，都有了改变。过了几个月，到四三年，烟台大复兴。大家都很受感动，我也受感动把自己交出来。

四六年我又到了上海，当时抗战刚胜利，许多弟兄姐妹还在外地没有回来，祷告聚会没有几个人。不久后倪弟兄回到上海，上海的事奉也上了轨道。汪佩真姊妹有段时间对我很有负担，叫我住在她那里，现在回想起来，那是对我在生活上、在各方面的一个训练。汪佩真当时对我很严厉，我受不了，有一天早上，汪姊妹说，“我们早上吃过早餐后，大家到厅里面有点祷告”。那天祷告她哭了，她对我说，“我盼望主在你们青年人身上有路”。她那样一哭，我里面就转了。

四八年，倪弟兄在一次全国同工的聚会中，要我和周靖梅姊妹放下职业事奉主。当时上海教会要在四个地方同时传福音。我参加了第二期的鼓岭训练，倪弟兄的信息很有光，我觉得很蒙恩。

五〇年上海福音书房的服事者李渊如姊妹写信到福州，叫我回去帮忙。我回到上海，帮忙把鼓岭训练的信息出书。《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什么是新约》也出版了。五二年我在福音书房配搭排版诗歌，有时遇到问题，李渊如姊妹就叫我去问倪弟兄。倪弟兄那时心脏不好，躺在家里，倪师母在那里照顾他。第二次我去的时候，才到门口，倪师母就出来，要我快离开那里，她说公安局的人在里头跟倪弟兄谈话。那天下午，倪弟兄就被公安局的人带去东北了。

五三年，我与余道胜弟兄结婚。余弟兄是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四七年毕业后在外省工作了一年，后来辞掉回到上海参加交出来的聚会，训练完被倪弟兄打发到云南、昆明一带服事。五〇年，余弟兄的父亲希望他结婚，他回到上海请当时年长的同工俞成华、张愚之、朱臣、李渊如等人为他的婚姻祷告，祷告了两三周之后，他们都觉得我们两个人合适，李渊如姊妹就来跟我题这件事，我们就在五三年十月结婚。结婚后我们到广州去看余弟兄的父母。余弟兄到了广州后，学生人数多了起来，引起政府注意。有一天宗教事务处把余弟兄找去，叫他停止讲道，不然后果自负。余弟兄回家后祷告了一个礼拜后，回宗教事务处说，“我已经奉献给主了，无论得时不得时，务要传道”。

五五年底、五六年初，广州开始肃反运动，打击“广州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的首恶份子”，余道胜弟兄和郑德尔、霍应源等人一同被抓。先关了一年，然后下放农场两年，之后又派去化工厂。名义上是化工厂，其实就是劳改场。像余道胜这样不肯放弃信仰的劳动比较苦，要替锅炉铲煤，还要去洗隔壁小学的厕所，后来又要他用硫酸、盐酸洗产品，手常常流血、流脓。不仅如此，还要他们批判圣经。有一天余弟兄从工厂回来，吃不下饭，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下午他们要他发言批判圣经，我们就一起祷告。多奇妙，到了下午，他们把题目改了，改为批判国家的副主席。

由于环境所逼，余弟兄只有离开大陆。他走后，因着传福音，我被关进监狱，原本要判十年。一年后，华国峰任主席，落实党的宗教政策，我被释放。之后我与两个女儿被送到农村。那时大女儿才十五岁，必须跟当地的农民一起劳动。

一年之后，主开路，我们回到广州。余弟兄后来辗转从香港到了美国。感谢神，因祂奇妙的恩典，我们母女也于八〇年代来到美国，一家团圆。（2013年）

徐腓力弟兄的见证

一、一个聚会处弟兄的见证

我（徐腓力）于1950年在上海虹口聚会处，在蓝志一弟兄传福音时清楚得救，由张愚之弟兄受浸谈话后，于同年六月在南阳路新会所受浸。我祖父是内地会的传道人，姑妈是徐奉先（倪怀祖祖母），徐恩秀（倪兴祖祖母）。我也熟识张品蕙（倪栢声祖母）及其外甥女万鲍贤玲。

1954年读苏州医学院时，我组织了一至五年级基督徒同学团契，并与本年级二个班的三位弟兄姊妹每天清晨在学院前对面公园里守晨更，晚上夜自修后也一起祷告。1955年下半年在全国“肃清暗藏的反革命运动”中，开始受到宗教迫害，因为：一、我向同学传福音，二、不相信“进化论”。我被隔离审查半年多，开全校大会批判、斗争，或班级小会批斗。非法检查我的信件、书籍、衣物等。我完全失去自由，日夜都有两个同学轮流看管（美其名是保护我），上厕所都有人跟着。我当时开阑尾炎，不能起床，仍有人看管。

他们强迫我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分子，校园内到处都张贴大字报、漫画，说我是反革命分子，我不承认，他们就用体罚，强迫我下跪，按下我的头，用脚压在我的小腿上不准我起来。后来我学会以不变应万变，来应付他们。但是我从没有出卖过弟兄姊妹。

1956年说我是“倪栢声反革命集团”分子，学院成立专门批斗“倪反革命集团”分子的办公室，负责人是布立文。

当时我丝毫不觉得苦，并高兴能为主的名受羞辱。

1956年三月初医学院派人带我们去上海，到铜仁路上海市卫生学校参观“倪栢声反革命集团”展览会。我至今还印象深刻，有无头的裸露女人照相底片（上下都有许多小孔），谁也无法辨识是谁！放录音，是听不懂的福建话。所谓的罪证，有为保留福建鼓岭土地的三万多人的签名记录，以及倪峻使人把丁螺（传染日本血吸虫病的媒介）投放在江西的河流中的证据——无稽之谈（stupid），找丁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医生都知道），哪里去买大批丁螺，再去投放。

从我本身被斗的种种经历，我深知道，这一切都可以作假证，张冠李戴（后来曾听说斗华东局第一书记陈丕显时，也有那同样的照相底片），照着领导的意图可以加给你莫须有的罪名！为了要把你斗倒斗臭，他们不择手段，什么都做，真可谓十恶不赦。如果你相信它——不是幼稚，就是傻瓜。

在西方国家要定罪一个人，一定要在法庭上双方对质，拿出人证、物证。一般首先是无罪推论，要有确实的人证、物证，并通过陪审团的有罪判定，法官才能定罪。

1957年“反资产阶级右派”运动开始时，我又因宗教信仰受批斗几个月。我说：“中国没有真正的信仰自由。”后来就被开除学籍，不许再进大学。

二、1958年9月28日被送去“劳动教养”

罪名是“反动教徒”。送到安徽省水利工程总队第三劳改支队（labor camp）与犯人一起劳动改造思想。每天劳动十二小时，十天休息一天，每月发15元（折美金约\$2.50）仅够吃饭。要你劳动改造到一天，政府干部认为你确实已经“改造”好了，才给予解除“劳动教养”（我们从来不知道所谓的改造好的标准。）

控告我的犯罪事实是：

我是上海市“小群”基督教会的骨干分子。

在大学里大搞“反动的宗教活动”，向同学传教（是传福音）。

我是上海市十大中学“基督徒反动联合聚会”的骨干分子。

我曾指使一名信仰基督教的青年团员，退出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倪柝声是我的亲戚，我不相信“小群”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的罪行，竭力为他们辩护。

感谢主，因着祂的怜悯，我先到了劳改第三支队卫生科医院，在重病房作抢救重病病人的工作。1961年因在干部门诊看病，去支队最高首长家给他打针时，主感动我问他，我已经改造快三年了，劳动勤恳，思想改造认真，从没犯过错误等等。什么时候能解除劳动教养啊？他当时答覆：你回去把你改造的成绩写下来。大约一个月后医院的管教干部找我，要我写改造经过，注重写成绩。在1961年底，给我解除了“劳动教养”处分，称为解教分子，也就是就业人员。

解除“教养”后不释放，强迫留队“就业”，每年有15天探亲假。所谓“就业”，其实是社会最底层的三类人员：劳改犯人，劳教分子，就业人员。还是与医务犯或其他犯人一同劳动、工作、学习和思想改造，并互相监督，互相检举。

三、1964年全国“四清”运动

政府给我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反动教徒变成反革命，因我不放弃基督教信仰，就一直受到反革命分子的待遇：每一次运动中都要受批判、斗争，他们说“宗教信仰”就是我反革命的罪恶根源。反革命是属于敌我矛盾，反革命就是人民的敌人。

后来给我摘帽，成为“摘帽反革命分子”，我的妻女就是“摘帽反革命分子”的家属。我妻子本来就是反革命分子的女儿，这样成了双料反革命。这表示个人和家庭成份不好，社会地位低下。

四、1966至197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更是加强对反革命分子的专政，只准老实劳动，不许乱说乱动。每天早晚二次要向毛泽东的画像“请罪”，背诵“认罪文”。1966年至1970年间不准回家探亲。星期日外出购物先要干部批准，节日不许外出。平时每天晚上政治学习两个小时，每年夏季和冬季要学习三小时，由两人记录，每次都要写思想改造总结，从八岁写起，深挖犯罪根源，接受批判教育。

1969年中苏关系紧张时，我被调去就业人员的“反革命中队”劳动，要推大土筑土坝抗洪，每人推独轮车，两边两个大筐，开始就要分装土四百斤，然后加到六百斤，八百斤或更多。我受不了这个苦只能求主，在关键时刻，突然大队医务所干部医生来找我，要我去抢救两个病危病人（Critical case），这样我就暂时被借到大队医务所，不去推大土劳动。

神的恩典总是够用的，祂知道我们的软弱，更担当了我们的重担。

约一年后，二个劳改中队和医务所要调到劳改农场（劳动和生活要艰苦得多），我却回到了“反革命”就业人员中队，随他们调到劳改工厂。起先心里还有一点埋怨，又要下去劳动了，后来才渐渐明白这是神的安排，好得无比。

1971年在安徽巢湖铸造厂的建筑队，非常艰苦地劳动一年，突然医院有调令把我调到本厂医院去制药（紧急任务），后来又做医生管理病房，看门诊，一直到1981年底申请赴美探亲。

五，被迫留在劳动改造单位二十年

我于1972年结婚，妻子张向晨是张愚之三女儿，因父亲是“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她被迫去新疆做苦工六年，经常受批斗，既失去了健康，又患上多种疾病。后来夫妻分居长达十年，妻女在上海没有户口，没有供应……

我妻子在上海每天勤读勤背圣经二十年，写成《圣经总论》66卷，在大陆发送，颇受浙江弟兄姊妹的喜爱。

我们在1979至1980年翻译了John Foxe作的《殉道者》一书，后来在美国出版时改名为《血证士》。本书读者之多，仅次于圣经和《天路历程》。

本书叙述了两千年来基督教会史中的重要事实，记载了无数圣徒用自己的生命见证了基督大爱的事迹。他们因着受主爱的激励而忠心跟随基督耶稣，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太十六24）。因为爱主，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启十二11），能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也完全配得神为他们预备的冠冕，公义的冠冕是为他们存留的（提后四7~8）。

这就是两千年来羊群的脚步——由死亡得生命的道路。

感谢主，给我们负担又给我们胆量和勇气将它译成中文，妻子校对；大部分是我在劳改队里翻译的，竟能全部安全寄往上海！感谢主！（中国邮局要先拆开检查邮件后，才可以寄）向晨刻腊纸，并自己油印了四百本，发送给三、四百处地下教会。其间买钢板，腊纸，买大量的白纸等都要冒一定的风险，这事万一让政府发现，判刑难免啊。

因为当时1979年邓小平上台后，许多人以为今后可以自由传福音了！？我们并不相信，要借此书来彼此提醒和勉励。

奇妙的是，竟然有一本当时的油印本——向晨和我女儿亲手作的（还有爱主的弟兄的二个孩子帮忙），从日本寄回中国，并且还回到我们手中。感谢主，后来实在看见这是主要我们作的。

此油印本我们可以送给召会，为张愚之弟兄作个见证。因为我们也是为纪念父亲殉道而翻译的（父亲名Philip），译者就是徐腓力。

我从小在地方召会中长大，至今不忘倪柝声弟兄在主里所带给我们关于基督、教会等丰富的属灵产业，在劳改受苦时，成为我应时的帮助。1953年暑假时我在召会中学习，负责弟兄们每天给我们一个殉道者的故事，也成了我在劳改营中莫大的帮助。1959年我以“上海十大中学负责人”的名义被判劳改教育，那段时间才是真正的难泯岁月。我早晚被疲劳轰炸，被一些比我年长十岁，当时约三十多岁的青年干部昼夜质询。他们审问的方式是不停的问我问题，大部分的时候问的都是正面的问题，要我一直答“对”。然后在我疲倦不堪的时候，掺入一些诡诈的问题，试图让我在精神不济的情形下说“对”，借此逮住我认罪的“证据”。那时我年轻力壮，初时还能分辨，到最后主给我智慧，知道这样长时间下去是撑不住的，我只好训练自己用一句话回答：“你说我是反革命份子，我就是反革命份子”。

我从1958年进到劳改营，1972年与张愚之弟兄的三女儿张向晨在劳改队结婚。印象中最苦的时候是1961年，那时中苏边界问题紧张，我每天要从早上八时做工作到晚上十二时，一个人推着单轮双筐的运砂车，从每筐200斤的重量，加到400斤、800斤，最后到1200斤。无数次如保罗所言，我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但每次都在惊险关头，因我曾是医学院的学生，临时被调去医疗一些干部或同志，把命保下了。我想主留我到今天将近七十八岁老人的原因，是要我代表所有在50、60年代受苦难的弟兄姊妹作一美好荣耀的见证：“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已经守住了”（提后四7）。

我虽受了一些苦，但跟我的岳父张愚之弟兄比起来，是不算数的。他于1962年从青年劳改队被放回浙江老家兰溪，但不准回上海见家人及四个女儿，最后政府开出条件，他若肯替政府彻底调查倪柝声的大姐倪规箴和其他同工，看看他们是否还有反革命的思想。我岳父坚决否定，不愿参与。最后以叛国罪在上海被处以死刑，并被枪决。（2013年7月2日）

第三部分

1950年代官方史料的背景研究

殉道者、洗脑者、被洗脑者：
在1950年代政治思想改造中看对倪柝声的控罪

肖忠信

“倪柝声反革命集团”案（以下简称“倪案”）是指中国大陆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针对倪柝声及其同工们的政治案件。自1942年延安整风以来，中共就以激烈的群众政治运动作为思想改造的手段。倪案源于1950年代初期中国的背景，当时新政府展开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等三大政治运动，同时在基督教[1]内部推行三自爱国运动和控诉运动。在外国传教士相继被驱逐后，原由西方差会支持的各大公会在政治形势变化后严重流失信徒。在此期间，一些本土基督徒团体如北京基督徒会堂、耶稣家庭、真耶稣教会和地方教会（或地方召会）认为自己已完全实践了三自原则[2]，与帝国主义无关，因此在不同程度上抗拒官方运动。反之，它们在1949年至1951年期间迅速扩张，不仅持续传扬福音，更大力发展，甚至达到了历史上的巅峰。然而，在新政府眼中，它们被视为不受控制、具危险性的团体。新政权急于团结内部、肃清外部势力，因此决心采取强硬手段取缔这些基督徒团体，使它们成为了1950年代一系列政治运动中的主要打击目标。[3]

倪柝声身为地方教会[4]的创始人和领袖，于1950年3月从香港返回上海，照料数百处地方教会，面对中共建立的新政权。[5] 倪于1952年4月“五反”运动期间被当局秘密逮捕，后来在1956年“肃反”运动期间，被指控为“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的头目，被定罪并判刑15年。1972年，倪柝声在早已刑满（1967）的情况下仍然被囚禁在安徽省白茅岭劳改营中，最后因信仰被殉道。[6] 因此，要正确理解和解释倪案中针对倪柝声的所有指控，就必须对当时的政治环境有正确的理解，而不能脱离当时的政治处境。

在1950年代的政治运动和三自爱国运动中，倪柝声建立的地方教会成为政府和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重要打击目标。因此，对于1950年代中国政教关系的研究，倪案是值得仔细以严谨的方式检视的。[7] 倪被指控的罪名主要包括政治罪、经济罪和道德罪，其中最核心也是最终决定判刑的罪名是政治罪。目前关于倪柝声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倪柝声的生平为主，另一类是对他思想和影响的研究。[8] 在这些出版物中，近二十年来，有一些人对倪柝声的道德提出了指控，包括前地方教会成员许梅骊（1931—）[9]、以及香港建道神学院前院长梁家麟等。[10] 然而，对这些道德指控的来源，都是非一手（原始）的，均为二手，甚至二手。[11] 二手或二手资料来源追溯始完全是单方面来自政府官方资料，由那些当时参与了政治活动或加入三自后的前成员，基于政府资料所作的进一步推测；指控并没有举证人提出，也没有当事人证实，可导致历史研究的错误结论。[12] 在历史研究中要避免“三人成虎”的错误，就需要仔细、全面且批判性的考量每个史料的来源、可能的动机和当时的处境，以确保结论

的严谨性，特别那些是涉及强烈的政治意图的情况，因为很可能导致冤案。本文旨在帮助读者呈现历史研究期间所获取和分析的原始资料，以便对那些欲明白基督教在当代中国的人们可以更理解倪案的历史脉络。[13]

倪柝声被视为红色中国下的一位基督教殉道者，但过去研究很少从政治处境和思想改造的角度来考察他的殉道经历。中国自延安整风以来一直强调透过思想改造来实现对全国界的“全能主义政治”（Totalism）。[14]“思想改造”这辞在英语语境中也被称为“洗脑”（brainwashing）、再教育（reeducation）或强行说服（coercive persuasion）。[15]过去，西方从未使用洗脑理论来分析中共的历史和政治运动。西方首次关于洗脑的研究即源自1951年亨特（Edward Hunter, 1902—1978）在他开拓性的著作《红色中国的洗脑》对中共政治运动中思想改造的研究。[16]紧接着有利夫顿（Robert Jay Lifton, 1926—）在《思想改造和极权主义心理学》（1969年）中对极权主义如何使用思想改造的研究。[17]然后是去年（2023年）学术界才重拾洗脑理论并应用至研究当代中国。[18]本文沿着这讨论，结合殉道为题，运用洗脑理论分析1950年代的当代中国基督教历史，尤其专注于倪案，涵盖1949年至1958年，展示殉道者与洗脑者和被洗脑者之间的复杂互动，从政治处境和思想改造的角度来考察对他的控诉以及他的殉道经历。

本文第一部分简述倪的职事在殉道题目上的教导，他职事在1949年中国易权前后的发展，以及新政权的宗教政策。第二部分专注新政权展开改造中国基督教的历史背景和政治运动，结束于首次的全国基督教会议，看倪和他带领的地方教会在其中互动。第三部分从控诉运动的展开至三反五反运动，结束于倪的被捕。第四部分展示在肃反运动中政府如何以倪和他同工们作斗争对象、洗脑者的思想改造手段，以及一些典型被洗脑者的转变，结束于倪的判刑。最后本文总结洗脑理论中的洗脑者使用的途径和手法、洗脑者的转变如何展现于倪案之中，向斗争对象施予的道德罪名，被洗脑者的记忆问题，以及。本文仅为初探性质，盼望有助于更多研究者从思想改造的视角深入理解当代中国基督教史，特别是在极权主义政治下殉道者所面临的政治压力和思想改造对信徒的身体、心理、灵性和人性的深远影响。

壹、易权前后（1948年11月至1949年10月）

1948年至1949年间，中国政治局势急剧变化。在这时局中，倪柝声召聚了两次紧急同工聚会。1948年11月初，美国举行了第41次总统大选，也是美国历史上最富戏剧性的选举之一。这次选举由共和党的杜威（Thomas Edmund Dewey, 1902—1971）和民主党的杜鲁门（Harry S. Truman, 1884—1972）竞逐。选前，几乎所有专业预测和民意调查都预测杜威将击败杜鲁门。然而，出乎意料的是，特鲁门当选了美国总统，这也转变了中美两国各自的政局。此时，在国共内战中，共产党军队已经到达南京浦口，准备渡过长江。选举结果公布后，倪认为杜鲁门当选对国民政府不利，于是召开了紧急会议，召集全国主要同工前往上海祷告，并讨论应对中国局势即将发生的变化。在聚会上，倪表示他与其他所有同工将留在大陆，继续照顾各教会，但同工们要差派李常受离开中国。倪离开上海前往福州鼓岭准备第二期的同工训练之前，嘱咐李尽快完成上海南阳路会所的建造工程。[19]然而，随着局势的快速转变，1949年1至2月间，倪又从福州飞到上海，召聚第二次紧急的同工聚会。在这次聚会中，倪更清楚主所带领前

面的道路，更明确地指示要差派李常受出国，而所有其余的同工要留在国内，为主忠心到底。据李忆述，他问倪：“倪弟兄，你刚才已经很郑重声明，你们大家都要留下，为主忠心，只要我一个人出国，是不是我不配留在这里为主忠心？”倪回答李说，“常受弟兄，你要知道，我们当然仰望主；但是可能有一天，仇敌会将我们一网打尽，所以你必须出去，这样还会留下一些。”倪再次嘱咐李务要完成上海南阳路会所的盖造。聚会结束后，倪返回福州继续准备第二期的鼓岭训练。[20]

一、“我的前途不是被提，就是殉道”

殉道的态度

1949年5月27日，上海易权。[21] 倪柝声此时身处福建福州进行第二期为着同工长老的鼓岭训练。该训练原订于1949年3月至7月期间在鼓岭山的训练中心进行，但因着山上治安恶化，训练至开始了一个多月，全员就移往福州城内海关巷倪的家中继续进行。[22] 早在上海政局变化前夕（3月底）倪见时局越来越紧张，解放军正南渡长江，避免地方教会同工们有可能被一网打尽，就从福州打电报，打发在上海正完成会所督工的同工李常受赶快放下一切责任，飞到福州参加训练，然后到台湾去开展工作。[23] 李常受于5月到了福州，直至7月中旬离开大陆，一个月后福州就易权了（8月17日）。[24] 倪似乎因着已预视到新政权可能带来的逼迫，在第二期鼓岭训练期间就重提“殉道”这一题目。这个题目是主在倪年青的时候就给他的启示，是他自从奉献自己事奉基督以来一直持守的信仰精神。[25] 他一直地将它教导给接受他职事的信徒，也鼓励他们作殉道者：

殉道就是最大的工作；忠心至死就是无上的见证。血所说的比口所说的更美；血的声音比甚么声音都大，血的感力比甚么感力都强。主要我们都作祂的殉道者；若非都在肉体上，最少也都在精神上。……虽然或者主没有安排我们每一个都作肉体上的殉道者，然而主却盼望我们存着虽死不肯否认主，不肯悖逆祂的话的精神。若因着忠心事主，而招人的误会、厌弃、反对、逼迫，或竟至杀害，而在所不计者，就是忠心至死。若因为忠心事主而失世界的朋友、父母、妻子、财产、名誉、荣耀、快乐、生命，而竟宴如也者，就是忠心至死。这是何等的难呢！肉身对此岂不发生战慄么？然而，主的能力是够以维持祂的圣徒的。

殉道者的生命就是死的生命。如果在平日没有死的生命，则在临时，（若非主的特恩，）很难望其为殉道者而不退缩。主要我们活着为殉道者，活着为死人。我们天天为活着的殉道者，则时候到了，要我们用血见证我们所信的道时，我们就能借着主恩，从容就死。……真有十字架在我们里面作工的，就要以这死的生命为宝贵，因为就是这生命叫主喜悦。[26]（1926年8月）

各种的试探，各种的压迫，各种的误会，各种的难处，真会叫最刚强体格的人软弱下来，何况帐棚绳栓时常动摇，像我这样的人呢？然而，殉道者固然难作，背道者也是难作。忠心固然不易，失节也许更难。吞忍固然痛苦，辩白也不见快乐。恶名固然可伤，美名也并不可喜。我们惟有从当初的爱心，用纯一的眼睛，作忠心的工作，等候主来而

己。难道我们出发的时候，主没有告诉我们要背十字架在世遇见苦难麼？[27]（1932年8月）

主不是叫我们每个人都作殉道者，但我们需要有殉道者的态度，就是不爱自己的性命。这个性命就是我们的魂生命。保罗对于自己的魂生命不但是不爱，也不看为宝贝（参徒十五26，二十23~24）。这乃是每个事奉主的人该有的态度。[28]（1939年12月）

1948至1949年的鼓岭训练期间，倪就以“殉道”作为初信造就的其中一题，指出殉道乃是主对每一信徒，包括初信者的要求（启二10）：“当信徒在任何环境中，遇到逼迫，危及生命时，主说，务要至死忠心，要以生命赔上。”[29]倪接着还说：

殉道的人乃是主所看为忠心的人。我们必须告诉初信的人，主给我们看见，凡相信祂的人，都得为祂舍命。所有信祂的人，必须不只盼望信祂而已，并要盼望为祂的缘故舍命。……我们要对初信的人说，有许多人，都是用自己的血来证明所传的道，如司提反、雅各、马可、马太、彼得、马提亚、安得烈、保罗、犹大（主的兄弟）、巴多买、路加、巴拿巴、提摩太、亚拿尼亚等，都是殉道的人。我们要让初信的人看见，作主的门徒要至死忠心。[30]

倪强调基督徒的殉道是“能跑而甘愿为主的名不逃跑。”[31]他举出了教会历史上许多殉道者的榜样，例如在1929至1940年间，俄国共产党政权在斯大林下有一百三十多万的基督徒被杀。殉道者的道路虽是何等艰难，但能够为主殉道却是主特别的恩待，因为将来在国度里他们都得着莫大的荣耀。[32]在鼓岭训练期间主工人的性格一课，倪说到相似的题目，论到虽然神没有意思要人受苦，但工人们需要有“受苦的心志”（彼前四1），以此预备那些一同事奉神的工人，面对或许要来的政局转变：

受苦的心志并不是受苦。受苦的心志的意思就是：我里面在神面前有一个心愿，愿意为主受苦，我存心要为主受苦，我里面甘心乐意的要为主受苦。……受苦的心志应该有多少呢？圣经的要求乃是『至死忠心。』（启二10。）换句话说，就是要甚么苦都吃得下，一直到死都行。……只有那有受苦心志的人，有一个无限的心志，有一个『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的心志的人，才能够事奉神。我们今天在神面前，要再一次把自己献上。我们不是献给受苦，我们乃是预备好什么都摆上。主也许没有意思要我们舍命，但是我们有一个心志就是至死忠心。[33]

预备作奠祭

第二期训练甫毕（1949年7月），倪柝声就从福州去到广州和香港教会考察。[34]八月中旬，中共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以钳形之势，五日之内攻陷了福州。不久，倪从香港回到已为共产党军队所占领的上海，因为他极为关心的是在中国的教会，并且希望对于在变化着的环境有更准确的察看。按照他的观察，他觉得工作还可以作好些年。同年（1949年）的年底，他再次回到他在香港的住处。[35]在这次访问香港教会期间，倪有负担将在中国内地的复兴带到当时的英属香港，加强此地教会的见证。这也可视为他预视新政权可能带来之逼迫所作的另一

个预备。1950年1月左右，倪在香港开始主领聚会，不久李常受也于二月中旬被倪从台湾所召来，两位执事罕有地同时在一地教会共同带领一系列聚会，且持续了整整一个月，为香港教会带进一个大复兴，由原来只有三百多人的聚会，在短期内增至二、三千人。[36]

这系列复兴聚会标志着香港教会的历史的一个新的开始，但倪始终强烈感到他的负担和责任是要与留在中国的信徒连在一起。事实上，经过了1948年11月和1949年2月在上海召开的两次紧急同工聚会后，倪已决定为着中国教会的缘故而留在上海，并在同工中宣布差派李常受到台湾，预备易权后万一临到的逼迫。[37] 因此，尽管倪明白回到中国大陆可能存在的危险，他不顾在香港一些弟兄们劝阻他不要回去的建议，仍然毅然决定返回中国。于三月中旬一天（12日），他不辞而别，坐火车返回上海。[38] 李常受回忆：“他就像使徒保罗在行传二十章二十四节一样…他知道有危险，但他意志坚定，灵中勇敢，要行完他的路程，成就他从主所领受的职事。”[39] 李在他最后一段与倪相见的日子里，为倪作见证说：“他已经预备好，被提或是殉道。我写这些话时，在我书桌上有两个石刻的文镇，其中一个刻着他的话说，‘我的前途不是被提就是殉道。’”。[40]

二、面对在新政权下的新环境

顺服地上代表权柄

在鼓岭训练期间，因着已接受在客观政局上将要发生的转变，倪也教导基督徒对国家该有的态度，这也符合他一直以来的教导，就是基督徒在地上不能参与任何形式的革命，而要在不违反信仰的前提下尽力顺服政府，甚至为政府祷告，就算其对基督徒不友善。早于1936年，倪在天津向着一群年青医科生讲道时，回答基督徒对国家社会的态度，说：“基督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主要的是完成了对付罪的工作，拯救了人脱离罪，叫人得着新的生命。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才是来解决这个社会的一切问题，更新一切的政治制度。”[41] 倪看今天社会的问题根源都是人犯罪带来的，因此该好好的作基督徒，尽力去救人脱离罪，叫人得着神的生命，而不是去改变政体，改革社会。基督徒所盼望的主的再来，那时一切社会的问题都要解决。[42]

甚至在国共内战之际（1946 - 1949），倪仍然持守他一直以来的立场，指出“基督徒个人的问题，乃是在基督第一次来时解决；社会上所有的难题（包括不平、战争、疾病、饥荒、教育、知识、犯罪机构等事），乃是在主第二次来时解决。”；“革命乃是因为有坏制度；人因为恨恶坏制度，而起来改革，甚至流血牺牲。我们不能以流血来破坏社会的制度。”倪认为基督徒的属天呼召不是去改变这世界的制度，乃是该传福音拯救罪人，并等候主的降临，这才是真正“基督徒的社会主义”。[43] 在第一期鼓岭训练期间，正值国共双方在东北长春围困战（1948年5月底）时，倪召聚了祷告聚会为局势祷告，并在会后指出，“政权的胜败不关我们的事，我们自己的态度应改变，不宜批评、咒诅、诽谤。只要一个政权不反对我们事奉神，我们就应该为他们祝福。李常受弟兄说，纵使一个国家的政府更坏一百倍，我们还应该为他们祷告。”[44]

在鼓岭训练第二期期间，倪再次认为需要教导初信者如何应与新政权维持怎样的关系。倪表示主耶稣第一次来到地上时，没有从事政治革命，也没有建立犹太国，因为祂来地上的目的是要救罪人。祂的工作是属灵的而不是属世的，与政治无关。因此，正如主耶稣在地上如何守住祂的地位，基督徒在世上也该守住基督徒的地位，跟随祂的脚踪行，不摸政治的活动，也不与政治发生关系。基督徒在地上的目的是为着神属天的国度，不作地上国家政治的统治者。另一面，基督徒对于地上政权的态度，乃是尽力顺服（罗十三1~7），然而，这顺服是有限度的。只有神是基督徒无限顺服的对象。除了关乎信仰的事外，基督徒在其余的事上都得听从政府。今天基督徒的主要责任是传福音救罪人，满足人属灵的需要。倪认为在准备活在新政权下，以上是基督徒在地上对于国家政权应有的态度与实行，并嘱咐他的同工们要将此教导给初信者。[45]

抓住机会

倪柝声由香港回到上海后，同时极为勤奋地工作，并且以“要赎回光阴（机会），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参弗五16），鼓励同工们抓住还有不多的作工机会。在面对在新政权下的新环境，倪提出两点的工作主要策略，一是“顶上去”，就是抓住机会，积极谋求发展，一方面是借着移民广传福音、抢救灵魂、建立教会；[46] 另一方面是借着联系和吸纳那些自西教士离去后的各基督徒团体，盼望通过壮大信徒人数而抵抗新政权可能施予的打压；[47] 二是在不干涉信仰范围内，尽力顺服新政权的要求，以祈在共产党容许的生存空间中发展。在1950年7月的一次同工聚会中，倪表达了这个“顶上去”的想法：

我想，当各处的初信造就作得相当强的时候，我们就得想办法和那些爱主而不反对我们的团体寻求交通，把他们带到教会来。已往，我们是注重从外教人中得着罪人。从已经信主的人中，若是可能，就让他们个人到我们中间来。我们怕人说我们是偷羊，就不去得着他们。这是我们已往所抱的态度。一直到现在，这一条路是这样走的 已往主是要我们这样作。

从第二期鼓岭聚会之后，我在感觉上有点改变，不是道理上的改变。这三个月来，我里头感觉越过越厉害。感觉今天到了一个地步，不只要得着一个一个爱主的人，并且要得着一个一个爱主的团体。……我想，主要我们和这样的属灵的团体有交通。弟兄们要全体出去得着他们。已往我们没有作的，现在要作。……我们一面注重传福音，一面要注重属灵的团体；我们不是要一个一个的得着他们，乃是要整个的得着他们。[48]

倪所提倡的教会合一，不是罗马天主教、“隔墙拉手式的属灵”、或堂会主义的合一，乃是基督身体的合一，照着圣经以地方为单位。[49] 那时候，倪呼召其他愿意一同作地方教会见证合一的基督徒团体，支持那些因传教士被驱逐而面临经济困难的团体，并他们原有的牧师和传道人，而这一决定受到了一些外国差会的欢迎，如不少中国内地会（CIM）和美国长老会的宣教士在他们被驱逐之前，因为倪决定留在中国继续牧养、照顾众教会，就将他们的团体都转交到所倪带领的地方教会。[50] 结果，地方教会扩展到了中国西部的云南省，并在中部的浙江省接收了多达十个中国内地会的聚会点及其原牧师[51] 为了容纳这些基督徒团体，倪甚至

允许他们保持各自原有不同的教会治理和敬拜形式。[52] 倪深知教会早晚一天会受到新政权的限制，福音工作可能会完全受阻，因此他积极为未来作出计划和预备。不幸的是，那一天来临似乎得比他预期的更快。[53]

倪柝声决心加强和扩展地方教会并寻求与众多基督徒团体合一的活动，正值朝鲜战争刚爆发的时刻。1950年6月25日正式爆发韩战，随后毛泽东于7月号召“抗美援朝”运动，政府也开始在基督教界筹备“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旨在将众多基督徒团体纳入国家控制的“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与当时许多由本土信徒自己创立的基督徒团体相似，倪认为地方教会在某程度上已肯定并早就实行了三自原则，并且不感兴趣参与或干涉政治领域。此外，倪认为教会在新政权所承诺的宗教自由下，可以找到一些程度的生存和自主空间。因而，倪似乎接受在信仰不被干涉的前提下尽力服从和配合新政权（参罗十三1~7）。事实上，地方教会在新政权建政的首年，表面上确实享受了某程度的宗教自由，基本未受政局影响，继续大传福音，大讲属灵生命之道，并持续迅速扩展，甚至达到历史上的巅峰时期。然而，从政府的角度来看，这一切举动无疑被视为对政权的挑战，使倪成为以后被政权攻击的目标。[54]

三、在新政权下的中国宗教政策

1949年9月，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下面简称政协）在北平召开，邀请了宗教界人士参加，并于9月29日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该纲领充当了临时宪法的角色，明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的基本权利，包括思想、言论、宗教信仰等自由。然而，许多基督教界人士对宗教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前景感到担忧，担心共产党会消灭宗教。虽然一些人相信政府会实现《共同纲领》中的承诺，但不久后，他们发现这只是一场幻象。中共高层已决定消灭与共产主义相竞争的宗教信仰，并计划打击顽固的基督徒。

在中共通过《共同纲领》期间，倪正身处香港，亦得悉有关信仰自由的条文。[55] 他认为，虽然《共同纲领》上保证信仰自由，但新政权不一定落实其承诺。在局势变动之际，可能仅有四年（1948至1952年）复兴的时间，一旦错过了作工机会就难复再。[56] 倪似乎准确地预言了自己的未来。的确，一个翻天覆地的变革正在筹备之中，因为中共并未真诚地赋予基督徒所以为的宗教信仰自由，或者说要享受这种自由存在着一个重大的预设。接下来将会看到新政权下社会中每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要经历一番深刻且彻底的改造和调整，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宗教也不例外。[57] 总理周恩来（1898 - 1976）多次在不同场合的报告和讲话中明确阐述了新政府的宗教政策。他强调保护宗教信仰自由，但也警告反对帝国主义。他要求宗教界与敌对的帝国主义国家保持距离，将反帝爱国视为享受宗教信仰自由的前提。周还指出，中国基督教需要割断与帝国主义的联系，实现自我改造，成为真正属于中国人的宗教。他强调政府不是要消灭宗教，而是清除其中的帝国主义分子。随着周恩来于1950年5月2日、6日和13日在北京三次接见吴耀宗（1893—1979）、刘良模（1909—1988）等现代派基督教人士，表明基督教自我改造运动将由这批共产党所支持下现代派所领导。[58]

四、思想改造运动

中共使用“自我思想改造”（即“洗脑”[59]）的方法处理新政权下的基督教问题，并非新尝试。[60] 毛泽东在延安进行的“整风运动”（1942至1945年）早有先例。[61] 这场运动通过暴力和洗脑手段，确立了毛在党内的领袖地位。[62] 毛利用《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简称总学委）要求党员组成学习小组，进行密集、封闭的学习讨论、自我批判和认罪，最终确立了对毛的绝对服从。[63] 整风运动中，人们在恐惧、怀疑和背叛的环境下被迫自我批评、写检讨书，导致大量冤假错案。毛在延安的成功思想改造成为新中国政治运动的样板，其过程采用了肃反工作的一贯策略，即“逼供信”——“逼”是肉刑逼供，“供”是迷信供词，“信”是坚信不移。[64] 为求达到所定下的政治目标，不惜制造大量冤假错案，残害无辜者，估计超过一万人因此丧生。[65]

对新政权来说，知识分子是思想改造的一个重要界别。针对高校教育领域的改造始于1951年4月，从北京大学扩展至全国各高校的教职员和学生，均以政治学习为主要内容，[66] 同时完成以苏联为师的高校院系调整。[67] 此后，全国各大学相继成立了“学习委员会”，对知识分子进行政治思想改造亦成为高等学校的日常工作之一。毛在1951年10月23日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中明确表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新中国重要的民主改革和工业化的条件之一。[68] 虽然1952年秋暂告一段落[69]，但政府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未有停止，并在学校中展开了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的思想改造工作，包括培养干部和清理反革命分子。[70] 此后，思想改造计划扩展至其他领域，包括政府干部和商人。中共既将基督教视为欧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因此中国的基督徒自然成为不可避免的改造对象。对中国基督教的改造要求不过是新政府对全国思想改造的众多领域之中其中一个——宗教领域——之下的改造。

贰、三自革新运动—中国基督教的大改造（1950-1951年）

1950年至1951年，中国基督教界经历了大规模改造，由政府主导的三自爱国运动和控诉运动成为其旗帜和内容。这场爱国运动最初名为“三自革新运动”（于1954改名为“三自爱国运动”），始于1950年代初中国三大政治运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的背景下。[71] 这几场大规模政治运动几乎同时进行着，这些运动的背景以及倪柝声和地方教会在其中的牵连，对于理解倪柝声案作为当代中国基督教史上最重要的一宗政治案件的性质有极重要的帮助。

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

朝鲜战争大大地催熟了政府改造中国基督教，包括其外貌和基督徒思想。[72] 这场战争于1950年6月爆发。10月8日，毛泽东决定中国参战，提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口号，以“中国人民志愿军”名义跨越鸭绿江对抗美军。10月26日，新政府成立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1951年2月2日，中共中央发布《进一步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指示》，全国范围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正式启动。[73] 在这“新形势”下，全中国的教会都被要求参与在全国对美国展开的批判。[74] 政府为了消除中国社会的“亲美、崇美、恐美”思想，发起了“三视”运动，旨在统一民众对美帝国主义的认识，倡导普遍对帝国主义的仇视、鄙视、蔑视态度。[75] 1952年2月，再次展开宣传攻势，指控美国对北朝鲜和中国东北境内进行了秘密的细菌战

，投放生物武器传播疾病。[76] 随后在各大城市举办了细菌战展览会，掀起了全国反美运动的高潮。同月16日，三自筹委会号召全国基督徒抗议美国在朝鲜的细菌战罪行。[77] 尽管有人质疑证据真实性，但在官方广泛宣传的影响下，大多数人普遍相信官方指控，并被动员在全国范围内收集“证据”，参与“反细菌战爱国卫生运动”。[78]

朝鲜战争对中国基督教界最直接影响主要体现在截断海外的财政支持。1950年12月16日，美国宣布对中国实施全面封锁和禁运，冻结了两个朝鲜在中国的资产，中国随即于20日宣布反制措施。这严重影响了在华依赖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同年底（12月29日），政务院公布了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号召全国各级政府及宗教界人士，全面清除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文化侵略影响，并要求各团体向当地政府登记及报告其工作及经济情况。[79] 许多依赖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立即向新政府靠拢，多地教会发表声明，支持政府的安排。[80] 倪柝声认为地方教会早已从西方差会和教会自立，因此对政府的“接受帝国主义津贴登记表”填上“不适用”，将空白表退回。这一举动随即引起了官方和后来的三自会的怀疑，被视为隐瞒和与政府对抗。[81]

战争对中国基督教界的另一影响是驱逐在华的外籍传教士。1951年，许多在中国的传教士被指控为“反革命分子”、“美帝分子”、“间谍”，遭到逮捕或驱逐。[82] 政府转而宣传指控外国传教士和涉嫌间谍活动的教会人员，启动了驱逐西方传教士的全国运动。这些宣传包括伪造的证据，指控传教士犯下间谍、强奸和谋杀等罪行。[83] 1951年起，各地报纸大量报道教会育婴院的指控事件，并举办控诉大会。其中，广州厄尔尼诺院的教案尤其著名。政府的指控在全国掀起对教会的憎恨和爱国热情，并促使基督徒对美帝国主义产生更深的仇恨。[84] 倪柝声本人及其领导的地方教会基于基督徒信仰是普世性的缘故，与外籍传教士维持正常个人的接触，接受属灵上的帮助，但从没有与海外组织建立过的从属关系。反之，地方教会一直以长老团的圣经模式实行本地信徒的自治和自理，因此拒绝承认受海外组织支配，也拒绝参与控告外籍传教士。[85]

二、土地改革运动

土地改革运动（简称土改）于1950年6月30日至1952年底展开。朝鲜战争爆发后的5天，中共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废除了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将土地转为农民所有。从1950年冬季至1952年底，全国约三亿农民获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免除了过去的地租负担。除了少数地区外，土地改革已基本完成。中共推行成功土地改革所使用的重要手段是发动“积极分子”，推动农民群众的“控诉运动”，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和对革命的支持。[86] 在土改运动初期，倪柝声和他的同工通过签名向政府请求保留鼓岭的土地和执事之家的房产，但政府不但拒绝了这请求，并且将他们定为“团体地主”。[87] 随后，鼓岭执事之家的成员受到半年的管制，之后被迫迁出，土地和房产被没收。[88] 1952年1月，有关鼓岭执事之家的报告指控倪柝声和其他请求者犯了破坏土改的政治罪，并将矛头直指倪本人。[89]

三、镇压反革命运动

中共建国首年，为了消除国民党和西方势力在中国的影响，中央高层决定镇压“反革命”（简称“镇反”）。[90] 直到1950年10月，毛泽东决定出兵朝鲜后，正式发动了镇反运动。毛于10月10日主持通过了新的《镇压反革命活动指示》，命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镇压。[91] 反革命分子包括国民党成员、土匪、地主、特务和反动份子。[92] 镇反旨在通过群众运动清除对社会秩序的威胁，巩固政权。[93] 特别是在中美开战后，更需要镇压国内的反革命，“把房子打扫清洁，更好对付帝国主义”，好消除“在我内部存在着（美国）他们的一些内应”。[94] 根据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只要有勾结帝国主义、参与特务或间谍组织，利用封建会道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人都可被定罪。同时，条例将反革命罪扩大至“挑拨、煽惑行为”，包括“煽动群众”抗拒政府命令、“挑拨离间”人民与政府的团结，或“进行反革命宣传”，也可被定罪。[95]

毛泽东指示镇反行动必须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要坚决杀掉一切应杀的分子。[96] 以上海为例，1951年1月5日，上海市军管会颁布《对反动党团特务人员实施登记办法》，要求与国民党有关组织的人员登记。[97] 毛泽东指示上海市委在同年春季前处决“三五百人”，一年内处决“一二千人”。[98] 4月27日晚，全市捉拿了8359名反革命。4月29日，在逸园体育场召开控诉大会，对9人进行了公审，判处死刑。4月30日，又判处285人死刑。至1951年11月，8100名反革命被转移至其他地方，强制接受劳动改造。[99]

随后，政府将镇压反革命运动结合其他同时展开的运动，如三反五反运动，进一步动员全国各省市单位深入调查，打击隐藏的反革命分子。至1953年底，历时三年的镇反运动告一段落。单就上海计，当局共逮捕并处理反革命分子5.4万余人。[100] 毛泽东强调要发动民主人士及群众参与，以收杀鸡儆猴之效。负责组织全国群众的治安保卫委员会监视群众，以巩固中共的统治基础，稳定社会秩序。根据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的报告，镇反运动以来，全国共捕了2.62百万余名，其中有71.2万被处决，关押了129万余名，并管制了120万余名。[101] 这场镇压反革命运动极大地震慑了社会，提高了新政权的威望，对新中国影响深远，与“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并称中共建国初期三大政治运动。[102]

简言之，朝鲜战争爆发后，新政权相信西方帝国主义者正在加紧对中国的渗透和破坏活动，因此加强了肃清各界中的“反革命分子”、“美帝分子”、“间谍”，尤其针对被认为与西方势力关系密切的基督教和天主教的领袖和团体。[103] 1950年11月，上海宗教界发布支持抗美援朝的声明，呼吁揭露美帝利用宗教在中国的反动阴谋，清除帝国主义反动分子。[104] 刘良模呼吁“肃清宗教中一手拿十字架，一手拿着枪的帝国主义分子，并镇压他们躲在宗教外衣后面所进行的各种反革命活动”。[105] 在强烈且恐怖的政治氛围下，几乎每个中国基督徒都需要面对个人与国家的关系问题。他们必须决定是否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是否顺从政府要求，特别是被政府视为与帝国主义联系最紧密的基督徒，必须公开与帝国主义划清界限。这对任何基督徒和教会领袖都是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和压力。

四、反帝爱国的〈革新宣言〉和签名运动（1950年5月-7月）

在抗美援朝和镇反的背景下，吴耀宗等基督教现代派人士发起了基督教革新宣言和签名运动。[106] 这些运动以反帝和爱国为目标，表面上由基督教人士领导，实际上由政府主导。[107] 1950年5月，19位基督教人士应周恩来的邀请在北京会面，并在中共领导人的支持下发表了〈中国基督教会今后努力的途径〉的宣言（简称作〈革新宣言〉）。[108] 宣言包含中国基督教会今后努力的途径，呼吁基督教团体支持共同纲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109] 宣言的公开信寄给全国1000多位基督教领袖，并获得中共高度重视。中共中央发布了相关指示，签名运动在全国蔚然成风，签名者达到18万，占全国基督徒的18%。[110]

倪柝声的名字并未出现在吴耀宗于7月底发表的《革新宣言》时所征得的40位教会人士名单中，但他可能也应该收到了宣言并受邀签名的信。[111] 虽然吴征得了40位教会人士的支持，但也有一些人反对宣言的内容，反对将基督教与帝国主义联系起来，如西安青年会的田景福和中华圣公会的朱友渔。[112] 上海的灵粮堂认为已经实行了自己的自主、自养和自传，所以也拒绝签名。[113] 倪最起初也不同意宣言，因此并未在首批1527名签名人中。他在1950年9月编的《我们的立场》和《对三自革新宣言》中，向各地地方教会负责人建议对宣言采取的态度。[114] 当时全国大约有10,000间教会、8,000名传道人和84万基督徒。在这政治氛围下，签名等同于支持“反帝爱国”，而不签名可能会被视为“反革命”。因此，每个人都在透过签名来表达自己的态度以保护自己。12月，倪与唐守临、张愚之和吴耀宗会面，将一份32,782人的签名名单交给了吴。[115] 后来，上海教会这份名单来源作出说明。[116] 但三自爱国运动并未止于宣言，后续发展需要更具体的行动，如参与控诉运动，有些人选择与国家进一步合作，而有些则拒绝，结果使他们成为政府攻击的目标。[117]

五、全国基督教会议（1951年4月）

使用控诉“打扫房子，洁净教会”

1951年4月的全国基督教会议是中共治下改造中国基督教历史中的一个重要事件。朝鲜战争时期，美中两国交战，冻结对方资产，使依赖差会援助的教会陷入经济危机。[118] 中国认为这是加速改造基督教的机会。在1950年12月29日的政务会议上，周恩来表示可以提早肃清美帝在中国的影响。[119] 为缓解海外财源中断的恐慌，中共于1951年3月5日强调自立革新运动是反帝政治斗争的一部分，并要求政府积极领导运动。[120] 中共中央决定在4月于北京召开名为“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的全国基督教会议（简称“北京会议”），讨论实现“三自”的问题。[121] 为此，政府在3月15至19日先召开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确认了会议的预备工作，并强调要做好准备工作。[122]

北京会议实际上是为了传达政府对实现三自革新运动的要求，要求每个基督教团体断绝与美国全方位上的联系，并要求每个基督徒接受在思想上的改造，完全服膺于新政权。[123] 政府邀请了所有基督教团体的代表参加会议，包括那些与西方差会无关的团体，像倪柝声等本土团体的领袖也受邀。[124] 在会议前，倪提到了一些引起他挂心的事情[125]，并与王明道讨论政府可能对信仰进行干涉的问题，希望能共同争取信仰的空间。[126] 虽然王受邀但拒绝参加，倪最后决定以观察员身份代表本土教会出席会议。其他参加会议的本土教会代表包括敬奠

瀛（耶稣家庭）、魏艾萨克（真耶稣教会）和谢永钦（中华基督教自立会）等。[127] 共有154位基督教团体代表应邀参加会议，其中来自上海的有41位，包括吴耀宗、邓裕志和刘良模等人。[128]

在这次会议中，有四个重要事件：首先，政府代表陆定一再次强调了《共同纲领》对宗教信仰自由的态度，宣称只有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才能享有宗教自由。[129] 其次，会议强调了国际形势，指出美帝利用基督教进行全球侵略阴谋，要求与帝国主义断绝关系。[130] 第三，除了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外，会议还发表了一份《中国基督教各教会各团体代表联合宣言》，号召基督徒积极参与政治运动和内部革新。[131] 最后，会议筹备了《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委员会》（简称《三自筹委会》），由吴耀宗担任主席，刘良模担任书记，旨在统一全国基督教爱国运动与革新运动。这个委员会旨在组织并推动全国基督教的三自革新运动，以彻底断绝中国教会与美国差会的关系，并提升信徒的政治意识和爱国热情。[132] 为此，三自筹委会最重要的当前任务是在全国基督教界推动控诉运动，以执行北京会议的《联合宣言》所提及的政策，帮助政府实行其《打扫房子》的政策，即揭发教会内的帝国主义分子及教会败类，将其驱逐出教会，保持教会的纯洁。[133] 控诉工作要求深入各个教会，遵循中共过去运动的模式：工作组确定斗争对象，发动群众，展开揭发，进行控诉。这些措施统一了思想，培养了新一代积极分子，取代了不能适应时代的领导者。各地的三自革新筹备委员会在此基础上成立，借着三自将全国各地的基督教完全纳入中共的控制。

在北京会议期间，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陆定一先亲自示范控诉美国宣教士。他首先指控了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 - 1861）牧师及其影响的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和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将它们描述为“美帝主义控制的机关”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134] 在接下来的两天封闭式小组讨论中，一开始各教派领袖保持沉默，直到华东宗教处长周力行催促大家开始控诉。[135] 18日下午，吴耀宗主持小组讨论时，一些支持差会和受差会的教会领袖开始一个接一个站起来控诉。崔宪详是第一个控诉美国传教士毕范宇（Frank Wilson Price, 1895 - 1974）的人。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共有18人登台控诉自己的同工是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外籍）或基督教的败类、走狗特务（本国籍）。[136] 参与控诉的人大多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有的几夜没有睡好。[137] 这18位教会领袖的控诉不仅成了会议的一个高潮，也有带有示范作用的性质，他们的控诉文不久即被刊登出来，成了后来整个控诉运动的样板。[138] 这样，1951年下半年在全国各地展开了控诉运动。

基督教控诉运动的样板

北京会议期间的两天控诉大会的一个焦点是对自由传道人顾仁恩的控诉（4月20日）。[139] 这一过程不仅使顾仁恩成为控诉大会的焦点，也成为后来整个控诉运动的样板。[140] 稍后将看到，顾仁恩反革命案（简称“顾案”）例值得与倪案一同讨论，因为二者同样是先受政治控罪，再加上经济和道德控罪。顾被捕后，除了全国范围的谴责宣传外，还有基督教界的政治加上各种道德揭发。[141] 顾案被视为是应景之作，因为政府需要将一位美帝特务抓出来，向整个中国基督教界传达一个强烈的信息——在宗教界中，谁反对、抗拒政府要推动的三自

革新运动，就会被视作“披着宗教外衣，为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必须被揪出来彻底清除，下场将像顾仁恩一样，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142]

北京会议传达的信息表明在中国的基督教团体即将迎来严峻的变革。控诉某些人的大会将在全国各地举行，基督教团体也将受到影响。大会安排了小组讨论学习揭发和控诉，还有被控者的“罪行展览”，以及控诉大会的实际操作。这些安排并非临时之举，而是政府在会议前就已经准备好的，旨在向代表们传达政府将开展控诉工作的信息。在此次会议上，顾仁恩成为首批被政府指名控诉的对象，让来自全国各地的基督教团体代表揭发他在各地的罪行。顾案是基督教内首批控诉运动的案例，为各地教会的控诉斗争拉开了序幕，并成为政府主导的“三自”运动未来控诉活动的范本。[143] 该案件确定了罪行的三个要素：政治（被指控为美帝间谍并宣传反革命）、财务（谋取私利和个人致富）、道德。会议结束后，许多受政府信息震撼的基督教界人士为了自保不得不附和政府的控诉，变本加厉地对顾进行批斗。

倪柝声在北京会议上没有参与任何控诉，但必然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也大概明白政府的要求远不止于签名支持，而是要实际参与控诉运动。一面他明白顺服神代表的权柄圣经要求，另一面他明白需要坚固在各地教会的信徒。在会议后回到上海，面对即将席卷全国的控诉运动，在政治紧张的环境下，倪和他的同工们夜以继日地工作，为信徒准备和出版各类圣经材料、属灵信息以及新增加的诗歌，作为坚固他们信心的工具。他也抓住机会出版了在鼓岭两次训练的信息，希望这些资料能够保存下来，让信徒以后受益。[144] 1952年至1953年期间，他的福音书房出版了《怎样读圣经》（即《读经之路》）、《基督徒基本认识与操练》（即《初信造就》）、《圣洁没有瑕疵》（即《荣耀的教会》）、《亚伯拉罕、艾萨克、雅各的神》、《甚么是新约》、《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主工人的性格》、《神话语的执事》、《十二篮》、《诗歌（增订暂编本）》等，还有预备作殉道者材料。[145]

叁、从控诉运动至三反五反运动（1951-1952年）

一、席卷全国的基督教界控诉运动

在北京会议中，中国政府正式呼吁全国基督教界展开控诉运动。会议结束后，在全国各地教会陆续展开控诉运动。《人民日报》（4月24日）发表社论称，控诉是普及和深入推进三自革新运动的重要方法，也是对抗“帝国主义分子”的有效手段。社论呼吁将会议的控诉经验推广到全国基督教团体，并要求每位基督徒积极参与控诉运动，以帮助政府清除教会中的反革命分子，并提升政治觉悟，激发对帝国主义的仇恨和对祖国的热爱。[146] 为推动这一运动，三自革新筹委会于次日（4月25日）通过了在各地政府领导和协助下普遍展开控诉运动的决议。[147]

5月2日，三自革新筹委会发出“搞好传达，搞好控诉”的号召，要求全国每个基督教会与团体在五月份的中心任务是在教会内传达政府在北京会议的精神和内容，并在当地政府的指导和协助下，办好控诉大会。此外，还要求在五月底将控诉材料与经验寄给筹委会。[148] 尽管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控诉动员是常见手段，但许多基督徒仍对控诉感到陌生，并认为它与圣

经和信仰存在根本冲突（太七7-5）。[149] 吴耀宗于是在《人民日报》（5月24日）发表的文章中为控诉运动辩护，认为控诉是完全符合耶稣教训的，甚至耶稣自己曾对文士和法利赛人进行过严厉的控诉。吴认为只有通过控诉，中国教会才能获得“新生”，教徒应该积极参与其中。[150] 在这段时间，《天风》杂志也发表了多篇为控诉寻找理论依据的文章。[151]

与此同时，三自革新筹委会为了在各地教会实际展开控诉运动，指示各地教会和基督教团体如何开展控诉大会，以教育教会群众。在这一过程中，刘良模发挥了关键作用。[152] 他在《天风》（1951年5月19日）刊登的文章〈如何开展教会控诉会？〉中详细指出控诉的原因、内容、对象和方法。控诉被认为是肃清基督教内部帝国主义影响的最有效方法之一。[153] 控诉的对象是那些潜藏在教会里面的帝国主义分子、他们的爪牙以及其他教会的败类，内容涉及他们如何“利用教会来侵略中国和欺骗信徒”。控诉的方法包括先排除许多基督徒思想上的顾虑。第一步是各地教会联合会组成控诉委员会，研究控诉对象和邀请控诉者，然后召开控诉动员会。第二步是在各教会、各团体举办控诉小组会，选出最有力的几个人参加控诉大会。在筹备控诉大会过程中，应当请当地的宗教事务处、政府等人员指导，并将控诉词发表在当地报纸上，同时寄给三自革新筹委会。如有揭发到具体罪行的材料，如信件、照片、武器、无线电等，可举办“全市性的展览会”或“全国性的展览会”。刘最后强调，开展好控诉会是每一个教会肃清帝国主义影响的重要任务。

经由各方及吴耀宗等人的积极推动，全国控诉运动迅速展开。根据三自革新筹委会两个月的工作报告，从5月到6月底，全国已举办63场控诉大会，尤其在上海、南京、青岛等地较为成功。[154] 上海因教派众多、势力强大，成为中共政府特别关注的区域，控诉运动在此启动最早且进展最深入。[155] 尽管如此，《天风》报导指出，全国普及和深入控诉运动仍面临困难，部分基督教团体控诉不力，特别是被认为是“属灵派”的团体。[156] 上海的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最受政府注目。[157] 该会于6月1日举行控诉大会，吴耀宗及陈崇桂在会上控诉该会受美帝利用作为侵略中国的代理人。此后，协进会几乎解散。[158] 6月至10月，上海又多次举办控诉大会，其中6月10日的全上海基督教控诉大会有一万余人参加。[159] 控诉者包括来自全国各地的教牧人员，他们控诉被美帝利用，并批评部分教会与外国势力有联系。[160] 最后，吴耀宗作报告，指控外国势力利用《属灵派》散播错误思想。[161] 大会的政治气氛极其浓郁，最后以全场欢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作结束。[162] 这次万人控诉大会已表明上海的本土独立教会或“属灵派”均不能以“与西方宗派无联系”或“超政治”为藉口，而幸免于成为控诉的对象。《天风》社论更明确指出，上海控诉运动不仅针对美帝国主义，还将具体控诉受其利用的教会或团体，包括传教士、基督教协进会、各大公会等。[163]

二、在上海地方教会展开的控诉运动

在1951年5月至8月期间，倪在上海得知控诉运动已在部分地区展开，内容已从反对帝国主义扩展到影响教会信仰，并对准了教会领袖。他意识到，运动让信徒相互攻击，但不参与又会给教会带来灾难，因此感受到巨大压力。一封1951年7月的信函报告说，地方教会处于严重考验中，而倪柝声因心脏病再次倒下。[164] 负责在南阳路会所举行的控诉运动是政府宗教事务处处长周力行和三自代表刘良模。[165] 8月7日，周要求倪承认“超政治”观点错误，并参与

控诉美帝利用了基督教、上海教会、英国弟兄会和史百克，以及控诉那些离开了大陆的同工，如到了台湾的李常受等。[166] 8月10日，周力行再次与倪和教会负责人会面，表明政府只关心政治立场，不干涉宗教信仰。[167] 8月20、21日及9月12日，倪在南阳路会所发表三次讲话，并编印成小册子《我是怎样转过来的？》以帮助信徒明白如何在新政权下既作人民又作忠心爱主的基督徒。[168] 他回顾从4月北京会议到当时的心路历程：

我先作一点见证。从北京会议之后，我回到上海，我里面起了一个极大的争执，或者说是起了一个极大的思想斗争，就是到底我们超政治可不可以。这一件事在我身上觉得非常重。在这里有的姊妹与我同工三十年之久，也有人和我在一起二十几年。你们知道在这三十年中，我们完全传宗教，不摸任何其他的事。我们好像对于所有的事，都不感兴趣，只感觉宗教的事有兴趣。今天呢，好像三十年功夫中所有的一切，都起了摇动。我在北京听说超政治是错误的，这叫我非常为难，因为我没有认识“超政治”是错误的。我是心脏有病的，这一次心病又发。

我在这么多年之中，经过了许多的事情，却从没有作过绝望的祷告。但是这一次我祷告，求主接我回去。还有一个难处，就是最近的时候，联络员〔注：控诉指导委员会〕（请你们原谅我这样说，现在事情是已经过去了）特别提起应当控诉美帝国主义如何利用上海地方教会。我觉得如果要我起来这样控诉，是叫我撒谎。弟兄们，我实在是难过。我觉得我如果要避免人的审判，而落到撒谎的地步，那是我作不到的事。所以我又有一个祷告：“主阿！求祢接我回去！”弟兄们，我今天在这里和你们谈，乃是我在这几个月之中，翻天覆地的在那里翻出一些东西来。这几个基本的问题，叫我非常困难，困难到盼望早日离世。我想这几个基本难处也许是今天晚上坐在这里我们一同学习事奉神的人所共有的。所以我觉得要把我自己转过来〔注：指“超政治”〕的情形和你们谈一下，让你们也在神面前看一看，到底这条路是不是这样走的。[169]

倪的祷告—“主阿！求祢接我回去！”—表达了内外困难如此之大，以至他盼望“早日离世”的心情，流露出他此时也许已预备好殉道，宁愿死也不肯作一些得罪主耶稣的事。似乎对倪而言，数月前在北京会议上政府和控诉者对顾仁恩的控诉大会的那景场境仍历历在目，如同福音书中群众对耶稣“除掉祂！除掉祂！”的呼声。对于他来说，根据他的信仰和良心，他无法控诉任何人，包括英国弟兄会、史百克，以及他的亲密同工李常受。[170] 倪始终认为控诉他人是撒谎，他是自己作不到的事。而对政府和三自代表而言，倪无法达到他们的要求。因此，他的“转变”也没有达到让《天风》转载来收宣传之效。相反，他们认为倪是让控诉运动无法普及和深入的主要阻碍，却尽快除掉他。张锡康有以下忆述：

我们将空白登记表退回去，不控诉帝国主义，和三自领导人对立起来。这就引起宗教事务局和三自对我们的怀疑，认为我们是对抗、隐瞒。他们经过调查后，找倪弟兄谈话，指出要他交待与1932年来上海的八个弟兄会外国人的关系，要他交待1933年和1938年，他两次去英国和史百克的关系。倪弟兄回以弟兄会的八个外国人是来访问我们的，他们要我们成为弟兄会闭关派在中国的分会，遭到我们的拒绝，以《致英国罗福区弟兄会的一封信》为证。至于和史百克的关系，也不过是在圣经亮光方面有同样的看见，并

没有和史百克成立从属的关系，成立行政上和经济上的关系。“三自”又要他控诉逃去台湾的李常受，认为他是漏网的反革命分子，并且带了许多青年去。倪弟兄1950年（注：应为1951年）一次在生化厂的办公室亲自对我说，他怎能控诉李常受弟兄呢？这怎能说弟兄彼此相爱呢？因这缘故，以后矛头就对着倪弟兄，想要控诉他。[171]

因着控诉运动在上海教会处处碰壁，政府和三自代表转变策略并很快就找到一些“积极分子”，策动发动“群众路线”来控诉倪。根据张锡康的说法，刘良模背后策动了守真中学的一位教师吴维傅率先站出来控诉倪和教会。[172]八月下旬，上海教会在控诉指导委员会监督下，在南阳路聚会所举行了首次正式的控诉大会，由刘良模主持。前一天是预备控诉，分别在南阳路和虬江路两处聚会所进行小组学习后排练控诉。南阳路由刘良模主持，虬江路由蔡昭修（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干事）主持。[173]在排练中，几位控诉被控诉指导委员认为不够深入，但吴维傅的控诉文得到了蔡的称赞，认为抓住了重点。[174]次日晚上在南阳路聚会所首次正式的控诉会上，先是三自会的代表们在聚集中向信徒讲话，控告差会领袖们帝国主义的行为，结果引来了一阵静默抵抗，无人发言支持。[175]反而，有地方教会信徒对政府干涉信仰表示了抗议。接着，就“积极分子”安排好起来控诉，而吴维傅是第四位控诉者。他在政府指导员的推动下，站出来控诉教会所教导关于姊妹蒙头、诗歌、传福音等四个问题，激起了信徒强烈的反控诉情绪，会场陷入一片混乱。[176]

上海教会首次举行的控诉会所引发的反控诉情绪完全出乎政府和三自代表的意料。对很多信徒来说，这场运动威胁到了他们的基本信仰。事后，刘良模随即向上海市宗教事务局的领导汇报了情况。[177]政府和三自代表对控诉大会的混乱进行了分析和判断，并将矛头指向了倪。[178]随后，上海教会再也没有举行过控诉大会。[179]上海教会和信徒认为，控诉运动实际上是针对圣经和他们的信仰，因此拒绝参与三自运动；而政府则认为上海教会的信徒不愿接受思想改造，并计划破坏党领导的控诉运动。双方的关系急速恶化。

总体而言，中国政府将控诉运动视为改造中国基督教（三自革新）的唯一途径，也是给每个基督徒和教会领袖的当前政治要求。在上海教会展开控诉运动时，因着倪和其他领袖们以“早已实行三自，与帝国主义早没有经济及组织联系为由”，他们对控诉运动消极抵制，或只避重就轻，不够深入地控诉。作为全国最大的本土基督教团体之一，在上海的地方教会抵制参与控诉运动被视为严重的政治罪行（“反革命”、“反动”），政府绝对不会对他们宽容。倪与他们的被逮捕只是时间和罪名的问题。但为了统战争取多数人的支持，并减少打击的范围，政府先将矛头只对准倪。此外，政府和三自转而采取另一种策略—发掘内部少数“积极分子”，以发动羣众以“由下而上”的方式，深入展开控诉运动。[180]最后，选取的“积极分子”主动配合政府，控诉了教会领袖并取代了原有的领导层。根据在南京和上海的控诉经验，政府指出，要继续展开和深化控诉运动，在过程中要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藉他们发动大批信徒群众，让他们在政府支持下取代现有的教会领导层后，才能着手成立三自分会。[181]

由于倪的一些亲属曾与旧国民党政府有往来，他也不愿与来华宣教士、海外基督徒以及去台湾的同工划清界线，没有迹象显示新政府就对倪有任何信任，并将他列为可以合作的对象。在控诉运动初期，政府似乎对倪持观察的态度。中国基督教学者李榭熙指出，早在建国初期政

府就留意到地方教会的迅速发展，对此充满怀疑和怨恨，并密谋计划对付倪。[182] 据张锡康回忆，政府要求基督教传道人参与控诉以展示其政治立场，而当控诉运动在上海教会展时，政府要求倪控诉他的同工如已去到台湾的李常受等人是帝国主义分子，但倪都不肯。[183] 从中共的统战角度来看，倪与政府和三自的关系已经不再是“人民内部矛盾”，而是“敌我矛盾”。[184] 根据宗教教事务处编的《宗教情况通报》，到了1951年11月，倪已被官方锁定为“反动分子”，“以宗教为掩护，进行各样反动的活动”。[185] 官方对倪的调查事实上已经展开，这可见于同月《天风》刊登的一份调查报告，该报告把倪定性为政治罪犯，指责他通过控制全国各地的教会和散播反动言论来破坏土改运动。[186] 在政府看来，地方教会领袖们不但早前拒绝登记接受外援资助，又不承认与帝国主义有关，他们是各样当前政治运动的思想“落后分子”；现在地方教会的信徒们又消极抵抗控诉运动和思想改造，而政府认定倪更是抵抗背后的指使者，必须迅速除去，才能叫革新运动继续深入展开。此时，倪已成了控诉大会中被公开控诉的对象，这些控诉也被官方和三自媒体广泛报道。[187]

当倪的一些同工们在观望他将采取何种自卫行动时，倪回忆起神在他生命中的好几次熬炼，其中对他个人的攻击、误会、诬捏等，他每次都不愿为自己伸冤，而看为是从主而来的打击和祂的旨意来剥夺他。他愿意顺服主的旨意而受苦，好为着结出更多属灵的果子。[188] 倪大概在这前后时候所创作的诗歌《神，你正在重排我的前途》反映他当时的心景并暗示他已预备好他前途的“重排”，如第一、三节说：[189]

神，你正在重排我的前途，你也正在拆毁我的建筑，
忠心事奉的人日少一日，误会增加，清白逐渐消失。

如果你的旨意和你喜乐，乃是在乎我负痛苦之轭，
就愿我的喜乐乃是在乎，顺服你的旨意来受痛苦。

三、基督教界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

随着控诉运动不断深入，政府要求基督教界加强政治学习，尤其在教会内进行思想教育，以支持控诉运动，实现基督教的全面改造（三自革新）。政府认为基督教领袖的思想程度比一般基督教徒更为落后，因此需要透过有系统的学习，持续不断的教育和灌输，以培养对政府基督教政策的支持和拥护态度。三自筹委会于1951年11月在上海举办了为期三周的第一届三自革新运动干部学习班，培训了一批青年积极分子，旨在在全国推动学习和改革工作。[190] 学习内容包括国内外形势和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等两大单元。[191] 1952年1月5日，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常委会发布了〈关于开展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特别针对各民主党派、工商界和宗教界进行思想教育。[192] 学习内容包括学习理论（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学习政策（党中央的重要政策文件）、整风（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自我教育和改造）。政府决意对基督教界人士进行彻底的思想改造，并结合当时的三反五反运动。[193] 在此之前，中共中央于1951年11月30日已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全国所有学校在一至二年内对教师和学生进行思想改造，并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

[194] 这份指示发布后，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在全国各地的学校全面展开，并逐渐扩展到全国基督教界。

四、三反五反运动

在基督教界控诉运动深入展开期间（从1951年底至1952年中），中共中央先后发动了“三反”运动和“五反”运动。“三反”指“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针对国家机关和企业，主要打击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五反”指“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骗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针对私营企业实施，主要反对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窃国家财产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行为。[195] 这两项运动具有极强的道德批判性质，旨在揭露和打击社会中的失德和犯罪行为。运动的发动和组织者刻意营造了道德批判的氛围，对任何失德和犯罪行为都加以鄙视。[196] 运动最初动机是由于朝鲜战争导致的财政困难，再加上党内贪污腐化和官僚现象的揭露，引发了对新政权前途的担忧。[197]

根据毛泽东的说法，“三反五反”是要“清洗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198] 1951年12月，中共中央陆续发布了《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和《中共中央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正式启动全国范围的‘三反’运动。[199] 随后，毛泽东将斗争对象扩大至资产阶级，于1952年1月26日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各大城市在二月上旬，依靠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进行大规模的“五反”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三反”斗争。运动很快在各大城市展开，并迅速成立了“打虎队”。

正值韩战急需经济物资，毛泽东因此视这运动为机会对城市工商阶层实施经济掠夺，从国家机关和单位开始，逐渐扩展到私营企业。运动结果导致全国范围内私有工商企业的消失，转变为公私合营，为日后对资本主义的改造和完全公有化奠定了基础。[200] 运动过程中，私营企业家被迫交出企业，加入公私合营，许多坚强的企业家面对巨大压力，纷纷自杀。[201] 运动使用了许多折磨和侮辱人的方法，成千上万的人被冤枉，许多被斗争的对象自杀，甚至有全家自杀的事件发生。[202] 运动期间，全国各地弥漫着恐怖气氛，许多人因此自杀。根据当代历史学者谢泳的研究，自1952年2月中旬以来，各地出现了大量自杀和神经失常的事件，上海单单就有上万人自杀，其中以跳楼、跃江、触电、吊颈等方式最为普遍。[203] 3月25日，上海市长陈毅宣布上海正式启动“五反”运动。尽管官方确定了斗争政策，但在运动开展后，资方违法数额往往被夸大，而资方则几乎全部配合，甚至自愿加罚款，毫无抵抗。盗窃国家资财的罪名容易出现扩大化，因为缺乏明确的法理依据。[204] 5月下旬，运动基本结束。在此期间，上海共查处老虎超过9600人，仅在3月下旬至4月上旬，每天就有7名工商户自杀。[205]

自中共中央发出参与打倒“大老虎”（大贪污犯）的号召后，1952年2月6日，三自筹委会也号召全国基督徒积极参加“三反五反”运动，以爱国爱教的姿态投身到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206] 隔日（7日），三自筹委员在基督教青年会召开动员会议，邀请了144名上海各基督徒团体的牧师参加。会上呼吁牧师们在各团体中动员信徒参与“三反五反”运动，揭发“大老虎”的贪污行为，并转载了天津官媒揭发的一些基督教界人士犯下“五毒”罪行的检举材

料。这些人士在教会中担任过重要职务，包括木商业界的王伟生、阮渭泾等，以及医药界的雷爱德、诸葛文屏等。[207] 在上海被打击的基督教“大老虎”包括上海伯特利医院总院的医务主任梅国桢及其舅母石成志院长，以及上海才记锯木厂的资本家李能才。[208] 《天风》转载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的报导指出，梅、石二人坦白承认群众检查时发现的价值一亿多港币、汽车等财产，又被医院的增产节约委员会检查组揭发了价值二亿多港币的药品器械、医疗用具、电影拍摄器材、黄金和美钞等。[209] 虽然表面上梅、石及李三案皆因劳资纠纷引起，但从“三反五反”运动的目的来看，中共利用这些案例将私人财产收归国有。《天风》引用这些案例作为代表性，因为他们具有显著的基督教背景，用以警示信徒发表反共言论及抗拒三自革新运动可能带来的后果。[210]

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以经济罪名被捕的其中一位牺牲者乃倪柝声。[211] 早于1934年11月，从上海圣约翰大学硕士毕业的倪柝声弟弟倪怀祖，与他父亲共同出资创办了生化药厂的前身“上海综合化工厂”。在此基础上，倪柝声创办了著名的“中国生物化学制药厂”（China Biology & Chemical Co.），简称“生化药厂”。这家中日战争时生产药品的企业，日后也因抗战而闻名。[212] 生化药厂的申请登记书显示，药厂最初于1937年7月设上海华山路，正值抗战时迁香港，后迁澳门。其后于1940迁回上海华山路，生产药品供国、共两军使用。[213] 起初倪因着家人的请求，帮助弟弟作生意，后来感到借此可得些利润供给教会和同工的需要，就着手经营，也雇用一些信徒在药厂工作。倪从作生意赚得的利润供给同工和信徒的需用外，后来还用于购置福州鼓岭山的训练中心、福州市海关巷执事之家，以及上海南阳路聚会所之地。然而，因着有这生意的牵连，加上有些在药厂工作的信徒不满，最后在上海教会中掀起风波反对倪，使他从1942年起不能公开尽职六年之久。[214] 1942年中日战争期间，倪在重庆开办生化渝厂（即重庆化工药厂），战争结束后迁回上海。1948年，在上海教会的复兴聚会中，倪也身体力行把药厂奉献出来给教会。[215] 1950年，倪回上海后在教会名义下增办一家生产颜料的工厂（翠华化工厂）和以琳印刷厂。1950年，在新政权所推动的公私合营运动中，政府下令将中国生化制药厂并入国营沈阳东北制药总厂，由倪担任工厂管理委员会主任。[216]

在三反五反的浪潮中，政府要求倪交待与其有关的生化事业，而期间以琳印刷工厂中的信徒工人与教会领导之间的矛盾也被三自筹委会挑拨起来，一些工人群众起来以经济罪名控诉倪。[217] 倪大概已预感自己自由的时日不多。在与他妻子张品蕙、同工和上海长老们商量后，倪决定专心于为信徒准备圣经资料。李渊如姊妹及她的助理们协助编辑他所讲道的内容。在面临生死关头时，他们努力争取时间，从白天工作到深夜，甚至每天仅睡两小时，详述和记录神的话语，一直到1952年3月。[218] 1952年4月10日，倪于上海江西路“生化药厂”办公处内被东北沈阳公安人员逮捕并押往前往沈阳，所有相关企业亦被政府充公。为争取大体的会众，政府和三自都封锁了倪被捕的消息，除了上海地方教会的领导层外，大部分信徒都是在数年后才了解这一消息。直到1956年2月，他以经济罪名被起诉之前，政府并未公布任何他的起诉和判刑。[219]

关押期间，倪被禁止与任何外界通讯。我们难以得知在那失去人身自由的四年期间，倪遭受怎样的对待。丁抒的《阳谋》第二章有关于“三反五反”运动中，毛下了在各地打老虎的指标，以及各地运用了1942年延安整风来对付斗争对象的手法，包括点名批判、逼供信、吊打关押、威吓利诱、车轮战术等。[220] 地方给中央的报告也承认，在反贪污斗争中使用逼供、肉刑和变相肉刑（例如罚跪、挂牌子、“打排球”（一种酷刑）、吊打等等）。[221] 倪在五反审讯期间所受的遭遇大概与此也相差不多。那时有消息传出，中共官方在倪入狱后将提出两项要求。第一，以书面认罪的方式公开放弃信仰；第二，无条件与政府合作，并在三自组织中担任要职，作为恢复其人身自由的条件。[222] 假若这消息属实，倪没有获释表明他并没有否认信仰。

在1952年年初起，中央基本上已把地方教会定调为反动组织。在1952年2月一份西南局统战部给中央的报告中称：

该会（小群）诡称系地方性教会，与帝国主义无关，拒不登记。过去一直打不进去，在这次三反运动中，在内外群众压力下，内部已起分化，经过小会、大会坦白检举，已发现它显系着重隐藏在工商业中的圣母军。[223]

报告把地方教会形容为几个特征：（一）组织严密，不仅类似（天主教）“圣母军”，并似“一贯道”。组织上有层层的核心，以倪柝声为全国的首领；（二）活动与国际间谍有关系，内战期间曾联系外国人；（三）经济充裕，该会设生产机构，购置房产作聚会之用；（四）内战后期（1947年），该会有曾提出“把全中国打下来”的口号，并拟“移民计划”。又曾在高等院校号召信徒、学生“交出来”，又骗引学生到台湾及国内各地去；（五）解放后一贯进行反动宣传，抵抗展开三反运动。报告最后称，现在该会已出现了七八个积极分子，中间分子看见教会黑暗情形已逐渐倒过来，顽固集团表面上不能不向群众低头。

同年（1952年）5月，中南局宣给中央的报告中，亦称在“三反运动中发现基督教反动的『小群会』组织，另缴获一部发报机”。[224] 7月，华东局宣传部基督教徒对三反思想改造不持积极反对态度，但其中小群派则较反动。[225] 8月，中共中央给各地〈关于教会革新运动不用三反作口号〉的指示中表示，在各地贯彻执行三自革新运动中利用“三反”口号，在教会内开展“三反”运动，把“三反”与“三自”运动结合起来以发动教徒群众是不妥当的，因为这也会使教会中反帝爱国统一战线发生了程度不同的混乱现象。该指示又表示：

今后一个时期内，在教会中深入三自革新运动，应按照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的规定，开展学习共同纲领运动，在此基础上要求教会神职及其他工作人员进行交代帝国主义的关系。在交代关系中，进一步有领导、有控制地发动教徒群众打击少数与帝国主义有联系的分子。他们如有贪污行为，并确实有据，应予揭露和处理，藉以进一步打垮其势力与影响，而使广大教徒群众一致站到反帝爱国的旗帜下来。真正反帝爱国的革新分子，如有贪污行为则应实行内部交代，保护过关，或挂一笔帐即可。

你们已有计划地开始对基督教徒聚会处（小群派）的斗争，这是必要的。对其所经营的工商业，用“五反”口号，从经济入手去打击他们，也是正确的。但不能用“五反”的

口号去对付“基督徒聚会处”。倪柝声案的公布时间，尚待中央公安部研究，华东可不等等待这个决定，按照自己的情况，决定斗争的方法和步骤。

……

你们对山东马庄耶稣家庭的斗争是成功的。望速将总结报来，并望扩大宣传，以推动教会中的反帝爱国运动。

上海对天主教的斗争计划，望向中央作一专门报告。[226]

这份指示看出三点：一是中共中央视地方教会、耶稣家庭和上海天主教视作此时同一阶段的斗争，而地方教会是全国性的。二是，中共中央欲把三反五反运动的打击面限制在其个别领袖，而非整个团体，避免连一些积极的革新分子也成为斗争对象，好扩大统一战线。就算那些反帝爱国的革新分子有贪污行为，只要内部交代，亦可保护过关或挂一笔帐。由于拒绝在教会内部开展“反帝爱国运动”，政府从经济入手去打击倪，不过是在地方教会中展开政治斗争的切入点而已，重点根本不在于是否有经济犯罪。三是倪案是由中央公安部处理，这显示政府将其非视为仅限于地方性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重大事件。

在三反五反之前后，除了地方教会的领袖倪被捕外，几个代表性案例展现了当局整肃基督教人士和团体的行动。其中包括北京灵恩派真耶稣教会的领袖魏艾萨克被捕，山东马庄的耶稣家庭被解散，天主教圣母军被打压，以及上海中华基督教会的牧师黄渔深被开除教籍。这些团体在当时被视为全国三个最大的本土基督徒团体，其领袖于1951年底陆续被捕，其会众逐渐被纳入官方的三自会体系。[227]

肆、肃反运动（1955年7月至1960年9月）

1955年，中共发动了一场新运动名为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简称肃反运动），旨在清除暗藏于党、政府、军队以及各界中的“反革命分子”，可视为延安整风运动的延伸，以及1950至1953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延续。[228] 1954年至1955年，发生了多起“反党反革命”案件，包括“高岗、饶漱石反党事件”（简称“高饶事件”）、“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简称“潘扬事件”）、“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简称“胡风事件”），毛泽东认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进展，阶级斗争必然日益尖锐化和覆杂化”，不仅党内，全国各类机关也存在许多反革命分子，因此决定在全国范围展开“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229] 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展开清查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展开清查工作。[230] 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规定了各机关中清查打压的比例为百分之五。[231] 该运动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分批进行，历时两年多，至1957年底基本结束。运动后期，中央曾强调会认真检查，对于错误的打击、逮捕、拘留和判刑进行辨别和平反工作。然而，由于1957年夏季后右派斗争扩大的影响，甄别平反工作基本上被搁置。

为了领导肃反运动，中央成立“中央肃反五人小组”（1957年7月扩大为中央十人小组），作为肃反运动的最高机关，领导全国各省市县直到每一个基层单位的“肃反十人小组”（人

数或有增减），对付暗藏在各界各阶层的“反革命分子”。[232] 肃反小组的组成通常是党委第一或第二书记，公安部代表，检察机关的代表，相应的党委组织干部，宣传部干部。7月11日，三自委员会的官方刊物《天风》周刊发表社论《加强团结，明辨是非》，称王明道是“中国人民的罪，教会的罪人，历史的罪人”。[233] 作为全国性的基督徒团体，地方教会自然也成肃反运动的目标。在倪被秘密拘留后，全国地方教会的领袖成了肃反运动的整肃对象。在一份由中央十人小组转发全国各地的肃反小组的政策文件，明言指基督徒聚会处，又名“小群”是“在帝国主义直接影响和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一个为反革命分子操纵的教派”。[234] 为了收窄打击面，达到最大的统战效果，政府把打击的对象界定为“上层反革命领导”以及其中一切的“反革命分子”：

我们打击的对象是“小群”的上层反革命领导和隐藏在“小群”中的一切反革命分子，即是打击在历史上有严重反革命罪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和披着宗教外衣，利用公开、合法的身份而进行各种反革命破坏活动（如搜集情报、盗窃机密、制造反革命谣言、写反革命标语、组织反革命小集团、破坏社会主义各项建设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及其他坏分子。[235]

1955年10月，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领导肃反运动的中央十人小组组长陆定一（副组长是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在与当时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帕维尔·尤金（Pavel Yudin，1899—1968）的一次谈话中，提到该运动仅头四个月（到1955年9月）就已审查了222万人，其中有约17万人与反革命活动有牵连，揭露出11000个反革命集团和小集团，逮捕了7550人，过程中有4239人试图自杀，其中1920人死亡。[236] 毛泽东表示，《在肃反工作中的路线是群众肃反的路线》，在肃反过程中，政府的公安部门会通过举办《罪证展览会》等各种方法，以鼓动群众对反革命分子产生仇恨情绪。[237] 配合使用这些方法，在基督教（更正教）方面，政府于8月宣称破获了“王明道反革命集团案”，而在天主教界方面，则于9月破获了“龚品梅反革命集团案”。这些相似方法也用于紧接着的倪案。

一、全国公安部报告（1955年8月）

1955年8月，一份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238] 第一局编印的调查报告，名为〈基督徒聚会处（小群）概况〉，[239] 文件开首形容“基督徒聚会处，又名“小群”，自称“神在XX地方教会”或“地方教会”，系基督教属灵派中新兴的教派。自建立之日起，因采取了瓦解其他基督教派以壮大自己的办法，一直与其他教派矛盾很深，而被视为“偷牛拉羊”之“邪教”“。[240] 关于当局指控倪的罪行一段，文件指在抗日战争时期，倪因失德及独吞国外教会津贴而引起李渊如等上层分子的不满，其内部趋向分化，一度表现消沉。但对外却声言：因倪经营企业，灵性堕落，为其掩其丑恶面目。倪则被迫暂离教坛，全力投入经营企业。并勾结蒋匪高级官僚和特务分子，奔走内地进行商业活动。”[241] 文件指“三十余年来，基督徒聚会处在倪柝声的积极经营下发展极速。目前已成为中国基督教属灵教派中有教徒众多，分布面广，实力雄厚的一派。……约有聚会处870处，教徒八万余人。”[242]

报告罗列当时全国十三个地区共十七名地方教会负责同工的名单，以及共169名的“上层分子”，指控其中在解放前有相当一部份是“蒋匪特务”等反革命分子，总共87人。[243]接着，报告又指控地方教会在“解放前后的阴谋破坏活动”，包括与“蒋匪保持联系”、在海外国内大力发展、“勾结特务间谍，进行情报活动”、“以“属灵”为藉口破坏反帝爱国运动，煽动教徒退出三自爱国组员”[244];又指控地方教会在1953年起，各地“反动活动又猖狂起来”，罪名包括“教徒发展很快”、“加强青年、儿童的宗教工作”、“积极混入我机关、学校、医院…内部，并不断向我党、团组织及基层干部侵蚀”、“向农村和边疆及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等。[245]最后，文件总结：

基督徒聚会处在以政治野心家倪柝声为首的上层核心集团中，潜藏有相当数量五方面的反革命分子和阶级敌对分子，他们一贯披着宗教外衣，对我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抱有强烈的敌视程度，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情况是十分严重的。[246]

二、中共中央的打击命令（1955年11-12月）

同年（1955年）年底中共中央从“中央宗教工作委员会”接收了一份于11月24日的报告，题为“关于打击隐藏在“基督徒聚会处”中的反革命分子问题”。[247] 12月25日，中共中央表示同意此报告，并转发此报告到上海局，以及全国各省市市委和党委机关，下令立即遵照执行中央的打击命令，务求于明年（1956年）2月召开的政协会议上能够汇报工作成果。报告共有十大点，包括如下：首先，指控地方教会为“在帝国主义直接影响和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一个为反革命分子操纵的教派”，它在“个别地方发展相当迅速。各地教会的领导权大多操纵在反革命分子手中，在教徒中也隐藏着相当数量的反革命分子。”其“领导核心，事实上已成为一个反对人民政府，破坏国家建设、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集团。”其次，透露在为了组织这一场斗争，分别于1955年8月27日和11月15至18日，召集几个重点省、市的管理宗教工作和侦察工作的同志来京汇报工作情况，并确定积极进行准备工作，并打算12月下旬“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重点的发动一次对“小群”内反革命分子的集中打击，争取明年一月底前告一段落”。命令强调斗争的总任务是：彻底摧毁“小群”反革命领导集团，肃清隐藏在“小群”中的一切反革命分子。大张旗鼓地揭发“小群”中反革命分子的罪行，广泛、深入地开展对教徒的爱国主义教育，大力争取上层分子和团结广大教徒群众，逐步地把由反革命分子操纵的教会变为从事正当宗教活动的爱国教会。”，而逮捕打击的主要对象是“（一）帝国主义与蒋匪的间谍特务分子；（二）隐藏在“小群”中的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三）坚持反动立场进行现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248]

这次斗争的策略是“对坚决的反革命分子要逮捕法办，对于可捕可不捕的反革命分子不要逮捕，可以用传讯和发动群众斗争的办法予以打击”，以“更加主动和有利于分化敌人，争取上层分子和广大教徒群众”。斗争的重点是：（一）“小群”中心教会的所在城市，如上海、福州、温州、长春、汕头、北京、西安、兰州、武汉、重庆等；（二）“小群”活动的主要地区，如浙江、福建沿海等省；（三）国家机关、学校、医院、工矿企业等部门。对于“小群教徒”的策略，“先应发动群众，广泛的揭露“小群”内的反动活动，进行充分的说理斗争与思想瓦解工作，争取其内部起义。只集中打击少数坚决的反革命分子，大力作好争取多数落后教

徒工作。”“对确有转变的“小群”骨干分子可以留在一般部门继续使用;对仍然坚持反动立场的“小群”的骨干分子应坚决清除”。[249] 命令重申:

在斗争发动的同时,必须使正常的宗教生活不致中断。必须事先或在斗争过程中,有计划的争取一些上层分子。我们应坚决支持“小群”教会中的爱国的上层分子,及愿意靠拢我们的上层分子,出面主持宗教活动;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即使是中间的落后的上层分子,也应该让他们出面进行正当的宗教活动。这个问题解决得愈早,解决得愈好,就愈对我们有利;同时更能促进其内部分化。在全国镇压反革命、特别是打击了王明道、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的声势下,“小群”内部发生动摇,某些上层分子表示要站到爱国方面来,靠拢政府,这种情况对我们很有利,不管其动机如何,均应当加以利用,进行分化争取,以扩大基督教的反帝爱国统一战线;但对其中的坏分子,应提高警惕,在发现他们进行破坏活动时及时予以打击。[249]

命令强调宣传工作在斗争中的重要,“在斗争中对教会内外广大群众的宣传工作必须做好。必须广泛动员社会舆论,充分揭发敌人的罪恶,驳斥可能产生的一切谣言、谬论,大力宣传宗教政策和肃反政策,以逐步澄清教徒群众的混乱思想,提高他们的爱国主义觉悟,划清敌我界限。必须发动基督教各教会的教牧人员及教徒参加这一斗争”。斗争结束后,要继续由公安部门拟出计划,以“有计划地、秘密地控制“小群”教会的领导,适应今后长期斗争的需要,必须加强对“小群”的秘密侦察工作的建设”。为确保这场斗争“彻底胜利”,“各主要地区应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组成临时的指挥机构,加强公安部门与宗教事务部门的密切配合,并动员各有关机关参加”,“各地对这次行动必须绝对保守秘密”;如有违犯,受严格的党的纪律制裁。[250] 全文请见本部分附件(一)。

三、于上海执行打击命令(1956年1-3月)

照着中央的打击命令,1956年1月中旬开始,全国各地公安部与宗教事务部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一同行动,陆续以“反革命”罪名突击拘捕全国各地的地方教会主要负责人,并紧接着全面的控诉大会、铺天盖地的宣传,以及思想再教育工作。[251] 政府的肃反斗争手段主要体现在以下七个步骤:(一)突击上门逮捕那些被认定为“上层反革命分子”(同工、长老),而未被逮捕、视为可争取过来的同工、长老则被隔离审查并交待“问题”;(二)其他教会带领者(执事们)则被要求出席和参加由三自人员主持的思想教育;(三)一般信徒被要求参观“反革命罪行展览会”和各种“学习讨论”;(四)在各大专院校、医院的青年信徒则要求接受思想教育和交待问题,然后组织他们参观展览会和参加控诉大会;(五)经过密集式“学习”后,召开大型群众的控诉大会;(六)组织青年中的执事、同工中的“积极分子”取代原有领导层,并成立“信徒学习委员会”,继续领导信徒学习政治;(七)利用媒体作宣传和思想工作,包括全国各地报章、三自刊物《天风》、教会肃反后出版的刊物等作详细报道,转载控诉文章。[252] 政府于上海教会的整个肃反运动从1956年1月29日起计至3月底信徒们肃反学习结束为止,历时约三个月。[253] 以下按时序展示政府于上海教会展开的肃反斗争手段。

首先，1月29日晚，上海公安局在文德里逮捕了地方教会在上海的同工李渊如、汪佩真、张愚之、蓝志一四人，同时还拘捕朱臣、陈本微、孙凯、初立明、李铭亮等一共30人，都关押在南市车站第一看守所。[254] 当晚公安又另押俞成华、唐守临、任钟祥、左弗如（1902—1979）等到南阳路会所进行隔离审查，以争取他们投入控诉行列。俞一直拒绝交待，被押到监狱拘留所日夜多番审查，并于两个月多即逝世（相信是被逼供而折磨而死）；[255] 而唐、任、左则加入了控诉行列。[256] 接着翌日起，倪被全国官方的媒体报章指控为“反革命分子”，以“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的罪名被煽动之群众大会中公开控诉。

接着，1月30日，上海全市各单位通知上海教会信徒参加学习，然后下午参加由上海市政府宗教事务处在天蟾舞台大礼堂召开的控诉倪柝声和上海教会带领者的羣众大会，共有2500余人参加。[257] 大会由上海市宗教事务处处长罗竹风（1911—1996）主持，再由市公安局副局长卢伯明通报“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宣布刚“破获”了“倪柝声反革命集团”，并首次提到1952年4月10日倪柝声被捕的罪状。然后再副市长许建国[258] 阐明国家的宗教政策，并号召广大基督教徒走“爱国爱教”的道路。[259] 在副市长发言后，政府特别安排了一名在南阳路聚会的上海第二医学院学生许梅骊（1933—），起来发言公开控诉倪和上海教会的带领者。[260] 许梅骊当日的控诉全文，随即刊登在2月2日的党媒《解放日报》及2月20日的党控制的《天风》杂志上。[261] 许控诉结束后，还有其他人也站起来控诉，包括陈见真和刘良模。[262] 1月30日下午举行控诉大会的同时，上海公安人员进驻南阳路145号聚会所，翻查执事室的信徒通讯簿、账册、文件、记录等，同工室则检查福音书房的出版物。同时，由公安局、宗教事务局和三自组成的“上海基督徒聚会处肃反检查队”也到场，其队长是“生化厂五反检查队”的邵洛羊（1917—2016）。[263]

2月1日，上海党媒《解放日报》首次刊登了倪柝声被捕的官方报道。[264] 同日（2月1日）和2日连续两晚，上海市政协静安区召开了扩大会议，有八百多人参加。会议上谴责了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发言者包括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局长刘毓秀、培进女子中学校长端木露西（原名端木新民，1912—1995）。在会上，基督徒聚会处的教徒张振华、常琪愤怒地“揭发”了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破坏三自爱国运动、破坏土改、毒害青年的许多罪行。长宁区委员会也于2日下午召开座谈会，有四十余人出席，一致支持政府依法逮捕反革命分子，并要求政府严惩不贷。[265] 同日（2日），上海市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在怀恩堂举行了一次扩大会议，由上海三自主席、中华圣公会主教院主席陈见真主持，有八百多人到场。在会上，有上海灵修院院长贾玉铭、上海灵工团监督竺规身等发言，并通过了肃清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的决议。[266] 2月3日晚间，政府和三自在南阳路聚会所举行了一次规模庞大的群众控诉大会，除了当地二千多信徒被要求参加外，还有其他各地和各宗派教牧人员、三自工作人员等共约四千人。控诉者的控诉文必须经过肃反队长邵洛羊审查后才能上台控诉，当日共有十人上台控诉：刘约翰、许梅骊、张主怀、左弗如、郭孩真、乔静文、范在甲（生化工人）、陈说如、张振华和张锡康。这些被视为控诉得好的控诉者被吸收加入“信徒学习委员会”。[267]

从2月1日至5日起，上海党媒《解放日报》连番刊登以信徒署名的控诉文章，控诉地方教会和其领袖，尽管许多记载都不符合事实。[268] 从2月5日以来，所有在上海的牧师与福音工人

，被组成许多学习小组，向各处的基督徒宣扬倪柝声的罪行。所有在南阳路的聚会除了主日崇拜外都一律停止，等候官方特别的指示。[269] 为了指导群众学习，2月6日的《天风》杂志，以标题为《赶出教会中残暴的狼》的社论，并花用11页的篇幅来宣传倪案。[270] 从2月起多期全国性的《天风》周刊均以倪柝声反革命集团为题作各方面详细报道，并转载多篇控诉文。上海市三自又自2月起不定期出版《学习通讯》，传达及报道政府对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的处理。[271] 政府的思想教育工作一方面以上海教会的执事为教育对象，另一方面以信徒为教育对象。一方面，由上海宗教事务处处长罗竹风于2月9日在南阳路聚会所主持了一场“全体执事大组学习会”，强调政府的方针是“将被蒙蔽、被欺骗的信徒与反革命分子完全分开”，并鼓励执事们“解除顾虑”，“勇敢揭发”反革命分子的罪行，以证明自己的爱国觉悟。[272] 另一方面，政府组织全体信徒，分区进行由上海市三自人员主持的“学习小组”，学习由政府提供的材料。[273] 接着于2月22日，在南阳路聚会所举行一场“全体信徒控诉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罪行大会”，组织了本地和外地共三千人出席，由副处长陈一鸣发言并重申政府的立场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方针。[274] 这些不断紧接着的宣传攻势和思想工作印证了早前政府内部文件中所指筹备多个月和精心部署的争斗行动。

为进一步打击地方教会“上层分子”，尤其倪的个人诚信，上海市公安局从2月8日起，举办“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罪证展览会”，除了组织本市信徒还有外地信徒参观，官方宣称组织了1.3万多人参观。[275] 会上展出声称属倪所有的黄色书刊为“罪证”。据曾前往展览会、熟识倪字迹，以及打理倪图书室的张锡康说：

这些“证据”主要根据一张小小的纸头，上面说是倪写的供认他犯罪的亲笔供词，字迹像蟹爬，一点不是倪的字迹。我当时就向上作同志反映说，这不是倪本人的字迹。工作同志回答说，这是倪生病时写的。我回答说，连生病也不是这样的字迹。我在生化药厂一段时间，对倪的字迹很熟识，一看就知道那不是倪本人写的。除此以外，展览会中摆出一些中文书籍，书面签上倪柝声名字。我一看也认出这不是倪的笔迹。因为倪的书我亲自整理，他都是以倪述祖签名，从来不以倪柝声签名的。至于报章上说的淫秽画册，我都没有见到；而所谓的淫秽影片，只是一张没有头的背面小底片，看不出是什么人。[276]

1945年太平洋战争胜利，美国为帮助中国恢复元气，就由美国军队在上海设立“善后救济总署”，简称UNRRA，运来许多物资，吃的、用的都有。上海是一个海港，美军出入很多。到晚上许多美军去找妓女院嫖妓，更有许多不法商人将许多英文污秽书籍在马路边设摊出售给美军，江西路生化办公室附近也有污秽书摊。这在1947年最盛，但在1948年我进生化办事处时，没看到倪房中有任何这一类。至于1956年2月展出的倪罪证展览会的，都是旧的中文书，上面已签了字，这些旧的从哪里来的呢？我是常跑旧书店的，从未见过这些书。[277]

就在上海聚会处内刚展开肃反运动时，于1956年1月30日至2月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于北京举行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上，时任全国政协（第二）副主席的董必武（1886—1975）就目前全国正在开展着的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斗争的问题，汇报了肃反运

动在宗教界的成果，表示这些反革命分子披着宗教的外衣，以宗教团体为掩护，进行各种反革命活动。[278] 北京的阎迦勒出现在这会议上，担任委员和列席人员，他是肃反后原地方教会的唯一代表，被列于宗教界代表之中。[279] 阎在会议上也有发言，作了自我检讨，称过往受倪和他同工们的蒙蔽，但感谢政府的耐心再教育，赞扬“毛主席可爱”，表示自己已“苏醒过来”，现在“样样都看得清楚了”。[280]

四、控诉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之样板（1956年2-4月）

早于1951年下半年开始，在策划和筹备于上海地方教会展开的控诉运动过程中，政府暗中观察并选取了一些可积极参与运动的人。在全国肃反运动展开期间，他们在政府各种的威胁和利诱下纷纷与所谓的“反革命分子”划清界线，带头起来控诉。这些积极分子大多数原是当时仍就读各大专院校、参加过或仍在教会聚会的青年成员。[281] 政府有意地提拔他们，以在肃反运动后取代那些“反革命分子”成为上海地方教会新的“领导层”。[282] 在这些积极分子中，以当时在上海教会青年信徒中间带头的许梅骊（1931—）对肃反运动的参与最为积极一位，她亦以控诉倪及那些曾服事过她的倪同工而闻名全国，被后来的三自副秘书长曹圣洁（1931—）赞扬作控诉标兵。[283] 许的案例对倪案具有特殊的参考和研究价值。

许梅骊的母亲名叫汪韵仙，是圣彼得堡的信徒，经常到该堂参加礼拜。[284] 据许自称，她在1947年9月27日，16岁（高二）时受浸加入上海地方教会。[285] 她个性表现出强烈的表演欲，喜欢出风头。初中时期，她已在里弄组织剧团演出，展现出积极分子的特质；高中时期她曾担任女青年会国际礼拜堂的主席和主持人；上大学时担任团契负责人。[286] 在1949年至1951年期间，许在圣约翰大学期间投入学校里的团契事奉。[287] 1952年高校院校调整期间，上海圣约翰大学和震旦大学的医学院合并成立上海第二医学院。据许自称，1952年进入上海第二医学院后，她在教会里的青年工作属灵组事奉。[288] 1955年7月，全国肃反运动开始时，许梅骊刚结束上海第二医学院的医院实习就被隔离审查。[289] 据她表示，在数个月的隔离审查期间，当看到干部们给她展示倪柝声的各种“罪证”时，内心无法平息，愤怒难以控制，因此她的思想彻底转变。[290] 于是在1956年1月底政府在上海教会展开肃反时，她配合了中共政府控诉地方教会和倪柝声，甚至去到天津教会参与了对夏习灵长老的控诉大会。[291] 1957年初，她宣布放弃了信仰，因而成功毕业并留在上海医院工作，被分配到新华医院小儿科担任医师。[292] 此后，她申请加入共产党未获批准，可能是因为她出身倪柝声反革命集团，以及父亲身在台湾的历史问题。[293]

关于许梅骊的婚姻状况，据与许熟悉的同辈透露，在肃反运动前，她原与一名基督徒同学（高秉衡）订婚。[294] 放弃信仰后，许因“思想积极”（即积极拥护共产党的马列毛指导思想），就跟这名身在香港的未婚夫解除婚约，改与另一位非基督徒同学结婚，但后来她又因性格不合而跟他离婚。[295] 张锡康也指出在上海教会肃反期间，信徒产生两极分化，一端是只顾及属灵不顾政治，一端是只顾政治不顾属灵，后者一个典型例子就是许梅骊。张说：“带头控诉的许梅骊，后来和不信的人结了婚，之后离婚再嫁又再离婚，有二十四年之久放弃信仰，过着痛苦生活。”[296] 许自己把她第一次婚姻的失败，归咎于“时代的悲剧”，到1974年许再婚，但后来又是失败收场。[297] 对于许梅骊的两次离婚，林向途认为若以主耶稣的话休

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太十九）的标准而言，许的休夫另嫁也应在“犯奸淫”之列。
[298]

1980年代，许移民美国，重新开始医疗工作。[299]在否认耶稣二十四年之后，她声称恢复了信仰，但将当年自己的软弱归咎于倪柝声及其同工们。[300]她涉嫌偷窃张锡康借给她仍未出版的稿件，于2011年3月自费出版了《难混岁月》，其中辩护自己当年的出卖行为，继续控诉倪柝声，也导致张锡康翌年正式出版他的回忆录。2018年2月，许在从之前没有任何历史和神学训练的背景下，竟又以85岁高龄，将其著作补充大量历史资料并出版为《警钟长鸣》，继续进一步控诉倪和地方教会。假若她不是偷窃或得别人提供帮助，则不得不佩服她能完成该书的自学能力。[301]许的著作获得了前全国三自秘书、上海三自主席（1997—2002）曹圣洁以及香港建道神学院前院长（2005—2018）梁家麟的公开赞扬和背书。曹赞扬许在控诉和肃反运动展开期间积极参与众多委员会和会议，“勇敢地”控诉“倪柝声反革命集团”，并表达自己的“反帝爱国”立场。[302]许至少有四篇发言刊登于1956年2月至4月期间的上海及全国报章上。然而，出于某些不确定的原因，她却没有将这些文章收录于她两部回忆录中。[303]（四篇全文请见本部分附件（二））

在她其中一篇控诉演说〈我控诉〉中，许的控诉重点如下：（一）对政府破获“倪柝声反革命集团”表示高兴和痛快；（二）自称成为该集团毒害最深的基督教青年，并曾成为毒害青少年的帮凶；（三）控诉倪柝声和李常受在解放前将一批青年骗往台湾进行罪恶活动，因为他们是蒋介石的走狗；（四）控诉倪柝声叫信徒不参加抗美援朝，希望帝国主义重新奴役中国人民；（五）控诉倪柝声叫信表面上徒守规矩，但私下散播反革命思想毒素并抵抗爱国主义教育；（六）控诉“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的教导使她变得对祖国冷酷，甚至看到塔尖的红星就感到罪恶；（七）控诉地方教会在肃反运动开始时表现出的惊慌是为了掩盖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八）感谢组织上的耐心教育，使她最终觉醒；（九）指责反革命分子将青年丢进“冰箱”，使他们感到窒息和不自在；（十）对政府逮捕这批反革命分子表示支持，呼吁曾与他们在一起的人揭露他们的罪行，与反革命分子作无情斗争。[304]无疑，在政府看来，许是在青年工作中思想改造的一个成功样板。

五、肃反后的上海教会“信徒学习委员会”至联合礼拜（1956年2月—1958年8月）

上海地方教会经过政府和三自的改组，改由曾公开批判倪、后来加入了三自组织的唐守临、任钟祥负责。[305]紧接着2月3日的控诉大会后，上海肃反小组要求参与控诉的“积极分子”组织“信徒学习委员会”（简称“学委会”），其中也包括一些肃反期间已公开放弃信仰的人士。[306]这个委员会于3月4日在南阳路聚会所成立，其任务是按照上海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指示，带领肃反后的地方教会会众接受政治思想教育，并向三自定期汇报情况。加入这个委员会的有二十三人，包括：刘约翰（主任）、许梅骊（副主任兼秘书）、张锡康（办公室主任）、左弗如、乔静文、张主怀、范在甲、周逸民、王彰、张振华以及王镕竹等。[307]3月7日，学委会召集执事和各区信徒，举行座谈，教育群众。会上肃反小组队长邵洛羊赞赏信徒已与倪柝声反革命集团展开了斗争，但需要学委会进一步教育信徒，以解除他们信仰和良心的顾虑，才正式参加三自。[308]3月11日下午，学委会在南阳路聚会所召开全体大会，控诉了

倪柝声和汪佩真，表达了要求参加三自，通过了一封致全国各地地方教会的公开信，以及一封歌颂给毛泽东的信。[309]

同年5月起，这委员会开始出版一份以属灵为包装、政治为实的刊物，名《上海基督徒聚会处通讯》。[310] 至于上海教会肃反期间的“积极分子”许梅骊，除了参与了学委会，还参与了上海教会“肃清毒素小组”。这小组是在政府的肃反小组领导之下于上海地方教会内部展开的，其主要任务是消除所有福音书房的出版物（包括圣经、诗歌和其他属灵书报）中任何《有害于人民的利益和祖国的利益的思想》，以达到肃清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的毒素的目的。例子，《圣洁没有瑕疵》、《荒漠甘泉》。[311]

1956年3月（15至23日），全国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第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举行之时，政府已在北京肃清了王明道反革命集团，在上海也肃清了倪柝声反革命集团，三自爱国运动达到较大的团结，这个会议的一个主题就是要扩大团结至肃反后的地方教会，补选了北京的阎迦勒和上海的左弗如为全国三自会委员和常委，加入三位与会者，以及十六位列席者，以显示团结面比1954年的北京会议更加为扩大了。[312] 肃反后的上海地方教会有四位代表参加了会议：左弗如、刘约翰、许梅骊、乔静文。[313] 在会上，阎迦勒、左弗如、许梅骊以及李更新都有发言，批判了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的罪行，作了自我检讨，并表示要拥护三自。[314] 在1956年4月，为了预备加入三自组织，学委会举行学习班，并由左弗如、刘约翰、乔静文和许梅骊召集全体信徒，向他们传达学委会将在4月15日上午召会开议，决定要求参加上海三自。当日下午，唐守临为代表正式向到场的全国及上海三自，以及宗教事务处代表，宣读要求加入上海三自的公开信。[315] 上海教会在学委会的带领下正式加入三自后，同月底，《天风》刊登了一首署名为在南阳路聚会的信徒黄守奉，题目为基督徒聚会处站起来了的诗，内容是感谢毛泽东、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教会肃清了倪柝声反革命集团，歌颂毛和党的伟大。[316]

在肃反后，接受了思想改造的积极分子如唐守临、任钟祥、左弗如、许梅骊等，随即获得了大量在以宗教为名义的政治回报。例如，1956年4月，上海市政协第一届委员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许梅骊亦获得列席，有分发言，内容不外乎“向党交心”，赞扬政府破获了反革命集团，保证自己热爱毛主席和党国。她的发言随即刊于上海《解放日报》上（见附件三）。[317] 同年5月，上海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召开第二届代表会议，左弗如获选为上海市三自副主席，成了肃反后的其中一位新领袖。[318] 同年7月，上海三自在南阳路聚会所主办了全市基督教青年大会。出席那次大会的有上海各堂青年信徒代表1700余人，地方教会参加的青年信徒最多，有72人。作为积极分子的许梅骊，亦在上海市基督教青年大会中有发言。[319] 在一千七百余人的大会中，只有三十位青年获准发言，他们均“谈到自己的〔卓越〕成绩与党的教育培养分不开，同时，信仰也会产生积极的力量，因此爱国爱教是一致的。”[320] 1957年，全国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肃反后的北京地方教会代表阎迦勒在大会上也获得发言机会，题为“中国基督徒在一条光明的康庄大道上”，刊登于北京《人民日报》（1957年3月19日）上。[321] 1956年1月肃反开始后，上海教会已经名存实亡，原领导层被政府扶植、由三自监督像“傀儡”般的“积极分子”取代；到了1958年8月，政府正式要求上海各基

督教团体实行联合礼拜。[322] 上海容纳信徒最多的南阳路聚会所建成不到10年，就被迫献给国家，后来改建成了静安体育馆。上海教会正式名实俱亡。

倪柝声自1952年4月开始失踪，直到1956年6月21日出现在上海高等人民法院。这次审判是公开宣判的，但审判过程是非公开的，持续了五个小时。在听证会上，宣布他被自己的教会开除，并因犯下各种罪行被判处了十五年的监禁（于上海提篮桥监狱）和劳改，日期从1952年4月12日开始计算。他被定罪的理由包括在宗教内部组成了反革命集团，以及在生化药厂违反了经济管理条例。[323] 起诉书、报章和三自出版物《天风》上的道德指控没有列入判决书中，这些指控显然无法被证实。金灯台认为，所谓的宗教内部倪柝声反革命集团实际上是指他们不参加三自，不接受政府改造信仰，使信仰变质成为政治机构的附属物。至于经济问题，是根据新的经济管理条例来追究该药厂在该条例公布前的经营状况，甚至将国民党政府期间的账目按照新的税收法来核算。[324] 约百余人前往法庭旁听，但只有12位肃反后的地方教会人士（全为“信徒学习委员会”）获准参加旁听。许在自己的书中仅表示自己是当年一位“青年信徒”，然而为何她能获准参加只有少数人的审讯旁听？许能获准旁听，这大概只能由于许的身份是“信徒学习委员会”的一员，然而这身分许并没有在她的书中向读者透露。[325]

伍、洗脑、记忆和殉道

一、极权主义的洗脑策略和手段

近代思想改造（或洗脑）的历史源自行为主义（behaviorism）心理学，起源于俄国革命，后来在政治领域得到了最广泛的应用。[326] 为了巩固新生的政权，中共官方在这些群众运动中除了大规模使用了各种（语言及或肢体）暴力，导致数以百万计的人被处死，实施了多种手段，包括迫使人在小组中坦白和参加公审，造成千万计人极大的身体和心理创伤。[327]

“镇反”、“三反五反”、“肃反”等运动期间造成的冤假错案而被公开处决、自杀者不足话下。[328][329] 同时，全国性大量使用了思想改造手段，借着小组“学习”、羣众控诉大会，就算是幸存者也经历洗脑的后遗症，一些被洗脑者被植入洗脑者的“记忆”，一些则被消去原有的记忆。因此，在研究当代基督教在中国史时，对史料或证言选取尤其谨慎，其中一点关键考虑的因素是思想改造，例如史料是否由洗脑者所提供，用于思想改造某些人、作证言者是否曾经历过思想改造、经历过怎样的思想改造，以及思想改造后的情形等。在1950年代初，中共对全国人民各界的“思想改造”是与“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相结合的。按毛泽东的洗脑理论，在引导人们进行公开控诉前，必须搞通他们的思想。思想搞通了，才有正确的行动。而搞通思想的一种主要方式是借着没有选择余地、受暴力（肢体或语言）心理威吓的封闭式集体学习。对任何人，特别是基督徒而言，对某人进行控诉需要突破许多道德的底线和良心的控告，自然经过许多的思想挣扎。但在经过思想搞通了“醒悟过来”后，减轻了甚至完全放下了这些道德底线和良心控告，就豁然快乐地参与控诉。[330]

美籍精神医学专家利夫顿（Robert Jay Lifton, 1926—）的著作《思想改造和极权主义心理学：中国的洗脑研究》中，研究了在1954年到1955年间与25名欧美人和15名中国人面谈，

他们都曾遭到共产中国政府逮捕，进入集中营接受思想改造。利夫顿从面谈内容分析出当时中国洗脑的技术，具备了八大要素，可以简化为以下六项：（一）环境控制—隔离不仅中断了受洗脑者接收外界信息与人际接触的能力，连他们内在心思考方式都加以干涉管制。政治性的教义成了唯一的真理，其他一律否定。（二）神秘操作—党的代理人会以不同于常人的身份出现在受洗脑者面前，散发的神秘严肃气息，尤如宗教领袖的影响力，这些气息来自坚信一种崇高使命（如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三）要求纯洁—极权主义的洗脑者持非善即恶的二分法，受洗脑者往往受到罪恶感与羞耻感的苛责，学会自行批判自己不够纯洁，并透过批判自己而洁净自我。（四）彻底忏悔—受洗脑者争相告白自己的过去“罪行”，藉此净化自己并促进与受洗脑者的秘密团结。（五）理念至上—受洗脑者对理念视为至上，超越个人经验，不容质疑，并且限制受洗脑者使用的词汇，使受洗脑者的价值观和思想不知不觉间受到口号所控制。（六）极权主义洗脑者对受洗脑者握有生杀之权：作恶者必遭处死，要活下来的唯一方法是接受思想改造成符合洗脑者理念的人格。[331] 思想改造要成功，除了洗脑者单方面的操控，受洗脑者一方本身的意愿也是一个因素。若受洗脑者一方在恐惧气氛下感受威胁又或/及受到利诱，渴望与强大的力量融合为一体，这也促进了思想改造的发生。[332]

二、向斗争对象施予的道德罪名

这洗脑的视角或许能帮助我们更了解中共1950年代改造基督教期间对那些抗拒或抵抗改造者的加诸的道德罪名的性质。作为洗脑者，在中共对基督教界展开改造期间，公安和宗教事务部门透过举办“控诉大会”、“罪证展览会”以及党国控制的媒体宣传等手段，煽动群众对斗争对象（以“腐败分子”、“反革命分子”等名）的仇恨情绪。为了进一步损害斗争对象的信誉，他们常常编造和加诸其他的经济罪，尤其是道德罪名。在控诉运动中，那些不肯加入三自组织的领袖被指控为“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时也经常遭到人格污蔑，指责他们生活腐败，特别是在资产或钱财、道德方面（通常为男性）。这些道德指控有时会加入许多细节，目的是增加群众对政府指控的可信度。然而，这些指控都是由第三者（通常是官方或控诉者）提出，而不是“受害者”本人，而且在控诉运动结束后，往往再也没有这些“受害者”的消息。被思想改造者的控诉文通常具备以下四个元素：（一）首先会先“自我检讨”，然后表示懊悔自己过去被这些领袖所“迷惑”和“欺骗”，误解了党和政府；（二）但经过政府和三自组织的耐心“教育”后，他们才“醒悟”过来；（三）接着，他们就开始勇敢地“揭发”这些领袖的罪行，并表达对他们“愤恨”；（四）最后，控诉者会表达一番“感谢的话”，包括感谢伟大的毛泽东、政府和三自运动的“教育”，并请求他们为人民“除害”，“洁净”教会。同样模式也出现在倪案中。

有一篇自称为北京教会前成员的李文蔚在网上发表的文章中，作者指“在教会“肃反”中，共产党要打倒的人很多，有些人共产党恨之入骨，远过于对倪柝声。但共产党并未都给他们安上类似的罪名，例如龚品梅、王明道等。”然而，在数十年后，历史研究者较能以“上帝视角”研究中共在1950年代改造基督教的历史，并发现事实并不如此。早在1951年4月的北京会议期间，上海自由传道人顾仁恩就成为被政府打击的对象，被称为四大“教会败类”之一。顾的罪名除了政治外，还在他身上加诸了经济和道德方面的指控。在北京会议期间，政府已用

上各种思想改造手段进行过程，例如小组学习、“罪行展览会”和羣众控诉。因此，“顾仁恩反革命案”才被视为基督教控诉运动的“样板”。从1951年夏季控诉运动开始，许多基督教教牧人员因不同程度的抵抗三自革新运动而被“揭露”其道德问题，当时除了耶稣家庭的敬奠瀛[333]之外，还有中华基督教会上海闸北堂的黄渔深[334]、基督徒学生联合会干事徐超尘[335]、汉口中华信义会吕绍端[336]、丰富路信德孤贫儿童教养院院长马兆瑞[337]、郑州市基督教浸礼会牧师董子成[338]、南京泰东孤算院王克己[339]等人，均冠上了道德败坏的罪名。如果将1951年的“顾仁恩反革命案”视为一个“样板”，以上这些抗拒人物是“样板”的“复制”，那么倪的道德指控是否也可能是个“复制”？[340]

要进一步检视倪的道德指控是否也可能是个“复制”，可从控诉倪的道德指控者的经历来看。从中共改造基督教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为了顺利开展控诉运动，中共首先将所要打击的对象或团体分化，并在其中寻找“积极分子”，将他们隔离，然后对他们进行强制教育。在持续不断的强制学习和政治利诱的影响下，被洗脑者已没有机会接触外界的信息。在洗脑者施予的巨大环境压力下，被洗脑者的独立思考的能力受了压制，也无法自由地检视任何洗脑者提供的信息真实。在通过持续参与斗争和自我检讨后，最终被洗脑者的内心发生转变，接受政府的观点，成功地被重新教育。在经历“再教育”的转变后，他们不仅道德快速蜕化，还可能成为极权者的疯狂帮凶，或者变成政治运动中麻木的旁观者。[341] 这些被洗脑者的思想、内心，以及道德的转变反映了极权主义政治中的一种心理控制和社会操控手段。例如，李文蔚的文章中就描述了“积极分子”许梅骊被长期隔离达半年，接着内心转变的经过，连许自己也有详细的透露：

许自1955年夏天即在校内被隔离审查，长达半年之久，不得见任何人。……被隔离审查期间，她一直充满自信，坚强不屈。直到最后，当局才把倪道德败坏的证据摆在她面前。她受到极大震撼，如同自己的亲人做了丑事被人抓住，再也擡不起头来。她觉得自己受了最敬爱的属灵长者的欺骗，灵命因此失去平衡。[342]

早在1955年7月底，我就开始被隔离审查，不能越出校门一步。学校当局指定一位政工干部负责我这个案子。无论是白天或晚上，任何时间他都可以找我去谈话。我只能够“招之即来，呼之即去”。他们也指定班上一位共青团员形影不离地陪伴着我。当这个干部要找我谈话时，她就得跟着去。我回来后就在宿舍里写交代。[343]

我只是在重重压力下，从早到晚地思索、思索，再思索。而后，上海市宗教事务处的干部出场了。…他们几次威胁我，说要送我到监狱去。他们说：很多人一进了监狱马上就交待了。你又何苦非要等到那一天呢？但是我都交待了，只是不知道怎样批判（注：即控诉），还是不能够难“认识错误”。[344]

（我）原来是一个胀鼓鼓的气球，如今却被人捅了一刀，霎时间就症下去。我真像一团稀泥，抓不起来。我不能思想，周身麻木。虽然我照样起居梳洗，吃饭行走，但是却是一个丧失了感情和思想的植物人。[345]

不管李文蔚对许的描述，以及许的自我描述，均完全符合典型被洗脑理论中思想改造的描述。[346] 正值肃反运动展开，许在长达数个月的隔离审查期间，均不能与外界联系。在社群中被隔离的孤独、心理压力以及人身威胁之下，她的思想一步步地被动摇。经过一番挣扎和解除顾虑后，她最后相信了政府提供的“道德败坏的证据”，感到“如同自己的亲人做了丑事被人抓住，再也擡不起头来”。接着为了从洗脑者处获得了一定的政治回报，这些被洗脑者“勇敢地”投入了控诉运动作为“投名状”[347]。因此，在肃反期间对倪提出道德指控的控诉文章，控诉者几乎一味地重复相同的指控，甚至相同的辞句，却没有提供任何实质证据，也没有任何“受害者”提出证词。在这样缺乏充足证据下，姑勿论按今日西方政治和司法标准，就是在当1950年代的政治处境下，倪的道德指控也是无法被证实的。历史研究者若引用这些由官方提供的资料，以及经过被洗脑者（控诉者）的口所说出的话作为“依据”，自然被视为严重的主观和偏见，甚至有违学术伦理和道德。例如美国福乐神学院教会历史博士王嗣岳就以梁家麟对倪控罪的考证[348]，作为历史研究研究者的主观判断为例子。[349] 王指梁的考证中所使用的主要依据基本上是政府发布的起诉书与官方报章的社论，然而同为唸历史出身的梁却表示对官方司法审理资料的评价是“较为慎重，掺虚造假的成分较少，可信程度较高”，而党国控制的报章社论“较为严谨”。[350] 作为自称的历史研究者，这种无视政治思想改造的处境，以个人立场先行的历史“研究”，在西方学术界一般是不会被接受的。难怪梁的著作备受他学术界同行的质疑，甚至立即受到不少教会界的谴责。[351]

三、被洗脑者记忆的可靠度

洗脑技术不仅能够成功地改变被洗脑者的思想、价值观和行为，更深层的影响在于改变人的内心和记忆，将自我责难的记忆植入人心。这样的做法可能成功得惊人，甚至不需要强大或高压的暗示，就能影响个人的记忆。因此，即使曾经遭受到极权主义者的洗脑手段所造成的经历，被洗脑者往往不察觉到自己被洗脑，甚至相信某些记忆片段是“真相”的一部分，让他们真心相信某些事情曾经发生。[352] 心理学家兼记忆研究专家罗芙特斯（Elizabeth Loftus，1944—）曾经记录了一宗令人不安的成功实验：仅仅透过暗示，受测者就记录了一段虚构的事件，成功植入了虚假的记忆。[353] 一旦这样的故事或记忆被建构出来，并且伴随着鲜明的感官意象和强烈的情感，就可能没有内在的心理途径能够区别真伪，同时也没有外在的神经途径能够辨别。[354]

在肃反运动六十多年后，许梅骊再次对倪提出道德指控，而唯一的证据是来自她忆述与一位探访者的谈话，而根据许的回忆，这次探访发生在肃反期间（1956年2月）。假若有发生的话，此时许已向政府交了心、公开控诉了倪和教会，也即将加入那背后由政府和三自直接操控的学委会。在经过八个月的洗脑后，再加上六十多年的重整，许的记忆是不可靠的，见诸比较她于两书对同一件事的记述，其中的年份是不同的，以及许似乎刻意在她回忆中忘记她亲自参与的控诉和肃反后参加三自，仿佛是一个旁观者。[355] 然而，不管是李文蔚还是梁家麟，都是相信了许的一面之词，然后试图推砌其他历史揣测来“证实”。这并不符合学术的史学方法，因为基本上，许的言词是无法被证实真伪。在这些情况下，李和梁确信倪有失德行为，这只能说是他们相信的是中共政府的诚信和许本人。在当时的政治运动下，李也就无法逃避思想改

造，而至于梁，以及其他人的背后基于什么真正原因选择性地相信并重复许的陈述，也许只有他们自己才能知道。

此外，许于六十多年后“回忆”的动机更是值得怀疑。自1950年中共在基督教界展开大改造工程起，至1951年底，上海教会大部分信徒对控诉运动表现出抵制态度。出于基督徒信仰和良心缘故，倪及其他教会领袖最终决定不参加三自组织。对政府而言，他们阻碍了运动的进展，因此立即成为政府打击的目标。政府转而采取群众路线，分化了领导层，如争取了唐守临和左弗如，同时提拔青年的“积极分子”如许梅骊。这些举措与政府的全国性政治运动和执法机关相结合，最终“破揭”了倪柝声反革命集团，并以积极分子取代了原有的领导层。这些新领导层在接受政府的思想改造、向政府投诚“交心”、控诉他们的“属灵父母”，甚至一些放弃了信仰后，带领已名存实亡的地方教会加入了三自运动。他们也因此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政治回报。许多信徒因着包括许等控诉者当年的行为而批评他们，认为他们像“犹大”一样出卖了耶稣和同伴。

在隐声匿迹多年后，许和一些人如李文蔚近年来极力试图洗脱当年的控诉行为，并将肃反运动后带领地方教会加入了三自组织归咎于倪，这是对历史事实的明显歪曲。政府在1952年2月的文件已明确指出，倪、他的同工与地方教会领袖遭受打压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拒绝登记（三自运动）。1955年8月的文件也一致地揭示了同样的镇压原因。对于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抵抗一直持续到1956年肃反运动期间，上海教会的大多数领袖被捕并被“积极分子”取代为止。许似乎忘记了加入三自实际上是由受到党国操控的“学委会”执行的，而她本人正是其中的核心成员之一，他们也顺利完成了这个政府要求的任务。另外，正是由于他们当年的控诉导致了倪和其他教会领袖的殉道（即使他们早已为此做好了准备），他们不仅当年逃避了为信仰受苦难，获得了政治回报（虽然未必符合他们的期望）。现在他们通过把自己由当年的帮凶描绘成受害者，这他们表现出非基督徒该有的所为，是极端不道德的行为。虽然李文蔚表示许已“在神面前痛悔认罪，也受到肢体们的谅解和接纳”，但在网上和图书馆翻查均无许梅骊公开向其陷害者承认罪行的记录，也没有受陷害者的亲属“谅解和接纳”她的见证。假如许真的悔改了，她就不会未经其同辈张锡康的许可就使用他的未发表手稿，出版自己的书，并大量引用张的内容，继续控诉倪以求洗脱她自己的污名，导致张不得不翌年把修订稿出版。至于为许梅骊背书的梁家麟的动机如何，超出了本文的研究范围，本文也不作猜测，留待读者自行推测。[356] 不过，假若在极权主义下，当年被洗脑者加害殉道者的行为，可视为纳粹大屠杀幸存者和政治哲学家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 1906—1975）所说的“平庸之恶”的话，那么今天在相对自由的世界中，为着某些缘故，继续引用被洗脑者的话来加害殉道者的行为，便是比“平庸之恶”更恶的恶了。[357]

四、彰显基督的生命与基督徒的信仰特点

在红色中国的年代，那些忠于基督的基督徒面临着以政治之名进行的宗教迫害，与初期教会的基在罗马帝国统治下所遭遇的处境异曲同工。这种严酷的处境对许多在西方信仰自由环境中长大的基督徒来说，特别是那些不太熟悉共产中国历史的人来说，是不易理解、完全陌生的处境。1950年代的一连串政治运动似乎成了对信徒的一处殉道的试炼场，在这试炼中不但考

验对基督信仰的忠诚，更考验人性的道德底线。新约福音书记载了耶稣的为人生活乃是受苦的生活，从出生于马槽到死于十字架；苦难是祂为人生活的记号（参路二7,12）。耶稣也预备了那些想跟随祂的人，让他们明白和计算跟随祂的代价，并预备在他们走向十字架进入神国荣耀的路上面对苦难（路十四25~35）。新约使徒们的行传和书信也记载了教会面临的逼迫，并教导信徒应如何为之做好准备（徒十四22；彼前四1）。对于使徒们来说，基督徒殉道被认为是补满基督苦难的缺欠，以产生和建造教会（西一25），就像初期教会教父特土良（Tertullian, 160-240）所说的：“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358] 根据平卡斯（Pinckaers）的说法，渗透于初期教会的“殉道的灵”，并不是由于殉道者本身的非凡英雄主义，而是因为基督徒在殉道者身上看见了那与基督的死相同的模型，这模型改变了全世界。[359]

倪柝声是在破坏人性的思想改造的处境下殉道。经过二十年的监禁和劳改后，他于1972年5月30日在劳改营离世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为人赎罪而死，三日复活，这是宇宙间最大的事实。我信基督而死”。他的故事展现了他以内心对基督信仰强大和坚定的信念，成功地拒绝了极权主义者借着洗脑改造基督徒的宗教政策的努力，将受迫害的痛苦经历升华为属灵上的超脱，以殉道的方式打胜了那美好的仗、跑尽了他地上的赛程，守住了当守的信仰（提后四7）。[360] 这种殉道并不是浪漫化的英雄主义，也不是热血的慷慨就义或戏剧化的死；[361] 而是在面对长期而压倒性的力量，几乎要被它压倒之时，让神圣的能力和荣光显示在脆弱的人性光辉中，既是神圣的也是人性的，与洗脑者、被洗脑者和其他加害者的人性形成鲜明对比。照着倪的信仰来说，基督徒殉道的能力绝非源自他自己，而是活在他里面，一直在被囚中与他同在的基督，以倪所引用使徒保罗的话说，“但我们有这宝贝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超越的能力，是属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林后四7）。倪不是完人，不过是众多由基督所构成并让祂得以彰显的一个瓦器。尽管他身陷失去亲人、疾病、诬陷、羞辱和监禁等各种苦难之中，但因着宝贵的基督活在他里面，他在最后的日子，在监狱书信中仍能说出心仍喜乐。[362] 这正是倪所认为基督徒生命和信仰的特点：

基督徒信仰显著的特点就在于此，就是‘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这里有一个人是惧怕的，却又是坚决的；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似乎打倒了，却不至死亡。他显然是软弱的，但他却宣称他甚么时候软弱，甚么时候就刚强了。

我们必须大大的感谢神，因为仅仅人的软弱并不能限制神圣的能力。我们很容易以为，忧伤时，喜乐就不能存在；流泪时，就无法赞美；似乎软弱时，就失去能力；四面受敌时，就必被困住；疑惑时，就没有信心。但我要有力、确实的宣告，神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一切属人的事物只是作瓦器，来盛装神圣的宝贝。因此，当我们感觉沮丧时，我们不要向灰心让步，只要向主让步；当疑惑、恐惧在我们心中兴起时，我们不要向这些屈服，反而要顺服主。如此，宝贝就会因着瓦器显出更大的荣光。[363]

注：

[1] 在中国基督教的语境中指“新教”，即“更正教”，全文同。

- [2] “三自”原则与“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在意义上所指不同。“三自”原则是指由19世纪的来华宣教士所提倡“自治，（独立于国外的教会）、“自养”（经济独立）、“自传”（传道是自立自主的）这三点在宣教事业上的原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政府指示和监察之下所成立的组织，以推动政府的政治运动和宗教政策。这个委员会的领导人绝大多数是“现代派”，来自“青年会”，主张自由神学和社会主义，因此与共产主义思想容易产生思想连接（上野正弥，pp173-4）
- [3] Wikis, 倪, 倪反革命集团, 南阳路聚会所
- [4] 有时亦被外界称“小群”、“聚会处”、“聚会所”或“召会”等。注：,地方教会在中国大陆时期,先:地方教会在台湾,有时候被称为“教会聚会所”,是于1947年经由大陆来台的移民建立的,早于李常受被倪柝声差遣到台湾的时候（1949年）。赖恩融（Leslie T. Lyall）,《卓识之士—倪柝声》（p.246, www.found-treasure.org/library/%20pdf/nec.pdf）。因此,
- [5] 今时代神圣启示的先见注: 人数和数量 / www.witnesslee.org
- [6] 参Joseph Tse-Hei Lee, “Watchman Nee and the Little Flock Movement in Maoist China, ” Church History 74, no.1 (2005): 68–95, and “Dying for Faith, Transforming Memories: Chinese Christian Martyr Watchman Nee (1903– 1972),” Journal of the Macau Ricci Institute 6 (2020): 37–47. 倪柝声在上海市提篮桥监狱服刑十五年期满后（1967），原该刑满出狱，却被政府关在“青东”和“白茅岭”劳改农场，继续改造将近五年之久，直至1972年离世，并未获释。参《白茅岭农场旧事》（刘文忠 李昭牛隐编著）澳门：崇适文化，2021。
- [7] 李榭熙、周翠珊,〈毛泽东治下对基督教的洗脑〉,收《洗脑:毛泽东和后毛时代的中国与世界》,宋永毅、夏明编(美国华忆,2023),页167。
- [8] 对1950年代中国教会内部被控诉人物的研究,有毕范宇(Frank Wilson Price, 1895–1974)、陈崇桂、王明道、倪柝声等。关于他的传记的有许多,比较详细而可靠的早期有:《中流砥柱》(中国主日学协会,)、《中国教会三巨人》(橄榄基金会,)等。有张锡康、聚会处或地方教会。Life & Testimony of Mary Shu (“Open Windows”, LSM webcast);另一类是林荣洪的《属灵神学:倪柝声思想的研究》(三版)(香港:建道,2003)、梁家麟《倪柝声的荣辱升黜》(增修版)(香港:巧欣,2004)、邢福增的《反帝·爱国·属灵人:倪柝声与基督徒聚会处研究》(香港: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2005)等。
- [9] 许梅耀2011年3月,她出版了《难混岁月—我和上海地方教会及倪柝声》,为自己当年的出卖行为辩护,并继续控诉倪柝声和渲染当时控告倪柝声的官方“证据”,引发了不少争议。2018年2月,她又将其补充并取名为《警钟长鸣—倪柝声与中国地方教会》出版,此书是《难混岁月》的增订本。
- [10] 倪柝声事奉生命中的缺失对今日传道人的鉴戒) 教牧博士论文 <https://wp.ces.org.tw/wp-content/uploads/2017/05/DM036.pdf>
- [11] 吴国杰,《真貌重寻:教会历史研究导引》(香港:基道,2005),30-33。在史学上,“一手资料”是直接由研究对象或事件留下的文献物品。“二手资料”为从一手资料而来的间接重述、归纳或研究;“三手资料”泛指一切未经详细考究一手资料而写成的作品。(页31)
- [12] 王嗣岳,〈基督教历史研究中的史论〉,《神学方法论》,陈俊伟编(香港:天道书楼,.2013),113-116。
- [13] 本文已尽力根据史料呈现事实,然而一提是,因为某些事件可能超出了研究者的能力范围、没有实质的证据去确定,或是根本已无法确定,本文无法对所有事件做出结论或最终定论。
- [14] “全能主义政治”(Totalism)的概念,指“社会中没有一个政治权力机构不能侵犯的领域”,参邹讷(Tang Tsou):《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角度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页7。
- [15] 宋永毅:〈洗脑和中共—研究的新突破和新开端〉,载《洗脑—毛泽东和后毛时代的中国与世界》宋永毅、夏明编(美国华忆),页1。
- [16] Edward Hunter, Brianwashing in Red China. New York: Vanguard Press, 1991.
- [17] Thought Reform and the Psychology of Totalism (New York: Norton, 1969)
- [18] 宋永毅:〈洗脑和中共—研究的新突破和新开端〉,载《洗脑—毛泽东和后毛时代的中国与世界》宋永毅、夏明编(美国华忆)。
- [19] 历史与启示,第十篇。
- [20] 历史与启示,第十篇。
- [21] 1949年5月27日,陈毅(中共开国十大元帅之一)率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简称三野)攻占上海。陈毅担任第一任上海市市长。(1950年代上海-维基百科)
- [22] 1949年3月至7月期间,原订于鼓岭山的训练设施进行。第二期训练进行至第二周,山上治安恶化,全员移往福州城内海关巷继续训练课程,八月中旬,集训甫毕,中共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以钳形之势,五日之内攻陷福州。其时

- 台北小群同工正起首聚会。(https://ct.org.tw/html/news/3-3.php?cat=47&article=1396649) (林子龙,《福音见证(六) 神恩浩大》(台北:台湾福音书房,XXXX),第8章,页XX。)
- [23] 李常受:《历史与启示》(上)(台北:台湾福音书房,2005),页229-230。
- [24] 李常受,《今时代神圣启示的先见—倪柝声》,页361。
- [25] 魏光禧,〈序〉,《倪柝声弟兄三次公开的见证》,页XX。
- [26] 出版于1926年8月,《基督徒报》第10期。〈(二) 士每拿教会(受苦的教会)〉,收《倪柝声文集》第4册:基督徒报(二),页XX。
- [27] 写于1932年8月15日,《复兴报》第26期。〈公开的信〉,收《倪柝声文集》第8册:复兴报(卷四),页XX。
- [28] 讲于1939年12月6日。〈不爱自己的生命〉,收《倪柝声文集》第44册:特会、信息、及谈话记录(卷四),第111篇,页XX。
- [29] 〈殉道〉,收《倪柝声文集》第60册:鼓岭训练记录(卷二),第54篇,页XX。
- [30] 〈殉道〉,收《倪柝声文集》第60册:鼓岭训练记录(卷二),第54篇,页XX。
- [31] 〈殉道〉,收《倪柝声文集》第55册:鼓岭训练记录(卷二),第54篇,页XX。
- [32] 〈殉道〉,收《倪柝声文集》第55册:鼓岭训练记录(卷二),第54篇,页XX。
- [33] 〈有受苦的心志〉,收《倪柝声文集》第55册:主工人的性格,第3篇,页XX。
- [34] 参《倪柝声文集》第61册:主恢复中成熟的带领(卷一),一九四九年港穗同工谈话记录(1949年8月29至31日)。
- [35] 江守道,《倪柝声生平简史》
- [36] 魏光禧写于1973年8月1日。《倪柝声弟兄三次公开的见证》的〈介言〉,收《倪柝声文集》第27册:通问汇刊(卷二),页XX。一九五〇年初,倪柝声弟兄来到香港,不久李常受弟兄也来了。已往两位弟兄同时在一地教会带领聚会,是罕有的事。他们的职事给香港教会带进大复兴。原来只有三百多人的聚会,在短期内增至二、三千人,这是香港教会特别蒙恩的地方。//
- [37] 李常受,《今时代神圣启示的先见—倪柝声》,页126,359-360。次年二月,有第二次同工聚会,交通到去留的问题。一开头倪弟兄就重复他前次聚会的宣布,大意是说我必须离开中国大陆。这一次,在有些祷告之后,他向其余的人宣布,他的感觉是他与大家必须留下,预备要为主的工作牺牲一切。李常受,《历史与启示》,页XX。
- [38] 李常受,《今时代神圣启示的先见—倪柝声》,七版(台北:台湾福音书房,2005),第18章,页126。参江守道,《倪柝声生平简史》。
- [39] 李常受,《今时代神圣启示的先见—倪柝声》,第18章,页126。
- [40] 李常受,《今时代神圣启示的先见—倪柝声》,第17章,页125。
- [41] 〈基督徒对国家社会的态度〉,收《倪柝声文集》第46册:特会、信息、及谈话记录(卷六),附录一,页247-263。
- [42] 〈基督徒对国家社会的态度〉,收《倪柝声文集》第46册:特会、信息、及谈话记录(卷六),附录一,页247-263。
- [43] 〈等候主的降临〉(1948年9月23日),收《倪柝声文集》第54册:鼓岭训练记录(卷一),第29篇,页。
- [44] 〈为华北、东北局势祷告〉(1948年6月3日),收《倪柝声文集》第54册:鼓岭训练记录(卷一),第9篇,页83-84。
- [45] 〈基督徒对国家〉,收《倪柝声文集》第55册:鼓岭训练记录(卷二),第52篇,页XX。
- [46] 〈同工聚会(十八) 身体的事奉〉,页505-506;〈今后工作的路〉,页119。倪于1948年期间的一句“把全中国打下来”(即藉着逼迫而移民出去,将福音传遍了中国),是倪“福音移民”工作路线的口号,后来成了倪被控诉为“反革命分子”的罪状之一。(邢福增,《反帝·爱国·属灵人—倪柝声与基督徒聚会处研究》[香港: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2005],页26-27)
- [47] 倪柝声,〈抓住机会〉(讲于1950年7月19日于上海),《敞开的门》第21期(1950年9月15日),载《倪柝声文集》(第55册:执事报、复刊敞开的门),页XX。“时间是常有的,而机会不是常有的。机会是在时间里。时间是长远不断的。但机会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所以我们要抓住机会。我们今天一有机会就要觉得,一有机会就要顶上去。”(页XX);“一个机会一来,灵魂来了。一个机会一来,工作来了。门才开启一点,就得进去。但难处在机会不等我们。”(页XX);“我们一面注重传福音,一面要注重属灵的团体;我们不是要一个一个的得着他们,乃是要整个的得着他们。各地负责的弟兄要看这是不是神今天要我们作的。”;“我们如果把所有爱主的团体带到同样

的路上，除了耶稣家庭之外，还有许多零碎的属灵的团体。需要全体弟兄姊妹起来去得着他们。要把他们全体变过来。”（页XX）

- [48] 倪柝声，〈抓住机会〉（讲于1950年7月19日于上海），《敞开的门》第21期（1950年9月15日），载《倪柝声文集》（第55册：执事报、复刊敞开的门），页235-237。
- [49] 倪柝声，〈敞开的门〉（第24期）（教会的合一—一次同工谈话聚会的记录），载《倪柝声文集》（第57册：复刊敞开的门（卷二）、复刊复兴报），页71-143。
- [50] Phyllis Thompson, *China: The Reluctant Exodus, the Story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s Withdrawal from Communist China* (Littleton, Co.: OMF International, 2000), 97-99. 甚至耶稣家庭也是倪希望争取合一的对象。（倪柝声，〈抓住机会〉，页237）
- [51] Report on the Little Flock..., op. cit., 11, 20–21. Cited by Joseph Tse-Hei Lee, “Politics of Faith: Patterns of Church-State Relations in Maoist China (1949-1976),” *Historia Actual Online*, 17 (2008), 131-132.
- [52] *Ibid.*, 18–21. Cited by Joseph Lee, 131-132.
- [53] 江守道，〈倪柝声生平简史〉
- [54] Joseph Tse-Hei Lee, “Politics of Faith: Patterns of Church-State Relations in Maoist China (1949-1976),” *Historia Actual Online*, 17 (2008),
- [55] 〈与港穗同工谈话记录（三）〉，载《倪柝声文集》第61册：主恢复中成熟的带领（卷一），页37，引自邢福增，〈反帝·爱国·属灵人—倪柝声与基督徒聚会处研究〉〔香港：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2005〕，页28。
- [56] 〈与港穗同工谈话记录（三）〉，载《倪柝声文集》第61册：主恢复中成熟的带领（卷一），页XX。
- [57] 王禁，〈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宗教政策研究〉（硕士论文，广东海洋大学，2011），页12。
- [58] 刘建平，〈周恩来与建国初期中国基督教反帝爱国运动的发起〉，《宗教学研究》（2012年第1期），页208-209。
- [59] 即“洗脑”（brain washing）。Edward Hunter, *Brainwashing in Red China: The Calculated Destruction of Men's Mind* (New York: The Vanguard Press, 1951); *Brainwashing: The Story of Men who Defied It* (New York: Farrar Rauschdahy, 1956); Robert Jay Lifton, *Thought Reform and the Psychology of Totalism* (New York: Norton, 1969).
- [60] 冯客，〈解放的悲剧〉，页195。早在1950年6月，毛泽东就提出，要在知识界开展自我改造的教育运动（参李杨，〈建国后第一次思想改造运动的前前后后〉，《中国社会导刊》[2004年第11期]）。
- [61] 冯客（Frank Dikötter），〈解放的悲剧：中国革命史1945-1957〉（*The Tragedy of Liberation: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萧叶译，初版（新北：联经，2018），页172-73,189-190。“整风运动”，又称作“延安整风”、“抢救运动”、“抢救失足者运动”。
- [62]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页XX，引自冯客，〈解放的悲剧〉，页172-73。
- [6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CREATING the INTELLECTUAL EDDY U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A CLASSIFICATION, <https://www.luminosoa.org/site/books/10.1525/luminos.68/download/2721/>
- [64] 这些手段在1930年代肃AB团时已开始使用（陈永发，〈延安的阴影〉，页3-5）。冯客，〈解放的悲剧〉，页173。
- [65] 陈永发，〈延安的阴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页82-94。US Joint Publication research service. (1979). *China Report: Political, Sociological and Military Affairs*. 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 No ISBN digitized text March 5, 2007. 崔敏，〈刑讯考论：历史现状未来〉Paperback – 31 Aug. 2011 Chinese edition
- [66] “洗澡”这个词见于1952年1月22日发布的官方文件《关于宣传文教部门应无例外地进行“三反”运动的指示》，其中要求对于校长、教师，“一般地说，使这些人物在群众斗争中洗洗澡，享受自我批评的锻炼，拿掉架子，清醒过来，对他们和今后的工作都是有利的。”（《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卷第49页），后又见于3月13日发布的《关于在高等学校中进行三反运动的指示》，其中规定：“每个教师必须在群众面前进行检讨，实行『洗澡』和『过关』。”；另参徐来，〈“洗澡”“红色”知识话语的建构与推行：以1951-19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为例〉（博士论文，香港浸会大学，2016）；杨绛，〈洗澡〉（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 [67] 陈辉，〈1952年中国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以苏联为师”的后果〉，《当代中国研究》，第3期（2003）（<https://www.modernchinastudies.org/us/issues/past-issues/82-mcs-2003-issue-3/1309-1952-.html>）
- [68] 毛的发言刊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开会词〉，《人民日报》（1951年10月24日），第1版（<https://cn.govopendata.com/renminribao/1951/10/24/1/#76001>）（http://big5.www.gov.cn/gate/big5/www.gov.cn/test/2008-02/20/content_894341.htm）。在毛发言的同一天，《人民日

- 报》发表短评，〈认真展开高等学校教师中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https://cn.govopendata.com/renminribao/1951/10/23/1/#75962>）。自此，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进入高潮。
- [69]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页XX。
。 <https://www.dswxyjy.org.cn/BIG5/n1/2016/0122/c244520-28077377.html>
- [7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页448、52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 [71] 〈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长罗瑞卿，把这毛泽东发动三大运动的目标和关系说得最清楚：“抗美援朝是要打败帝国主义的侵略;土地改革是要彻底打倒封建势力，解放广大农村的生产力;而镇压反革命则是争取抗美援朝、土地改革胜利的的必要条件，也是保卫国家和人民、巩固政权和巩固革命胜利、准备建设的必要条件”〉，见〈有关坚决镇压反革命的几个认识问题（1951年4月4日）〉，收入《罗瑞卿论人民公安工作》，页59。原为《坚决镇压反革命：罗瑞卿在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机关干部大会上的报告》。
- [72] 邢福增，《反帝爱国与宗教革新-论中共建国初期的基督教〈革新宣言〉》，《近代史研究集刊》第56期，页116。
- [73] 齐德学、邓礼峰：〈抗美援朝运动的组织领导与开展〉，收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支持抗美援朝纪实〉（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页4-6。引自邢福增，《反帝爱国与宗教革新-论中共建国初期的基督教〈革新宣言〉》，《近代史研究集刊》第56期，页116-117。
- [74] 邢福增：《基督教在中国的失败？—中国共产运动与基督教史论》，增订版（香港：道风书社，2012），页78。
- [75] 〈中央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1950年10月26日），载《中国共产党宣传文献选辑（1949-1956）》，页139。贺宝玉，《抗美援朝战争初期北京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21）第3期。为了配合宣传教育运动的展开，中共宣传部门专门编写了一本名为《怎样认识美国（宣传提纲）》的小册子，刊在《人民日报》（1950年11月5日），第5版。（<https://cn.govopendata.com/renminribao/1950/11/5/5/#61637>）
- [76] 冯客（Frank Dikötter），《解放的悲剧：中国革命史1945-1957》（The Tragedy of Liberation: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萧叶译，初版（新北：联经，2018），页161-166。3月8日，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严重抗议美国政府使用细菌武器屠杀中国人民、侵犯中国领空的声明》，指控美军自1952年1月28日在朝鲜发动了大规模细菌战，自2月29日起至3月5日止，先后以军用飞机68批，448架次侵入中国东北领空，并在抚顺、新民、安东、宽甸、临江等地撒布大量传播细菌的昆虫，对临江、长甸河口进行轰炸扫射。
- [77] 〈严重抗议美国在朝鲜进行细菌战的罪行〉，《天风》总303号（1952年3月1日），页2。
- [78] 冯客（Frank Dikötter），《解放的悲剧：中国革命史1945-1957》（The Tragedy of Liberation: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萧叶译，初版（新北：联经，2018），页162-168。+《天风》
- [79] 〈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郭副总理的报告〉，《协进月刊》第9卷第5期（1951年1月），页5。〈接受外国津贴及外资经营之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登记条例〉，《协进月刊》第9卷第5期（1951年1月），页6-7。一九五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政务院第六十五次政务会议通过，根据1950年12月30日《人民日报》刊印，<https://zh.wikisource.org/zh-hant/>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
- [80] 〈拥护政务院处理方针——沪基督教界发表宣言〉、〈穗基督教界发表宣言〉，《协进月刊》第9卷第5期（1951年1月），页8-10。
- [81] 张锡康，《张锡康回忆录——上海地方教会六十年来的回顾》（香港：光荣，2012），页177-178。
- [82] 例子有天津津沽天学三名天主教传教士以间谍罪被捕，参〈天津逮捕三个美国间谍〉，《人民日报》（1951年4月6日）。
- [83] 刘建平：〈虐婴还是育婴？—1950年代初育婴堂问题〉，《二十一世纪》，107期（2008年6月）：67-77。〈调查圣婴院收养弃婴情形〉，广州社会局（1946年9月10日）。
- [84] 〈广州圣婴育婴院残害我儿童的罪行〉，《天风》总261号（1951年4月28日），页9。
- [85] William Buntain, 参《聚会的生活》、《工作的再思》
- [86] 江汉文：〈参加上海郊区土改中的几点体会〉，《天风》总283-284号（1951年9月30日），页10-13,20。
- [87] 〈革新宣言签名已近九万〉，《天风》总247号（1951年1月20日），页11。天风社：《关于《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宣言签名启事》，《天风》总255号（1951年3月20日），页12。
- [88] 陈福中编，《汪佩真传》，第十七章〈鼓岭执事之家结束〉（黄得恩着），页XX。
- [89] 〈福州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处关于鼓岭“基督教执事之家”破坏土改问题的调查报告〉，《天风》总298号（1952年1月19日），页9。
- [90] 杨奎松，〈新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史学月刊》，期1（2006年），页45-61。程昱豪，〈“镇压反革命”运动之研究（1950-1953）〉，硕士论文（国立中央大学，2016）（

<https://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ncugsweb.cgi/ccd=QI7U25/fulltextstdcdr?dbid=veVbHYaLHGX&dbpath=/opt/fb32/db/ncu/ncucdrf/&fuid=01&dbna=>) (3), “刘少奇与周恩来曾先后下令镇压‘反革命’，但并未得到毛泽东的公开支持。直到1950年10月，毛泽东决定出兵抗美援朝，遂抓紧机会正式发动‘镇压反革命’运动。运动初期，毛泽东尚强调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统战策略，但是到了1951年1月，毛泽东不满于各地镇压‘反革命’的进度落后，特别是上海、南京等大、中城市执行不力，遂下令须按比例大杀一批。毛泽东令下，各地开始‘镇反’杀人竞赛，部分地区甚至出现超额杀人，并反过来要求毛泽东提高比例。毛泽东惊觉运动失控，才下令将捕人批准权收回到地专一级，杀人批准权收回到省级，并紧急召开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以贯彻命令，不过仍有部分地区出现赶杀的情况。1952年的第五次全国公安会议，罗瑞卿指示将‘镇反’重点转向‘反动’会道门。”//

- [91] 〈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1950年10月10日）〉，收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党的文献”编辑部编，《共和国走过的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专题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页235-237。
- [92] 1951年2月21日，政务院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指明镇压对象包括“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反动会门头子”。
- [93] 杨奎松，《毛泽东与“镇压反革命”运动》，收入陈永发主编，《两岸分途：冷战初期的政经发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6），页31-76。引自邢福增，《反帝爱国与宗教革新-论中共建国初期的基督教<革新宣言>》，《近代史研究集刊》第56期，页116。
- [94] 罗瑞卿，《必须坚决，准确地执行中央镇压反革命的指示》（1950年10月19日），收公安部罗瑞卿论人民公安工作编辑组编，《罗瑞卿论人民公安工作》（北京：群众出版社，1994）页31。引自邢福增，《反帝爱国与宗教革新-论中共建国初期的基督教<革新宣言>》，《近代史研究集刊》第56期，页117。
- [95] 〈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收《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册2，页44-46，引自邢福增，《反帝爱国与宗教革新-论中共建国初期的基督教<革新宣言>》，《近代史研究集刊》第56期，页117。
- [96] 毛泽东，《关于对镇压反革命分子必须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的电报》（1951年1月17日），收《共和国走过的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专题选集》，页237-238，引自邢福增，《反帝爱国与宗教革新-论中共建国初期的基督教<革新宣言>》，《近代史研究集刊》第56期，页117。
- [97] 至1951年8月，上海市共登记了26896人。易庆瑶（主编），《上海公安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1997），第二编惩治反革命罪犯，第二章镇压反革命运动，第一节（<https://www.shtong.gov.cn/difangzhi-front/book/detailNew?oneId=1&bookId=4476&parentNodeId=58351&nodeId=46220&type=-1>）。《上海公安志》由官方出版，按照历史的轨迹，记述上海近百年以来警察历史与现状的专志。（<https://www.shtong.gov.cn/n87419/20210701/132990.html>）
- [98] 毛泽东，《关于镇反部署给上海市委的电报》（1951年1月21日），收《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册2，页47。
- [99] 易庆瑶（主编），《上海公安志》，第二编惩治反革命罪犯，第二章镇压反革命运动，第四节（<https://www.shtong.gov.cn/difangzhi-front/book/detailNew?oneId=1&bookId=4476&parentNodeId=58351&nodeId=46223&type=-1>）。
- [100] 易庆瑶（主编），《上海公安志》，第二编惩治反革命罪犯，第二章镇压反革命运动，第五节（<https://www.shtong.gov.cn/difangzhi-front/book/detailNew?oneId=1&bookId=4476&parentNodeId=58351&nodeId=46224&type=-1>）。
- [101] 〈徐子荣关于镇反以来几项主要数字的统计报告〉（1954年1月14日），转引自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1）（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页217。
- [102] 杨奎松，《新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程昱豪，《“镇压反革命”运动之研究（1950-1953）》。
- [103] 罗瑞卿，《在第二次全国公安会议上的报告》（1950年10月16日），收《罗瑞卿论人民公安工作》，页27，引自邢福增，《反帝爱国与宗教革新-论中共建国初期的基督教<革新宣言>》，《近代史研究集刊》第56期，页118。
- [104] 〈上海宗教界拥护各党派宣言，为争取和平不惜牺牲一切，对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罪行将及时予以揭露〉，《人民日报》（1950年11月12日）。，引自邢福增，《反帝爱国与宗教革新-论中共建国初期的基督教<革新宣言>》，《近代史研究集刊》第56期，页118。
- [105] 刘良模，《帝国主义分子怎样利用宗教侵略中国》，《天风》总257号（1951年3月31日），页3。，引自邢福增，《反帝爱国与宗教革新-论中共建国初期的基督教<革新宣言>》，《近代史研究集刊》第56期，页118。
- [106] 〈中共中央关于天主教、基督教问题的指示〉（1950年8月19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第1册，页408-412：“在上述基本方针之下，我们正鼓励基督教中有爱国心的分子吴耀宗等，签名发表宣言，号召以逐渐脱离帝国主义的影响与经济关系等，实行自治、自传、自养为教会今后的目标。对于这个签名运动，各地的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应从旁予以适当的赞助，经过适当关系，组织有爱国心的教徒，签名响应，并在教徒中进行宣传。”（页XX）。

- [107] 19人包括：吴耀宗、邓裕志、刘良模、涂羽卿、崔宪详、艾年三、赵紫宸、陆志韦、江长川、王梓仲、高凤山、庞辉亭、赵复三、凌俞秀蒙、陈文润、刘维诚、杨肖彭、邓锡三、霍培修。吴耀宗：〈展开基督教革新运动的旗帜〉，罗冠宗编：《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文献（1950~1992）》（上海：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1993），页10。原文刊于《天风》第233-234号（1950年9月）。〈吴耀宗〉：〈基督教访问团返沪〉，《天风》第217号（1950年6月），页12。
- [108] 又或简称作《基督教宣言》、《三自宣言》，参邢福增，《反帝爱国与宗教革新-论中共建国初期的基督教〈革新宣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集刊》第56期（2005年6月），页92。王禁，《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宗教政策研究》（硕士论文，广东海洋大学，2011），页12-13。
- [109] 在这三个主要团体之中，以耶稣家庭对新政权的态度最为积极。1950年，敬奠瀛带领381名耶稣家庭成员和崔宪详、朱大卫等一起签名拥护《三自宣言》，人数居各宗派之首。该团体又积极参与政府组织的爱国运动，在韩战中组织“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医疗队”支援前线而获得巨大声誉。然而，尽管如此，它仍逃不过政府于1952年的取缔。其中耶稣家庭对新政权的态度最为积极，敬奠瀛带领381名耶稣家庭成员和崔宪详、朱大卫等一起签名拥护“三自”宣言，人数居各宗派之首。又积极参与政府组织的爱国运动，在韩战中组织“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医疗队”支持前线而获得巨大声誉。（注：<https://zh.wikipedia.org/wiki/耶稣家庭>）{1950年，敬奠瀛带领381名耶稣家庭成员和崔宪详、朱大卫等一起签名拥护《三自宣言》，人数居各宗派之首。（注：<https://zh.wikipedia.org/wiki/敬奠瀛>），但纵然如此，仍逃不过政府于1952年的取缔。
- [110] 邢福增，《反帝·爱国·属灵人》，页34-35。
- [111] 田景福，《有关宣言签名的三个问题》，《天风》总242号（1950年12月2日），页2-3。朱友渔着，陈锡麟译，《朱友渔自传》（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72），页226-227，引自邢福增，《反帝爱国与宗教革新-论中共建国初期的基督教〈革新宣言〉》，《近代史研究集刊》第56期，页107-108。
- [112] 周福庆，〈控诉美国侵略工具赵世光〉，《天风》总270号（1951年6月30日），页11；陆传芳，〈在学习中认识三自，在工作中理解三自〉，收入上海市基督教两会编，《上海基督教纪念三自爱国运动50周年神撻思想建设研讨会专辑》（上海：中国基督教两会，2000），页15-16，引自邢福增，《反帝爱国与宗教革新-论中共建国初期的基督教〈革新宣言〉》，《近代史研究集刊》第56期，页108-109。
- [113] 基督教聚会处编：《我们的立场》、《对三自革新宣言》。并见原省宗教处档案157-2-56。黑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黑龙江省宗教志》（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页270。网上版（<http://shuju.zglz.gov.cn/BookRead.aspx?BookID=201708230084>）
- [114] 《吴耀宗日记》，1950年12月14日，12月29日，收全集（第四卷）？（<http://jloverseas.org/yzwu/>）
- [115] 〈上海教会概况〉（1951年10月），甲件，页3。引自《反帝·爱国·属灵人》，页83注146。
- [116] Joseph Tse-Hei Lee, "Politics of Faith: Patterns of Church-State Relations in Maoist China (1949-1976)," *Historia Actual Online*, No. 17 (October, 2008), 131. 李树熙、周翠珊：〈毛泽东治下对基督教的洗脑〉，《洗脑—毛泽东和后毛时代的中国与世界》，宋永毅、夏明编（美国：华忆，2023），页168。
- [117] 邢福增：《反帝·爱国·属灵人》，页49。
- [11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页110。
- [119] 〈中共中央关于积极推进宗教革新运动的指示〉（1951年3月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页238-239。
- [120] 〈中共中央关于积极推进宗教革新运动的指示〉（1951年3月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页242。
- [121] 朱越利主编：《今日中国宗教》（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4），引自邢福增：《反帝·爱国·属灵人》，页49注50。当代中国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1951年卷（北京：当代中国，2007），页183，引自宋军：《变局中的抉择—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历史的终结（1949-1951）》（香港：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2017），280。
- [122] 邢福增：《基督教在中国的失败？—中国共产运动与基督教史论》，增订版（香港：道风书社，2012），页81,85。
- [123] 邢福增：《反帝·爱国·属灵人》，页50。
- [124] 中流砥柱，第十一章新的历程，181个差会的领袖开会。另有资料（德溶？）指31个教派的154名教会领袖参加会议。
- [125] 《王明道日记》，1951年3月10日，14日，4月7日，4月13日，14日。王于4月7日收到政务院的邀请函。王长新，《又四十年》（多伦多：加拿大福音，2001），页12-14。王长新指倪不仅来到了北京，还起草了一份通知，由北京协和印刷局承印，通知聚会处的信徒都要拥护“三自会”。实际上，这并不准确，因为在全国基督教会议开始前，

“三自会”（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还未正式成立。作者的目的是引导出王明道接着对指控倪违背自己的教导去参加宗派的教会（页XX-XX）。然而，作者误解了“三自会”的性质，它并非一个宗派的教会而是一个由政府主导和监察，以宗教为名来完成政治任务为目标的组织。倪是以基督教团体代表的身份应邀。三自会成立后，倪也从没有加入过其组织。作者引用王明道的评论是为了凸显王才是真正反对三自会的英雄。事实上，当时与政府冲突的焦点，在于是否愿意配合政府去执行不久由三自会所推动的全国性控诉运动。

- [126] 邢福增：《反帝·爱国·属灵人》，页52。
- [127] 〈出席会议代表名单〉，《人民日报》（1951年4月18日）。《天风》，总262-263期（1951年5月8日），页3-5。
- [128] 《天风》，总262-263号（1951年5月8日），页1,6-10。
- [129] 《天风》，总262-263号（1951年5月8日），页1,6-10。
- [130] 《天风》，总262-263号（1951年5月8日），页2-3。
- [131] 王禁硕论，页12-13
- [132] 《天风》，总262-263号（1951年5月8日），页1-2。
- [133] 赵天恩、庄婉芳，《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1949-1997）》，修订初版（台北：中福，2010），页72。
- [134] 沈德溶：《在三自工作五十年》，页81。
- [135] 这18个人是：崔宪详（中华基督教全国总会总干事）、邵镜三（南京中华基督教会总干事）、沈德溶（《天风周刊》主编）、施中一（江浙基督教乡村服务联合会干事）、施如璋（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学生部主任）、江长川（卫理公会华北年议会会督）、李牧群（重庆中华路德会牧师）、王重生（青岛基督教联合会书记）、王志堃（天津）、谢颂三（中华监理公会）、钮志芳（杭州基督教协进会副会长）、陈见真（中华圣公会主教院主席主教）、胡翼云（广东基督教协进会总干事）、胡祖荫（广学会义务总干事）、王梓仲（华北公理会布道牧师）、陈崇桂（重庆神学院院长）、江文汉（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副总干事）、乔维熊（天津基督教革新推进委员会）。
- [136] 〈出席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的代表，控诉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中国〉，《人民日报》（1951年4月24日）<https://web.archive.org/web/20160304124152/http://libproject.hkbu.edu.hk/trsimage/christian/er00337.pdf>
- [137] 沈德溶：〈参加一九五一年“北京会议”始末〉，氏著：《在三自工作五十年》（上海：上海市基督教两会，2000），页6-7。《天风》，总262-263期（1951年5月8日），页30-31。赵天恩、庄婉芳，《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1949-1997）》，修订初版（台北：中福，2010），页72-73。
- [138] 顾十五岁中学毕业后，在上海当演员，1930年归信基督，任自由传道。（赵天恩、庄婉芳，《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1949-1997）》，页73注74。）于力工：〈顾仁恩先生〉，《西方宣教运动与中国教会之兴起（附中国传道史人史馆）》（台北：橄榄，2006），页367-371。不少年前，遇到谭雅各牧师。他送我一本书，是他的自传。附有见证，说他曾为海员，在将临绝境的时候，经顾仁恩引他信主的。当然我不认识顾仁恩其人，但听说是多年前上海电影界的英俊演员。蓝妍了个女演员蓝莘，后来被她丢弃，就起意投江自杀；忽然听到教堂的歌声，被吸引走进去，听道信主得救悔改，奉献成为布道家高举十字架，引领了不少人归信基督，不少还作了传道人。那位老牧师就是蒙恩者之一。而那蓝莘呢，由蓝变红，成为毛主席的夫人，后来为“四人帮”的女帮主，努力迫害教会；结果帮了教会的大忙，信徒分散各处，造成了复兴。江青被使用，像是神大计画之中的小幽默，显出神的全知和权能。（〈神的仆人〉于中旻）
- [139] 张乐：〈样板：1951年基督教控诉运动中的顾仁恩事件〉，《华大史学研究》2016年2期：58-78页。
- [140] 〈顾仁恩事件的舆论反应〉，《天风》，总261期（1951年4月28日），页12。〈短评—严惩特务〉，《天风》，总256期（1951年3月24日），页2-3。〈青岛市公安局逮捕顾仁恩〉，《青岛日报》（1951年3月15日），转载于《天风》，总256期（1951年3月24日），页6-7。〈本刊邀请上海教会同道座谈顾仁恩事件〉，《天风》总259号（1951年4月14日），页6-7。该座谈会于4月7日下午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举行，由《天风》周刊主编沈德溶任主席，声称是旨在使一部分不明白的上海信徒，认识“顾仁恩的过去历史”和表达对顾的“个人看法”。
- [141] 〈短评：肃清宗教界的败类〉，《北京日报》（1951年3月27日）收《对顾仁恩事件的评论》，《天风》总258号（1951年4月7日），页8：“青岛市顾仁恩事件教育了广大的宗教信徒，使大家再一次地认识到：在宗教界中，确实还有些人，披着宗教的外衣，为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作侵略工具。这是宗教界的取辱。从去年八月起，广大爱国的基督教徒提出了自治、自养、自传的革新行动纲领，决心斩断与帝国主义的一切联系。一向利用教会作侵略工具的帝国主义者，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者和它们的走卒，自然不会甘心，他们想尽一切卑鄙的办法，企图破坏这个爱国运动。顾仁恩正是受他主子的指使来进行这个破坏活动的。”。宋军：《变局中的抉择—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历史的终结（1949-1951）》（香港：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2017），278。
- [142] 张乐：〈样板：1951年基督教控诉运动中的顾仁恩事件〉，《华大史学研究》2016年2期：58-78页。

- [143] 李常受：《今时代神圣启示的先见—倪柝声》，第18章，页126。江守道，《倪柝声》（pp.357-8, www.found-treasure.org/library/%20pdf/nec.pdf）。
- [144] 邢福增：《反帝·爱国·属灵人》，页101。
- [145] 〈开展基督教对美帝国主义的控诉运动〉，《人民日报》（1951年4月24日），第1版。引自邢福增：《反帝·爱国·属灵人》，页59。
- [146] 〈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委会第一次会议记录〉，《天风》，总262-263期（1951年5月8日），页31。是次会议另一个议决是以《天风》为该会的机关刊物。（引自赵天恩、庄婉芳，《当中国基督教发展史》，页74注98）。
- [147] 〈搞好控诉，搞好传达〉，《天风》，总262-263期（1951年5月8日），页29。
- [148] 吴耀宗：《中国基督教的新生—出席“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感想》，《天风》，总266期（1951年6月2日），页2。原载于《人民日报》（1951年5月25日），第3-4版。
- [149] 刘建平：〈抗美援朝时期中国基督教界的控诉运动〉，《二十一世纪》，121期（2010年10月），页126。
<https://www.cuhk.edu.hk/ics/21c/media/articles/c121-200911011.pdf>
- [150] 如：应元道：〈控诉的宗教意义〉，《天风》，总265号（1951年5月26日），页248；陈崇桂：〈我控诉美帝利用宗侵略中国〉，《天风》，总264号（1951年5月19日），页229-31；陈崇桂：〈为甚么要控诉？〉，《天风》，总267号（1951年6月9日，页277-79）。（引自刘建平：〈抗美援朝时期中国基督教界的控诉运动〉，页126注24。
- [151] 刘良模曾著《我所认识的美国》（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50），此书周恩来总理当面的称赞，以及编著《美国怎样利用宗教侵略中国》（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51）。
- [152] 刘良模：〈怎样开好教会控诉会？〉，《天风》，总264号（1951年5月19日），页5。刘文亦刊登于5月21日的《人民日报》（引自邢福增：《反帝·爱国·属灵人》，页59注81。）
- [153] 吴耀宗：〈全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近况〉，《天风》，总270号（1951年6月30日），页314；〈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后两个月的工作报告〉，《天风》，总274号（1951年7月31日），页2；〈继续展开并深入控诉运动〉，《天风》，总276号（1951年8月6日），页1。
- [154] 以50上海为例，第三章
- [155] 〈继续展开深入控诉运动〉，《天风》，总276号（1951年8月11日），页1。
- [156] 刘建平：〈抗美援朝时期中国基督教界的控诉运动〉，页128-9。
- [157] 〈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控诉大会特辑〉，《天风》，总267号（1951年6月9日），页4-14。
- [158] 刘建平：〈抗美援朝时期中国基督教界的控诉运动〉，页128-9，表1。〈上海基督教会及团体揭露美帝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罪行控诉大会特辑〉，《天风》，总268-269号（1951年6月21日），页1-17。〈基督教举行万人控诉大会〉，《解放日报》（1951年6月12日）。
- [159] 万人控诉大会由吴耀宗带头，然后各教派的教会领袖逐一上台控诉，参与者有：江长川（卫理公会）、邓裕志（女青年会）、胡祖荫（广学会义务总干事）、徐华（安息日会会长）、吴永泉（基督徒学联合会）、贾玉铭（长老会）、杨绍唐（内地会）、竺规身（灵工团监督）、崔宪详（中华基督教会）、吴高梓（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等人。
- [160] 吴耀宗：〈对美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的罪行的控诉〉，《天风》，总268-269号（1951年6月21日），页3-4。
- [161] 〈上海教会及团体举行控诉大会—揭露美帝利用基督教侵略我国的罪行〉，《天风》，总268-269号（1951年6月21日），页2。
- [162] 〈我们要控诉！〉，《天风》，总268-269号（1951年6月21日），页1。
- [163] 《中流砥柱》，第17章，页。参陈希曾：《晒熟的美果—倪柝声的诗歌及其源考》，修订版（美国：活道，2015），页309。
- [164] 张锡康：《张锡康回忆录—上海地方教会六十年来的回顾》（香港：光荣，2012），页177。
- [165] 倪柝声：《我是怎样转过来的？》（上海：上海教会，1951年10月）。张锡康：《张锡康回忆录—上海地方教会六十年来的回顾》（香港：光荣，2012），页177-178。注：张的年份或许有误，控诉运动的展开并非1950年而是1951年。
- [166] 倪柝声：《我是怎样转过来的？》（上海：上海教会，1951年10月）。
- [167] 这三篇话题目是：（一）〈我是怎样转过来的〉（1951年8月20日），（二）我们对于政治所应有的态度（1951年8月2日），（三）走那一条路（1951年9月12日）。

- [168] 倪柝声：《我是怎样转过来的？》（上海：上海教会，1951年10月）。
- [169] 张锡康：《张锡康回忆录—上海地方教会六十年来的回顾》（香港：光荣，2012），页177-178,510。
- [170] 张锡康：《张锡康回忆录—上海地方教会六十年来的回顾》（香港：光荣，2012），页177-178。
- [171] 张锡康：《张锡康回忆录—上海地方教会六十年来的回顾》（香港：光荣，2012），页178。
- [172] 根据吴维傅，蔡昭修的太太是虬江路第二家的一位家负责姊妹。吴维傅：《中国的以巴弗》，张云妍、徐嘉徽编（台北：中福，2002），页102-103。
- [173] 吴维傅：《中国的以巴弗》，张云妍、徐嘉徽编（台北：中福，2002），页103。
- [174] 《中流砥柱》，第17章：
- [175] 吴维傅：《中国的以巴弗》，张云妍、徐嘉徽编（台北：中福，2002），页101-105。张锡康：《张锡康回忆录—上海地方教会六十年来的回顾》（香港：光荣，2012），页178,511。
- [176] 吴维傅：《中国的以巴弗》，张云妍、徐嘉徽编（台北：中福，2002），页105-106。
- [177] 倪柝声：《我是怎样转过来的？》（上海：上海教会，1951年10月）。吴维傅：《中国的以巴弗》，张云妍、徐嘉徽编（台北：中福，2002），页111。
- [178] 吴维傅：《中国的以巴弗》，张云妍、徐嘉徽编（台北：中福，2002），页108-112。
- [179] 沈德溶：〈发动信徒群众，搞好控诉运动〉，《天风》，总280号（1951年9月8日），页2。
- [180] 〈教会革新必须发动信徒群众〉，《天风》，总299号（1952年1月26日），页1。引自邢福增：《反帝·爱国·属灵人》，页60。
- [181] Joseph Tse-Hei Lee, “Politics of Faith: Patterns of Church-State Relations in Maoist China (1949-1976),” *Historia Actual Online*, No. 17 (October, 2008), 130.
- [182] 张锡康回忆录，510。
- [183] 1957年，毛泽东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分为两类：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矛盾，例如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则是非对抗性的。按照处理是否得当，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可能互相转换。
- [184] 政务院文委宗教事务处编：《基督徒聚会处简况》，《宗教情况通报》17号（1951年11月12日），页1-3。转引自邢福增：《反帝·爱国·属灵人》，页95注184。参政务院文委宗教事务处编：〈关于基督徒聚会处及倪柝声的各种活动〉，《宗教情况通报》第23号（1952年4月17日），页1-2。转引自邢福增：《反帝·爱国·属灵人》，页86注157,96注186。
- [185] 〈福州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处关于鼓岭“基督教执事之家”破坏土改问题的调查报告〉，《天风》，总298号（1952年1月19日），页8-10。
- [186] 见在1951年9月，四自称“小群”的会员在南京大会上谴责倪柝声是“反革命分子”、1951年10月30日《天风》，发表出一位署名南京“小群”教会信徒的攻击倪个人的文章
- [187] 中流砥柱，第17章
- [188] 〈一零五二首诗歌〉（上海：上海福音书房，1952），第645首。参陈希曾：《晒熟的美果—倪柝声的诗歌及其源考》，修订版（美国：活道，2015），页309-311,472。
- [189] 〈祝第一届三自革新运动干部学习班〉，《天风》，288（上海，1951年11月3日），页2-3。
- [190] 〈三自革新运动干部学习班学习内容提要〉，《天风》，288（上海，1951年11月3日），页4。
- [19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展开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页11-13。
- [192] 该文件注1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一九五二年一月五日通知内容如下，根据本会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的指示，兹决定目前全国各界社会人士的思想改造的学习，即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内容，以配合实际斗争，清除旧时代的遗毒，树立新社会的道德，并为今后的经常学习奠定基础。此项学习的时间定为两个月。学习方法为学习文件、组织报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包括检举和坦白）。学习文件定为《毛泽东同志论反对贪污浪费》，《人民日报》一月四日社论《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伟大斗争中，发动群众的关键何在》和各大行政区各省市首长关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报告。参加学习的人数愈多愈好，尤其要努力吸引工商界的广大人士参加。务望各地协商机关迅速成立学习委员会，领导这个伟大的学习运动。”
- [19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页448,526。
- [194] 冯客 (Frank Dikötter)，《解放的悲剧：中国革命史1945-1957》（The Tragedy of Liberation: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萧叶译，初版（新北：联经，2018），页179-182。

- [195] 张鸣,《执政的道德困境与突围之道——“三反五反”运动解析》,页48。
- [196] 张鸣,《执政的道德困境与突围之道——“三反五反”运动解析》,《二十一世纪》,92期(2005年12月),页47。
- [197]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草案说明稿的批语和修改〉,收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页411。
- [198] 〈中共中央关于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1956年12月1日),收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页471-485。〈中共中央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1956年12月8日),收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页500-501。
- [199] 张鸣,《执政的道德困境与突围之道——“三反五反”运动解析》,页48。
- [200] 《洗脑的历史》,157-159。
- [201] 冯客(Frank Dikötter),《解放的悲剧:中国革命史1945-1957》(The Tragedy of Liberation: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萧叶译,初版(新北:联经,2018),页182-83,185。张鸣,《执政的道德困境与突围之道——“三反五反”运动解析》,页48。
- [202] 谢泳:〈1949年至1976年间中国知识分子及其它阶层自杀现象之剖析〉,《当代中国研究》,2001年第3期。
<https://www.modernchinastudies.org/cn/issues/past-issues/74-mcs-2001-issue-3/582-19491976.html>
- [203] 郑维伟:《权力转移与组织调适:上海“五反”运动浅析》,《二十一世纪》,页84。
- [204] 〈上海部分区五反中曾发生左倾混乱现象 市委发现后已很快予以纠正〉,《内部参考》,第80号(1952年4月11日),页99。转引自郑维伟:《权力转移与组织调适:上海“五反”运动浅析》,《二十一世纪》,页78,85。
- [205] 〈爱国爱教的基督徒积极参加“三反”与“五反”运动〉,《天风》,总300号(1952年2月9日),页1。
- [206] 〈在发动信徒参加“三反”“五反”运动中的思想问题〉,《天风》,总301号(1952年2月16日),页1。〈上海各教会积极发动信徒投入“三反”与“五反”运动〉,《天风》,总301号(1952年2月16日),页2。
- [207] 〈上海伯特利医院发现“大老虎”〉,《天风》,总302号(1952年2月23日),页1。〈上海才记锯木厂资本家李能才腐蚀和陷害工人〉,《天风》,总302号(1952年2月23日),页2。
- [208] 〈上海伯特利医院发现“大老虎”〉,《天风》,总302号(1952年2月23日),页1。
- [209] 《五十年代控诉运动研究——以上海为中心》,第四章,页73-74。
- [210] 《五十年代控诉运动研究——以上海为中心》,第四章,页74。
- [211] 郭荣刚、张恩强,〈生化药厂与抗日战争〉,《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05(2014),页420-421。
- [212] 郭荣刚、张恩强,〈生化药厂与抗日战争〉,《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05(2014),页420-421。参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专业志--上海医药志--第一编行业--第二章化学制药行业--第二节企业
- [213] 李常受:《今时代神圣启示的先见》,页98-99。见倪内弟张宜纶(倪妻张品蕙的弟弟)的见证,张是惟一在倪作生意期间从始至终和倪一起的人(从1938至1949年)(页99-101)。
- [214] 李常受:《今时代神圣启示的先见》,页99。1950年4月,倪以教会名义集资旧人民币8.6亿元,在漂阳路开办翠华化工厂有限公司(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专业志--上海化学工业志--第二篇行业企业--第二章企业--第三节中型企业)
- [215] 〈诡诈的盗窃〉,上海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编:《学习通讯》第3期(1956年2月29日),页1。陈说如:〈他们压迫我们工人〉,上海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编:《学习通讯》第3期(1956年2月29日),页2。转引自邢福增:《反帝·爱国·属灵人》,页92-93。
- [216] 《中流砥柱》,第17章。
- [217]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天风》总498号(1956年2月6日),页9-10。原载2月1日上海《解放日报》。
- [218] 丁抒:《阳谋——反右派运动始末》(开放杂志社,2006) Cerritos Library 43 miles from your current location. 18025 Bloomfield Ave, Cerritos, CA, 90703 8578, United States
- [219] 〈中南局宣传部关于中南各级学校三反运动问题给中央的报告及中央批示〉(1952年5月23日),收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页364。
- [220] <https://banned-historical-archives.github.io/articles/422ec55e18>
- [221] 《中流砥柱》,第17章,页239。转引自《50年代控诉运动》,页75。
- [222] 〈西南局统战部关于在三反中揭穿了“神在重庆的教会”的面孔的报告(摘要)〉(1952年2月)。内部文件。
<https://banned-historical-archives.github.io/articles/dfac8ba914>。关于圣母军和一贯道下面简介。

- [223] 〈中南局宣传部关于中南各级学校三反运动问题给中央的报告及中央批示〉（1952年5月23日），收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页364。<https://banned-historical-archives.github.io/articles/422ec55e18>
- [224] 〈中央批转华东局宣传部关于上海第二批高等学校“三反”运动情况报告〉（1952年7月）。内部报告。
<https://banned-historical-archives.github.io/articles/99b55bae22>
- [225] 〈中央关于教会革新运动不用三反作口号的指示〉（1952年8月）。内部报告。
<https://banned-historical-archives.github.io/articles/2a941ec063>
- [226] Melissa Wei-Tsing Inouye, *China and the True Jesus: Charisma and Organization in a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191.
- [227] 有学者认为，肃反运动的起始时间，应该是1951年5月，而不是1955年7月。至于大规模肃反运动从1955年7月正式发动，于1960年9月结束，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一）肃反运动的发动（1955年7月—1956年12月）、（二）肃反运动的高潮（1956年12月—1958年12月），以及（三）肃反运动的结束（1958年12月至1960年9月）（王小平，〈五十年代肃反运动的来龙去脉探究〉，西部学刊）
- [228] “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指示》基于当时对国内阶级斗争状况的严重估计，认为“在很多部门，在很多地方，大量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还没有揭露和肃清的”，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场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同时要求将审干工作与肃反斗争密切结合进行。按照中央的部署，全国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机关，高等学校和干部学校，中小学（不包括学生），军队，国营、合作社营和公私合营的企业，均须进行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从1955年下半年起，内部肃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分批进行，到1957年底基本结束。”（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系列辞典》[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9]）（<https://baike.baidu.com/item/内部肃反运动（1955年7月1日—1957年底）/56666957>）
- [229] 〈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1955年7月1日）。
- [230] 〈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1955年8月25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页141。
- [231]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1月出版）。《尤金与陆定一会谈纪要：介绍中国政治运动的状况》（1955年10月22日）的附件《与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的会谈纪要》（见第六卷，第73~80页，下同），引自朱正：〈陆定一和尤金谈肃反运动〉，载《炎黄春秋》第9期（2015）。
- [232] 《天风》周刊26-27期社论：《加强团结，明辨是非》，1955年7月11日。
- [233] 〈中央十人小组转发山西省委十人小组对基督教“小羣”分子政策界限的解释〉（1956年6月9日），收《肃反运动政策界限文件彙集》（缺出版地，1956），21。
- [234] 〈中央十人小组转发山西省委十人小组对基督教“小羣”分子政策界限的解释〉（1956年6月9日），收《肃反运动政策界限文件彙集》（缺出版地，1956），22。
- [235]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1月出版）。《尤金与陆定一会谈纪要：介绍中国政治运动的状况》（1955年10月22日）的附件《与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的会谈纪要》（见第六卷，第73~80页，下同），引自朱正：〈陆定一和尤金谈肃反运动〉，载《炎黄春秋》第9期（2015）。
- [236]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编：《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罪证展览会材料彙编》（缺出版地，1957年10月），页2。
- [237] 主管全国公共安全工作的组成部门。公安部前身是1949年10月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1954年9月改为现名。
- [238] 于1955年8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第一局（政治保卫局）编印的内部文件（共21页）。文件上面有署名“罗”，可能为时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1906-1978）。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将军之一。1949年10月15日至1954年9月29日期间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兼北京市公安局局长，1954年9月29日至1959年9月17日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部长、公安军司令员兼政委。1955年9月27日获授予公安军大将。（参 <https://zh.wikipedia.org/wiki/罗瑞卿>，[139](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罗瑞卿传》编写组. 罗瑞卿传.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7、罗瑞卿—新中国第一任公安部长 罗瑞卿, 陶驷驹 主编 群众出版社）</p>
<p>[239]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第一局编，《基督徒聚会处（小群）概况》，1。</p>
<p>[240]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第一局编，《基督徒聚会处（小群）概况》，3。</p>
<p>[241]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第一局编，《基督徒聚会处（小群）概况》，4。</p>
<p>[242]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第一局编，《基督徒聚会处（小群）概况》，5-6。</p>
<p>[243]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第一局编，《基督徒聚会处（小群）概况》，9-16。</p>
<p>[244]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第一局编，《基督徒聚会处（小群）概况》，16-21。</p>
<p>[245]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第一局编，《基督徒聚会处（小群）概况》，21。</p>
</div>
<div data-bbox=)

- [246] “关于打击隐藏在“基督徒聚会处”中的反革命分子问题”
- [247] “关于打击隐藏在“基督徒聚会处”中的反革命分子问题”
- [248] “关于打击隐藏在“基督徒聚会处”中的反革命分子问题”
- [249] “关于打击隐藏在“基督徒聚会处”中的反革命分子问题”
- [250] “关于打击隐藏在“基督徒聚会处”中的反革命分子问题”
- [251] 参《彻底肃清潜藏在基督徒聚会处内的反革命分子》。沈德溶：《在三自工作五十年》（上海：上海市基督教两会，2000），页77-78。
- [252] 参张锡康：《张锡康回忆录》，190。
- [253] 张锡康：《张锡康回忆录》，212-213。
- [254] 〈破获隐藏在“上海基督徒聚会处”内倪柝声反革命集团〉，《天风》总498号（1956年2月6日），页5。张锡康：《张锡康回忆录》，188。
- [255] 俞崇架：《俞成华医生轶事》，376-377，引自邢福增，131-132。
- [256] 左弗如：《神在我的软弱上显明了祂的大能》，原刊于《上海基督徒聚会处通讯》第1期（1956年5月），由南阳路聚会处“信徒学习委员会”出版，收张锡康：《张锡康回忆录》，191-195。据张锡康记述，左弗如患了癌症，临终时表示：“我很后悔，我给弟兄姊妹领错了路。”（页195）。
- [257] 张锡康：《张锡康回忆录》，189。
- [258] 易庆瑶（主编），《上海公安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1997），第二十编人物，第一章人物传略，许建国：“1952年1月后，许建国任公安部副部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部长兼上海市公安局局长、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政法部部长、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上海警备区政委。1956年，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政法、党群、外事等工作。许建国在上海工作期间，十分重视提高公安干警的政治素质，要求搞好警风和警民关系。1952年夏，他领导开展整顿组织和警风的工作，对犯有利用职权敲诈勒索、包庇犯罪分子、腐化堕落、侮辱妇女等六害的人员进行集中清理，纯洁了组织。同年7月，许建国兼任上海市肃清毒品委员会主任，开展禁烟肃毒运动，消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烟毒祸害，使上海成为无毒的城市之一。许建国在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中，十分重视严格依法办事，力求把保护人民的合法权益和稳、准、狠地打击犯罪分子结合起来。他在干部中反复强调“要做到防错防漏，不枉不纵”；“政法干部手中握有生杀予夺之权，决不允许草率办案”。1956年夏，他根据中央部署，亲自检查清理积案的工作，纠正了一批错案，从而减少和避免了冤错案件的发生。“文化大革命”中，许建国遭受迫害，被关押秦城监狱。由于长期关押和摧残，1975年5月出狱时已身心憔悴，1977年10月4日病逝于安徽省合肥市。1980年3月，中共中央为许建国平反昭雪。”（<https://www.shtong.gov.cn/difangzhi-front/book/detailNew?oneId=1&bookId=4476&parentNodeId=58550&nodeId=46545&type=-1>）
- [259] 易庆瑶（主编），《上海公安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1997），第二编惩治反革命罪犯，第四章打击以宗教作掩护的反革命分子。
- [260] 〈上海市二千五百基督徒集会揭露倪柝声反革命集团〉，《天风》总498号，11-13,18。邢福增，《》，132。张锡康：《张锡康回忆录》，189。
- [261] 《解放日报》（2月2日）第3版。许梅骊：〈我控诉〉，《天风》总499号（1956年2月20日），11-12。
- [262] 张锡康：《张锡康回忆录》，189。
- [263] 张锡康：《张锡康回忆录》，189。
- [264] 《解放日报》（2月1日）第1版。张锡康：《张锡康回忆录》，189。
- [265] 《解放日报》（2月3日）第1版。
- [266] 《解放日报》（2月3日）第1版。张锡康：《张锡康回忆录》，189。
- [267] 张锡康：《张锡康回忆录》，200。
- [268] 包括：2月3日〈解放日报〉又登载所谓“交出来”运动是一个大骗局。这篇文章是一个笔名“阿章”的人写的。弟兄姊妹看了文章都知道这是知道内情的人写的，或者就是我们自己的弟兄，但是许多记载都不符合事实。2月5日登载何广明的母亲李蟠珠一篇控诉稿〈还我被骗去台湾的儿子〉。
- [269]
- [270]
- [271] 邢福增，133。
- [272] 〈解除顾虑，勇敢揭发！〉，《学习通讯》第2期（1956年2月22日），页1。引自邢福增，133。

- [273] 〈消息〉，《学习通讯》第1期（1956年2月8日），页1。引自邢福增，133。
- [274] 〈本市基督徒聚会处全体信徒集会，控诉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罪行〉，《学习通讯》第3期（1956年2月29日），页1。引自邢福增，133。
- [275]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公安志》，第二编，第四章：
<https://www.shtong.gov.cn/difangzhi-front/book/detailNew?oneId=1&bookId=4476&parentNodeId=59921&nodeId=46226&type=-1>。〈全市同道参观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罪证展览会〉，《学习通讯》第2期（1956年2月22日），页1。〈外埠同道来上海，参观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罪证展览会〉，《学习通讯》第3期（1956年2月29日），页1。
- [276] 张锡康：《张锡康回忆录》，199。关于展览会上的字迹，也遭到其他熟悉倪字迹者的质疑，如倪同工陈则信之子陈福中的质疑（《倪柝声传》，页XX）。
- [277] 张锡康：《张锡康回忆录》，513。
- [278] 董必武，〈关于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问题的报告〉（1956年1月31日）
https://www.gov.cn/test/2008-02/20/content_894766.htm，刊登在《人民日报》（1956年2月1日）第4版。
- [279] 《人民日报》（1956年2月2日），第3版 <https://cn.govopendata.com/renminribao/1956/2/2/3/#135890>
- [280] 《人民日报》（1956年2月7日），第7版 <https://cn.govopendata.com/renminribao/1956/2/7/7/#136202>
- [281] 包括：当时上海第二医学院的许梅骊、上海交通大学的张主怀、上海中山医院的刘约翰、上海生化药厂的范在甲、翠华化工厂的顾吉成，以及以琳印刷所的陈说如。（张锡康：《张锡康回忆录—上海地方教会六十年来的回顾》，第19章，（四），页XX）
- [282] （邢）
- [283] 曹，70。
- [284] 曹，70。
- [285] 根据许梅骊在《警钟长鸣》一书中自述，她是1947年9月27日在上海的文德里受浸，参加地方教会的，那时她高中二年级。（第一篇：关于许梅骊和她的两本书）<http://www.jdt365.net/post/1408.html>
- [286] 林向途
- [287] 《曹圣洁的口述》，28。根据曹口述，圣约翰大学（St. John's Christian Fellowship，简称SJCF）的学生中也有由基督徒聚会处的青年骨干组成的团契。这个团契的活动场所是借用了SJCF的活动室，它没有具体的名称，也没有张贴公告，而是透过个别通知。这团契的负责人主要是医学院的学生，男负责人是俞崇信，他是上海教会长老俞成华的儿子，女负责人是许梅骊，她后来在控诉运动中“揭发”了许多事情。
- [288] （许，第十章）
- [289] <http://www.jdt365.net/post/1408.html>。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但“隔离审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在1994年之前对公职人员的一种措施，完全限制了人身自由，。此措施在“文化大革命”中到处盛行。之後，“隔离审查”逐渐被“双规”取代。（[https://zh.wikipedia.org/zh-hant/ 隔离审查](https://zh.wikipedia.org/zh-hant/隔离审查)）
- [290] 难混岁月
- [291] <http://jdt365.net/post/183.html> 第二十三章“文化大革命”时期弟兄姊妹的情况（1966年到1976年）（张锡康：《张锡康回忆录—上海地方教会六十年来的回顾》，光荣出版社，2012,10初版，第257-286页。）
- [292] <http://jdt365.net/post/183.html> 第二十三章“文化大革命”时期弟兄姊妹的情况（1966年到1976年）（张锡康：《张锡康回忆录—上海地方教会六十年来的回顾》，光荣出版社，2012,10初版，第257-286页。）曹，70。
- [293] 林向途
- [294] 陈福中，页XX。许梅骊向秉衡解除婚约后，高娶了陈福中的二妹陈秀美为妻。
- [295] <http://jdt365.net/post/183.html> 第二十三章“文化大革命”时期弟兄姊妹的情况（1966年到1976年）（张锡康：《张锡康回忆录—上海地方教会六十年来的回顾》，光荣出版社，2012,10初版，第257-286页。）
- [296] 张锡康：《张锡康回忆录—上海地方教会六十年来的回顾》，光荣出版社，2012,10初版，第213页。
- [297] 《难混》第十二章
- [298] 林向途
- [299] 林向途
- [300] 曹，70，林向途
- [301] 许在该书中，虽然没有明确标明引用梁的研究，全书却处处包含了与梁的著作极度吻合的研究依据。

- [302]曹，70。
- [303]见于(1)：〈我控诉〉《天风》(总499号)(1956年2月20日)，第11-12页，原载上海《解放日报》(1956年2月2日)；(2)〈起来，揭露这批豺狼！—上海基督徒聚会处信徒愤怒控诉倪柝声反革命集团—〉《天风》(总499号)(1956年2月20日)，第12-14页；(3)〈访许梅骊〉《天风》(总500号)(1956年2月29日)，第8-10页；〈许梅骊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第一届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载《解放日报》(1956年4月15日)。
- [304]
- [305]1950年代上海 - 维基百科
- [306] <http://jdt365.net/post/187.html> 第十九章 上海基督徒聚会处经过肃反运动的情形 (张锡康：《张锡康回忆录—上海地方教会六十年来的回顾》，光荣出版社，2012,10初版，第187-227页。) (四) - (六) 页XX。
- [307] 〈本市基督徒聚会处信徒们组成了学习委员会〉，《学习通讯》第4期(1956年3月19日)，页1。
<http://jdt365.net/post/187.html> 第十九章 上海基督徒聚会处经过肃反运动的情形 (张锡康：《张锡康回忆录—上海地方教会六十年来的回顾》，光荣出版社，2012,10初版，第187-227页。) (四) - (六) 页XX。
- [308]张锡康、左弗如、张主怀：〈上海基督徒聚会处近讯〉，《天风》总504号(1956年5月14日)，页28。
- [309] 〈本市基督徒聚会处信徒们组成了学习委员会〉，《学习通讯》第4期(1956年3月19日)，页1。
- [310]南阳路聚会处“信徒学习委员会”一共出了八期《通讯》，从5月24日第一期到1957年12月29日第八期止。
- [311]1939年12月，上海福音书房出版了唐醒(唐守临)和袁周洁民翻译的节译本，受到中国基督徒的欢迎。到1947年已经增印到第8版。(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D%92%E6%BC%A0%E7%94%98%E6%B3%89) 〈李更新同道的发言(摘要)〉，《天风》总502号(1956年4月16日)，页13。(《天风》)
- [312] 〈补选委员名单〉，《天风》总502号(1956年4月16日)，页16。〈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第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出席名单〉，《天风》总502号(1956年4月16日)，页17。〈〈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第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列席名单〉，《天风》总502号(1956年4月16日)，页18-20。
- [313]其中刘约翰是中山医院的医生，新的长老：许梅骊是青年代表；乔静文是家庭妇女，信徒代表(曹，78-79)
- [314]
- [315]张锡康、左弗如、张主怀：〈上海基督徒聚会处近讯〉，页28。引自邢，136。
- [316]黄守奉：〈基督徒聚会处站起来了〉，《天风》总503号(1956年4月30日)，页33。
- [317]《解放日报》(1956年4月15日)(https://digital.lib.hkbu.edu.hk/newscipping/search.php?language=sc&categories=NCB*&starts=1050) 1
- [318]上海宗教志 >> 第五编基督教 >> 第二章团体 >> 第二节 上海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页460。〈上海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1955年3月17日，上海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同年4月25日至29日举行上海市基督教第一届代表会议，正式成立上海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以下简称“上海三自”)。第一届三自主席为陈见真、秘书长为罗冠宗，第二届主席为谢永钦、秘书长为罗冠宗。
https://mzzj.sh.gov.cn/2021j dj_shjdj szagy dwyh/index.html
- [319] 张锡康在大会后写了一篇文章〈我参加了上海市基督教青年大会的体会〉，刊登在“信徒学习委员会”的〈通讯〉第四期中。<http://jdt365.net/post/187.html> 第十九章 上海基督徒聚会处经过肃反运动的情形 (张锡康：《张锡康回忆录—上海地方教会六十年来的回顾》，光荣出版社，2012,10初版，第187-227页。) (六) 页XX。第二十一章 上海基督徒聚会处南阳路会所捐献给国家，并入怀恩堂成立联合礼拜(1958年) <http://jdt365.net/post/185.html>
- [320]曹，57。
- [321]阎迦勒，〈中国基督徒在一条光明的康庄大道上〉，《人民日报》(1957年3月19日)
- [322]张化：〈联合礼拜：中国基督教会两次抉择的成果〉《金陵神学志》2019年02期，58-81。
<http://www.juqk.net/tougao/qikan-46954.html>
- [323]审理过程登载在《通讯》第三期中，由《天风》杂志的记者“井谷”署名的报道标题为《审理倪柝声旁听记》，载于XX期，第28-29页。
- [324]
- [325]難混歲月、警鐘長鳴
- [326]《當「洗腦」統治了我們》，173。謝泳：〈思想改造運動的起源〉。

- [327]邢福增：《三自爱国运动的起源与发展（1949-1957）》，收邢福增、梁家麟：《五十年代三自运动的研究》（香港：建道神学院，1996），页53-54。据统计，在“镇压反革命运动”被判死刑者约二百万人；在“五反运动”中五百名资本家判死刑，三万多人判徒刑（页53，注110-111）；肃反？
- [328]期间，造成了诸多冤假错案，有许多资本家和商人被迫害自杀，亦有许多人士被处决或折磨致死，中国资产阶级走向消亡，仅在上海一地，从1月25日至4月1日的不完全统计，因运动而自杀者就达到了876人，平均每天的自杀人数几乎都在10人以上。。[12][13]，<https://zh.wikipedia.org/zh-hans/三反五反运动>，[3][10][12][13][14]。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
- [329]期间全国共造成140多万知识分子和干部被迫害，21.4万人被捕，2.2万人被枪决，总共死亡5.3万人。注：<https://zh.wikipedia.org/zh-hans/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13][4][5][6][7][10] 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简称“肃反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1955年发动的一场政治运动，目标是肃清中共、政府、军队中的反革命分子。潘汉年案
- [330]控诉者（被洗脑者）的自我描述经历，可参崔宪详：《我对于控诉的一点经验和体会》，《天风》，总261期（1954年5月19日），页4。刘清芳：《我认清了顾仁恩的反动面目》，《天风》，总265期（1951年5月26日），页1,3。朱光朝：《我参加政治学习后的感想》，《天风》，总265期（1951年5月26日），页5。
- [331]《当洗脑统治了我们—思想控制的技术》（），193-196。
- [332]《当洗脑统治了我们—思想控制的技术》（），255。
- [333]《上海耶稣家庭革新经过》，《天风》总号366（1953年5月18日），页287。
- [334]《天风》（总号364）（1953年5月4日）《扫除污秽 洁净圣殿》，253-5。
- [335]《教会消息》，《天风》总268-269号（1951年6月21日），页19。
- [336]《教会消息》，《天风》总268-269号（1951年6月21日），页19。
- [337]邵琼：《揭露马兆瑞的罪恶》，《天风》总286号（1951年10月12日），页8-10。
- [338]《郑州市基督教浸礼会教友控诉美帝暴行及其走狗董子成罪行大会宣言》：《天风》总286号（1951年10月12日），页11。
- [339]《南京市泰东孤儿院孤儿控诉教会恶霸王克己—人民法院接受人民要求，将王犯予以逮捕》，《天风》总291号（1951年11月24日），页4。
- [340]李文蔚相信政府对敬的性道德指控也是真确的：“当时被揭露有淫乱罪名的，只有两个，就是聚会处的倪柝声和耶稣家庭的敬奠瀛。原因无他，就是因为这两个人确实都有这样的行为，而倪的犯罪情节尤较敬为严重。”，然而，许却是不相信敬，但相信倪（《难民》）：“”。
- [341]宋永毅，《洗脑》，IV。
- [342]李文蔚，页XX。「隔离审查」，亦称“双规”，是中国共产党在进行纪律检查方面调查的一个措施，是指共产党员在接受检察机关调查前的党内调查和限制人身自由。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中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要求有关人员在规定的地点、时间、地点就案件所涉及的问题作出说明”，期间不能和外界联系。然而，双规对象没有限制为党员，只要跟案件有关的党员和非党员都可以进行双规调查。直到2005年发布《7号文件》和《28号文件》，才进一步明确双规对象必须是党员。（中国行政评论 第26卷第1期 The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Vol.26 No.1 March 2020.71-101, DOI: 10.6635/cpar.202003_26 (1) .000471, <中国大陆反腐措施问题与改革之研究—从双规到留置>, 陈铭聪)
- [343]难民岁月，页99。
- [344]难民岁月，页104。
- [345]难民岁月，页105-106。
- [346]比较的例子，《》，页
- [347]投名状在古代用于忠诚之征，意思是加入一个组织前，以该组织认可的行为表示忠心。其所谓“但凡好汉们入伙，须要纳投名状”，大意是指一个人在进入绿林时必须签署的一份生死契约，有了“投名状”便落草为寇。而摆脱“投名状”的方法，就只有接受官府的招安这一条路了。所以后世就沿用了这一系列的说法即为“投名状”。（<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A%95%E5%90%8D%E7%8A%B6/24850#:~:text=%E6%8A%95%E5%90%8D%E7%8A%B6%E5%9C%A8%E5%8F%A4%E4%BB%A3%E7%94%A8.%E5%8D%B3%E4%B8%BA%E2%80%9C%E6%8A%95%E5%90%8D%E7%8A%B6%E2%80%9D%E3%80%82>）
- [348]梁时为建道神学院副院长，院长为张慕恺，讨好院长和中国共产党（Sam Nee's Interview, 01/24/2024）
- [349]于中旻、倪徐恩秀、陈终道、吴主光、周子坚，《对再批斗倪柝声的平议》（香港：金灯台，2004）。https://goldenlampstand.org/books/GL129/GL129_Nee_Full.pdf

- [350]梁家麟：《倪柝声的荣辱升黜》（2003），页31。
- [351]参于中旻、倪徐恩秀、陈终道、吴主光、周子坚：《对再批斗倪柝声的平议》（香港：金灯台，2004）。
- [352]参David F. Bjorklund (ed.) , *False-Memory Creation in Children and Adults: Theory, Research, and Implications*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2000) 和Martin A. Conway (ed.) , *Recovered Memories and False Memor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 [353]Elizabeth Loftus and Katherine Ketcham, *The Myth of Repressed Memory: False Memories and Allegations of Sexual Abuse* (New York: St. Martin's Griffin, 1994).
- [354]奥立佛·萨克斯 (Oliver Sacks) 《意识之川流：萨克斯优游于达尔文、弗洛伊德、詹姆斯的思想世界》 (The River of Consciousness) , 杨玉龄译 (2018) 。<https://bookzone.cwgv.com.tw/article/13541>
- [355]
- [356]梁任建道神学院的上一任院长为张慕皮牧师 (1980-2005) , 梁于2005年9月开始接续张任建道院长至2018年。
- [357]还有另一位韩国的前地方教会人士“X東根”。
- [358]Tertullian, “Apology,” ch. 50, in *Anti-Nicene Fathers*, trans. Sydney Thelwall, edited by Alexander Roberts, James Donaldson, and A. Cleveland Coxe (Buffalo, N.Y.: Christian Literature Publishing, 1885), 3:55.
- [359]Clark M. Patrick, "Translator's Preface," in Servais Pinckaers, OP, *The Spirituality of Martyrdom... to the Limits of Love* (Washington, D.C.: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2000), xviii.
- [360]李榭熙：〈为信仰而死，转变的记忆：中国基督教殉道者倪柝声（1903–1972）〉，《澳门利氏学社学刊》（2018），
- [361]Craig Hovey, *To Share in the Body: A Theology of Martyrdom for Today's Church* (Grand Rapids, MI: Brazos Press, 2008), 133.
- [362]
- [363]这人将来如何 第四章 保罗与生命

附件一

政治的信仰：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政教关系（1949-1976年）〔節錄〕

李樹熙 (Joseph Tse-Hei Lee)

摘要：本文探讨了基督教新教在毛主义国家崛起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文章关注基督教与国家权力之间的互动，以及国家对中国基督徒的宗教和政治身份的影响。特别是，它讨论了国家如何利用基督教来宣称其合法性并建立对基督徒的意识形态控制，以及一般基督徒如何反过来利用其宗教资源来加强自己在政治竞争中的地位。

关键词：潮州、毛泽东思想、小群、三自爱国运动

引言

二十世纪是中国新教发展、压制和复兴的时期。随着人们对中国基督教历史的兴趣与日俱增，本文介绍了毛泽东时代（1949-1976年）教会与国家冲突的两个案例。选择这些案例是为了说明普通新教徒如何应对毛泽东主义与基督教之间的政治冲突，以及他们采取了哪些生存策略来保护自己免受社会主义政权的迫害。第一个案例涉及基督徒聚会处（jidutu juhuichu），在西方被称为“小群”（xiaoqun），这是一个快速发展的本土新教运动，由倪柝声于二十世纪初创立。1949年后，基督徒聚会处转变为一个分散的宗教团体互助网络，并扩展到传教士尚未到达的许多偏远地区。第二个案例涉及华南沿海广东省讲潮州话的浸信会和长老会（见“地图 1. 潮州”）。

地图 1. 潮州



城市教会领袖成功地调解了与当地政府的冲突，而农村教会则利用长期的亲属关系和世系网络，在农村各地建立了自治的礼拜社区。在这两种情况下，新教社区都拒绝接受毛派国家的控制。它们也不认同由国家控制的三自爱国运动（sanzi aiguo yundong）的反帝意识形态：

不受外国传教士和帝国主义控制的自治、不受任何外国捐款的财政自立、不受任何传教士影响的自我传教。作为一党制国家的总组织，三自爱国运动试图确保所有中国新教徒服从社会主义秩序。这些新教徒摒弃了毛泽东对政教关系的看法，坚持教会自治的信念，宣称每个教会都应成为自治机构，管理自己的事务，不受国家控制。然而，共产党国家将意识形态认同视为对社会主义国家绝对忠诚的同义词。因此，宗教皈依被视为对国家的挑战。这种基督教活动模式凸显了民众抵制国家强加的现代性的作用，并揭示了毛泽东时代中国教会与国家关系的复杂性。

1. 毛泽东思想与三自爱国运动

毛泽东时代共产党的宗教政策是什么？与过去的帝制国家一样，共产党国家不断推行与中国新教团体接触的“统一战线”政策。其目的是切断他们与外国传教企业的联系，将不同的新教教派置于列宁主义群众组织的控制之下，并清除教会中的反动势力和阶级敌人。共产党宗教政策的基础是国家与宗教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C. K. Yang 认为，毛泽东思想是一种非神论的“信仰”，表现出明显的宗教特征。中华民族的两个愿望表达了其理想主义民族的本质：民族主义和物质进步。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所有改革、革命和激进运动都是为了促进物质进步和建立强大的国家。毛泽东主义国家提出了同样的主张，但要求人民无条件地服从一切个人关切。毛泽东思想是中国最终命运的唯一指南，是实现民族独立和现代化的唯一途径[1]。共产主义国家决心将普通民众从宗教和“迷信”中解放出来，宣传世俗、科学和理性主义的世界观。它谴责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障碍[2]。共产党控制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努力导致所有基督教机构被毛泽东主义国家强制同化。

在此背景下，我们将讨论三自爱国运动。“三自”一词最初是由美国对外传教委员会的鲁弗斯-安德森和教会传教会的亨利-文在十九世纪创造的。“三自”描述的是一种传教政策，它将非洲和亚洲的当地基督徒组织成自我支持、自我管理和自我传播的教会。共产主义革命后，中国政府将“三自”口号改为“三自爱国运动”，以使国家接管新教教会合法化。在政治上，三自爱国运动是一个群众组织，与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一脉相承。它由一党制国家发起，旨在将宗教领域政治化并控制新教社区。1949年6月28日，中国基督教青年会（YMCA）全国委员会出版秘书长吴育宗充当了共产党和基督教全国理事会之间的中间人。他敦促教会领袖支持共产党。基督教青年会和基督教女青年会的许多领导人协助吴育宗在新教界推行亲共议程。共产党、基督教青年会（YMCA）和基督教女青年会（YWCA）之间的合作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革命运动时期，当时共产党成功收编了基督教青年会（YMCA）和基督教女青年会（YWCA）的部分领导人[3]。

1950年7月，吴耀宗率领由19位新教教会领袖组成的代表团会见了周恩来总理，并起草了一份名为《基督教宣言》的声明，表达了中国基督徒对共产党国家的忠诚。当时，朝鲜战争爆发，反美情绪高涨。《宣言》号召基督徒反对帝国主义，表明中国基督徒的政治立场，并建立一个由中国人自己管理的教会。这标志着三自爱国运动的开始。从表面上看，三自爱国运动呼吁中国教会本土化和教会自治。但它的根本目标是迫使中国基督徒切断与外国传教企业（尤其是外国传教企业）和外国人的机构联系。

全球政治的变化影响了中国的基督徒。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驱逐了所有外国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驱逐是一种民族主义行为，象征着外国帝国主义在近代中国的终结[4]。朝鲜战争期间，“基督教会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筹备委员会”成立，谴责西方传教士。经过一系列的声讨运动后，筹备委员会于1954年夏主办了第一届全国基督教会议，吴玉宗当选为会议主席，并受命组织“三自”爱国运动。宗教事务局的官员担任了运动的“顾问”。据梁碧云介绍，宗教事务局成立之初是为了处理少数民族事务局下属的宗教事务，1951年划归民政总署教育文化组。此外，中共中央统战部还设立了宗教科，负责执行共产党的宗教政策。大部分宗教干部都是共产党员，他们负责监督宗教活动[5]。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三自爱国运动结束了中国的传教时代，标志着共产党接管教会的开始[6]。很明显，三自爱国运动的领导人只是国家的代理人，他们按照共产党的设计重塑了基督教会。在绝对效忠毛泽东主义国家的巨大压力下，政治中立是不可能的，教会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存在。

2. 倪柝声和小群运动

基督徒聚会处起源于倪柝声（1903-1972）的教导和职事，他可能是二十世纪初最有影响力的华人新教传道人[7]。倪柝声出生于1903年，在一个第三代圣公会家庭中长大。1920年，倪柝声在一所圣公会宣教学校学习时，经历了一次激动人心的悔改经历，并决定成为一名全职传道人。在弟兄会思想的影响下，倪柝声摒弃了他在天主教会和中国大多数新教教派中看到的阶级制度。他敦促中国基督徒发展强大的普通信徒，摆脱对西方传教企业在教义指导和行政支持方面的依赖。他将教会或聚集视为“属灵的群体”，由一群蒙召出世间的基督徒组成——这一概念源自他对《新约——使徒行传》的解读。他强烈支持自治和独立的教会，认为应该“一地一教会”[8]。他强调必须保持独立的地方教会，因为在教义层面上，地方教会可以充当基督教教义的守护者。在他看来，一群基督徒将自己划分为不同的宗派在宗教和实践上都是没有道理的。他试图推动的是一个独立于任何外部控制的地方自治和非宗派教会。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倪柝声鼓励基督徒脱离已建立的宗派教会，加入“小群运动”。据估计，到1949年，小群运动的追随者多达七万人[9]。

在1949年后的时代，他们不愿加入国家控制的三自爱国运动，这就产生了对毛泽东主义国家的政治认同问题。在确认自己的基督教身份时，小群基督徒发现自己在传扬神性或确认毛主义意识形态，以及通过服从国家或在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中抵抗国家来选择政治稳定之间产生了分歧。一些“小群”成员选择与国家合作，而另一些成员则拒绝这样做，但无论如何，他们都卷入了政治。在整个毛泽东时代，与国家的紧张和冲突程度使他们很容易成为攻击目标。

朝鲜战争期间，倪柝声决心加强和扩大小群的活动。1951年1月，他发起了“教会合一运动”（jiaohui heyi），将其他新教团体纳入“小群”。他支持那些因传教士被驱逐而面临经济困难的教会，并聘用他们的牧师和传道人。这一决定受到了一些外国传教企业的欢迎。一些中国内地会（CIM）和美国长老会的传教士在被驱逐之前，将他们的教会财产交给了“小群”，因为倪柝声决定继续他在中国的布道工作。结果，小群教会扩展到了中国西部的云南省，并在中国中部的浙江省吸收了多达十个中国内地会的聚会点及其牧师[10]。为了容纳这些基督教团体，倪氏允许他们保持各自不同的教会管理和敬拜形式[11]。

在结构上，“小群”的“教会合一运动”与共产党自下而上的建立联盟政策有相似之处，即在革命运动中与志同道合的团体和个人结盟，并将他们纳入党内。倪柝声将共产党的游击战术用于传福音目的，决心在其他基督徒和教会中建立联盟[12]。由于财政拮据和政治孤立，许多宣教教会和地方教派没有能力维持自己的机构，但与“小群”结成联盟将使他们能够在1949年后的时代生存下去。他们建立这些联盟的目的是为了生存，目标是使这些地方教会免于被三自爱国运动接管。当这些教会意识到外国传教士永远不会被允许返回中国时，他们不得不永久加入“小群”。建国初期是“小群”重塑全国基督教新教格局的大好时机。

共产党国家对“小群”的迅速发展充满怀疑和怨恨，并密谋对付倪柝声。1951年9月，四名“小群”成员在南京大会上谴责倪柝声是反革命分子。作为回应，倪柝声发起了一场反控诉运动，并惩戒了那些亲政府的小群成员[13]。但一年后，他被捕了。1956年，他被指控为反革命分子，并被控犯有一系列危害国家罪。他被判处15年监禁，1972年死于劳改营[14]。1951年的“小群”政治告发显然是为了从内部消除倪柝声的影响，但一旦告发，共产主义国家就会利用它来破坏他的信誉，并控制“小群”的聚会。

倪柝声于1952年被捕后，小群教会的带领者采取了几种策略来应对国家的迫害和重建基督教会。第一个策略是通过驱逐亲政府的成员来巩固小群会的内部团结。1953年，福州大会的领袖开除了三名参与当地反对倪柝声的政治运动的成员；1955年，南京大会的带领者谴责了四名在1951年发动反对倪柝声的群众运动的成员。第二个策略是挑战三自爱国运动。1953年7月，北京大会领导人阎迦勒和房爱光公开谴责三自爱国运动是共产党国家接管教会的工具，因此基于宗教良知退出了三自。阎迦勒还敦促内蒙古和陕西等西北省份的小群教会谴责三自爱国运动。房爱光访问了武汉、长沙、广州、济南和青岛的小群会，向他们解释了北京小群会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15]。到1954年，包括福建省十一个会在内的全国三十多个会退出了三自爱国运动。他们都拒绝参加三自爱国运动领导人举行的宗教仪式和政治会议[16]。这场反三自运动破坏了三自爱国运动的合法性，也威胁到了共产党政府的统一战线政策。第三个策略是从全国各社会阶层中招募成员。由于许多“小群”成员毕业于基督教高中和大学，他们在1949年前的年代里曾在医疗、教育、工业、商业和政府部门担任要职。根据他们的专业技能，共产党国家将他们划分为城市人口的三个部分：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国民党政权遗留下来的官僚和城市管理人员以及民族资产阶级（即私营工业家、店主和手工业者）。共产党建国初期基本上没有触及他们，并鼓励他们为新的政治秩序提供服务。例如，在山西省，有43名大学、中学和小学教师加入了“小群”。在福建省，许多“小群”医生和护士继续在国立医院工作。小群带领者呼吁这些城市专业人士向他们的朋友和同事传福音[17]。

此外，“小群”还向毛泽东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的受害者（主要是乡绅、地主、资本家和国民党政权的官员）传福音，因为“小群”成员可以很容易地向他们救恩的应许并解释他们的苦难。由于这种招募政策，大批前国民党党员和政府官员、资本家和地主加入了小群运动。从1954年到1955年，湖南省安阳大会的成员从1563人增加到2467人，增加了一半以上。1954年，福建省十一个教会的信徒人数增加了两倍[18]。就这些新皈依者而言，他们的宗教皈依与他

们在政治和社会动荡中寻求情感支持的愿望不谋而合。从短期来看，这种大规模皈依现象正在巩固意识形态上对国家的抵抗。

同样重要的战略是教育年轻的“小群”成员，并将他们组织成相互支持的青年团体。由于政府垄断了教育机构，并不断宣传其共产主义思想，因此小群带领者试图对抗国家对青少年的教育。除了圣经学习班、主日学校和青少年聚会外，他们还动员年轻的教会成员在大学和学校建立基督教团契，并向非基督徒学生传福音。据统计，“小群”成员在二十三所大学、二十六所医学院和许多职业学校学习。1954年7月，上海总会组织了一次大学生和中学生夏令营，来自上海、北京、武汉和浙江省的多达一千名学生参加了这次活动[19]。这一传福音策略非常有效，在20世纪50年代初吸引了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小群运动。最后一个策略是在共产党控制相对薄弱的地区建立新的据点。一些“小群”聚会点利用毛主席的土地改革和集体化运动传福音。1954年1月，厦门总会的叶美良将28户基督徒组织到龙溪区第八区的一个农村生产队，目的是在山区建立一个基督教村。江苏省也有类似的例子，吴江大会堂成功地在内地建立了一个基督教据点。莱城区鹤山村生产队的22户人家中有18户加入了吴江大会，生产队长和会计都是小群成员。这两个“小群”前哨深深扎根于中国东南部长期存在的乡村网络中。在穆斯林占主导地位的新疆省，乌鲁木齐教会从华东地区招募传道人，并帮助他们获得政府的许可，移民到当地定居。甘肃省的“小群”成员则跟随季节性商人网络迁徙到西藏[20]。到1955年，“小群”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运动，扩展到许多基督教尚未到达的偏远地区和边疆省份。

然而，最初的成功并不长久。20世纪50年代末，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对“小群”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1956年1月，倪柝声被指控犯有间谍罪、不道德罪和盗窃教会资金罪[21]。与此同时，教育机构、工业企业和政府部门也加大了清除小群成员的力度。全国各地的大多数“小群”领导人都被逮捕，并被指控犯有危害国家罪[22]。打击“小群”的运动充斥着政治话语，揭示了中国社会日益政治化的趋势。到1958年“大跃进”时，“三自爱国运动”成功接管了“小群”机构，并将其纳入自己的领导体系。大多数“小群”成员似乎与倪柝声的教导保持了距离，但他们仍在开展活动。1958年，内蒙古和云南两省传来了他们的活动报告，“小群”在这两个省的三自教会之外建立了小组[23]。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动荡的文化大革命时期（1967-1976年），所有的公安和宗教事务局都停止了工作，这反过来又为“小群”和其他新教团体在基层的活动开辟了一些空间。直到1978年中国对外开放，“小群”才开始恢复公开活动。与“小群”教会与国家冲突激烈的特点不同，下一个案例研究表明，潮州的新教团体与毛主义国家之间有很大的调解空间。

（作者李榭熙为美国纽约市佩斯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潮汕历史。出版著作有《圣经与枪炮：基督教与潮州社会1860—1900》等）

註：

[1] Yang, C. K., *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Social Functions of Religion and Some of Their Historical Factor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381-387.

- [2] Smith, Steve A., "Talking Toads and Chinless Ghosts: The Politics of 'Superstitious' Rumor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61-1965".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CXI-2 (April 2006), 405-427.
- [3] Wickeri, Philip L., *Seeking the Common Ground: Protestant Christianity, the Three-Self Movement, and China's United Front*. Maryknoll, Orbis Books, 1988, and *Reconstructing Christianity in China: K. H. Ting and the Chinese Church*. Maryknoll, Orbis Books, 2007.
- [4] Ling, Oi-Ki, *The Changing Role of the British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 London,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es, 1999, 148-180.
- [5] Leung, Beatrice, "China's Religious Freedom Policy: The Art of Managing Religious Activity". *The China Quarterly*, 184 (December 2005), 894- 913.
- [6] Wickeri, Philip L., *Seeking the Common Ground...*, op. cit., 117-153, Ling, Oi-Ki, *The Changing Role of the British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 op. cit., 122-180, and Yeo, K. K., *Chairman Mao Meets the Apostle Paul: Christianity, Communism, and the Hope of China*. Grand Rapids, Brazos, 2002, 152- 162.
- [7] The term "Christian Assembly" refers to a community of Christian worshippers rather than a church institution. The term "Little Flock" comes from Jesus' words to his followers in the Gospel of Luke 12:32: "Do not be afraid, little flock, for your Father has been pleased to give you the kingdom." Wickeri, Philip L., *Seeking the Common Ground...*, op. cit., 162.
- [8] Lu, Luke Pei-Yuan, *Watchman Nee's Doctrine of the Church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Its Contribution to the Local Church Movement*. Doctoral Dissertation,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 1992, 248-251, and Watchman Nee, *The Open Door*, no. 20. *The Collected Works of Watchman Nee*, vol. 55, Anaheim, California, Living Stream Ministry, 1994, 179, cited from May, Grace Y., *Watchman Nee and the Breaking of Bread: The Missiological and Spiritual Forces that Contributed to an Indigenous Chinese Ecclesiology*. Doctoral Dissertation, School of Theology, Boston University, 2000, 272.
- [9] The Shantou Municipal Archive, Shantou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gong'anbu diyuju* [The First Department of the Bureau of Public Securit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d.), *Jidutu juhuichu (xiaoqun) gaikuang* [Report on the Christian Assembly (Little Flock)] (hereafter Report on the Little Flock), 1-21.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laimed that the Little Flock had as many as 870 assemblies with eighty thousand adherents in 1955, but other scholars estimated the Little Flock adherents to be seventy thousand. See also Guest, Kenneth J., *God in Chinatown: Religion and Survival in New York's Evolving Immigrant Communit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3, 92-94.
- [10] *Report on the Little Flock...*, op. cit., 11, 20-21.
- [11] *Ibid.*, 18-21.
- [12] Wou, Odoric Y. K., *Mobilizing the Masses: Building Revolution in Hena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187-211.
- [13] *Report on the Little Flock...*, op. cit., 14-15.
- [14] Bays, Daniel H., "The Growth of Independent Christianity", in Kaplan, Steven (ed.), *Indigenous Responses to Western Christianit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5, 124-143.
- [15] *Report on the Little Flock...*, op. cit., 14-15.
- [16] *Ibid.*, 16, and *Xin Hunan bao* (New Hunan Newspaper), 17 January 1956, 3.
- [17]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ies Service Center,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Neibu cankao* (Internal References), 8 February 1955, 107.
- [18] *Report on the Little Flock...*, op. cit., 16-17.
- [19] *Ibid.*, 17-18.
- [20] *Ibid.*, 20.
- [21] "The Editorial", *Jiefang ribao* (Liberation Daily News), 1 February 1956, 1 and 3.
- [22] *Fuzhou ribao* (Fuzhou Daily News), 2 February 1952, "The Editorial", *Xin Hunan bao* (New Hunan Newspaper), 17 January 1956, 1, 3, and "The Editorial", *Zhejiang ribao* (Zhejiang Daily News), 27 January 1956, 2.
- [23]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ies Service Center,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Neibu cankao* (Internal References), 13 October 1958, 18-20.

附件二

奉 献

讲者：倪柝声

时间：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七日下午

地点：福建泉州

出版记录：摘自《倪柝声文集》第41册，第13篇，四版[臺灣福音書房，2004]，頁114。

特会、信息、及谈话记录（卷一）

奉献是基于神拯救的恩典

罗马十二章一节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这里的‘慈悲’在原文乃是多数的，就是指罗马书前面一至八章所说百般的恩典。按照罗马书的教训，十二章乃是接在八章之后。所以十二章所说的慈悲乃是一至八章里的那些事。也就是说，神的儿子已经为我们的罪死。祂替我们死，免我们受罪的刑罚；祂替我们活，使我们脱离罪的权势。神向着我们是有诸般的慈悲，因此保罗在这里不是命令我们，乃是劝我们将身体献上。罗马书头八章说到，从前我们是罪人，神的儿子来替我们流血赎罪。三至四章讲到血，五章讲到赦免，六至八章讲到十字架钉死我们的旧人，叫我们从罪得释放。祂替我们死，现今也替我们活。我们相信主的死与复活，我们就是属主的人。但是许多人肯脱离地狱，却不肯与世界分别；他们愿意脱离罪，却不愿意完全归主为圣。在神方面，祂已经救了我们，我们相信神已经拯救了我们的事实。从前在非洲的阿比西尼亚（Abyssinia）有一个基督徒女子，要被人拍卖为奴。竞买开价之初有三个人彼此一直加价竞买。这三个人都是不好的人。这个女奴知道，她无论落到那一个人手中，都是很悲惨的。所以她就一直流泪，一直哭，极其难过。最后来了第四个人，这人出了最高的价，买下了她，并且立刻叫一个铁匠来，打断她的锁炼。他对那个女人说，‘你自由了。’说完这话就走了。那女人起初不明白这话的意思，后来醒悟过来，就大声喊着说，‘他买了我，他买了我，从今天起，直到我气断之日止，我要跟随他去。’这故事今天也发生在你我身上，我们因着主爱的策励，也愿对主说，从今以后，我愿跟随祂去。

有一位弟兄有次在火车上，被人邀请去打纸牌，但他对那些人说，‘对不起，朋友，我的手没有带来。’大家都希奇的看着他，他接着说，‘今天我这双手是主的，以前我那犯罪、玩纸牌的手已经与主同钉十字架了。’他看见他既奉献给主，手就是主的，不再是他的了。

我自己有一次搭车，在店旁看见一本有点疑惑的书，就想翻开来看看，但因为主禁止，我就不敢去翻那本书了。因为我的眼睛、思想已经奉献给主，不再属于我自己了。

今天我们需要有这个认识，认识主买了我们，我们乃是属祂的人。我们如果有这样的感觉，乃是最甜美奇妙的。虽然有人要批评我们太固执，眼光太短浅；但是批评之人的口尽管那样说，心中也不得不佩服我们这样的基督徒，因为这样的基督徒乃是顶快乐的。没有一件事比完全奉献给主，更能使我们快乐，因为我们乃是奉献给那位极其爱我们的主。

附件三

中共中央转发宗教工作委员会关于打击隐藏在“基督徒聚会处”中的反革命分子问题给中央的报告

1955. 12. 25

上海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国家机关各党组，中央各部委，各人民团体党组，国家机关党委，中直党委：

现将中央宗教工作委员会关于打击隐藏在“基督徒聚会处”中的反革命分子问题给中央的报告转发给你们，中央同意这一报告，望即遵照执行。

中央

附：

中央宗教工作委员会关于打击隐藏在“基督徒聚会处”中的反革命分子问题给中央的报告
中央：

兹将关于打击隐藏在“基督徒聚会处”中的反革命分子问题报告如下：

一、“基督徒聚会处”又名“小群”（以下简称“小群”），在我国已有三十多年的活动历史。这是在帝国主义直接影响和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一个为反革命分子操纵的教派。它一贯以“自立教会”、“地方教会”为标榜，事实上同帝国主义有着政治的、经济的和组织上的密切联系，并以上海为首脑机关所在地，在全国设有十多个中心教会，指挥着各地的教会活动，还分散建立了许多教营企业，作为支持其活动的经济基础。其内部组织极为严密，现在，全国“小群”有八百七十多个聚会处，教徒八万多人，分布在二十三个省的二百八十多个市、县，个别地方发展相当迅速。各地教会的领导权大多操纵在反革命分子手中，在教徒中也隐藏着相当数量的反革命分子。“小群”的领导核心，事实上已成为一个反对人民政府，破坏国家建设、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集团。

几年来，他们积极巩固内部，发展组织，加强毒化青年、儿童，并以各种方法向我国国家机关、学校、医院、工矿企业内部渗入，向我工作基础薄弱的农村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伸展。经常散布谣言和反革命言论，恶毒地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挑拨离间，破坏历次的社会改革运动，阻挠教徒参加社会主义建设，阴谋瓦解我党，团基层组织。在上海等地还发现他们直接为帝国主义和蒋匪帮进行间谍特务的活动。浙江金华专区的“小群”勾结土匪组织所谓“浙江省人民反共救国军”，企图进行武装叛乱。他们的野心很大，曾经提出要在“十年内打下全中国”的狂妄口号，阴谋以所谓“移民”的办法，在全国各地扩展反革命势力。由此可见，这个教派的活动具有明显的反革命阴谋，他们是帝国主义和蒋匪帮利用来同我们进行斗争的工具，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敌人。

过去各地对“小群”中的反革命活动曾经进行过若干斗争，特别是“五反”期间以“五毒”罪行逮捕了全国“小群”头子倪柝声，接管了它的最大的教营企业生化药厂等八个工厂，给予了一定的打击。但以往的这些斗争还是限于零碎的局部的，对“小群”中的反革命分子还没有给予严重打击，他们的反革命活动仍很猖狂。

目前全国镇压反革命的形势,对我们有计划地发动一次肃清“小群”中反革命分子的斗争极为有利。因为群众已经有了动员,敌人已呈现某种动摇,我们已经掌握了他们很多罪证,在基督教中已经形成了一支爱国力量,加上我们已经有了同披着宗教外衣的敌人进行斗争的一些经验,这些都是我们开展斗争并取得斗争胜利的有利条件。当然,对于这个敌人仍必须作充分的估计。几年来的情况说明:它懂得一套反革命的斗争策略,它善于利用宗教向群众作欺骗,确是一个比较阴险狡诈的敌人,目前他们有了一定的警惕和准备。因此,我们同这个敌人的斗争仍然是长期的、复杂的,任何轻视和麻痹的思想,认为一次集体打击就可以彻底解决问题,和忽视长期斗争的想法,都是不对的。

二、为了组织这一斗争,今年八月二十七日我们召集几个重点省、市的管理宗教工作和侦察工作的同志来京汇报了情况,研究了这一问题,并确定积极进行准备工作。十一月十五日到十八日又召集十四个地区的有关同志开会,检查了各地准备工作情况,认为各地已有了一定准备(虽还不够十分充分),打算今年十二月下旬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重点的发动一次对“小群”内反革命分子的集中打击,争取明年一月底前告一段落。

我们斗争的总任务是:彻底摧毁“小群”反革命领导集团,肃清隐藏在“小群”中的一切反革命分子。大张旗鼓地揭发“小群”中反革命分子的罪行,广泛、深入地开展对教徒的爱国主义教育,大力争取上层分子和团结广大教徒群众,逐步地把由反革命分子操纵的教会变为从事正当宗教活动的爱国教会。这些任务当然不是一次斗争就可以完成的,需要通过一个长期复杂的斗争过程,可能需要经过几个步骤或几次打击才能达到。但仍必须把目前的斗争看作是一次关键性的斗争。力争做到:第一,彻底摧毁“小群”的反革命领导集团;第二,清查处理在我内部的“小群”教徒;第三,加强对“小群”经营的企业了解,分别情况加以处理。所有这些,都必须通过宣传教育工作,大力争取教徒群众和爱国上层分子的支持。

三、逮捕打击的主要对象是:(一)帝国主义与蒋匪的间谍特务分子;(二)隐藏在“小群”中的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三)坚持反动立场进行现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在政策的掌握上,要严格的区别反革命问题和宗教问题,在打击反革命分子的时候,不要牵涉到宗教信仰问题上去。要区别反革命分子和落后分子以及被反革命利用的分子的界限。对反革命分子的打击也要有灵活的策略,对坚决的反革命分子要逮捕法办,对于可捕可不捕的反革命分子不要逮捕,可以用传讯和发动群众斗争的办法予以打击,对罪恶不大且有动摇悔悟表现的分子应尽力分化争取。对应该逮捕的反革命分子也不必在一次行动中全部捕光,可以捕一批,留一批,看看斗争情况的发展,分批执行。这样做会更加主动和有利于分化敌人,争取上层分子和广大教徒群众。

四、斗争的重点是:(一)“小群”中心教会的所在城市,如上海、福州、温州、长春、汕头、北京、西安、兰州、武汉、重庆等;(二)“小群”活动的主要地区,如浙江、福建沿海等省;(三)国家机关、学校、医院、工矿企业等部门。以上这些地方的斗争,对争取全国胜利起着很重大的作用,必须搞好。在步骤安排上,上海、江苏、浙江、福建等重点地区应于十二月下旬同时行动,其他地区相机发动。

五、对于在国家机关、学校、医院、工矿企业内部的“小群”教徒,必须在此次斗争中加以清查,并根据具体情况逐步予以处理。首先应发动群众,广泛的揭露“小群”内的反动活动,进行充分的说理斗争与思想瓦解工作,争取其内部起义。只集中打击少数坚决的反革命分子,大力作好争取多数落后教徒工作。

对于“小群”的一般教徒,除个别坚持反动立场的与在我要害部门的分子应即调离外,其余仍留在原来岗位上继续考察使用。对确有转变的“小群”骨干分子可以留在一般部门继续使用;对仍然坚持反动立场的“小群”的骨干分子应坚决清除,其中有些人可以劳动教养,但对其中确为我们需要的高级技职人员,可以进行监督使用;对清查出来的“小群”中的反革命分子应按内部肃反办法进行处理。经过这些清查以后,应当严格防止“小群”在我内部进行有组织的不正当的宗教活动。

六、对于渗入到云南、新疆、内蒙等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活动的“小群”分子应严厉打击,将其挤回内地。对福建、浙江、广东等国防要塞地区的“小群”教会应予挤掉,对沿海复杂地区的“小群”教会能控制的应以控制,不能控制的应将其中的坏分子挤掉,并逐步控制其教会。在挤的时候应讲究方式方法,防止他们就地分散,进行隐蔽活动。

七、同宗教中的反革命分子作斗争是一个复杂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取得这一斗争的胜利,必须大力争取和团结广大教徒群众,争取分化上层分子。

争取广大教徒的关键,是在我们切实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从事实上把打击反革命的问题和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区别开来。因此,在斗争发动的同时,必须使正常的宗教生活不致中断。必须事先或在斗争过程中,有计划的争取一些上层分子。我们应坚决支持“小群”教会中的爱国的上层分子,及愿意靠拢我们的上层分子,出面主持宗教活动;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即使是中间的落后的上层分子,也应该让他们出面进行正当的宗教活动。这个问题解决得愈早,解决得愈好,就愈对我们有利;同时更能促进其内部分化。在全国镇压反革命、特别是打击了王明道、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的声势下,“小群”内部发生动摇,某些上层分子表示要站到爱国方面来,靠拢政府,这种情况对我们很有利,不管其动机如何,均应当加以利用,进行分化争取,以扩大基督教的反帝爱国统一战线;但对其中的坏分子,应提高警惕,在发现他们进行破坏活动时及时予以打击。

八、在斗争中对教会内外广大群众的宣传工作必须做好。必须广泛动员社会舆论,充分揭发敌人的罪恶,驳斥可能产生的一切谣言、谬论,大力宣传宗教政策和肃反政策,以逐步澄清教徒群众的混乱思想,提高他们的爱国主义觉悟,划清敌我界限。必须发动基督教各教会的教牧人员及教徒参加这一斗争,特别注意发挥其中爱国力量的作用,但是应当防止他们卷入宗派纠纷。

九、为了有计划地、秘密地控制“小群”教会的领导,适应今后长期斗争的需要,必须加强对“小群”的秘密侦察工作的建设,这工作将由公安部门另行拟出计划。

十、为保证斗争的彻底胜利,我们建议各主要地区应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组成临时的指挥机构,加强公安部门与宗教事务部门的密切配合,并动员各有关机关参加这一斗争。各地对这次行动必须绝对保守秘密,有关此次斗争的计划和准备工作情况,只能向直接有关人员传达,不得让

无关人员知道,并须告诫所有参加工作的人员严守秘密,不得泄露,如有违犯,应受严格的纪律制裁。

以上意见,妥否,请批示。

1955年11月24日

附件四

控訴文的例子

1. 许梅骊的〈我控訴〉 刊于《天风》总499 (1956年2月20日) 页11-12, 原载上海《解放日报》(1956年2月2日)

第3版 1956年2月2日 星期四 解放日报 乙未年十二月十一日 中国立宪

肅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保障社会主义建設的勝利進行

上海市委工宣部 上海市委工宣部

我控訴

許梅骊

最近我親身經歷了反革命分子在學校裏的種種陰謀活動, 使我心裏感到非常痛苦和憤慨。我控訴反革命分子在學校裏的種種陰謀活動, 使我心裏感到非常痛苦和憤慨。

這是一篇控訴文, 作者控訴了反革命分子在學校裏的種種陰謀活動, 包括破壞教學秩序、煽動學生鬧事、污蔑黨和社會主義等。文章呼籲黨和社會各界採取措施, 肅清反革命分子的陰謀, 保障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進行。

明辨是非, 劃清我界線

吳德輝

最近我親身經歷了反革命分子在學校裏的種種陰謀活動, 使我心裏感到非常痛苦和憤慨。我控訴反革命分子在學校裏的種種陰謀活動, 使我心裏感到非常痛苦和憤慨。

這是一篇論述文, 作者論述了如何明辨是非, 劃清我界線。文章指出, 在當前形勢下, 必須提高警覺, 辨別敵我, 防止反革命分子的煽動和破壞。

肅清暗藏在宗教界的反革命分子

王華

本報記者最近採訪了上海各宗教界人士, 他們紛紛控訴反革命分子在宗教界進行陰謀活動, 企圖破壞宗教界的團結和穩定。

這是一篇報導, 報導了宗教界人士對反革命分子陰謀活動的控訴。文章強調了黨對宗教界工作的重視, 以及採取措施肅清反革命分子的必要性。

這是一樁大快人心的事情

上海市委工宣部

最近, 上海市委工宣部宣佈, 一批反革命分子在學校裏的陰謀活動, 已經被徹底粉碎。這是一樁大快人心的事情, 充分顯示了黨和社會各界的強大力量。

這是一篇新聞稿, 報導了反革命分子陰謀活動被粉碎的消息, 並表達了黨和社會各界的歡欣鼓舞。

堅決打擊毒害青少年的反革命活動

中國青年團上海市委

最近, 上海市委工宣部宣佈, 一批反革命分子在青少年中間進行毒害活動, 企圖破壞青少年的身心健康。這是一樁大快人心的事情, 充分顯示了黨和社會各界的強大力量。

這是一篇新聞稿, 報導了打擊毒害青少年反革命活動的消息, 並呼籲社會各界加強對青少年的教育和保護。

又除了一個大害

上海市委工宣部

最近, 上海市委工宣部宣佈, 一批反革命分子在學校裏的陰謀活動, 已經被徹底粉碎。這是一樁大快人心的事情, 充分顯示了黨和社會各界的強大力量。

這是一篇新聞稿, 報導了反革命分子陰謀活動被粉碎的消息, 並表達了黨和社會各界的歡欣鼓舞。

工人們的憤怒

上海市委工宣部

最近, 上海市委工宣部宣佈, 一批反革命分子在工人中間進行煽動活動, 企圖破壞工人團結和生產秩序。這是一樁大快人心的事情, 充分顯示了黨和社會各界的強大力量。

這是一篇新聞稿, 報導了工人們對反革命分子煽動活動的憤怒, 並呼籲黨和社會各界採取措施, 維護工人團結和生產秩序。

最近政府破获了长期披著宗教外衣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倪柝声反革命集团，我心中感到说不出的高兴、痛快，我衷心感谢政府为我们除去了这一大害。

我是一个受倪柝声反革命集团毒害最深的基督教青年，是上海第二医学院学生。我在他们的蒙蔽毒害下，作了他们毒害青少年的帮凶，在大学、中学和医院中毒害了许多青年和儿童。现在我醒悟了，我要控诉，我要揭发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的罪行。

在上海人民欢欣鼓舞地等待著解放时，反革命分子倪柝声、李常受（已逃往台湾）把一批青年诱骗到台湾去作他们在台湾进行罪恶活动的骨干。为甚麽倪柝声、李常受对台湾这样感兴趣？原来他们是蒋介石的忠实走狗。

1950年当美帝国主义疯狂地侵略朝鲜时，倪柝声却在上海骨干分子的特别聚会中明目张胆地叫我们不要参加抗美援朝运动。当时我受了倪柝声反动言论的毒害，就真的想，即使美帝国主义打到黄浦江也不管我事。多少教徒都受他的毒害不想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倪柝声就是这样希望帝国主义重新来奴役中国人民的。

倪柝声反革命集团要我们耍两面派的手法，叫我们表面上成为功课好、守校规的“好学生”，去争取群众，然后叫我们运用各种方式去散佈反革命思想毒素。他们要我在学校教徒青年裡散佈“一切不能动心”和“不可用思想”。几年来他们紧紧地抓住我，毒害了我的心灵，他们把许多消极的、敌视新中国的反动思想充塞了我的头脑，使我对爱国主义教育，使我不敢爱国。每当我听了政治报告，听到祖国建设的辉煌成就和祖国怎样关怀青年一代，共产党怎样为青年开闢了美好的前途，我也受到感动，思想上也有过斗争。每当我看了些电影（学校裡组织大家去看的电影），有时我也感动得暗暗地流下了眼泪，但是我想到了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的话，我又为我自己动了心而感到不安，像犯了罪一样，并且竭力用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灌输给我的反动论调来掩盖所引起的思想斗争。在他们的毒害下，我变成了一个对自己祖国对人民完全冷酷的、耍两面手段的、毫无爱国心的人。对祖国的新面貌我不仅不关心而且不动心。从上海解放到去年年底：我连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都没有去过，跑路时连雨旁橱窗也不敢看，害怕堕了灵性。我到南阳路教会去做礼拜的时候，总要经过中苏友好大厦，我心里很想看那塔尖的红星，因为这颗星实在红得好看，可是我没有勇气抬头，怕受引诱，有时偶而看到了心裡很怕，好像犯了罪。

在“肃反”运动开始后，倪柝声反革命集团就表现得非常惊慌，反革命分子汪佩真就几次找我谈话，对我说：“今后传福音是用血来传的”，“这次是对你的一个考验”，并且更恶毒地把政府说成是仇敌，又叫我“不要怕他们”，叫我抗肃反学习，抗拒交代。他们如果是清白的人，为甚麽在肃反运动中这样紫张呢？为甚麽叫我们去抗拒交代呢？为甚麽要我们去流血去死呢？他们这样做是梦想叫我们隐瞒他们的反革命底细。

几个月来，组织上耐心地教育我，我终于觉醒过来，并且痛恨他们，揭发了他们许多丑恶的反革命底细。我深深地感到，倪柝声反革命集团根本不是甚麽“年长弟兄姐妹”，而是一羣最凶险的披著羊皮的狼，是毒害青年的罪魁。他们如果杀死我，不过是害了一个青年，但是他们不这样做，却更恶毒地要我维持一个正常青年的外壳，一个“圣人”的外壳，而毒死了我的

心，又利用我去毒害许多年青人的心。在祖国土地上充满了阳光和自由，但反革命分子却把我们青年丢进了冰箱，在我们的鼻孔裡塞上了棉花，叫我们过着窒息的日子，处处觉得不自在而忍受着许会不必要的痛苦，跟著他们走上反人民的绝路。现在政府逮捕了这批反革命分子，这真是大快人心的事！过去曾经和他们在一起，并且被他们蒙蔽利用进行过违反人民利益的活动的人，我希望你们能彻底地交代自己的问日题，站到人民的队伍中来，揭发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的丑恶罪行，与反革命分子作无情的斗争。

2. 许梅骊的〈起来，揭露这批豺狼！——上海基督徒聚会处信徒愤怒控诉倪柝声反革命集团〉——刊于《天风》总499（1956年2月20日）页12-14

起来，揭露这批豺狼！

——上海基督徒聚会处信徒愤怒控诉倪柝声反革命集团——

倪柝声反革命集团曾經欺騙了許多善良信徒。但是，隨着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的被揭露，許多弟兄姊妹已開始有了覺悟，逐漸看清楚了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的真面目。他們憤怒地控訴了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的罪惡。現在，讓我們聽一聽被這批反革命分子所毒害、所欺騙的弟兄姊妹們的控訴吧：

欺压剥削工人。

七十二歲的沈榮泉控訴說：十多年來，我一直給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的“聚會處”做雜工。他們把我當作牛馬，每天早晨四點鐘就要起床，收拾房間，拖地板，給他們疊被頭，倒馬桶……。他們“聚會”很多，我差不多天天要給他們搬凳子，搬進搬出，每天總要忙到晚上十點鐘以後才能困到床上。我這個老頭子常常忙得頭昏眼花，精疲力盡。倪柝声反革命集团各地來來往往的人很多，這些“客人”到了上海，我還要幫他們到火車

站去把行李挑回來，離開上海的時候，又要把行李挑到火車站去，百來斤重，一二十里路，挑得我這個老頭子渾身冒汗。這些“客人”在“聚會處”我又要服侍他們，給他們汰被頭，吃飯時給他們裝飯，有一個黃昏我給他們汰了十幾條被單。我這個老頭子終於被他們弄得吐過幾次血。

我為他們做牛馬，可是他們是怎樣對待我的呢？十多年來，他們每個月給我幾斗米的工錢，自吃飯，連畚箕、掃帚都是我自己拿錢出來買的。我拿這些錢勉強养活我自己一個人，老太婆我也養不活她，靠她自己做小生意养活自己。我多少苦呢！這還不算，1948年，倪柝声反革命集团搞“交出來”運動的時候，他們“号召”每個信徒都要把財物交出來，我這個老頭也被他們欺騙了。第一次，我把我和老太幾十年的積蓄合十多担米的錢都交出來了；第二次，我沒有什麼好交了，就把一件駱駝毛的棉襖也交出來了。

些朝气蓬勃的青年人，变成冷冰冰的人。但是，青年人觉悟了，許梅驪、刘涵芬說：“反革命分子騙了我們，把我們的心塞進了冰窖里，今天党和政府幫助我們，使我們的心在祖國和人民的愛撫溫暖下，熱起來，熱起來！讓這顆心熱愛我們親愛的祖國和人民吧！我們感謝党和政府像父母似地關懷我們，挽救我們。我們保證：今后要好好學習，努力建設祖國！和這一撮反革命分子一刀兩段！”

六十二歲的李蟠珠，眼已花，心臟又有病，她多么地想念他的孩子啊！李蟠珠說：“養大一個孩子，難道是一樁容易的事嗎？為了這孩子，我曾經嘔了多少心血啊！”“在這風燭殘年里，我多么希望我的孩子何廣平能在我的膝前啊！”然而她的孩子那里去了呢？他被倪柝聲反革命集團騙到台灣去了。

摧殘青年幸福

住在上海南京西路的周強華已經四十二歲了，還過着孤單單的生活，沒有結婚。過去她有一個未婚夫對她很好，等了她六年。他們買了繡花被面、床單，已經準備結婚了，但倪柝聲反革命集團對她說：“一個女人有了丈夫就要討丈夫的喜歡，討了丈夫的喜歡就不能討主的喜歡。”這樣，就使周強華痛苦地離開了自己的未婚夫。

上海第一醫學院助教鄭修文在婚姻問題上是飽受痛苦的，而這痛苦是誰給她的呢？反革命分子是怎樣的卑鄙無恥做圈套陷害她的呢？讓我們聽一聽她自己的控訴吧：

幾年前，當我還在學校里讀書的時候，也像許多青年基督徒一樣，熱心於教會，信任教會中的一切的人，一切的話。就在什麼“弟兄姊妹要彼此相愛”“要服權柄”等幌子下，一個別有用心的人假稱有難處找我談話，借機與我接近。此後就用什麼他得神啓示，說我與他在一起是神的意旨。又說，教會里的人應和教會里的人結婚，否則會走上

歧途。並且要我去找他所指定的“長老”談話，實際上他們是一伙。當時我心中雖然極端憎惡他，但束縛在倪柝聲反革命集團的“服權柄”的鎖鏈下，只是敢怒而不敢言，只得同他結了婚。從那時候起，我渾身給戴上了封建的枷鎖，每天他要我向他彙報所做的事。夏天不許我穿短袖衣服，不許我解開衣服領子。買東西不許我出主張。我生病時，我的弟弟托同學向我問好，他却咒罵他們居心不良。過去我有許多小姊妹，他強迫我與她們絕交。平時我和別人往來的信件，他都要檢查，有時候還要遭他打罵。那時候我痛苦極了，每天我只好躲在被頭里默默流淚。

但在祖國的大地上，處處都洋溢着青年人的微笑歌唱，我怎么不向往呢。我開始謀求擺脫，但是，當我第一次提出離婚要求時，這個壞傢伙就威脅我，我被他壓下去了。直到1953年，社會上展開了婚姻法的宣傳運動，在我哥哥的鼓勵下，我才下了決心，第二次又提出離婚的要求。可是倪柝聲反革命集團立刻又派人來，先是甜言蜜語地用軟功來勸我，見我不服，又用教會的名義對我說，如果我一定要這樣做，他們就要鬥爭我了，而且要當眾宣判我的罪，所謂負責弟兄也將親自光臨，說我犯了一件史無前例的大罪，玷污了神的教會要開除我出教會。儘管他們恐嚇我，威脅我，但最後在人民政府的支持下，我終於擺脫了這個壞傢伙；可是倪柝聲反革命集團還不讓我安寧，經常來到我面前說我患了精神病，又誣蔑我，說我受了魔鬼的欺騙，還造謠說第三次世界大戰就要爆發了。還說，他們預感到我住的地方要被火燒。但是我並沒有被嚇倒，我還是擺脫了這個壞傢伙。

× × × ×

神是公義的，祂看見一切。人民是不可欺侮的，誰若欺騙毒害善良的弟兄姊妹，誰就會遭受應有的懲罰。倪柝聲反革命集團的下場就是這樣！

倪柝声反革命集团曾经欺骗了许多善良信徒。但是，随着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的被揭露，许多弟兄姊妹已开始有了觉悟，逐渐看清楚了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的真面目。他们愤怒地控诉了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的罪恶。现在，让我们听一听被这批反革命分子所毒害、所欺骗的弟兄姊妹们的控诉吧：

[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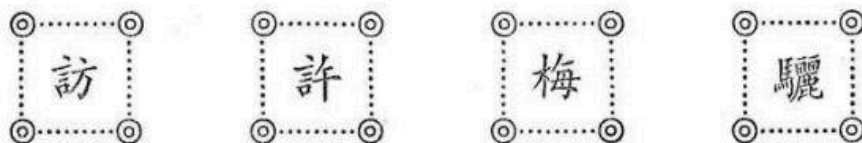
毁灭青年前途

许梅骊、张良栋、刘涵芬、张主怀是上海第二医学院、第一医学院和交通大学的学生，倪柝声反革命集团利用他们、通过他们拉拢其他青年，并在学校中进行破坏活动。更可恨的是毒害他们的心，把这些朝气蓬勃的青年人，变成冷冰冰的人。但是，青年人觉悟了，许梅骊、刘涵芬说：“反革命分子骗了我们，把我们的心的塞进了冰窖里，今天党和政府帮助我们，使我们的心的在祖国和人民的爱的温暖下，热起来，热起来！让这颗心热爱我们亲爱的祖国和人民吧！我们感谢党和政府像父母似地关怀我们，挽救我们。我们保证：今后要好好学习，努力建设祖国！和这一撮反革命分子一刀两段！”

… [省略]

神是公义的，祂看见一切。人民是不可欺侮的，谁若欺骗毒害善良的弟兄姊妹，谁就会遭受应有的惩罚。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的下场就是这样！

3. 〈访许梅骊〉——刊于《天风》总500（1956年2月29日）页8-10



本刊記者 惟 眞

在上海開展肅清倪柝聲反革命集團的運動以後，我訪問了上海基督徒聚會處青年聚會負責人之一的許梅驪同道。她是上海第二醫學院畢業班的学生，最近正以全力投入這一次的肅反運動。

2月7日，我到上海第二醫學院會見了她，她梳着兩根長辮子，圓大的眼睛，精神愉快充沛，穿着一身朴素的衣服。當我說明了來意以後，我們熱烈的握着手，在一間充滿陽光的房間里坐下來，開始了交談。

我提出的問題是：她是怎樣認清倪柝聲反革命集團的真實面目的？

她沉思了片刻後微笑地說：“我認為這裡主要的關鍵是‘立場’。過去我一直是站在倪柝聲這一幫人反動的立場上，一切問題的判斷都是以倪柝聲他們的論調為依據的，因此看法和做法都錯了。”

許梅驪同道繼續說：“當我經過組織上的幫助教育以後，我開始站在人民立場上來看問題。首先，我看到自己的不對，如：‘愛國愛不起來’，‘不起勁讀書’，‘與進步同學有距離’……並且也發覺這種情形的嚴重性，因此，我就追究根源。當我追下去時，我發現我所以如此，並不是獨立的自發的，而完全是由於受了倪柝聲反革命集團的毒害所致。我再把我所記得的倪柝聲反革命集團所有的言行活動擺開來看，把他們的言行和當時的時局和政治問題配合起來看，再加以分析就發現出很多問題。例如，在每一次政府所發動的中心運動中發現他們都有一套破壞的活動，而這一系的活動是無法用‘巧合’‘偶

然’來解釋的，也不能用‘他們的用心是好的，結果却是坏的’等話來加以辯護。聖經的話是不錯的，‘好樹不能結坏果子’，好樹偶然結出一個坏果子還有可能，但好樹絕對不會全結出坏果子來的。愈是分析下去，愈是拿出事實來看，就愈發現破綻，在數不清的事實面前，我只能得出一個結論。”這時她眼睛看着我，用肯定的語氣說：“他們的確是政治問題，絕不是信仰問題。”

她又說：“轉變的關鍵是在於立場，要看我們站在人民立場上，還是站在老的反人民的立場上來看問題。要看我們有沒有替人民着想一下？我們對人民有沒有感情？”她說：“我曾有一段時間，因為立場不穩，痛恨他們不深，只恨幾分鐘就過去了。當我站穩立場時，我就能透過他們的外衣，看清楚事實，分析他們的用意。考慮這些事實的結果，我就對他們非常痛恨。”

我听了許梅驪同道所講的思想認識轉變經過後，我繼續向她提出一個問題：要求她談談在這次肅反運動中對倪柝聲反革命集團毒害青年的體會。

她愉快的繼續回答我的問題說：

“他們對青年的毒害是有步驟、有策劃的。對一般的青年信徒，他們故意謬解‘不要愛世界’這個經訓。當我們覺得世界上有正義和美好的事情時（如好好讀書，將來為建設祖國而貢獻自己等），他們就歪曲地說：要留心不要貪愛世界；又說世界上的事都是渺小沒有價值的，人生短暫，讓別人去做這些好事好了，我們不必注重這些。他們又具體

地提出不要愛前途、學業、父母、愛人、兒女等等，叫青年感到一切吸引我們心的事，就都是‘世界’，都是不能愛的。

“他們就是這樣惡毒地控制了青年的感情，使我們變成與人民隔絕，對人民和自己的親人冰冷無情的人，而他們卻攫取了我們向着主的熱誠。他們還更進一步的用‘不要講理由’，‘不要分析’，‘要服從權柄’等論調控制一些有心追求主的青年的思想和意志。使我們在感情、思想、和意志上都成為這批反革命分子的俘虜。另一面他們還會假惺惺地對我們說：‘你們要愛國’。這時我們年青人的心已冷如死灰，愛國那里還能愛得起來呢？倪柝聲反革命集團所標榜的‘愛國’不過是教青年穿上‘愛國’的外衣罷了。他們口頭上要我們愛國，但又不許我們在正當的事上動心。這使青年人也受毒害成為兩面派的人，成為一個表面上愛國，而實際上是一切都不動心的人。而他們的陰謀不止是使青年受毒害成為冷酷的人而已，卻是更進一步的使我們這些對人民冷酷的人，發展成為背叛祖國背叛人民的人。他們惡意的製造愛國愛教間之矛盾，利用青年愛主的熱誠，使我們錯覺地認為追求主，就不可能愛國，處處認為愛國和我們的愛教有矛盾，因此就厭煩一切進步活動。在他們陰險的、日積月累的挑撥污蔑下，青年人的思想被腐蝕了，青年在本質上趨於腐朽，立場上起了變化——從有正義感是非感愛祖國的青年墮落成為恨惡進步恨惡新社會的人，而站在反人民的立場上來進行活動。逐漸地，從愛主變成愛反革命，遠離了神的心意，從受蒙蔽受利用，發展成為蒙蔽人，利用人；從不自覺的發展成自覺地走上反人民的絕路，做這批反革命分子的接續者，自覺地從事反革命活動。這就是這批反革命分子毒害青年的最終目的。這也是我最痛心最感憤恨的！

“有人說倪柝聲雖然是反革命分子，但道

理講得還不錯。我認為這是完全錯誤的。倪柝聲等反革命分子歪曲聖經、利用聖經來欺騙弟兄姊妹，如‘交出來’的問題，根據使徒行傳，是把自己的東西給大家公用，但聖經上同時說要照大家所需要的分給各人；聖經上又說：要把你所有的分給窮人。因此，‘交出來’後應照顧那些需要的人。但是，倪柝聲等反革命分子卻是利用了聖經上記載的前一半（交出來），而沒有實行後一半——把所有的分給有需要的人。我們把一切交給神是對的，但是，過去我們一切都擺上卻是交給了反革命分子了。至於我們批判反革命分子曲解聖經的罪惡是否就是批判了聖經呢？不是的。我們批判的是反革命分子所散佈的毒素。至於聖經中的真理，我覺得聖經中每一句話語都是真理，真理是不受時間、空間的限制的，而且又是永不改變的。這正如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披着馬列主義外衣進行反革命活動，並不等於批判馬列主義一樣。

“關於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的問題，我覺得這是指着聖經中所說的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并今生的傲驕，這些，我是不愛的。但是，我認為並不是世界上一切都是不好的，都是不應動心的。神不是也在世界上造了美麗的百合花、美麗的風景給我們去欣賞嗎？要不然，為什麼神不把世界造成像地獄一樣呢？”她微笑地說。

“過去我怕看美的東西，我認為花花綠綠都是罪。過去我不敢看电影、歌舞，認為這是犯罪。最近，我去看了上海歌舞團的演出，我認為演出的新疆舞很美，使我懷念着遠居邊疆的少數民族。當我聽到頌讚毛主席的歌時，我深深地体会到人民對領袖的熱愛，使我感覺到自己生長在新中國是多麼幸福呀！過去我不去百貨公司，但最近我去了，而且都看了；我看到許多人在購買東西，從這裡使我看出祖國人民購買力的提高，使我更熱愛祖國！這種思想是犯罪是動情慾嗎？不，

这种思想是健康的。”然后，她又着重说明一下：“我现在对于‘情慾’‘驕傲’还是严格的，我並不願意放縱自己。”

接着，她又从容地说下去：

“把一切献给神，我今后也还是如此的。现在我感到爱国爱教是不矛盾的。我最近帮助弟兄姊妹们学习，明辨是非，站稳立场，这是为了爱主，也是为了爱国。今后我将拿出更多的时间、力量去贡献给人民事业，我觉得这样在神面前是有价值的。我认为爱神爱人、爱国爱教是一致的，也是圣经的教训，这样做，才是爱的实践哩。”

这时，我插断了许梅骧同道兴奋的谈话，要求她继续谈谈她最近的宗教生活。许梅骧同道说：“前天是政府逮捕了倪柝声反革命集团首恶分子后的第一个礼拜，我继续去聚会了，因为我所信的神和祂的话语与反革命没有丝毫共同的地方，纯洁的宗教生活我是要坚持的。”

接着，她用反问的口吻说：“宗教生活是否可以放松呢？”然后，她肯定地回答道：“不能，我的心仍然向着神，我还是读经、祷告，而且最近读经时更能看到从前所不注意的圣经真理。”她举例说：“在我读诗篇的时候，我特别注意到神的公义，我也看到自己的不义，因为在过去的日子里，全国人民正在忘我地劳动着，而我却是坐享其成。这是多么亏欠和羞耻！”她继续说：“另一面我也看到神是何等的爱世人，圣经中告诉我们，神不只爱祂已蒙恩的儿女，而且也爱所有的人，如拿因城的寡妇因儿子死了悲恸，她并不是跟随主的人，但主一样对她动了怜悯的心。过去我们对非基督徒却是冷漠无情的，这与主爱人的心是有何等的不同呀！”她又默默地说道：“过去我们虽付出了代价追求主，但卻与主的心意背道而驰，这个责任应该由倪柝声等反革命分子来负的。”

接着，许梅骧同道惋惜地说道：

“过去我们自以为是属灵的，现在才知道，我们中毒很深。因为过去我们完全是受了反革命分子的蒙蔽欺瞒。现在我的信仰还是一样的，而且是蒙了洁净了。以后，我还是愿意爱主，在爱国爱教的道路上前进。我相信在这条道路上走，生命会更长进。今后，我仍持守信仰，我相信圣经的一点一划，我也愿意吸收别的教会在神面前的亮光。过去我们与其他教会隔绝了，今后，应该要加强团结，向其他教会学习。”她微笑着说：“门不能再关了，关门使我们在属灵情形上及政治认识上都蒙受损失。”

最后，她愉快自信地说：“上海基督徒聚会处这次肃清了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弟兄姊妹们一定会在爱国爱教的道路上前进；我相信，教会是会兴旺，是有前途的。”

谈到这里，已将近午饭时刻，我就告辞了。她站起来时，指着“天风”说：“过去我们恨‘天风’，甚至恨‘天风’上发表感想的每一个人。”然后，我们两人都笑了。我们似乎有共同的体会：今天在反帝爱国的旗帜下，我们紧密的团结起来了。我们都有决心，要贡献自己所有的力量与暗藏在教会内的反革命分子作斗争！最后，我们在这个共同的意愿下欣然握手告别。

“新舊約經文彙編”

特 价

布面精裝 每本 五元五角（原價九元）

紙面平裝 每本 四元（原價六元五角）

銷 售 處

廣 學 會

上海（○）虎丘路一二八號

電話 一九六六〇號

在上海开展肃清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的运动以后，我访问了上海基督徒聚会处青年聚会负责人之一的许梅骊同道。她是上海第二医学院毕业班的学生，最近正以全力投入这一次的肃反运动。

2月7日，我到上海第二医学院会见了她，她梳着两根长辫子，圆大的眼睛，精神愉快充沛，穿着一身朴素的衣服。当我说明了来意以后，我们热烈的握着手，在一间充满阳光的房间里坐下来，开始了交谈。

我提出的问题是：她是怎样认识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的真实面目的？

她沉思了片刻后微笑地说：“我认为这里主要的关键是‘立场’。过去我一直是站在倪柝声这一帮人反动的立场上，一切问题的判断都是以倪柝声他们的论调为依据的，因此看法和做法都错了。”

许梅骊同道继续说：“当我经过组织上的帮助教育以后，我开始站在人民立场上来看问题。首先，我看到自己的不对，如：‘爱国爱不起来’，‘不起劲读书’，‘与进步同学有距离’……并且发觉这种情形的严重性，因此，我就追究根源。当我追下去时，我发现我所以如此，并不是独立自发的，而完全是由于受了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的毒害所致。我再把我所记得的倪柝声反革命集团所有的言行活动摆开来看，把他们的言行和当时的时局和政治问题配合起来看，再加以分析就发现出很多问题。例如，在每一次政府所发动的中心运动中发现他们都有一套破坏的活动，而这一系列的活动是无法用‘巧合’‘偶然’来解释的，也不能用‘他们的用心是好的，结果却是坏的’等话来加以辩护证。圣经的话是不错的，‘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好树偶然结出一个坏果子还有可能，但好树绝对不会全结出坏果子的。愈是分析下去，愈是拿出事实来看，就愈发现破绽，在数不请的事实面前，我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这时她眼睛看着我，用肯定的语气说：“他们的确是政治问题，绝不是信仰问题。”

她又说：“转变的关键是在于立场，要看我们站在人民立场上，还是站在老的反人民的立场上来看问题。要看我们有没有替人民着想一下？我们对人民有没有感情？”她说：“我曾有一段时间，因为立场不稳，痛恨他们不深，只恨几分钟就过去了。当我站稳立场时，我就能透过他们的外衣，看清楚事实，分析他们的用意。考虑这些事实的结果，我就对他们非常痛恨。”

我听了许梅骊同道所讲的思想认识转变经过后，我继续向她提出一个问题：要求她谈谈在这次肃反运动中对倪柝声反革命集团毒害青年的体会。

她愉快的继续回答我的问题说：

“他们对青年的毒害是有步骤、有策划的。对一般的青年信徒，他们故意谬解‘不要爱世界’这个经训。当我们觉得世界上有正义和美好的事情时（如好好读书，将来为建设祖国而贡献自己时），他们就歪曲地说：要留心不要爱世界；又说世界上的事都是渺小没有价值的，人生短暂，让别人去做这些好事好了，我们不必注重这些。他们又具体地提出不要爱前途、学业、父母、爱人、儿女等等，叫青年感到一切吸引我们心的事，就都是‘世界’，都是不能爱的。”

“他们就是这样恶毒地控制了青年的感情，使我们变成与人民隔绝，对人民和自己的亲人冰冷无情的人，而他们却攫取了我们向着主的热诚。他们还更进一步的用‘不要讲理由’，‘不要分析’，‘要服从权柄’，等论调控制一些有心追求主的青年的思想和意志。使我们在感情、思想、和意志上都成为这批反革命分手的俘虏。另一面他们还会假惺惺地对我们说：‘你们要爱国’。这时我们年青人的心已冷如死灰，爱国那里还能爱得起来呢？倪柝声反革命集团所标榜的‘爱国’，不过是教青年穿上‘爱国’的外衣罢了。他们口头上要我们爱国，但又不许我们在正当的事上动心。这使青年人也受毒害成为两面派的人，成为一个表面上爱国，而实际上是一切不动心的人。而他们的阴谋不止是使青年受毒害而成为冷酷的人而已，却是更进一步的使我们这些对人民冷酷的人，发展成为背叛祖国背叛人民的人。他们恶意的制造爱国爱教间之矛盾，利用青年爱主的热诚，使我们错觉地认为追求主，就不可能爱国，处处认为爱国和我们的爱教有矛盾，因此就厌烦一切进步活动。在他们阴险的、日积月累的挑拨污蔑下，青年人的思想被腐蚀了，青年在本质上趋于腐朽，立场上起了变化一一从有正义感是非感爱祖国的青年堕落成为恨恶进步新社会的人，而站在反人民的立场上来进行活动。逐渐地，从爱主变成反革命，远离了神的心意，从受蒙蔽受利用，发展成为蒙蔽人，利用人；从不自觉的发展成自觉地走上反人民的绝路，做这批反革命分子的接续者，自觉地从事反革命活动。这就是这批反革命分子毒害青年的最终目的。这也是我最痛心最感愤恨的！”

“有人说倪柝声虽然是反革命分子，但道讲得还不错。”我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倪柝声等反革命分子歪曲圣经、利用圣经欺骗弟兄姊妹，如‘交出来’的问题，根据使徒行传，是把自己的东西给大家公用，但圣经上同时说要照大家所需要的分给各人；圣经上又说：要把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因此，‘交出来’后应照顾那些需要的人。但是，倪柝声等反革命分子却是利用了圣经上记载的前一半（交出来），而没有实行后一半一把所有的分给有需要的人。我们把一切交给神是对的，但是，过去我们一切都摆上却是交给了反革命分子了。至于我们批判反革命分子曲解圣经的罪恶是否就是批判了圣经呢？不是的。我们批判的是反革命分子所散布的毒素。至于圣经中的真理，我觉得圣经中每一向语语都是真理，真理是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的，而且又是永不改变的。这正如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译注：1950年代在中国大陆发生的一场从文艺争论到政治审判的事件，因主要人物胡风而得名，在民间和学界被广泛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生的一场大规模文字狱。改革开放后，中共中央认定“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为错案，胡风案得到官方彻底平反。）披着马列主义外衣进行反革命活动，并不等于批判马列主义一样。

“关于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的问题，我觉得这是指着圣经中所说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这些，我是不爱的。但是，我认为并不是世界上一切都是不好的，都是不应动心的。神不是也在世界上造了美丽的百合花、美丽的风景给我们去欣赏吗？要不然，为什么神不把世界造成像地狱一样呢？”她微笑地说。

“过去我怕看美的东西，我认为花花绿绿都是罪。过去我不敢看电影、歌舞，认为这是犯罪。最近，我去看了上海歌舞团的演出，我认为演出的新疆舞很美，使我怀念着远居边疆的少

数民族。当我听到颂赞毛主席的歌时，我深深地体会到人民对领袖的热爱，使我感觉到自己生长在新中国是多么幸福呀！过去我不去百货公司，但最近我去了，而且都看了；我看到许多人在购买东西，从这里使我看出祖国人民购买力的提高，使我更热爱祖国！这种思想是犯罪是动情欲吗？不，这种思想是健康的。”然后，她又着重说明一下：“我现在对于‘情欲’‘骄傲’还是严格的，我并不愿意放纵自己。”

接着，她又从容地说下去：

“把一切献给神，我今后也还是如此的。现在我感到爱国爱教是不矛盾的。我最近帮助弟兄姊妹们学习，明辨是非，站稳立场，这是为了爱主，也是为了爱国。今后我将拿出更多的时间、力量去贡献给人民事业，我觉得这样在神面前是有价值的。我认为爱神爱人、爱国爱教是一致的，也是圣经的教训，这样做，才是爱的实践哩。”

这时，我插断了许梅骊同道兴奋的谈话，要求她继续谈谈她最近的宗教生活。许梅骊同道说：“前天是政府逮捕了倪柝声反革命集团首恶分子后的第一个礼拜，我继续去聚会了，因为我所信的神和祂的话语与反革命没有丝毫共同的地方，纯洁的宗教生活我是要持守的。”

接着，她用反问的口吻说：“宗教生活是否可以放松呢？”然后，她肯定地回答道：“不能，我的心仍然向着神，我还是读经、祷告，而且最近读经时更能看到从前所不注意的圣然真理。”她举例说：“在我读诗篇的时候，我特别注意到神的公义，我也看到自己的不义，因为在过去的日子里，全国人民正任忘我地劳动着，而我却是坐享其成。这是多么亏欠和羞耻！”她继续说：“另一面我也看到神是何等的爱世人，圣经中告诉我们，神不只爱祂已蒙恩的儿女，而且也爱所有的人，如拿因城的寡妇因儿子死了悲恸，她并不是跟随主的人，但主一样对她动了怜悯的心。过去我们对非基督徒却是冷漠无情的，这与主爱人的心是有何等的不同呀！”她又默默地说道：“过去我们虽付出了代价追求主，但却与主的心意背道而驰，这个责任应该由倪柝声等反革命分子来负的。”

接着，许梅骊同道惋惜地路道：“过去我们自以为是属灵的、现在才知道，我们中毒很深。因为过去我们完全是受了反革命分子的蒙蔽欺骗。现在我的信仰还是一样的，而且是蒙了洁净了。以后，我还是愿意爱主，在爱国爱教的道路上前进。我相信在这条道路上走，生命会更长进。今后，我仍持守信仰，我相信圣经的一点一划，我也愿意吸收别的教会在神面前的亮光。过去我们与其他教会隔绝了，今后，应该要加强团结，向其他教会学习。”她微笑着说：“门不能再关了，关门使我们在属灵情形上及政治认识上都蒙受损失。”

最后，她愉快自信地说：“上海基督徒聚会处这次肃清了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弟兄姊妹们一定会在爱国爱教的道路上前进；我相信，教会是会兴旺，是有前途的。”谈到这里，已将近午饭时刻，我就告辞了。她站起来时，指着“天风”（注：三自爱国教会的机关刊物）说：“过去我们恨‘天风’，甚至恨‘天风’上发表感想的每一个人。”然后，我们两人都笑了。我们似乎有共同的体会：今天在反帝爱国的旗帜下，我们紧密的团结起来了。我们都有决心，要贡献自己所有的力量与暗藏在教会内的反革命分子作斗争！最后，我们在这个共同的意愿下欣然握手告别。

4. 許梅驪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第一屆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發言——原載於上海《解放日報》（1956年4月15日）。地點：中蘇友好大廈（1984年改名為上海展覽中心）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上海市第一届委员会第
二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許梅驪的發言

1956年1月5日 上海解放日報

这次我能够列席政协上海市第一届委员会第二次全体會議，心里感到非常兴奋和光荣。我是一个学生，也是一个基督教青年，多年來深受隱藏在基督教內的倪柝声反革命集团所毒害所利用的。回想过去，虽然祖國解放了6年，但我在他們的毒害下，成为一个对祖國丧失了感情的人，甚至連中苏友好大厦尖頂上的紅星都不敢看（因为怕看了动心，就感到像犯了罪一样）。而今天，我却能有机会在中苏友好大厦說出我心底里的話，我是热爱祖國的！这是多么高兴的事啊！

今天能列席这样的會議，我深深感到了政府和人民对我，对許多受过倪柝声反革命集团毒害、摧殘的基督徒的关怀。人民欢迎我們站起來。我們虽然站起來迟了一点，但还是站起來了，在妄想毒害我們、控制我們的帝国主义面前站起來了。

今年一月間，上海市公安局破獲了倪柝声反革命集团以后，許多基督徒都認清了真相，和这些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一刀兩段。我們也認清了这些反革命分子的所作所为，根本違反了我們的宗教信仰，也根本違反了人民的利益，我們就毅然決然地擺脫了他們的多年來束縛着我們的枷鎖，走上了热爱祖國的道路。

在許多事实的教育下，廣大的基督徒也更明确了政府坚定不移地肅清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政策和坚定不移地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例如在揭發倪柝声反革命集团以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地区里的干部都鼓励基督徒仍去过宗教生活。各大專学校里都曾分別召开过团結大会，就是学校行政、党团员和基督徒在一起的联欢团結。不僅在基督徒較多的上海第一医学院、上海第二医学院、复旦大學，連基督徒較少的如中央音乐学院華东分院也召开了团結大会。这都說明政府是坚决地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并且想尽一切办法來加强基督徒和廣大同学之間的团結。現在，正如一位青年所說，我們再也不是革命大家庭以外的野孩子了。

我們廣大的基督徒是愛國的。我們青年基督徒也是愛國的。在認清了披着宗教外衣進行反革命活动的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的真相后，我們基督徒的愛國热情激發起來了，青年基督徒積極地投入了肅清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斗争。有些覺悟過來的青年基督徒寫了保證書，决心协助政府把上海基督徒聚会处里受过毒害的青年都挽救過來。有的青年基督徒向学校联名保證，要以具体行动响应毛主席的“三好”号召。在今天，我們也真正体会到了愛國愛教是一致的。我們热爱、持守我們的宗教信仰，我們也从心底里热爱祖國。我們基督徒要为肅清一切反革命分子，为建設社会主义祖國，为解放台灣，为保衛世界和平而貢獻出我們的一切力量！这是我們的决心。

这次我能够列席政协上海市第一届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心里感到非常兴奋和光荣。我是一个学生，也是一个基督教青年，多年来深受隐藏在基督教内的倪柝声反革命集团所毒害所利用的。回想过去，虽然祖国解放了6年，但我在他们的毒害下，成为一个对祖国失了感情的人，甚至连中苏友好大厦尖顶上的红星都不敢看（因为怕看了动心，就感到像犯了罪一样）。而今天，我却能有机会在中苏友好大厦说出我心底里的话，我是热爱祖国的！这是多么高兴的事啊！

今天能列席这样的会议，我深深感到了政府和人民对我，对许多受过倪柝声反革命集团毒害、摧残的基督徒的关怀。人民欢迎我们站起来。我们虽然站起来迟了一点，但还是站起来了，在妄想毒害我们、控制我们的帝国主义面前站起来了。

今年一月间，上海市公安局破获了倪柝声反革命集团以后，许多基督徒都认清了真相，和这些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一刀两段。我们也认清了这些反革命分子的所作所为，根本违反了我们的宗教信仰，也根本违反了人民的利益，我们就毅然决然地摆脱了他们的多年来束缚着我们的枷锁，走上了热爱祖国的道路。

在许多事实的教育下，广大的基督徒也更明确了政府坚定不移地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政策和坚定不移地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例如在揭发倪柝声反革命集团以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地区里的干部都鼓励基督徒仍去过宗教生活。各大专学校里都曾分别召开过团结大会，就是学校行政、党团员和基督徒在一起的联欢团结。不仅在基督徒较多的上海第一医学院、上海第二医学院、复旦大学，连基督徒较少的如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也召开了团结大会。这都说明政府是坚决地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并且想尽一切办法来加强基督徒和广大同学之间的团结。现在，正如一位青年所说，我们再也不是革命大家庭以外的野孩子了。

我们广大的基督徒是爱国的。我们青年基督徒也是爱国的。在认清了披着宗教外衣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的真相后，我们基督徒的爱国热情激发起来了，青年基督徒积极地投入了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斗争。有些觉悟过来的青年基督徒写了保证书，决心协助政府把上海基督徒聚会处里受过毒害的青年都挽救过来。有的青年基督徒向学校联名保证，要以具体行动的响应毛主席的“三好”号召。在今天，我们也真正体会到了爱国爱教是一致的。我们热爱、持守我们的宗教信仰，我们也从心底里热爱祖国。我们基督徒要为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解放台湾，为保卫世界和平而贡献出我们的一切力量！这是我们的决心。

附件五

张品蕙反革命罪撤销（平反）通知书

在文革中，倪柝声的妻子张品蕙因不肯与丈夫离婚而遭受严重迫害，曾经多次被鞭打，以至全身多处受伤，1969年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给她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交群众监督改造”。

张品蕙是唯一允许前去探监的人。在文革中，张品蕙因不肯与丈夫离婚而遭受严重迫害，曾经多次被鞭打，以至全身多处受伤，1969年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给她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交群众监督改造”。1971年11月，张品蕙在岳阳路200弄88号家中骨折，送至医院后无人为其医治，11月7日，病故于上海中山医院的走廊中。

张品蕙死后十五年，上海市公安局为其平反。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69)沪军审字第48号，1986年8月23日，张品蕙的反革命罪获撤销。

(86)沪公政保(4)字第652号
上海市公安局（决定）

决定书

张品蕙，女，1902年生，福建省福州市人，无业。原住岳阳路200弄88号，1971年11月病故。

1969年2月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以张“思想反动，利用宗教进行反革命活动”等罪行，决定给张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交群众监督改造。

经复查原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给张品蕙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的决定不当，应予纠正。

据此，撤销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69）沪军审（戴）字第48号的决定，予以平反。

上海市公安局（公章）
1986年8月23日

倪柝声的道德问题探讨

余洁麟

引言

倪柝声之个人道德问题，自八十年代开始成争议话题，其原因起于五十年代中国共产党鬭争倪柝声反革命集团时宣传资料，经八十年代改革开放，逐渐流传海外。对此问题，不同人士曾作各种不同论述，所言皆认为证据确凿，态度坚定。然所言论，多属文学论著性质，虽辩词刚硬，或说词动听，但不属纯客观科学分析性质。本文尝试以另一形式分析这问题。

最科学性的探求

现今人类语言资讯追求最准确者，莫胜于现代法律程序。法律程序追求事实的真相。它的焦点不是一方或另一方的演词是否动听，或文章是否具吸引力，它甚至不在乎陈词的说服力，而是在乎追寻事实的真相。一位法律专家说：法律程序中的证据法，是人类语言沟通范畴内，最接近科学验证方法者[1]。这就是说，法律程序中，或者说在自由社会法庭内，对证据的审核，筛选，和过滤，对见证人见证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对陪审员公正度的要求，对排除不符合标准的资讯等的要求，是最接近科学性的诉求。

所有法律程序，首先必须有控方与辩方[2]。这个简单的事实说出一目的：为着充分提供不同角度与观点的证词，以供法庭与陪审人有充分探求真相的机会。一件事态无论如何有理，也必须提供对方答辩的机会。历史上有些法庭只有控方而排除辩方。这种法律程序以今天标准，是不合公正标准的。其实把这原则放诸四海，同样可应用至任何一种资讯传达方式。假若一篇文章，只盼望读者接受一面的论点，而不期望有相反立场的辩证，原则上与一个不提供辩方机会的法庭同样是缺失的。任何合理的法律程序，必须提供相反立场充分的表述，而由裁判者作出独立的判断。至于对方愿否出席作辩，是对方的自由。对方若因不便答辩，或不肖答辩，因而不辩，不能因此成立对方的罪名。在此情形下，法律程序仍需公正的进行，不能因对方不出席或对方不发言则断言对方的默认[3]。

通常一件案件开庭后，法官第一件事是提醒陪审员主持公正的责任。这提醒包括指出陪审人需屏除私人感觉，私心，成见，预设，假想等心理，并提醒他们不能凭双方律师口才，逻辑，推理，假设等作任何判断根据，而只能凭事实证据作判断根据。并且在法律过程中，不能受法庭外任何资讯影响，包括媒体报导，公众舆论，私人意见，甚至个人特别资讯等，皆得一一屏除。以求达到判断过程中任何认可的证据外的骚扰。

美国刑事诉讼程序规条270.40指明：“陪审团宣誓后，双方律师还没开始申诉前，法庭必须先叮咛陪审人一些基本功能，责任，和行为，包括不能对案件彼此讨论，或与他人谈论，不得阅读或收听任何与本案有关之报导或新闻，不得亲访案发地点或任何相关地点，不得接收任何相关财物，并向法庭提供任何人有损案情公正进行的行为。”[4]

许多时候法官在开头的话里，会点出法律程序中一个最重要原则——“无罪推定原则”，即被告在未被判处罪名成立前，必须假设被告为清白无罪。故证明事实的责任，是在控方身上，而不在辩方身上。控告人的要证明自己的控告是有理的，而被告人则不需预先主动证明自己是清白的，只需否定控方的控告。故此，辩方律师有权利更有义务对控方所有提出证据一一加以质询并置疑。裁判团体得以此为基本心态，即被告是无罪的，直至被百分之百确实否定为止。此为自由社会法律制度一最基本概念，但普通非法律人士常不知其究竟。[5]

何谓“证据”

以上所提“证据”，为法律程序中最根本诉求真相倚据。在法律范围，此词含极特定之定义，非如一般用法之广泛。法庭能接受的证据，称为可呈堂证据admissible evidence，有严格的定义。1972年美国最高法院定下详细法则，1975年由国会通过，界定何种证据是法庭可以接受的，何种是不可接受的[6]。主要来说，证据必须1)切题 relevant; 2)可靠reliable. 不能接受的证据，不光不能决定案件的判断，就是连摆出来都不可以，为免潜意识中影响决断者心理。双方律师有责任在法律过程中临时叫停，以免此等不合条件的证据，鱼目混珠的打进来。在平常一件案件中，这类的彼此叫停是经常有的。经常在法庭中，有“objection, your Honor”一语，即一方认为另一方所言构成不合条件的证词。根据美国法律，属这类的言词有以下数种[7]：（1）矛盾，混乱，误导，含糊，不明；（2）阐释法律；（3）推理，经常律师会跟据一些证据，推理出一套逻辑性的辩词，这些辩词，企图从律师立场，把一些证据，串出一套合乎理性的解释。辩词与陈词不同，陈词为陈列证据，而辩词为趁陈列证据时加上自己推理。有时这种推理还会加上律师认为合理的假设和假想。差不多每件案件双方律师都会这样作，而许多合情合理的推理，到头来却被证明与事实大不相同。（4）重复；（5）提示陪审者对某证据作偏颇的判断；（6）排除某陪审者；（7）以一些不被接纳之证据为事实；（8）骚扰见证人；（9）证据非原本；（10）题外话；（11）跳至结论；（12）提示猜臆；（13）重迭问题；（14）听闻，即出自第三者而非当事者之证词；（15）证人不合格，即所呈证人因身体精神或与当事人关系导致不合格；（16）问题隐含答案，或提示答案；17）讲故事而不是陈明证据；（18）法律保护，法律保护一些问题不能供庭，如要求证人陷自己于罪中；（19）题外供词，与案情不直接相关资讯；20）误导证据证人；（21）律师充当证人，即律师辩词误导思路，或属纯辩论性质，或假设证据没有指明的事情。除以上二十一项，于法庭呈上的证据可因以下原因导致不合格：（a）来历不明；（b）收集过程不合法；（c）残缺不全，断章取义，部分隐藏；（d）传言；（e）任何法官判为有可能引致偏见之材料[8]。

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其设立目的，为确保其公民有为自己寻求法律申诉的权利，该观念源于公元1215年英国之大宪章Magna Carta，原意为防范君主一言堂之陋习，日后用以对付任何企图垄断言论的倾向，为现代西方社会之基本人权观念。其文明言：“无论何人，除非根据大陪审团的报告或起诉书，不受死罪或其他重罪的审判……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证其罪；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财产。”[9] 日后宪法又加上第十四修正案，这一修正案涉及公民权利和平等法律保护。其第一款云：“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在州管辖范围内，也不得拒绝给予任何人以平等法律保护。”[10]

倪案分析

对倪柝声道德之指控与辩论，过去有不同文章论述，其中更有著书立论者。若以上文之法律观点评之，则其中一大部分属推理性质文学。这些文字作为文学创作或推理文学，自有其发表自由，但从法律观点，皆可以上述二十一条之第三条“推理言论”否定之。例如有些文章详细分析一些当事人心理状态等，皆为推理文学，如同推理小说，属这类性质的文章，有梁家麟的《倪柝声的荣辱升黜》，许梅骊的《难泯岁月》等。姑不论其推理合理不合理，在法庭上皆站不住脚，属inadmissible evidence，可予叫停。真正能在法律程序中可考虑呈现的，只有三类：1) 控告倪罪行之原本资料，即1956年反倪运动时中国政府提供的官方资料；2) 倪本人亲手或亲口作出的供词；3) 其他当事人一手的供词。以下本文将逐一以法律观点讨论此三类“证据”。

控告倪罪行之原本资料

首先来看中国政府提供的资料。这类资料表面来自三方面。第一是公安处，第二是法庭，第三是媒体。在自由社会，言论自由与司法独立，使得以上三个单位是单独的。但在中国，特别是解放初期，这三个单位不是单独的，这是众人皆知的事实，也是共产党本身承认的事实。共产党开宗明义是以党治国，党的功能不光在政治选举，也延申至一切行政领域。故在西方以上三个实行上独立的单位，在中国事实上归为一个单位，即“党的领导”。

中国背景

在还没分析对倪之道德指控前，对所有出自大陆这段时期的资料真实性，首先得作一点合理讨论。中国共产党是以党执政，这在上文已指出。因这原因，所有政策与措施皆以达到政治目的为主，寻求事情的客观性并不是主要目的。故此中国执法单位的指控与司法单位的判案充满错案冤案，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连中国政府本身也坦白承认此事实。根据共产党官方网站《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站承认[11]：至1985年止，“全国共平反纠正了约3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的无故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脱。”注意这里说的三百万只是政府机关‘干部’的冤假错案，也就是对作官的冤假错案。若作官的数字是三百万，平民老百姓的冤假错案就不知比这个数字大多少倍了。除了被立案审查的事件，还有尚未立案而被批斗的，数字大得惊人：“虽然有些干部没被立案审查，但也受到错误批判斗争。此外，在‘文化大革命’前，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政治运动连续不断，也造成了一大批冤假错案。”[12] 仅以上报导足以构成对所有出自官方资讯质疑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根据中国共产党中组部知识分子办公室所编《知识分子手册》，“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词目解释，自1978年至1983年“十三大”平反知识分子冤假错案达680多万件。另据不完全统计，至1985年为止，全国共约300多万名干部曾遭受冤假错案之苦。[13]

《瞭望东方周报》报导：“最近十年中，全国共发生有据可查的冤案（即改判无罪和直接宣判无罪）多达20万起……。”[14] 如此压倒性冤假错案成绩肯定在西方法庭可被列为不合格之证据inadmissible evidence. 著名加州州立大学伯克莱分校法律与社会研究中心学者中国法

律专家Stanley Lubman 曾言：“中国之所谓‘政法系统’在五十年代不过是党的土工具。” [15]

案情本末

倪本人在1952年被公安单位扣留，时值三反运动时期，公安部为配合政府调研各单位，倪以此为名被拘，但对外未发表任何资讯。对倪的报导，最早于1955年12月，由宗教处出面披露倪罪行，制造舆论，并开放展览会，揭发倪罪行。然后于1956年1月29号，大举逮捕聚会处骨干分子，次日30号宗教局动员2500会众开鬪争大会，声讨倪集团，会中宣布上海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此为第一件公开定罪倪柝声文件[16]。注意此文件并非法庭判词，仅起诉书而已，但隔日于2月1日于各大报章媒体立刻以头版新闻刊登。2月3日发动聚会处内部鬪争大会，8日展览会移至一公立学校，向外开放。于同时政府单位进驻聚会处，人员改组，举办学习班。这一连串行动，皆在法庭宣判前进行。在这期间，除起诉书与展览会外，尚加上报章的报导和收集的见证，并几次鬪争会上的见证。至于法庭，则迟至6月21日始开庭，出来判决书。在整个过程中，採领导地位的单位是由公安局，宗教局，三自爱国委员会三个单位合办的“上海基督徒聚会处肃反检查队”，队长是邵洛羊。[17] 换句话说，这些单位不是独立操作的，而是由一个单位指挥的。并且这指挥单位是配合当时闹得最热的政治运动“肃反运动”设立的。

肃反运动

“肃反运动”究竟是什么，既然它是控诉倪案的主办单位，则倪案不过是整个“肃反运动”的一宗个案而已。正因倪案是在这大环境影响下发生，则有合理并合法立场了解它的真相。要详细了解这运动，可参王小平的《五十年代肃反运动的来龙去脉探究》[18]，或朱正著的《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第九章“肃反与反右派斗争”。[19] 它是“一场举世无双”，“波及全国各阶层的政治运动”。它涵盖1955年7月至1956年12月，始于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文件，目的为“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反革命分子”名义上是反政府分子，实际上在那年代为所有对政府不够积极支持人士。谁对政府的支持不够积极，谁就可能被扣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就有可能成为肃反对象。按照“七一指示”的规定，各地用大张旗鼓的宣传教育同严格的组织控制相结合的方法，先后展开肃反斗争。这文件根据毛泽东6月15日“严格的审查”，“彻底的清理”等话，大力推动运动。7月3日，《人民日报》指出：“正是因为不少人有这些极端危险的右倾思想，才使得我们不少部门在党内斗争、思想斗争、干部工作和人事工作方面采取了‘宁右勿左’的作法。这就使得我们队伍中许多人丧失了政治警惕性，不能辨别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使很多人长期和老虎睡在一起还不知道，或者明明发现了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思想也不敢进行坚决的斗争。这是目前革命队伍中的主要危险和主要偏向。”7月4日毛泽东给各省市发出批示：“你们那里如有相同的偏向，望注意纠正。”7月25日，《人民日报》严厉批评说：“我们的某些领导人员……束手束脚，不敢大胆放手地发动群众，揭发反革命的言论和行动，企图以司法手段代替群众运动，抓几个反革命分子了事。也有一些单位借口业务忙而不认真开展斗争……。许多地方和部门对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斗争至今还限于少数领导人员和专门机关在那里孤军作战，斗争的范围很小，不能形成声势浩大的力量。”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

〈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指出党的、政府的、群众团体（不包括工商联）的机关，高等学校和干部学校（包括全体教职员和学生），中小学校（包括教职员，不包括学生），军队，国营的、合作社营的、公私合营的企业（包括技术人员、职员和工人），均无例外地进行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换句话说，不能放松，宁可过分，不可手软，宁左勿右，若殃及无辜，在所难免，甚至公开为所谓“难免论”辩护。[20] 在这种空气下，不要说客观检讨，就是连说一句公道话都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各省市接到上述指示后，先后制定出开展肃反运动的计划，并将运动的情况和运动中发生的问题报告了中央。10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在群众已经发动之后必须注意保证运动的健康发展的指示〉。该指示指出，“肃反斗争开展后，每个单位的运动应该经过五个阶段：（一）准备阶段，建立肃反队伍，摸底调查，准备材料，发动群众，交代政策。（二）小组斗争阶段，对有反革命问题，尚未坦白交代的人，经批准，在一定范围内发动群众追查。（三）专案小组阶段。对问题重大的案件，成立专案小组，进行审查。（四）甄别定案阶段。对经过小组斗争和专案审查，认为是反革命和其他坏分的人，由公安、法院、检察、纪律检查和组织部门进行甄别和处理。如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法律处分，经过检察机关向法院起诉，由法院审判判决。行政处分由政府监察部门或行政首长最后决定。（五）复查阶段。”

“运动开始，每个单位都遵照统一部署成立一个叫做‘五人小组’的机构，领导本单位的肃反运动。五人小组事先按照一定的百分比，比方说人员总数的百分之五，选定一批老虎。这通常是一些历史比较复杂的人。如果这个单位没有那么多历史复杂的人，也可以找一些历史并不复杂的人凑数”。以上一段指出，肃反不是以人定对象，乃是以指标和百分比作目标，对象不够的，找一些人来凑数。

运动开始后一月，于1955年8月7日王明道被捕，控以反革命罪[21]，又一月于9月8日，天主教枢机主教龚品梅被捕，同样控以反革命罪[22]。两者组织均被称为“反革命集团”。四个月后，倪案发于1956年1月30日，正值肃反运动进行至如火如荼时期。同样被定位为“倪柝声反革命集团”。

1955年冬季到1956年春季，全国有42万多名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向人民政府投案自首。[23] 运动至4月间，政府开始进行收场准备。于4月10日发出〈关于必须把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又好、又快、又省地进行到底的指示〉。该指示提出，1955年开展肃反运动的单位，要采取各项具体的措施，争取1956年6月底结束运动。值得注意的是，倪案刚好于6月21日开庭判案，正吻合政府叫停的日期。至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认为反革命力量已经日益缩小和分化，对于反革命分子应当进一步实行宽大政策，这运动才开始冷却。由上可见，倪案毫无疑问是这运动的产品。

整个肃反运动究竟牵连多少人？1957年7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提出了可供推算的数字。根据该报告，“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就现已经定案的来说，有八万一千多名”。另有“十九万余名反革命分子投案自首”。此外，“有一百三十多万人弄清楚了各种各样的政治问题。”[24] 换句话说，这一百三十多万是政府弄清楚了问题后发现抓去的人是抓错的，也就是肃反肃错的。也就是说，除去自首的不算，“1955年肃反运动中错

案约占百分之九十四强，不错的约占百分之六弱”。[25] 从另一角度看，这两年内，除自首数字外，共一百三十八万多宗肃反案，每天就有1891件肃反案，其中94%还是肃错的。当然在那些所谓被肃对的案中，许多日后又被平反算是肃错的，最明显的例子是引发整个运动的胡风案和潘汉年案，当时被认为是铁定的真理，日后却被平反为冤假错案。倪案是这时期每天超过1891件如此案中的其中之一。[26]

陈列以上资讯，目的为提供倪案大体和具体的背景。大体背景是中国解放初期之一般环境，具体背景则是这时期的肃反运动之特定环境。以大体背景来说，中国共产党这时期并没有独立的司法执法体制，冤假错案数字极高。以具体背景来说，发动策划倪案的肃反运动是一大型政治运动，牵连许多无辜者。

倪柝声反革命集团

倪氏被控罪名属三类：（1）经济罪；（2）政治罪；（3）道德罪。其中以政治罪为主。故称之为“倪柝声反革命集团”。虽然1952逮捕时是以经济原因拘留，但起诉与判决是以政治为主因，经济是其次。至于道德方面，则不列在判决书内，只于起诉书列出。原因可能是道德罪并不能构成法律罪名。无论如何，对倪的道德指控，是1955年末至1956年初这短短一个月内，趁着肃反鬭争运动浪头时突然提出的。至于为何这问题到56年6月法庭判决时尚不列入罪名内，有认为这是追查过程中的意外发现，这是推理。也有可能是当局为达到鬭争目的，而倪是宗教领袖，道德问题比政治或经济问题更属敏感，故特加栽桩，当然这也是推理而已。无论如何，从法庭判书看，道德罪名并不是罪名之一。

倪罪“物证”

以下我们固且撇下中国五十年代官方资讯之合法性不提，专一看看在反倪运动中提出的倪道德罪行“物证”作一分析，来评估一下这些个别资讯的可靠性与可信性，从而鉴定它们今天在法庭上的可接受性。对倪道德罪行的指控，首先来自1956年1月30日公布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这是由拘留倪之上海公安部提供，其中提出证据为倪本人供词与一些公安部收集的“物证”。这些“物证”连同被指为倪本人之亲笔供词，一并于同时举办的“罪证展览会”中展示。这些“物证”包括：（1）倪亲笔供词，（2）摄影机，（3）与女同工淫行底片，（4）具倪签名之淫书。今天我们无法亲眼看到这些“物证”，故无法呈现法律面前。假设这些“物证”能呈现法庭，辩方有权提庭参观过这展览会的见证人，由他们口中见证他们对这些“物证”的印象。以下是上海聚会处执事倪办生化药厂经理倪柝声学习小组成员张锡康亲自作的证词：

“我也去看了展览会。会中展览了一些控诉倪反革命罪名、经济罪名和道德败坏的“证据”。这些“证据”主要根据一张小小的纸头，上面说是倪写的供认他犯罪的亲笔供词，字迹像蟹爬，一点不是倪的字迹。我当时就向工作同志反映说，这不是倪本人的字迹。工作同志回答说，这是倪生病时写的。我回答说，连生病也不是这样的字迹。我在生化药厂一段时间，对倪的字迹很熟识，一看就知道那不是倪本人写的。除此以外，展览会中摆出一些中文书籍，书面签上“倪柝声”名字。我一看也认出这不是倪的笔迹。因为倪的书我亲自整理，他都是以

“倪述祖”签名，从来不以“倪柝声”签名的。至于报章上说的淫秽画册，我都没有见到；而所谓的淫秽影片，只是一张没有头的背面小底片，看不出是什么人。” [27]

以上张锡康把提出四种“物证”中的三种，作了个人见证。

(1) 倪亲笔供词——张锡康说那是“一张小小的纸头，上面说是倪写的供认他犯罪的亲笔供词，字迹像蟹爬，一点不是倪的字迹。我当时就向工作同志反映说，这不是倪本人的字迹。工作同志回答说，这是倪生病时写的。我回答说，连生病也不是这样的字迹。我在生化药厂一段时间，对倪的字迹很熟识，一看就知道那不是倪本人写的。”

(2) 与女同工淫行底片——张锡康云：“所谓的淫秽影片，只是一张没有头的背面小底片，看不出是什么人”。另一参加过展览会的见证人张愚之女婿见证：“同样无头女人的底片，后来也出现在上海高干第二书记陈丕显的罪证展览会中，此无头底片到处流传，毫无可信之实。” [28]

(3) 具倪签名之淫书——张锡康云：“展览会中摆出一些中文书籍，书面签上‘倪柝声’名字。我一看也认出这不是倪的笔迹。因为倪的书我亲自整理，他都是以‘倪述祖’签名，从来不以‘倪柝声’签名的。至于报章上说的淫秽画册，我都没有见到。”

(4) 摄影机——展览会中陈列摄影机一部，但没有任何实物显示该摄影机属于何人，也无任何实物显示该摄影机曾作何用，拍过甚么片子。那年代的活动摄影机，不如现代摄影机，可立时放映所拍摄者，而是用胶片作底，需经冲洗方能放映。与倪氏同坐监的监友吴友琦见证，他曾问狱中的倪氏关于摄影机一事，倪坦然说他在英国时买过一部摄影机，但只用过拍摄普通家庭生活，并没有以之用于记录任何淫秽行为。

倪本人亲手或亲口作出的供词

讨论过倪案的“物证”，我们来看第二类“证据”，即倪本人亲手或亲口作出的供词。除了上述被调查当局指为倪氏本人的亲笔供词外，倪本人在1956年6月21日曾亲自出庭，亲口承认所指控他的罪状，包括他道德罪，并且概括性承认他“个人道德很坏”。这供词出自他本人口中，并有出庭的见证人亲自看见听见，不可置疑。这是他被捕后惟一一次公开露面，也是最后一次。此后他没有被释放，也再没有在公开露过面。

认罪的可靠性

通常一件案件，当被告人承认“有罪” guilty时，大概案件就算结束。因一个被告的认罪词，通常是被认为是最可靠的证据。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当辩方律师有理由相信被告人的认罪不是绝对出于自发或在完全自由条件下说出的，则有权并有地位提出质疑。普通人认为，一个正常人不可能承认在自己身上没有发生过而置自己于罪的事。但事实证明，许多所谓西方的自由法庭，都有被告承认根本没有发生过的事的例子，而且这些例子还为数不少。密歇根法律大学于2012年设立一错案资讯档，记录了自1989年来美国的1880宗的错案。其中不少是当事被告自己的供词被推翻的例子，超过10%为所谓假认罪 false confession。 [29] 即根本没有的

事被告却承认自己作了。White, W. S. 在其2003著作 *Confessions in capital cases*中指出[30]，在已被DNA确认为非当事人事例中，有20% 至25%自认犯案。也就是说，四五个已被DNA证明不是犯罪人中就有一个在法庭上曾公开说自己是有罪的。Drizin & Leo更声称这数字只代表冰山上一小块而已。[31] 要指明的是这是在所谓西方自由文明社会法治国家所得的数字。若在极权统治，施刑逼供频繁的国家，那数字和比例则比这数字肯定高得多了。

证据分析

倪柝声是在如何环境下作出供词，我们无法查究。但参考美国通用FRED E. INBAU 1962年出版刑事疑犯逼供手册，可见可产生错假供词的一般环境。通常疑犯被隔离于简陋隔音小房间，使疑犯远离熟人，远离任何资讯支持，在陌生环境下，由审查者严厉确定的咬定被拘者的罪行。此过程延续不断，直至被拘者开始感觉绝望。过程中审查者经常打断被拘者的说话，否定任何不认罪之声明，指控被拘者撒谎，反驳任何抗议，不让被拘者有机会作任何反驳。在这时期内，审查者提供一些或真或假的提示和资讯，进一步拆除被拘者对自己的信心，渐渐感觉再坚持下去不会有好处。这时审查者开始为被拘者提供一些想法，帮助被拘者能作出使自己能接受的合理说词，审查者此时开始态度转为仁慈同情，劝勉被拘者合作，并提供一些替被拘者保留面子的建议，使之接受审查者的想法。藉此加增被拘者对不认罪的焦虑，对事态的绝望，对认罪的可接受性。最后，审查者让被拘者亲自写下自己供词，加上一些想出来的情节，如此则使被拘者的证词显为自动而合理的。[32]以上描写的，是在美国发生的情景。这类逼供的手段，在中国可谓司空见惯，并且通常是变本加厉的。以上之美国逼供手法若能产生错假供词，则在中国产生的可能性大得多了。

Kassin分析这种现象是循着一固定形式呈现的，可分五步骤：（1）被拘者被置身极端环境，如压力，隔离，剥夺睡眠等，（2）审查者提供被拘者一些表面可信的见证，如其他证人，测谎器，物证等，（3）在审查者提示下，被拘者开始对自己记忆产生怀疑，（4）被拘者开始初步承认，（5）被拘者进一步确认自己犯罪，并加上自己想出来的一些情节。[33]

其他当事人见证

以上对倪氏本人见证作一点的分析。上文提出另有第三类证据，即其他当事人见证，这里所指其他当事人，不包括根据他人听闻而再转述的见证，也就是不包括所有第三者的所谓听闻，这些所谓听闻只能被算为传闻，不能被法庭接受为可接受见证admissible evidence。[34]真正能被接受的见证，只有与倪案有直接关系的个人见证，属这类的只有二人，即被指定被倪强姦的女同工。于最原始资料1956年2月之公安检查处起诉书中，只提到两位同工，被分别提名为张耆年和缪韵春，而真正从她们口中听见她们本人见证的，则只有缪韵春一人。以下分析一下缪韵春的见证。

缪个人的见证，是在1956年2月倪被公开斗争以后，由许梅骊与张锡康代表肃反大队组织的学习小组登访缪韵春时，后者亲口对二人作的见证。缪之见证并无录音，我们并没有原始资料，只有许梅骊的转述报导。

许梅骊之报导准确性有多少我们暂且不讨论。在此讨论缪韵春见证之可信度。首先要指出，在倪起诉书称倪自供是强姦二同工，并将过程录于摄影机。在缪之见证里，没有提倪强姦，而是说二人邂逅，并且是彼此同意的。跟据许梅骊的报导，缪见证中也提到摄影一事，并云此事发生于1931年。[35]

首先要指出，倪说他的摄影机是留英时期买的，倪第一此访英是1933年夏天，则凭客观资料，1933年前倪根本没有到过英国，倪第一次访英，是由于英国关闭弟兄会Taylorites注意到倪，故于1931年年底，组团八人访沪[36]，同时邀请倪回访。倪故于1933年夏天首次访英美两国，在此期间也访问伦敦的史百克。同年回国，至1938年再访英国史百克，次年1939年回国。他一生访英，仅此两次。凭此事实，1931年倪根本还未去过英国，也就没有买到摄影机的可能，故此根本无可能用摄影机拍电影。缪之见证，与事实不符，若不是她的见证有误，就是许梅骊报导有误。

除此以外，根据许梅骊报导，缪见证事情是在无锡发生。缪自1928年已迁沪，与李渊如同住文德里[37]。而倪惟一可能住无锡时间，是1928年前。倪于1927年底迁沪。自1928年初至1933年夏，倪皆住上海，并且长期卧床养病。于倪出版《复兴报》22期（1931年12月）显示[38]，倪于这段时期皆于上海。缪之见证，与上述史料不合。

要进一步客观分析这见证，得先问以下几个问题：（1）缪是在甚么大环境下说出这话的，（2）在说这话以前有否传闻缪为当事人，（3）缪有否在这之前接触公安部，（4）缪对两位代表政府的“肃反学习委员会”代表会有什么想法。

中国五十年代初期的肃反运动，上文已作简单介绍，值得注意是自1955年7月至1956年年底一年半内，运动牵连人数仅官方承认的就有1380万人，自首的人数仅自1955年冬至1956年4月止就有42万[39]，也就是说平均每天就有2300人自动向政府承认自己是反革命的，这些人不是在政府逼供下，而是在完全自发的状态下自首的。仅此数字可见当时社会的紧张状态和人民紧张空气。1956年上半年，是斗争倪柝声高潮时期，又是肃反运动紧绷时期，是倪案已被公开批判，又未于法庭结案之前时期。缪韵春的见证，是在这时期供出的。这是当时客观的大环境。

在许梅骊与张锡康访缪以前，所有人皆已知倪案所指女同工为缪与张，包括缪本人在内。并且缪本人不会不了解这资讯是政府官方公布的。那个年代对政府提供的任何资讯探任何质疑态度，是会招来杀身之祸的。这个任何人包括缪在内是不会不知的。许梅骊与张锡康的学习小组，不采访别人，而锁定采访缪，此事本身就证明许，张，缪，皆知道缪是与倪案牵连的。缪不是在毫无预设立场下被采访的。

至于缪与公安单位在此采访前有否接触过，我们不得而知。但很难想象这段时期正值倪案高潮，案中又指名道姓提出缪本人，而公安单位却不曾接触缪本人，这是不可思议的。

缪本人对许梅骊与张锡康之来访如何感想，我们固不得而知，但这两人是代表肃反学习小组，而学习小组是代表政府，这二人其实就是代表政府，至少是站在政府一面的，所有与他们的说话，就是对政府的交代，任何对他们说的话，她有理由相信都会回到政府耳中的。

基于以上的事实，我们可以下一个结论，缪的见证不可能是在完全自由状态下说出的。这点非常重要，它关系到一个证词能否被接纳的关键条件。这里不是说见证真不真，而是说见证是否在完全没有外来影响下完全自由自主状态下作出的。

必需性与可能性

有人说缪无必需且无可能作假见证。首先我们来看看她有没有必需作见证。她有没有必需作她的见证，我们无法断定。但试问在那种情形下，她能说否定的话吗？假设她否定与倪有关系，政府会让她自由否定政府的宣传吗？她真的没有需要作她的见证吗？有人说她可以不讲话，但在那情形下，她如果在学习小组面前不讲话，报告回到政府那里，将会有甚么结果？所有经过那段历史的人知道，大凡任何政治运动，不积极表态的结果是怎么样的。

至于她有没有可能说出一些对自己不利的假话，我们上文讨论了许多，但上文是针对倪本人作false confession之可能。这里是说缪本人作false confession的可能。前者是在监禁压力下，后者是在无监禁环境下。

人品见证和结论

知名的美国心理学家加州尔湾大学教授Elizabeth F. Loftus 对人类记忆之脆弱作了多年研究与实验。她最大的发现，是人类记忆对错误资讯的可能产生的反应，与所谓目击者之记忆，并对错误记忆之产生与性质的研究。她的著作举世公认，并经常在法庭上被引以为证。她本人于超过250宗案件中出庭作证。于2002年百位最具影响力心理研究专家中名列58。[40]

她发现人类记忆会随着提供给它的资讯而改变。记忆并非完全准确，而是由过去经验加上其他支配因素构成。别人问的问题，甚至问的方法，会直接影响被问者的记忆。她用实验证明，目击人的记忆如何因错误资讯而改变。这现象成了心理学上最广传的新发现，而她的实验促进上百种相关的研究与实验。

她最出名的实验，为所谓购物场走失实验，对一些成年人提示他们在孩童时在购物商场上走失，这些事故是根本没有发生过的，但由于实验员的提示，结果25%自认曾发生此事，有些更加上自己创造的情节。这实验多次被法庭应用，结果一些州法庭开始不接受凭记忆提供的见证，而保险公司也开始拒绝心理治疗者诱导下供出的孩童受害个案。[41]

D. J. Bem于1966年发表文章，指出人类语言可改变人类信念，特别指出这些语言若来自可信靠的人或可靠的来源，则更能产生效果。通常说出来的话会加强听话者的信心。他说：“当我们感觉讯息的来源是可信的，话语就成了信念，若再加上一点鼓励，或轻微或暗示的压力，信念就更加强。”[42] 另一专家Driver于1968年指出，当刑事疑犯被逼招供自述罪行几次，就会自动相信他所招供者。[43] Henkel and Coffman于2004年研究指出，真实或假设的人、

事、物有时会被错误穿插于经验中，并且这种张冠李戴的现象，通常越生动，越浅显，越重复，越与熟人熟事接近，则越容易被接受。特别在辨别疑凶时，见过的面孔很容易被混乱穿插在无相关的情景中。[44] Porter, Spencer, & Birt于2003年更证明，想象的情境越负面越情绪化，则越容易被置信。[45] 总括来说，人是可以在精神压力下想出没有发生过的事。并且实验证明，“认为可能”的思维，会生出“坚定相信”的思维，而“坚定相信”的思维，又会产生“记忆幻想”的思维。

以上例子，皆在无警察压力下发生的现象。许梅骊报导在倪事件中，缪韵春见证是在完全自动自发下，娓娓道来的。故此她没有可能在这种情形下说假话。但以上资讯指出，人的记忆可以在完全没有恐吓压力的情形下改变的。上文讨论倪本人见证时，考虑因素之一是外来压力，但在这里的记忆改变，考虑因素是外来提示。而实验证明，记忆的改变和假想，不需恐吓压力，只在乎提示。专家指出，记忆不光有可能在某种情形下改变，想象出没有发生的事，并且这些想象能加以扩大，在专业名词中称为Imagination Inflation，甚至可以产生根本不可能发生的记忆Impossible Memories。[46] Loftus指出，熟人与朋友的见证，是构成假记忆的一有力提示。由他们提出某事的经过可引至误导的认罪。[47] 有时给受影响人一点时间思索记忆，或给予提示，受影响人开始不知不觉地想出他认为可以叫对方满意的答案，可能开头几次不成功，对方不满意，这就更能促使受影响者在心思上不段努力，在这种挣扎中，开始产生错误的幻象。[48]

本文引述许多专家的见证，因专家见证被法律明确指定为可呈堂的见证。[49] 虽然以上所引研究均是美国例子，然而假如在美国这类事件尚如此普遍，在中国则更有可能发生了。

人品见证

上文仅就三方面可考虑的“证据”作讨论，即（1）政府提供物证，（2）倪本人见证，（3）当事人缪韵春见证。至于其他见闻报导，无论合理不合理，皆在法庭上不能被接受，因皆为间接传闻，在法律上属hearsay性质，不仅不能作考虑因素，连在法庭上呈堂也不能，以免影响陪审员的中立性。[50] 但是相反地，一些对倪人品正面的见证，被反对者批评为奉承“贴金”的见证，却反在法庭被承认为可呈堂的见证admissible evidence。美国联邦证据法FRE第404A(2)条，明文准许所谓人品见证character evidence[51]。并且特别指明所谓人品见证，是指对被告之人品“好”的见证，以支持被告的无辜。反过来那些指控被告之人品“坏”的见证，则不被接受[52]。原因是人品“坏”的见证，会反面影响陪审员，造成偏见。人品“好”的见证，只需是一般性的，而不需是具体的事例。因这样见证的目的是见证被告的一般人品，具体的事例反会分散注意力。

对倪人品正面的见证有许多，最接近他的是他的妻子，他妻子张品蕙一直坚持他的无辜。[53] 此外尚有许多其他人，对他曾作正面见证。[54] 即使缪韵春张耆年二人，也于1950年与其他10人为倪人品作正面见证。[55] 这些见证，根据联邦法律，都是可以呈堂的证据。

相反地，法律容许对于任何毁誉别人的毁誉者本身的人格作出质疑，[56] 并提供该毁誉者一贯之人格作风作为指控。也就是说，若有言论中伤别人的，被中伤的人或他的律师有权对中伤人的品德提出质疑并质问。

以上就倪案三方面可考虑的证据作一讨论，至于不属这三类的，基本上是上不了法庭的资讯，只可当作茶余饭后用的推理言论。以上大部分资料是出自美国自由法治社会，显示一严谨处理事态的手法。但是从上文看见，就是如此小心翼翼防止错误资讯的措施中，仍发生诸多冤假错案，若在没有这些保障下的司法制度，其错误则更可想而知了。

结论

作为结论，本文以一件案件到达结束时在法庭所发生程序作借镜。通常一件案件到达尾声，双方律师皆说完要说的话，所有可呈堂的见证也一一展示完毕，法官就得转向陪审团，说一些提醒的话。[57] 其中最重要的，是提醒陪审员对事态保持公正不偏的责任，并提醒他们判断是根据证据事实，而不是根据律师的口才。他们的责任是屏除所有推理和情绪，光凭事实判断。并且提醒他们，所有呈现证据必需是无任何可疑空间的 *beyond the shadow of a doubt*. 也就是百分百无错误之可能的。若有丝毫能被挑战空间，则不能成立。法官通常也要提醒陪审员法律基本原则，即无罪推定原则，也就是在判定被告有罪前，必须假设被告是完全清白的。通常法官也会把相关法律为陪审员详细并明白的复述一次，并告诉每位陪审员必须独立作出判断，而不能受其他陪审员影响。然后陪审员根据所呈上资料，各作独立判断。最后的判决，不是根据多数陪审员意见，而是根据全部陪审员百分之一百一致的判断，只要一个陪审员有相反意见，判词就不能成立。

倪柝声个人道德问题，过去几年众说纷纷。本文试图从人类最严谨之资讯传达程序，作一分析讨论，并请读者以陪审员身份，作出客观独立公正的判断。

注：

[1]

[2]

[3] <https://www.sccourts.org/summaryCourtBenchBook/HTML/CriminalH.htm>

[4] <https://codes.findlaw.com/ny/criminal-procedure-law/cpl-sect-270-40/>

[5] <https://zh.wikipedia.org/zh/%E9%A6%99%E6%B8%AF%E5%88%91%E4%BA%8B%E8%A8%B4%E8%A8%9F%E7%A8%8B%E5%BA%8F>

[6] Federal Rules of Evidence, 简称FRE; 见<https://www.law.cornell.edu/rules/fre>

[7] <http://criminaldefense.homestead.com/CondensedObjections.html>

[8]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objections_\(law\)](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objections_(law))

[9] https://www.law.cornell.edu/constitution/fifth_amendment

[10] <https://www.law.cornell.edu/constitution/amendmentxiv>

[11] <http://cpc.people.com.cn/GB/64156/64157/4512071.html>平反冤假错案工作

[12] 同上。

[13] http://blog.boxun.com/hero/200808/guoguoting/7_1.shtml

[14] 同上

- [15] Stanley Hubman, *The Study of Chinese Laws in the United States: Reflections on the Past and Concerns about the Future*; *Global Studies Law Review*, Washington University, Vol.2, No.1, 2003.
- [16] 此前于1955年8月出现公安部内部文件“基督徒聚会处（小群）概观”一文。但主题并非倪柝声。
- [17] 张锡康, 《张锡康回忆录》, 189页, 光荣出版社
- [18] <http://wenku.baidu.com/view/49592c2fb0717fd5370cdc30.html?re=view>
- [19] http://www.yxjedu.com/li_shi_shun_jian_fan_you_zhuan_ji/1957_xia_ji/1957nian_xia_ji_9.htm
- [20] 朱正反右派斗争全史（上册）, 79-80页
- [2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E%8B%E6%98%8E%E9%81%93#.E5.85.A5.E7.8B.B1>
- [2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E%9A%E5%93%81%E6%A2%85#.E8.A2.AB.E6.8D.95.E5.92.8C.E5.88.A4.E5.88.91>
- [23] 王小平, <五十年代肃反运动的来龙去脉探究>; <http://www.xuehuile.com/thesis/e4c4bc3a52254e18bc47457860b95a35.html>. <建国以来公安工作大事要览-编写组. 建国以来公安工作大事要览（1949年10月至2000年）[K]. 北京：群众出版社, 2003.
- [24] 这是朱正一书引1957年7月18日<人民日报>的数字. 这数字显然是过低的. 它报导自首人数自1955年7月至1957年7月两年间只有19万. 但上文王小平引官方2003年<建国以来公安工作大事要览-编写组报导, 自首人数仅1955年冬至1956年4月半年间即已有42万. 若2003年公安的报告是比较准确, 则真正数字比<人民日报>57年报导的数字至少大7-8倍.
- [25] 130万与8.1万是94%与6%之比。
- [26] 1956年12月7日, 中央十人小组向中央作了《中央十人小组关于肃反运动的当前情况和一九五七年的工作向中央的报告》。该报告说, “1955年, 第一批肃反运动中的中央和省、市级党政军领导机关, 已经基本结束。参加运动的580多万人, 查出反坏分子37000多人。第二批肃反运动的县区机关、厂矿、企业、基层文教卫生、财经等单位正在进行, 至1956年底, 有800万人参加, 初步查出2万多名反坏分子。[32]1此外, 该报告还指出, 1955年开展的第一批肃反运动, 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基本结束。根据1956年10月的统计, 全国参加运动的有5, 864, 238人, 经过反复检查, 最后定案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共37, 288名。”以上报告中第一批和第二批加起来, 共有1380万人参与运动。
- [27] 张锡康回忆录, 199页, 光荣出版社
- [28] <http://bbs.fuyin.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274>
- [29] 参: <https://www.law.umich.edu/special/exoneration/Pages/about.aspx>
- [30] White, W.S. (2003). Confessions in capital case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Law Review*, 2003, 979–1036.
- [31] Drizin, S.A., & Leo, R.A. (2004). The problem of false confessions in the post-DNA world. *North Carolina Law Review*, 82, 891–1007.
- [32] FRED E. INBAU, ET AL., *CRIMINAL INTERROGATION AND CONFESSIONS* (Jones & Bartlett Pubs. 2004) (1962)
- [33] 见上文, Kassin, Internalized False Confession.
- [34] 见联邦证据法 Federal Rules of Evidence, FRE Article VI WITNESSES. 特别第602条 Need for Personal Knowledge; <https://www.law.cornell.edu/rules/fre>.
- [35] 许梅骊, 难泯岁月, 137页。
- [36] 张锡康回忆录, 51页。
- [37] 同上, 21页
- [38] 倪柝声文集第9册《复兴报》。
- [39] 见上文
- [40]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lizabeth_Loftus
- [41] 同上
- [42] Bem, D. J. (1967, June). When saying is believing. *Psychology Today*, 1, 23-24.
- [43] Driver, E. D. (1968). Confessions and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coercion. *Harvard Law Review*, 82, p.53.
- [44] Henkel, L. A., & Coffman, K. J. (2004). Memory distortions in coerced false confessions: A source monitoring framework analysis. *Applied Cognitive Psychology*, 18, 567–588.
- [45] Porter, S., Spencer, L., & Birt, A. R. (2003). Blinded by emotion? Effects of the emotionality of a scene on susceptibility to false memories. *Canadian Journal of Behavioural Science*, 35, 165–175.

- [46] 同上
- [47] 同上
- [48] 张锡康回忆录里转载了左弗如,周静梅,倪规箴,周逸民等见证,与上述描写心理现象完全吻合,见191-199页.
- [49] 见联邦证据法Federal Rules of Evidence, FRE Article VII Opinions and Experts Testimony. 第702条;
<https://www.law.cornell.edu/rules/fre>.
- [50] 见联邦证据法FRE Article VIII Hearsay; 同上。
- [51] <https://www.law.cornell.edu/rules/fre>
- [52] S.M. Kassin and L.S. Wrightsman, *The Psychology of Evidence and Trial Procedure*, p. 151-152
- [53] 倪妻甥女万小玲见证倪妻曾亲口否定所有政府对倪指控. 见<反驳梁家麟著的倪柝声的荣辱升黜>,56页
- [54] 如吴有琦,陈终道,李常受,陈则信,张宜纶,张悟晨,张郁岚,金弥耳等,尚有网上许多其他名字.
- [55] “几句不得已的话”, 敞开的门第22期, 倪柝声文集第3辑第9册, 314-315页
- [56] Martin F. Kaplan, *Character Testimony, The Psychology of Evidence and Trial Procedure*, 153页
- [57] 见美国律师公会American Bar Association提供的How Courts Work, Instructions to the Jury;
http://www.americanbar.org/groups/public_education/resources/law_related_education_network/how_courts_work/juryinstructions.html.

第四部分

回应梁家麟、许梅骊、连曦等人的不实叙述

何子建

倪柝声的一生，可由他所写的诗歌“葡萄一生的故事”（诗歌465首）来表达，“估量生命原则，以失不是以得；不视酒饮几多，乃视酒倾几何；因为爱的最大能力，乃是在于爱的舍弃，谁苦受得最深，最有，可以给人”。他是我们所知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基督教传道人，因不愿放弃信仰，被囚禁二十年，刑满未获释放，最终死于劳改农场者。夫妻分离十九年，在妻子病重离世之前，也未获得应允去见妻子最后一面。倪柝声的一生活出了圣经马太福音里主耶稣对门徒所说的话：“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十六24），以及“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七14）。

今天所有的基督徒中，有成千上万神的儿女受到倪柝声见证的激励和他属灵的帮助，但另外也有少数（五位左右）社会人士和所谓的学者公开著书攻击倪柝声有不道德的罪行，我们在此不能承认这些人是基督徒，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完全不是基督徒该有的生活见证。因为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至三十一节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事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忿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或译：阴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

1. 梁家麟

这五人中写得最多、最长、最恶毒的是香港建道神学院的梁家麟，他在2003年出版《倪柝声的荣辱升绌》一书。该书由建道神学院出版，建道神学院直属的出版社是宣道出版社，社长许朝英是香港第五届金书奖出版人。建道神学院在宣道出版社代理出售之前，倪弟兄小弟的长子Sam Nee曾就此书拜会梁家麟，梁家麟对Sam Nee的回答是“他要替天行道.....”。读此书的人不难发现梁家麟的文字充满了苦毒、恼恨和毁谤。他攻击倪柝声的根据大多出自引用王明道的日记，而王明道的日记又是根据其他人士的耳传，没有任何一点事实证据。梁家麟的书中大量使用这样的叙述，表示他的写作是“略可接受的事实”，“拼合出较为合理的故事来”，“错谬的可能性较低”，“由于资料缺乏.....我们并不清楚，一个合理的推断是.....”，“倪柝声在法院上的供词据说是这样的.....”，“综合各方面的资料，我们大概确定以下的故事始末.....”，“我们有理由怀疑倪柝声被停职的原因.....从常理推测.....”。

在今天的法律社会，你若要控告一个人犯了道德的罪行，你在法官面前是不能用“略可接受的事实”、“拼合”、“资料缺乏”、“推断”、“据说”、“大概确定”这类的词语，还没进法院，你的控诉就会被驳回。但今天在学术界，梁家麟这样的人竟然可以不受约束，随意地控告倪柝声？不仅如此，圣经给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有一个更高的律法约束，“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或译：就是从恶里出来的）”

（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七节）。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四至三十七节里，主也斥责法利赛人：“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

2. 连曦：浴火得救——现代中国民间基督教的兴起

连曦是美国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神学院的历史教授，一般在美国学术界的出版都有严格的论文写作标准，任何引述都要有直接的论述事实。连曦在2018年4月21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主持人张敏采访，讲述他于2018年3月出版的书，这本书名为《血书》，论到以血为墨的中国异见者林昭。在采访中，连曦多次强调他写作的水准：

“有关书的内容，我先讲几句。我的书从性质上来说，应该是一部学术的著作。比如说，书总共的页数是330多页，但是书的正文只有252页，那么也就是说，大概有80多页都属于.....里面有大部分都是脚注和引用的一些资料。所以这是这书的一个特点，它是一个学术的著作。”

“在这个基础上.....您也知道，作为作历史研究不能只使用一种史料，必须结合各方面史料。所以在这么多年的时间里，从2013年开始，我每年都回国采方一些能够提供一些比较直接的林昭史料的人，包括她的前未婚夫甘粹。”

“在国内的特别是在网上很多有关林昭的评论文章，主要是注重林昭的一些思想，这些当然都非常重要。作为历史研究，我需要把她的思想放在一个历史的框架里面，放在她人生的一个大的叙事、大框架里面，所以我就必须注重一些史实，要澄清一些事实。”

从该书的总页数是330多页，正文只有252页，大约有80多页都属于脚注和引用资料来看，连曦花了许多时间，把人、事、物的史实有一个明白的交代。这里确实看到连曦先生治学严谨，不愧是杜克大学神学院，享有世界基督教研究终身教授的名誉。但若是回到《浴火得救》这本书，连曦在说到倪柝声的道德问题时，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第一局在内的诸多文件，但这些文件的真实性均有待查考。今天你要控告一个人有道德上的犯罪，也需要有详细的人证、物证。对于一位为信仰被监禁20年的传道人，你一句话把谣传当事实就定人的罪。不要说是治学，就连作人也不能如此。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三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

众所周知，在毛泽东统治时期，许多人以捏造的罪行被安上“反革命”的罪名，这些案件在80年代邓小平执政时，经判定为冤、假、错案而获得平反。倪柝声之妻张品蕙的反革命罪名也得到平反。连曦所使用的公安部资料，后来并没有被列入法院的起诉书中。连曦研究过林昭，应该最清楚在那个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年代里，公安部文件的可信度有多少。

3. 许梅骊

近日读了许梅骊女士近七百页的大作《警钟长鸣》，该书是许女士第一本书《难泯岁月》的增修版。第一版许女士从地方教会前成员的角度自述其主观感受，第二版除了收录第一版的自述外，另新增了一倍的篇幅，一面批评论倪柝声的教会理论和实践，一面引用历史来加强她所断称的失德事件，最后再以教牧的口吻劝地方教会的信徒要悔改，一跃成了集教会学、历史学、教牧学于一身，还以旧约的历史书为例，要信徒“以史为鉴，除去障碍”。然而许女士的“历史”丝毫无法与旧约正典相提并论，充其量不过是“伪经”改编的小说，性质近似于八卦杂志。打着倪柝声和地方教会的醒目标题，博取好奇人士的关注，只要稍微谨慎一点的读者，就可以看出内容的可疑，竟还有多名基督教人士为这样的书作序，也是很令人匪夷所思了。

一、资料来源

许女士1947年才在李常受先生的传福音下清楚得救，受浸时只有16岁，就读高二。因此该书的前五章半，都是许女士从别人的著作东拼西凑而来。许凭着一些二手资料，将倪1934年的结婚事件形容得像人在现场一样，一面质疑倪是在压力下勉强成婚，一面指责他身居幕后嫁祸于人。倪弟兄结婚时许不过才三岁，从哪里得出这些结论？同样的，许批评倪1935年致弟兄会的《覆伦敦罗区福街聚会信》傲慢虚伪（88页），强烈质疑倪的道德，又将倪1948年的复职形容成他暗中调兵遣将的预谋（125页）等等。书中许多事都发生在许梅骊得救之前，许是从哪里得到这些印象，作出这些结论？

众所周知，倪柝声于1942年停职，一直到1948年才复职，许得救的时候倪弟兄并不在上海，当时上海教会反对倪柝声的风波也尚未结束，教会里不免还会听到一些闲言闲语。许是一个刚得救的青年人，对倪的事没有亲眼见过，自然无从分辨其真伪。倪弟兄1948年复职后，在上海只聚了几次同工聚会，便到福州鼓岭去办训练。1949年政局改变，倪先是到香港开特会，后回安排福音书房事宜。许到底见过倪柝声几次面，我们不得而知，可以说许女士所认识的倪柝声，大多是从旁人口中听来的，是别人对倪的印象，加上许自己的想像。

1949年到1956年是基督信仰在中国饱受试验的时刻，新政局的不稳定，新宗教政策的实施，许多教会和事工带领人都在摸索往前的路，倪也是其中之一。尽管他也曾经尝试要服从世俗的政权和宗教政策，但他仍与许多其他宗教领袖一样，被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成了政府主要打击的对象。当时这种案例并不少见，许自己也在书中见证当时她看过耶稣家庭的罪证展览会，极其渲染、夸张，但到了倪柝声身上这里，许就照单全收，深信不疑，政府的打击宣传政策在许身上再成功不过，许不仅完全相信这些罪证，还在控诉大会和报刊上多次公开控诉倪柝声。在教会经过试验，忠心爱主者为信仰摆上性命之时，许却因政治表现良好，被立为上海教会思想改造教育委员会一员，协助共产党改造上海教会其他信徒。因着她在政治上的活跃表现，以及对“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的大力控诉，使得许多曾经服事过她的年长弟兄姊妹因此被囚数十年，甚至殉道。许并非如她自己所言，是被倪柝声带错路的受害者，反之，许踩着倪柝声和其他人的性命，顺利完成医学院的学业。六十年后，爱主殉道的人都已不在，苟且偷生的人却跑出来写历史。事实上，历史对倪柝声早有定论，许不过是想改写历史，动机可议。

二、作者人品

许的书主打她在地方教会的亲身经历，但她从得救到倪弟兄被囚不过四年时间，她所写的“地方教会历史”却前后涵盖了五十多年，九成以上都不是她的亲身经历，特别是与倪个人有关的部分。许以政府摆出的罪证控诉倪柝声犯了财务和道德上的罪行，再引用张锡康的“回忆录”（未出版的手稿），任钟祥的《地方教会简史》、李文蔚的《关于史伯诚著〈倪柝声殉道史〉一书违反史实的参考资料（摘要）》和俞崇恩的“个人资料”作为“内部人士”观点。众所周知，前三位都曾于1950年代和许一起控诉过倪柝声，只有张锡康一人晚年悔改。而俞崇恩因其父俞成华至死不愿控诉倪柝声而病死于狱中，心中一直耿耿于怀，认为倪是害死他父亲的始作俑者。许梅骊在描述倪柝声失德时，大量引用俞崇恩的“个人资料”作为证据，却没有交代这些资料从何而来，以何种形式存在？这些“个人资料”可以是俞从别人那里听来的传闻，俞的日记，或是口述。若是这些资料来源可信，足以作证据，为何俞崇恩不自己发表，要以嫩子为笔名提供资料给许梅骊？若是俞崇恩没有平安以这些资料来控告弟兄，又为何要借许梅骊之手来作这事？无论如何，这些所谓“个人资料”真实性都有待调查，并不足以当作控罪的根据。

许梅骊的另一个资料来源是上海教会长老张光荣之子张锡康的回忆录。张锡康曾经在生化药厂工作，对倪柝声有第一手的认识。许梅骊本人对倪柝声本人、生化药厂、倪的停职与复职，以及倪的个人生活一无所知，她书中对地方教会历史的叙述，几乎都是先抄袭张锡康回忆录的历史部分，再以自己的揣测想像作出负面结论。2011年《难泯岁月》出版后，张锡康曾公开作出澄清，直批许在未经同意的情形下，从他书中抄录一些历史过程，“加上一些不实的传言，归纳到她自己负面的结论上，还用我从来没有讲过的话作结语”，“犯了抄袭修改的无耻之过”（见张锡康“有关生化药厂的澄清”）。2012年张锡康将许梅骊抄袭扭曲的《回忆录》补充增订出版成《张锡康回忆录—上海地方教会六十年来的回顾》。在序言里，张明白表示之前的“回忆录”在写作过程中有政府的监督，而今离开那环境后二十年，看法和说法都比较自由与客观，因此感觉需要在有些资料上加以修正。然而许梅骊不但不以自己抄袭被暴露为耻，还在第二版的《警钟长鸣》里一面继续抄袭张锡康回忆录的内容，一面又用17页的篇幅大肆批评张锡康，还为其悲哀。事实上，许书第一版中恶意引用张未出版的手稿，已然违反世俗的著作权法，张看在许是神儿女的份上没有以法律维权，只以信件警告，许却恼羞成怒、变本加厉地在他的第二版中批评张锡康的人格，真是“蠓虫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太二三24）。

三、动机可议

如张锡康所言，许的“历史”乃是从不同书里抄录多段历史事件，再加入她的想像和一些不实的传言，好归纳出她事先已经预设好的负面结论。许的第一版如此，第二版还不只如此。她不仅继续编造对倪柝声的批评，还进一步评论倪的教会观，对倪柝声的教导和著作做出各种的扭曲解读。不知许是哪里来的资格对此做出评论？为何不告诉读者她书中内容的来源出处，乃是出于与她沆瀣一气，以同样手法写作的梁家麟？梁、许两人彼此引用，梁用许抄来的假历

史批评倪柝声的职事，许再用梁对倪的批评作为她自己书中的论点。梁从道理入手，许从道德入手，目的都是要打倒倪柝声，使人离弃他的职事。

许批评地方教会高举倪柝声，遮盖他的罪行，这绝非事实。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明确教导门徒：“不要审判，免得你们受审判；因为你们用什么审判审判人，也必受什么审判；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七1-2）。许在审判大会上控诉倪柝声之后，神所量给她的人生经历，见证了主话语的真实性。使徒保罗也告诉我们，察验人的乃是主，“所以在那时以前，什么都不要论断，直等主来，祂要照出暗中的隐情，也要显明人心的意图，那时各人要从神那里得著称赞”（林前四5）。正如倪妻张品蕙所言，“将来还有更高的审判”，在基督的审判台前，一切都会真相大白，许又为何要着急地将倪柝声钉十字架（路二三21，约十九6，15）呢？

许口口声声要信徒“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但读完许七百多页的著作，却“不见耶稣，只见一人”，六十多年过去了，许依旧紧抓着“倪柝声”不放。笔者鼓励许自己要先“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忘了倪柝声，好好专注于基督，不要再流连过去，不如把时间用在写点有营养的东西供应祂的儿女，结出果子与悔改相称（太三8，路三8）。

许梅骊在她两本书《难泯岁月》（2011）和《警钟长鸣》（2018）里扮演的角色无非是小丑和恶妇。箴言六章二十三至二十四节：“因为诫命是灯，法则（或译：指教）是光，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能保你远离恶妇，远离外女谄媚的舌头”。

上海教会的徐腓力弟兄，比许梅骊低一个年级，两人前后进入同一所医学院成了前后期同学。许梅骊在政府追捕倪柝声和上海教会相关人士时，提供给政府详细的名单，造成1956年一月一夜之间八位长老、负责弟兄和同工被捕。那时的许梅骊放弃信仰，完全配合政府的拘捕行动和思想改造的政治活动，因此她一步青云，不仅成为上海教会思想教育委员会的核心骨干，也顺利完成她的医学院，后来美国，功成名就。退休后也许因良心不安，写了两本书解释她当年为何卖主求荣，并将自己一切的恶行都归咎于倪柝声，试图得到谅解和同情。

许梅骊和梁家麟两人彼此推荐，互相抄袭。反观徐腓力，因拒绝配合政府放弃信仰，被判18年劳动营改造，从此未能完成医学院的学业。许梅骊所行的就如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三至五节所说：“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三十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当吧！”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殿里，出去吊死了。”那八位长老同工到死都未放弃信仰，其中徐腓力的岳父张愚之弟兄被判死刑，死在刑场，效法主耶稣一生十字架的道路。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七至十节：“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的枉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赍济穷人。”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门徒认为马利亚向主爱的奉献是枉费。已过二十世纪以来，千千万万宝贵的性命、心爱的奇珍、崇高的地位以及灿烂的前途，都曾“枉费”在主耶稣身上。对这些爱主的人，祂是全然可爱，配得他

们献上的一切。他们浇在主身上的不是枉费，乃是馨香的见证，见证祂的甘甜。”（圣经恢复本太二六8注1）

兹以2014年4月29日美国国会议员Joe Pitts在美国国会的史资（United States Congressional Record, Vol. 160, No. 62），作为回应总结。Joe Pitts先生肯定倪柝声、李常受两人的职事，认为这两位忠信神仆的名字和职事实是华人之光，他说：

倪、李二人自1932年起即在中國共事，孜孜不倦為主作工。……今天，由於倪柝聲多部著述，如《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坐、行、站》等，已成為基督教界經典之作，倪氏生平也堪稱廣為人知。…倪李二人在中國同工時，雖以倪為翹楚，但其後乃是李在倪的指示下，將他們所作主工帶出中國，使其得以在海外存續，且發揚光大，甚至擴展及於華語世界之外。……

李常受的工作并未局限于亚洲。他于1962年来到北美，在洛杉矶开始尽职并设立水流职事站，出版倪柝声和李常受的著作，以英语及其他五十多种语言发行。李常受的著述继续强调“基督作生命”，并强调神的心意是要在神子民合一的基础上，而非种族或文化差异上，“建造祂的教会”。这正是他师承倪柝声所学之道。自六〇年代初起，地方教会在李氏的职事下，于北美、南美、欧洲和非洲皆有显著扩展。目前在各大洲聚集者，共有超过四千处教会，信徒人数达四十万，其中包括在俄国和俄语世界的两百处教会和数千位信徒。

今日地方教会遍及全球各大洲，其教会的发展和信徒人数之众，是神对倪柝声、李常受两人的职事最强的认可，无须他人宣扬。倪、李的职事所造就出来的信徒和教会，照着圣经纯净的教导，阐明圣经的真理，为着神永远经纶的目标，建立神的国度，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以达成神心头的愿望。

倪徐恩秀论生化药厂与倪栢声弟兄职事的恢复

2003年8月26日

我的先生倪兴祖是倪栢声的五弟，我大哥倪栢声先生于1920年得救后，身体力行他所信，所传；其间经过多次误会，诬陷，但他秉持在主前所受的教导，甘心一生走十字架的道路，从不为自己辩护。他于1972年离世归主后，虽然近年坊间出版多本关于倪弟兄的书籍，无论是好是坏，我们倪家也尊重他在世向主的心愿，从来不予置评。但《倪栢声的荣辱升黜》一书的作者的写书的存心及动机，已远超过对一个神的仆人的打击与抹黑，其效果已对许多无辜的圣徒、读者造成极大信仰上的伤害。故此，在许多的祷告后，才接受负担执笔作函。此信中所参用的资料来源都是我们倪家在1942-1956年在上海当事人的直接见证，也包括我姪儿徐腓力先生（倪怀祖是他的姑父），以及该书作者所列举之证人的亲笔来往信件。对于信中所提到生化药厂之内容，我也请两位弟兄和我的长子倪天佑，及陈正行（倪怀祖的外甥）等四位日前到上海找我二姊倪徐奉先求证，她是倪怀祖的妻子，倪怀祖是倪栢声的二弟，也曾任生化药厂的厂长。

当时教会在各地非常的兴旺，同工的需要也日益增长。照着倪弟兄从圣经的启示所教导和实行的，在我们中间从来不募捐，当然也没有基金、差会的支援。经年为了众同工在靠信心过生活而生计贫乏，多有因营养不良而生慢性疾病，以及儿女求学因贫困而作罢的情形，倪弟兄为此常常自责。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开始了生化药厂的事业。倪弟兄还为生化药厂取了“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作为标语。

倪弟兄的堂兄倪树祖，我们都称“Peter倪”是当时在上海的商业巨子，曾经作过中国银行在上海的行长，由他为主要投资人并出任总经理之职。我记得还有相当数量的银行贷款。二哥倪怀祖是知名的化学师，曾有自己的发明，起初担任厂长，后来山东齐鲁大学的刘弟兄担任厂长的职务，怀祖则专心作研究工作。有许多弟兄姊妹也在工厂工作，我自己担任包装部主任，那时我们都年青，别的不知，只知爱主，努力工作。每天早上开工之前都先祷告。生化的业务蒸蒸日上，虽然我们都拿微薄的工资，但结余下来有相当的利益。后来买牯岭训练的房舍以及海关巷的房子都是从生化支应的。倪弟兄一生没有过好日子，凡事为他人着想，为他人打算。他所背负的，所承受的非外人可以明白，但是只要接近他的人都能为他作见证；他是一个实践信仰的人，他不仅教导十字架的功课，他的确追求，接受十字架的对付。从来不为自己打算，即使有误会，甚至于有诬陷，我没有看过他为自己辩白过一次，这是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可以在见证的，（如今还有不少的人仍然健在。）但是我相信这对于许多不认识他的人，或者不以他的教训为然的人是无法理解的。

因着生化的问题，教会中生出了风波，结果由该不该作生化开始，愈演愈烈，传言加上无理、恶意的中伤，演变成对倪弟兄个人的严重攻击。这个风波大到几乎所有同工长老都置身其

中，只有俞成华弟兄坚持圣经的教训，认为教会不得只凭传言而作出任何举动，需当面核实方可处理。没有想到大多数人都反对而作罢，因而造成倪弟兄长期不能服事的局面。

在上海的英国女教师巴姊妹、钟姊妹，我们都非常熟悉并亲近，再加上一些西国的姊妹，因上海教会的情形而停止聚会很久，灵里非常枯干。有一天她们不得已去找倪弟兄交通，结果好像是谈到了国度的启示，（我记不太清楚，）交通后她们大得帮助，喜乐异常。她们说：“不管倪弟兄开生化是对或是错，我们知道他灵里有宝贝，他里面的亮光是他人所没有的。”于是与许多弟兄姊妹交通，而有恢复倪弟兄职事的开头。

当时倪弟兄和我们住在一起，他自己没有子女，对我们的孩子特别疼爱。我还记得那天早晨他正要出门，我的次子天赐见到大伯一定要他抱。倪弟兄满面笑容地将孩子从我手中接去。不多久他对我说：“恩秀，快把孩子抱过去，我要去聚会，时间来不及了。”没想到孩子用两只小手把大伯的脖子抱得紧紧的不肯放，我只好勉强把孩子抱过来。我看他很高兴，于是大胆问他说：“大哥！我可以和您一同去参加聚会吗？”他回答说：“好。”我们坐上吉普车到了哈同路，文德里。进了会所，大吃一惊。原来今天是全国长老及同工聚会，（本人并无资格参加。）不一会倪弟兄立起，带着非常沉重的心情，眼中含着泪，轻声慢语一句一句的说：“我开生化是出于不得已，我好像一个寡妇带着孩子改嫁，因为同工的孩子都长大了，要学费上学，有些同工们因缺乏营养，病的病了，去世的去世了，我心中非常的难过。还有每次买会所都是老寡妇姊妹们拿出钱来，于是我对主说，‘下次买会所，我拿出钱来。’”讲到这里，全场弟兄姊妹痛哭，流泪。李渊如姊妹站起来请倪弟兄赦免她，她说：“生化是（生活）。”对我来说，长时间以来，这类的话我听得太多了，实在是令人无奈。

从那天起，主在上海带进了大复兴，大家写字条将自己完全交给主，奉献给主。买南阳路会所时，总共三佰金条是相当大的数字，当时每人都将自己最值钱并心爱的东西献上。有一位裁缝弟兄把他唯一养生之物，一部缝衣机奉献了，大家因他此举大受感动。后来俞成华弟兄出钱买下这台缝衣机，送还给这位裁缝弟兄。大家向着主的心是多么的火热，教会大大蒙福。后来倪弟兄去烟台一段时间，与李（常受弟兄）同回上海。释放信息刚强而有能力，圣徒被丰富的话和灵供应，祝福像洪水一样洋溢在上海教会当中。整个教会满了喜乐，满了丰富的供应和享受，那种复兴的流是无法抗拒也是无法言喻的，那是我一生中最喜乐的日子，是一种在地如同在天的喜乐。张愚之弟兄满有福音之灵的能力，传福音一日有五百人得救，这是空前的。大家满了喜乐，真是疯狂了。

这不仅是我个人的见证，也是许许多多经过上海教会大复兴的圣徒的见证。我们经历了主在死亡、枯干之后赐下来复活、生命的丰沛祝福，这是全教会众圣徒共同经历的属灵事实。直到今日，在中国、在海外有成千上百的圣徒都直接、间接地受了当时教会复兴的影响和益处，这是一个不容抹杀的属灵事实。我希望这个事实也不致于为他人所轻易侮蔑与践踏。

以上是我个人亲身的经历，生化药厂的事与倪弟兄恢复职事的经过，至今仍然历历在目。尤其是后者，在当时置身其中的圣徒所经历的，是神在地上工作极其荣耀的一段，圣灵的能力

，祝福的水流，被主爱所感，被圣徒向主的爱所感的事迹无法一一胜数。我只是重温我生命中在主面前最可纪念的一段日子，我没有意思为倪弟兄的恢复职事作任何的表白，更不用说辩护。

就以我大哥外传有关男女之间的事件，从无当事人对上海教会长老提出控诉的事实，所有的说法都是第三者的传言。所以1950年10月22日，上海市教会负责弟兄，李渊如姊妹、汪佩真姊妹及二位被传言的姊妹，发表了一份“几句迫不得已的话”（刊于《敞开的门》第22期，1950年上海教会长老及同工声明）：

近来外面有的刊物，责难到我们的见证，并攻击我们的同工倪柝声弟兄。我们对于这样的刊物，一向是抱静默的态度，不乐于争辩。我们一面愿在主面前学功课，一面也愿让主自己来替我们证明。总之，将来在基督台前，各人的心怀意念都必要显明出来。但愿主怜悯我们，叫我们不敢不敬畏祂！不过对于倪弟兄个人，我们在主面前都能同心见证，他是神的一个忠心的仆人。他虽然经营生产事业，但他的目的从来没有为着他个人的什么。在真理上，在事奉上，在经营生产的事业上，我们和他都是同心合意的。特此敬告凡关切到我们的弟兄姊妹，也请你们为我们代祷。

唐守临 杜忠臣 缪韵春
俞成华 许达微 李渊如
张光荣 朱 臣 汪佩真
江守道 张愚之 张耆年
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二日

我们作后人的相信，前人在神面前的操守，上海教会长老以及同工共同具名的信件声明，是我们当然接受并信赖的。至于外人和不信者不同的评论，不是我们辩答的对象。

倪怀祖妻子倪徐奉先姊妹的访谈纪录

时间： 2003年6月17日

地点： 倪师母上海寓所

在场者：倪徐奉先（X），倪师母亲戚（R），倪天佑（S），何子建（H），吴有成（W）

出版纪录：本访谈经编辑曾刊于《对再批斗倪柝声之平议》一书，45-56页。此为原访谈纪录，未经讲者编辑。

H： 1952年倪弟兄被公安抓走了，到1956年才审判他，这四年来，你们有没有什么消息？

X： 这完全是撒但的攻击，撒但他不甘心。倪弟兄他是为着主的缘故，完全是为着主的缘故。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完全是撒但作工，因为撒但一直不甘心的。你晓得自古以来，多少人为主殉道，是吧。像[施洗]约翰被杀掉了，彼得倒钉十字架。走主的道路就是这样子，逼迫。走十字架道路的人，撒但就不甘心，就要想办法攻击他。彼得倒钉十字架，约翰的头摆在盘子里头，他犯什么罪？ 保罗也是为着主，是吧。从古到今，我说如果主耶稣来之前，还要有事情发生的，因为撒但不肯甘心，他不会停止的。

我得救那个时候，聚会刚在我们这里开始的时候，我很年轻。我当时在美以美会学校读书。我的爸爸本来是做医生的，后来事奉神作了内地会牧师，我的母亲也非常爱主。我的大姊先到文德里去聚会，她一听见倪柝声弟兄讲道、传福音、讲真理，觉得完全不同，她就打电话通知我，要我也去聚会。那个时候我在工作了。她打电话给我，要我去。我一听，我就觉得完全不同。我在学校的时候是美以美会，我在文德里聚会的时候，我的老师，我的校长都不赞同我，因为他们是美以美会的，反对我这样。但是我就觉得里头有生命，清楚地叫人得救。什么是主耶稣？ 主耶稣是谁？ 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相信他的人就有永生，这是美以美会没讲过的。我在美以美会读书的时候，早上都有作礼拜，作好礼拜再上课，我没有听说过这些。我那时候一听，里头就有感觉，我就相信，以后我就去聚会，以后我就受浸。每一次我去聚会的时候，倪柝声弟兄在上面讲道的时候，我都记笔记的。为什么我记笔记呢？ 因为我有好朋友在复旦大学读书，她礼拜天不能去聚会，我就记笔记，坐车到复旦大学给她看。倪弟兄讲的道每一句话我都非常宝贝，都是要拿笔记下来的。

S： 1952年的3月份倪弟兄被捕，一直到1956年判刑，这中间不是有四年左右的时间吗？ 这段时间的情况怎么样？

X： 哦，是这样的，可能是在55年，我记不清楚了，因为我现在年纪老了，如果没有神的话，我也活不下去了。我记得可能是55年，我接到一个通知，那个通知是寄到鲍家去，鲍贤玲家里去，就叫我送东西去。鲍贤玲就是我大嫂的姊妹的女儿，我大嫂姊妹的家里，就是倪柝声弟兄太太的姊妹家里。她就住在岳阳路，到这边来很近，她拿一张单子来给我，要我送东

西给我们大哥，送脸盆，热水瓶。送到那里呢？送到淮海路，我忘记那个地址了，就送过去。送过去的时候，他们就收下来了，我就问，请他写个字条给我好吧，但是他们说，“不可以”。后来我听人家讲，那是个拘留所，以后就没看见他了，我们每天就非常焦急。大概到了1956年，接到一个通知，他被关到提篮桥了，我就同我们大嫂一道去看他。看他的时候，有一个铁栏杆的窗子，我们送点很简单的东西，他们就检查，检查好了就叫犯人出来。这里有个窗子，是个年轻人，这里是我们大哥，他是这样坐着的，我们是这样子站着的，只能看到他的侧面。看到他的时候，他很瘦，如果我不是自己家里的人的话，我差不多不认识了。很瘦、很瘦。十分钟讲话，他没有讲什么，他就很安静的这样。这里有两个警察，这里一个，这里一个。他没有讲什么话，他就问我大嫂“妳好吧”，我的大嫂就说，“你看，我的头发都白了”，青头发都白了。他也没有转过来看，他就同后头二个人讲，他说，“我们好久没见面了，你能给我们时间多一点吗？”那个警察就很凶的，他说，“你讲完了”。这样子，他就没讲什么话了。把他推到一边，他就进去了。这个以后，每个月都进去一次，见面的时候，送什么东西呢？送很简单的东西，四个咸鸭蛋，这样子大的瓶子，两瓶豆瓣酱，牙刷三个。

H: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这本书（梁家麟的书）里面说，倪弟兄同意跟三自联合，然后给了三自两万人到三万人弟兄姊妹的签字，那么听说这两万人到三万人弟兄姊妹的签字是为了南阳路会所不被政府征收时弟兄姊妹的签字。但是倪柝声又把这两万人的签字又作另外一个用途，说是弟兄姊妹同意教会要跟三自联合。这种说法是唐守临自己作的呢，还是倪弟兄，他们说倪弟兄同意的。

X: 唐守临的太太是我的好朋友，原来是我的好朋友，但是那件事以后，我就没有同她来往。是这样子的，据我晓得的，倪柝声弟兄，三自里头要他参加三自，他不同意。这个我在神面前可以说，神知道，将来也许不只神知道。我所知道的。他不同意。他不同意。三自对他说，“如果你同意的话，你参加三自，我要叫你作三自的头头”。倪柝声弟兄不同意，他没有参加，可能他这样被处置的，这个原因也说不定，但是我不晓得，神晓得。自从这样子以后，有一天说人不见了，没有消息了。之后我去淮海路送东西给他，后来又没有了消息了。

唐守临写了一个《天风》，那个时候，我就不去聚会了，我就没去聚会过了。唐守临写《天风》的时候，我就觉得他这个人变了。本来他的太太是我的好朋友，后来我没有同她来往了，结果有一天他的太太到我家里来了，要我去聚会，我就不去，我说我通通不去，从那时候，我们就同她没有来往。

S: 我们还有一件事情想问您一下，那个展览会上不是有照片吗，这件事你可以讲一下吗？当时你也去看了。

X: 是这样的，事情发生以后呢，解放日报上登了，登了之后就动员居委会的人去看，很多人去看。但是感谢神，派出所没有动员我去。他就到我家里来，他说你报纸看过了吧。因为我那时候心脏病很厉害，他看我身体不好，他就说你报纸看过了吧？我说，我看报纸只看主要

的题目，不是全部都看的。他就说：“你看了印象怎么样？”我就说：“你指那一点呀？”我想因为我身体不好，报纸我不是全面的看，我是主要的题目看一看。我说：“你指那一点？”他就指到这一点，我就对他说，今天如果不是我家里的人，我也可以说说，我说所刊的，我不相信，这是虚伪的，我这样讲，这是假造的。可是呢这个报纸是解放日报，是国家的报纸，我说我就不说什么了。我头一句就说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他会作这件事情。我现在是站在一个不是他的家里的人讲话，我是从旁边看起来，他不会作这件事情，绝对不会作这个事情，我这样讲。那么他就说（态度蛮好的），“妳身体不好，我们过两天再来吧。”但是他就没来了。

S：后来你也去看那个展览了？

X：我去了，看了。他没有动员我去，是我自己去的。我一看，我的心真的想，我说，神哪，撒但是这样的攻击，完全出乎撒但的。因为照片，一个女人的照片，头没有的，裸体的。我就在想，一个人如果作这件事的话，他会这么笨吗？他会笨到这样一个地步吗？留给人家把柄吗？是吧！要枪毙的，现在是要枪毙的。有这样子的傻瓜吗？我那时就这样子想，有这样子的傻瓜吗？很多那个小书，连拉三轮车子的都不要看了，很低贱的书。另外有一个姊妹她去看了，她告诉我说，她说：“倪柝声弟兄绝对不会看这种书的，都是那种……。”我告诉你们两位，你们没有在大陆上，你们不晓得，共产党什么东西都拿得出来，他什么东西都有。就是文化大革命抄家的时候，人家家里明明没有那个金条，他还是拿一大堆出来，说是到家里抄的，其实是他自己在别的地方拿出来的。是吧。

所以我去看的时候，我就说唉呀，我们大哥呢，头剃光了，头剃光了。我想他在那里恐怕吃了很多苦，可能非常非常的苦。可是我就想到一首诗歌上的故事，就是背任何的十字架，“我愿背任何的十字架”。他在监牢里我去看他的时候，因为怀祖弟兄胃出血，大便里头都是血，都是血，那我有心脏（病）的，但是每个月我都去看他一次。可能他看见我，好像看见他（倪怀祖），有次他就问我，“怀祖好吧？”。我说：“胃出血”。我去看他的时候，心里满难过的，他就看出来，他就对我说，他就说：“要喜乐”。他总是说，他说，“我总是维持喜乐”。他这句话给我安慰，在那种环境中，他有喜乐，神给他喜乐。因为一个人如果作了坏事情的话，他会这样讲这句话吗？会讲吗？如果他真的是一个坏人，他会这样讲，说“很喜乐”吗？是吧？所以真的，将来在神的面前，都要显明。平反用不着，不要失去神的祝福。

H：提到当初最早的人民政府的控告书，可不可以再找到一份影本？

X：本来我有的。他判刑的时候，没有叫怀祖弟兄去，也没有叫我去，是叫我姊夫去的，姊夫林步基他已经到主那里去了，他去的。他就拿了一本回来，这么大本，大概有两张纸吧。拿回来以后我就藏起来了。摆起来以后我想不对，因为这个政府这样子，如果给他抄家抄了去，他说我是翻案，所以我就把它作废了。如果摆在那边的话，文化大革命的话，他要把我们两个抓去，说你们要翻案，好像留着这个做本钱。

- H: 那生化药厂，当初开始这个生化药厂的时候，是倪弟兄自己家里人自己的钱投资呢，还是说，听说，英国有一个Austin Spark，他说给一千磅，有没有这件事情？
- X: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
- H: Austin没有一千磅？
- X: 绝对没有。没有没有。
- S: 书上说，在生化之前，倪怀祖开了一个药厂，经营不好，所以倪弟兄帮他，说你在我这边再开一个。
- X: 他没有开张，从来没有开张。没有没有，我们没有本钱。他（倪怀祖）就是个搞科学的，他拿着很低的工钱。以后我自己也到生化药厂去作了，我们两个工资很少的。
- S: 鼓岭训练的时候买的房子，那个房子完全都给了教会了，对不对？书里面说没有给教会，是完全给了教会的，这个我妈妈(倪徐恩秀)都知道。而且呢，不只是鼓岭的房子，全倪家的资产，自己家里的产业都给了教会，都奉献了。
- X: 自己的资产，自己家里的产业，也都奉献了。福州的房子，那现在我要这样讲了，那是福建自己家里的资产，祖上留下来的房子。有一天倪柝声弟兄喊我也去了，怀祖也去了，老母亲也去了，就说，这个房子你们要吧？谁要吧？我们都说不要，都说奉献。就是这样子，征求我们的意见。怀祖弟兄也说不要，我们也说不要，那我们大嫂都说不要，都说是奉献给神。所以你们细细想，还有什么事要问我？怀祖弟兄一直拿工资的。
- S: 生化药厂的股份到底是属谁的？
- X: 倪徐恩秀知道，她在工厂做过事。生化的问题主要是有很多弟兄姊妹没有得益处，失业的，没有事情做的，这我很清楚的，就是这些弟兄姊妹到药厂去做，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没有事情做。
- S: 生化药厂有没有分厂？
- X: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只有抗战把厂迁到重庆，那是因为打仗，只有这回事情。
- S: 在上海我可以带你们去，就在胶州路上面，现在那个老厂房还在，就是上海那个地方，旧址还在。
- H: 你认不认识史伯诚这个人？他当时多大年纪？
- X: 好像他比我大？

H: 他好像讲的头头有理, 好像什么都知道。

X: 这个人不行, 这个人不行。

S: 他也不负责弟兄, 他年轻阿, 大概二十来岁吧?

W: 史伯诚好像比倪老师母年轻, 他好像只有九十岁, 他年轻。

S: 那他年纪很小, 他跟我妈妈(倪徐恩秀)应该同样年纪, 二十来岁。

H: 他讲得好像什么都知道的样子。

X: 他乱讲。这个人乱讲。

W: 您认识俞成华弟兄吗?

X: 俞成华我很熟。

W: 那俞成华的孩子熟不熟?

X: 孩子是俞崇恩, 我和他熟, 我认识他, 因为我的老母亲, 就是倪伯母, 她看眼睛, 陪她去他家里, 小孩子跟我们打招呼, 像这样子同他谈话没有过, 但是我晓得俞成华弟兄是非常爱主的, 他为主都摆上的。

W: 他有一些的话我们不知道准不准, 他说倪柝声跟三自联合。

X: 誰呀?

W: 俞崇恩。

H: 他说, 因为倪柝声跟三自联合, 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就软弱了, 人数就减少了。

X: 没有, 没有, 没有。绝对没有这件事, 没有, 没有。他同三自根本没有关系。如果倪柝声弟兄参加了三自, 就没有这些事了。

W: 就是在52年到56年, 倪弟兄在正式判刑之前, 被关在哪里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提篮桥我们知道, 刚说淮海路拘留所那个地方可以见面。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现在手头的资料有倪弟兄写的文稿, 说是倪弟兄写的文稿, 说倪弟兄赞成弟兄姊妹向三自会登记。

X: 没有, 绝对没有。

W: 因着有这些东西出来, 说我们要顺从政府的规定, 所以它说倪弟兄赞成登记。因着他这样的赞成, 所以跟他当初的反对冲突了, 矛盾了。所以原先与他一同配搭的李渊如, 汪佩真, 她

们先是软弱了，后来她们就敌对他了。她们站住，她们认为倪弟兄没有站住。就变成她们站住了，她们站住了，所以那两个姊妹也都被关进去了，一直到死在监里面，有没有这个事？

X： 没有这个事。绝对没有。

W： 这就是外面传的一些事。

X： 我一直说，这是从撒但来的，撒但它真是谎言。这是从撒但来的，一直到今天。为什么撒但这样做呢？ 我看就是这个原因，就让弟兄脑子弄糊涂了。因为现在弟兄姊妹们还是走在这条真理道路上，这样一来，他们就把弟兄姊妹分开。绝对没有。我听见我很惊奇，没有这件事，绝对没有。所以我只能说是撒但来的，撒但这样做，弟兄姊妹的心就分开。

H： 他们还说倪弟兄是国民党的上校，特务员。

X：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如果这样的话他不会抓进去。他就不会被抓进去坐监了。我每个月去看他一次，他还是喜乐。他还对我说，“要喜乐”。

S： [书]里面还有说，大伯（倪柝声）和四伯（倪兴祖），有把情报交给了四伯（倪兴祖）？

X： 没有这件事。没有这件事。没有这件事。如果有脑子的人，站在神面前的人，一听就晓得这是假的，就晓得是假的，是吧。如果真的是在神面前看清楚的话，一听就晓得是假的，因为撒但就是撒谎的，是吧。如果撒但不撒谎，他不能写这些话。

R： 我们同你们说，我们从小在这里长大，这里搞运动就是对你讲他说了什么什么事情，对他说你说了什么什么事情，就一直是这样的，从那个时候到文化大革命 一直就是这样。我不讲什么，你问老太太，在文化大革命时也对老太太这样，谁讲了什么事情什么事情，要她承认。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拿出来讲，那他[书作者]太没有知识，太没有经验，他不知道搞运动是怎么回事。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跳楼阿，自杀，都是这样。

X： 有一个姊妹，他们把他弟兄摆在外面，就像我们一样的，把弟兄摆在外面，把姊妹摆在家里，斗阿斗阿斗阿。隔离审查，让你们两个不见面。到我面前讲，说“怀祖弟兄他在里面已经坦白了，你还不坦白？”在我弟兄面前说，“倪怀祖阿，徐某某人已经坦白了。”都是谎言，都是骗人的。

S： 他还说，我二伯（倪怀祖）已经死了，这都说得出来。

X： 可以这样子吗？ 因为撒但他不这样子，他就早早到硫磺火湖里去。怎么问俞成华？是俞崇恩讲的阿？

- W: 对，是俞崇恩作过一些的见证，说倪弟兄他后来是妥协，就是愿意跟三自联合。他在这边 [上海]，他算是当初比较早出去的人，也是俞成华的儿子，所以好像他的话人家比较容易接受。
- X: 如果是俞成华弟兄在的话，他一定否认的。
- W: 现在就是那些的文章，是不是真的，这个存疑。我们是有一些的文字稿。
- S: 这个是有一点存疑。当初他如果这样，他不会关起来的。当时有两个人，1953年，我那时才初中，我才升高一，一个天主教的龚品梅，一个就是倪柝声，两个人，两个人都被国家抓，有不道德的，还有反三自的。
- W: 我的印象中看过这样的文字，就是倪弟兄赞成。但是倪弟兄的定罪，并不是宗教的问题，也不是反革命问题，是生化药厂的问题，中间大概是有逃税，还是囤积居奇，低价卖高了，大概就是（我记得不清楚）这么一个定罪的原因。当然我们这都是看看而已，倪弟兄被定罪的说法，我们在海外的并不是很清楚，因为有好几种说法。
- X: 可以说完全不清楚。
- W: 对，完全不清楚。我们比较能接受的是因着站住教会的立场这个事被定罪，我们接受的是这个，那就等于是为主殉道了。这个立场是我们能接受的，对于其他的，关于逃税啦，关于道德的问题啦，关于其他的事情呢，这个都是我们不接受的。
- S: 一个起诉书，一个判决书，两个书，你记不得那个时候那些项目是什么东西？
- X: 我不记得了，因为上面写的，很多的完全是假的，都是假的。如果我们大哥参加三自的话，他就不会判刑了。
- S: 共产党蛮狡猾的，他可以以这个名义抓你，最后定你 [罪] 不是这个名义。（H: 他花了四年时间找材料。）我刚才讲，他从52年3月份进去以后，一直到55年，根本就找不到人，一点音讯都没有。一直到55年，她第一次去就到淮海路拘留所送东西。送了以后56年判罪有提篮桥，她们才去。去的话原来只能是大嫂，后来大嫂有心脏病，写了两个人名字，所以她和和大嫂，所以每次探监只有两个人去探。有的弟兄姊妹讲，当时里面只能有一个人探，事实上是她和大嫂两个人可以进去探，每次都是她们两个人。
- X: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大嫂她血压高，再有心脏病，所以她说，就报我的名字，上面会批。有一次一个人就问我了，我送东西去，他就说，“你不是这里家属，你怎么可以送东西来？”我说，因为我们大嫂有心脏病，血压很高，我把名字摆在上头都是领导同意的，这样子他就收了。以后大半的时间就是我一个人去，我一个人去的时间比较多，去看他。一直等到文化大革命搬到白茅岭，开始就不能去了。但是谁去看他，就是我们大嫂的姊姊张品峥

，张品峥到主那里去了，她去看他的。大嫂也去看过他的，大嫂在白茅岭的时候也去过。因为我怀祖弟兄身体不好，所以我不能去，这样子的。有一次文化大革命以后接到他一封信，就是他要心脏病的药，是我寄过去的，以后就没消息了。

今天早上听你说，我说，撒但到今天他还是不甘心，他还不甘心。为什么呢？就是一班弟兄姊妹，好像心里摇动了，它的目的就是这样的，影响弟兄姊妹的信心。所以撒但还是不甘心。我有时候会想，像我们大哥这个样子，如果他不是为着主的缘故，他很有本事阿，很聪明阿，非常聪明的人，也非常老实的人，他可以作很大的事情，是吧，他为着主的缘故摆上一切。

像扫罗在去大马色路上碰着主的时候，就变成神的保罗了。他很聪明啊！以后他事奉神了，事奉神把他自己的生命摆上了，一样的，一样。他很聪明。保罗多聪明阿，因为他在大马色，主耶稣喊他，“你为什么逼迫我。”，他专门抓相信主耶稣的人阿，他抓相信主耶稣，相信主耶稣的人都不是坏人阿，都不是坏人。那个时候害他们，他真高兴。结果在大马色，主耶稣喊他了，你看他为着主的缘故摆上，他摆上了。他很聪明的人，但是他认识主，回头了，摆上一切了。我们大哥也是非常聪明的人，我们常常在想，如果他不是把他自己奉献给神，在社会上肯定作一个很大的事情的，是吧。

所以今天我的外甥同我讲的时候，我说撒但到今天还不甘心。文化大革命就可以证明了，就把人分开，那个时候把我分开，就讲“怀祖弟兄，他讲了什么什么什么，他都坦白了，你还不坦白，你还要保护他？”在怀祖弟兄面前就说，我已经坦白了，“她已经把你的事都坦白了，你还包庇阿？你还保护阿？死都还保护阿？”我说没有，没有。他说，“没有？你还保护他？你应该帮助他坦白。”就讲这些，这样一年多。

我的照片在哪里？就在那...现在我眼睛看不好，眼睛怕亮。他就把一个电灯就摆在这里，我在房间里头，一个电灯摆在这里，五十烛光的一个电灯摆在这里，日夜。这里坐一个人，一个男的坐在那里，家里有八个人。我都不承认，我都不承认，我说没有没有没有。那么他到怀祖弟兄那里就讲我坦白了，在我面前就讲怀祖弟兄已经坦白了，他认罪了。

H: 他们就灯五十烛光一直照着你，八个人在家里，一个人就在一直问你？

X: 一直问。把我跪在地下，把我背后衣服一拉，啪就跪在那里，客堂那里，门朝这里这样子。哎呀，一年。他们住在客堂上面，这里，一年多。一年阿，我瘦得皮包骨头，我有一张照片还在这里，瘦的皮包骨头。有一张照片是他把我们放回来了，他说你回去，回去同你丈夫拍张照片拿来，那时他恐怕要判我们刑了。后来他说照片不要了，还给你们了。

H: 这是哪一年？一年的审判是哪一年？

S: 文化大革命66年开始，你这个事情是哪一年？

X: 记不清楚了。大概是七几年。

H: 我想倪弟兄那四年在监牢里面不知道吃了多少苦，那根本是，什么话都能讲得出来了。

R: 像我们在这里经过的，这书我们就看着笑，不值得去跟他讲的。

X: 唐守临这个人没良心，他太太不会做事的，烧饭什么的都是唐守临自己烧的。《天风》我没看见，但是我听说他写的《天风》，我想这个人怎么这样要不得，这样卑鄙无耻。同他人一样的，他太太叫我去聚会我就不去。

52年的时候三反五反，我记得那时候照顾唐守临，我拿我自己的钱，买小菜找其他人烧饭给唐守临，他身体不好，生病。他养热带鱼，爬在锅炉上跌下来了，就烫到了，这样他太太一个人负担不了，我就同他太太一起买菜。买菜的时候有人从上面跳楼，跳下来。后面的人跳下来了，Sam讲，姨妈，你快点走，不然的话就跳在我头上把我压死了。文化大革命很多反右派、反革命的犯人关在上面，三反五反，犯人多得不得了。

S: 但是从那56年以后，唐守临就...还有人讲这话，说我赞成三自关进去，我不赞成三自才还在里面。现在唐守临还赞成三自，还拿工资的，拿国家的工资一直拿到现在，拿到他过世。从56年以后阿姨同唐家就不来往了。

H: 所以那些信，就是倪弟兄对三自比较有好评的那些信，可能都是52到56年在监狱里面被批逼迫写的。

X: 被逼迫写的。在监牢里头，人在里头，他这里有小窗子，手伸出去，被人家按手印。他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违反良心的事情，因为他们没神啊，有神就不敢这样做了，因为撒但、魔鬼，是吧。他什么都有，这是我亲眼看见的，抄家的时候，他拿几个金条，小金子，说从你家里抄出来的。他说，“我没有”。他说，“在你家里墙上敲下来的”。明明他家里不会有的。他[红卫兵]手里什么东西都有，他拿出来就说是你家里抄出来的。哎，我们在这里苦的不得了。文化大革命苦的不得了。

倪徐奉先的祷告：

主阿，我们在任何的环境中，我们还是感谢你，我们还是赞美你。因为你是主，你是天地的主宰，你管一切，你也一切都知道。主阿，我们真是感谢你，今天弟兄来，我们有个甜美的交通，主阿，在主里头的交通，是何等的甜美！是世人所不能体会的。主阿，相信所谈的这些话，主阿，你都知道了。主阿，什么是事实，什么是虚伪，什么是诡诈，主阿，都是撒但在这里。主阿，撒但一直要等到你再来的时候，撒但才下到无底坑里面，要到硫磺的火湖里头。主阿，它今天还在猖狂，主阿，它在这里就是要分散人的心，主阿，它这样子作就是要让弟兄姊

妹里头摇动。主阿，里头信心摇动，主阿，但是我们向神说，主阿，你是神，弟兄姊妹一定站在你的面前，站在你一边，不是站在撒但一边，主阿，叫撒但 的都是撒谎。主阿，它始终都是谎言。主阿，始终都是逼迫弟兄姊妹，逼迫相信神的人，神的儿女。神阿，你保守你的儿女。主阿，不受这些影响，不受这些谎言的影响。主阿，里头不摇动。

主阿，主阿，撒但它失败。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永远永远得胜，祂是永远得胜的主。主阿，一切事情，我们今天所谈的一切事情，你都听到，神都听见。神阿，你都知道。神阿，我们所谈的，我们所讲的话，所谈的话，你都知道，你都在中间。因为你说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你就在我们中间。主阿，何况我们现在是有五个人在这里，你在我们的中间。我们所讲的一切你都听见。主阿，求求你，按你的公义，你来审判这件事。你乃是亲自审判，按你的公义来审判。主阿，我们活在你的手中。主阿，倪柝声弟兄他到你的怀中了。主阿，将来还要得荣耀的冠冕。主阿，主阿，他为着你摆上一切，他真的要讨你的喜悦，任何的十字架他都背。主阿，主阿，我们为着他，我们自己得着益处，我今天还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不然的话受了这么多的逼迫老早远离你了。主阿，人是软弱的，靠不住的，但是你的保守，你还保守我到今天。主阿，感谢你。主阿，我们今天所谈的这一切，都在你的手中。主阿，求求你使所有的弟兄姊妹，能够看清楚，神是不改变的，神是永远不改变。主阿，我们谢谢你。主阿，大哥在你那里。主阿，他已经在你的怀中。主阿，我们因着他，主阿，如果他不是相信你的话，他不是为着你的话，今天在上世界上他可以得着最好的、美好的工作。他为着你摆上他的一切，他背十字架，他是任何的十字架他都背。主阿，真是感谢你。主阿，谢谢你，主阿，谢谢你。带领我们到今天。求求你真是完全的认识你。再保守我们，主阿，你与我们同在。主阿，我们虽然人会分开，但是我们祷告神，永远不分开。那不受空间的限制，不受环境的拦阻。主阿，我们谢谢你。在我们分散的时候，你与我们同在。保守弟兄，祝福弟兄。主阿，求你无论他们到那里，都与他们同在，看顾他们。主阿，谢谢你，我们真是低头敬拜你。主阿，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不敬拜你，还有谁来敬拜你呢？主阿，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关于1942-1948年倪柝声停职之原因 及生化药厂经营问题之事证^[1]

关于倪弟兄停职六年（1942-1948）的事，许梅骊在她的第二本书《警钟长鸣》（2018）[2]里，提到两个主要原因。近因是为着在生化药厂里工作的人有许多抱怨批评，远因是倪氏的道德问题。按许梅骊的描述，许多在药厂工作的人跑去向李渊如抱怨，结果引出与李渊如同住多年的女同工张耆年在“无意之中吐露出一句咒骂倪柝声的江南俚语”（页320-321）。许梅骊说李渊如“甚为讶异”，并且“紧紧追问”。张耆年被污辱之事，据许梅骊说，是发生在1933~1934年间。（页322）因为这个“隐情”，许梅骊说倪弟兄就写信给上海教会长老俞成华，请他们将他从教会除名。（页323）

本文主要是查对许梅骊对倪柝声停职的控诉，特别是在她的第二本书里面，她强调倪柝声停职六年是因为他道德的罪，所以需要探讨倪柝声停职以及后来恢复尽职的背景与原因。

许梅骊书中的重点，是把道德的事和倪氏之所以停职硬要牵连在一起。她一口咬定道德的事是真的，虽然时间上倪氏停职和道德之罪没有任何合理原因相连（如果道德之罪是真的，两者之间事隔八、九年之久），她仍然定意要把它们连在一起。许梅骊在这点上的坚持，可以从后面她的叙述看出来。1956年的肃反以及官方对倪柝声道德方面的控诉，都让许梅骊“释怀”，从此她就紧紧抓住这一条线，凡是能够拉进来的，不论合不合理，她一概加到倪柝声头上控告他犯了道德罪。

关于倪的停职，最合理的原因与当时的大环境有关，其最主要的事件是1942年由上海教会长老俞成华所召开的一个会议，这个会议除了教会的长老之外，一些负责同工也在场。对于这个事件，任钟祥和张锡康都有描述。

任钟祥的记载出版最早（1996年）。在《上海基督徒聚会从简史》里，任钟祥说：

自四十年代初起，倪柝声利用国外资助和向国内的信徒招股、认股，办起了“中国生物化学制药厂”。由他本人任董事长，因此引起信徒非议甚多。1942年6月，李渊如得知倪犯奸淫罪就写密信给俞成华等三位长老，要求暗中将倪革除。长老们顾虑可能导致聚会处分裂，未敢决断，因此引起李渊如愤慨，李即退出上海聚会处，去苏州隐居。

1943年5月2日，倪柝声致函长老、执事们，信中说：“声受神所托者不多，而今所余者亦少，自念长此以往，于教会毫无益处。敬请诸弟兄将弟名字从簿中除去，以安许多人心，以免贻羞主的名字。（抄自上海聚会处执事办公室记事簿）。（页9）

许梅骊在她书中（2018）关于这个会议的描述，尤其是关于李渊如，以及李后来搬到苏州去住等，明显是引用任的说法。此外，许梅骊还加上不少别的细节，包括张耆年脱口咒骂、长老们“坚决主张革除倪柝声”、李渊如气愤的控告、和最后李带着张耆年去苏州。许梅骊说她的这些细节源头来自俞崇恩的“个人资料”（页323）。

张锡康在他的回忆录（2016）里，清楚说到他本人在那个会议里面。他说：

在生化闹事的弟兄们常去李渊如家告状。李渊如也不耐其烦，常下逐客令。后来她去苏州休养。上海当时负责的同工是俞成华。有一次，他召集同工、长老、执事开了一次会，又请在苏州的李渊如来。李渊如带着气愤的样子来，只说了一句话就走了：为着弟兄姊妹，我不说的好。大家都在猜发生了什么事，这事我父亲不知道，教会长老也不知道。我当时参加了那次聚会，听见俞医生说，“倪弟兄要求教会将他的名字从名册上拿掉，但事实是上海教会没有信徒名册，只有通讯卡片，况且倪弟兄不属于那一个地方教会的，因为他是同工，通讯卡片上也没有他的名字，况且我们也不知道真实的情况。既然他自己引退，那就让他引退吧。”大家也同意俞医生的话。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

（页100）

张锡康接着针对任钟祥的记录表示意见：

目前坊间有些文章评论1942年倪弟兄停职的事。评论者都没有亲自在场，所记的都是从第三者听来的传说。我是当时在场的见证人。上海负责弟兄们在讨论这事时，我亲自参与。许多传闻只是事后多年的传闻和解读而已，并非当时在场者的所见所闻。任钟祥日后在《上海教会历史》中声称倪在该年给上海长老写了一封引退信。但我个人在任钟祥之前管理教会执事室文书档案里，从未见过此一封所谓呈职书。不知任从何得有此书信。（页100）

所以，许梅骊的描述，首先她引用任钟祥的话，任并不在场，他所说的话不能采信。另外，她还有两个细节与张锡康的记录不符。许氏强调长老们对倪事处理有分歧，且有多人主张革除倪氏。这点必定是从余崇恩的所谓“个人资料”来的。俞崇恩自己并不在场，1942年俞大约16岁，其资料从何而来？许梅骊还加上另外一些无法证实的故事，说长老同工们到俞家去强迫俞成华（俞承恩的父亲）革除倪氏。即便真有此事，要革除倪氏的原因，最有可能的不会是八年前的道德因素，而是和当时生化药厂之经营有关。这是最明显最直接的问题和背景。余崇恩的个人资料并没有说长老们为了道德之事革除倪氏，许梅骊强调倪柝声道德的缺失是他停职的原因，这样强调不但牵强，而且从许氏后面的表述，她另有目的，所以才事隔多年突然拿出来大做文章。另外一点，许说李渊如因为倪的罪行，所以气愤之余离开上海去苏州，按张的记载，李渊如已经去了苏州，因为俞成华的召集才回来开会。

在这些与倪柝声有关的控告和抱怨里，其实最重要的恐怕是背后的大环境，就是倪弟兄决定经营生化药厂，以应付同工们迫切的需要，又因中日战争导致社会动荡不安，药厂曾经迁到重庆再迁回上海，经营药厂事业需要和政府周旋，加上厂里的员工各种人都有，不但是弟兄姊妹还有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在里面。经营之中或许考量不周到，造成许多弟兄姊妹的不满。张锡康提到一个叫作史久荣的人，他专门传是非，并且爱跑李渊如家。张描述生化药厂经营时，李渊如家充满抱怨是非的光景：

[生化药厂] 在开始的时候，因产品质量要求高，功效好，价格低廉，医生都喜欢用，因此生意很好，也赚了一些钱。但是以后有些在药厂工作的弟兄，因着有野心要得更高的地位，有的认为倪弟兄专权，把属灵的权柄用到厂里来；有的不满工作，有的不满工

资太低，就在教会的弟兄们中间制造了一些误会。这些误会就像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在教会中有很多流言蜚语。这中间有一个执事，就是史久荣，他在生化作事的，他的嘴就是没有办法关住，一点事就跑到教会里面讲，讲倪弟兄这个也不懂，那个也不懂，还指手画脚，说作经理的都没有办法作了等等。后来，他不做教会执事了，但生化他还在做。在生化的弟兄们常到李渊如家去告状。这就给撒旦有洞可钻。我们知道魔鬼的名字在原文是diabolos，意即借着毁谤离间人的。魔鬼一贯的手法是挑拨离间，他在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他要钻入教会里来散步诽谤控告的话。这是他的诡计，是他破坏教会的伎俩。（页99）

从这个描述里不难想象不论在药厂或不在药厂里作事，极容易受到各种闲话的影响。李渊如姊妹肯定也不免受影响甚至离开上海，并甚至公开表示她对倪柝声的不满。这种负面的传闻闲话，是导致倪弟兄停止服事的原因。李渊如姊妹当时的不满与办药厂直接有关，后来倪弟兄复职之后，办药厂的动机解释清楚了，她公开承认错误（见下文她认错的节录）。如果倪氏停职与道德的缺失有关，李渊如怎么可能在倪复职时当面认错？

生化药厂的经营并不全然是负面的。根据郭荣刚和张恩强的研究（2014），生化药厂重视研发，成立研究室并聘请当时国内知名的化学专家积极制药以取代进口药品来应付抗战时各面的需要。在抗战期间生化药厂曾以“三大名药”之一闻名全中国。郭荣刚也提到生化药厂雇用的员工里有共产党员，证实生化药厂基本上支持政府的，并非后来肃反时给“倪柝声反革命集团”所加的罪名。生化药厂后来经营走下坡，根据郭氏的研究，一方面是市场改变，一方面是政局改变。抗战时期所需药品与后来市场所需不同，两种党员在药厂里作事，当政府改变后因政策不同也造成内部气氛紧张不合。

战事结束之后，关于生化药厂的经营，后续还有许多情形，并不是我们这里讨论的重点。这里只用一部分张宜纶弟兄关于倪柝声作生意的见证来结束。张宜纶见证的全文可以在所引的书中看见。

相信我是唯一在倪柝声作生意的期间，从始至终和他在一起的人。我能见证他的动机绝对不是为了致富，他是完全被主得着了。虽然有人批评他作生意，但我必须作见证，他所赚得的，丝毫没有为自己的享受花费。他所得的钱都是为着主，是照着主的心意花费的。（倪柝声——今时代神圣启示的先见，100页。）

我们再来看许梅骊怎么说倪弟兄在1948年复职的过程。

按照许梅骊的说法，从1945年抗日战事胜利之后，倪柝声就开始“暗自筹划复职”（页125）。他如何筹划呢？许氏列举几个实例。第一，倪氏在重庆查经聚会所讲的信息，出版成《教会的正统》一书（1945）。许梅骊说，这本书是倪氏用来“使地方教会早日重振旗鼓”的方法。他用此书里的非拉铁非教会来号召基督徒跟随他。（参124~125页）。第二，许梅骊引用金米尔的书，说倪氏写密信给李常受，还有1946年汪佩真姊妹也亲自到烟台去请李常受到南

京。许梅骊还承认，因着李常受“活动力强”（页131），她就是在那时候得救受浸的。许梅骊认为这是倪柝声在背后操纵：

倪柝声意识到自己的复职遥遥无期，只得借助李常受的大力鼎助。他就写信给李常受，邀请他来沪协助教会工作。他虽说是为着‘上海教会的需要’，其实是为了自己复出的需要。（页126~127）

下面许氏的第三个例子更是离谱。许梅骊说，倪氏“不声不响地在福州和鼓岭大兴土木”（页128），这是为着他复出后训练一班人来跟随他，扩大他的地盘和势力。

倪柝声不仅是复职，而且是要通过复职，掌握比以前更大的权力，做更大的事。他一开口，就是要福州教会交出来，成为进而掌握全国地方教会的第一步。复职不是目的，只是起步。倪柝声的心计何其深！他的雄心又何其大！（页141）

为着证明倪柝声在背后操作使自己能够复职，许梅骊提出上述三点来支持她的理论。仔细研究这三点，让人意会到任何人、事、物，在许氏的眼中都可以用来证明倪柝声的败坏和阴谋。第一，《教会的正统》这本书按着真理解开启示录里的七个教会。一个人如果想要复职，不会去写一本讲解启示录批判教会历史的书，因为这本书不会讨人喜欢，反而会得罪很多人。第二，根据李常受的见证，因汪佩真的邀请，主带领他到南京、上海分享生命树的信息，将主在那里的见证恢复起来，这是主的安排。许梅骊自己就是在那时得救的。主甚至使用李常受去见一些当初反对倪柝声的同工，包括李渊如和张愚之，和他们有交通。这样的交通使他们回转，甚至公开认错。（参页160~164，《历史与启示》上册）在1948年李渊如的公开见证里，并没有提到一句倪弟兄道德的问题，而是承认关于生化药厂的事她自己受到负面影响。许梅骊也把李渊如的见证收在她的书里。从李渊如的话可以清楚看见倪柝声停职的原因就是生化药厂的事。

我今天请倪弟兄赦免我以往的态度和言语，我也请负责的弟兄赦免我以往的态度和言语。我对倪弟兄作生意这件事是表同情的。关于生化的话语听得多了，叫我生气，所以到后来这些气都归到倪弟兄身上.....。我的存心对生化是不利的，对倪弟兄也是不利的。我不说我没有定罪，我的确有过不去的地方，人去了生化，不进则已，一进就倒下去。（147页）[3]

第三，许梅骊说倪柝声买下鼓岭的房子预备训练场所，为的是给自己扩大势力和地盘。1948到1949年，中国在一个极端混乱的光景里，如果倪氏为自己的利益着想，绝不会在中国置土地搞房产，反而会离开混乱之地，到别处去发展。事实上，有记录显示1950年倪柝声曾到香港访问三个月并开特会。令人惊讶的是，他后来悄悄离开香港回到中国。这是一个为自己权益为自己名誉拼命的人的作法吗？许梅骊所提的三点，不但不能支持她对倪柝声的评论，反而完全为倪柝声脱罪。

关于倪柝声停职与复职之事，许梅骊所给的“证据”和说法，可以看到许氏的一些倾向。第一，外表上，许氏提出许多所谓的证据，仔细读进去，可以看到许氏的目标是人身攻击，箭

靶指着倪柝声的人品。二，许梅骊所引的所谓证据，都是从反对者来的，那些反对倪柝声的职事和他所建立的地方教会的人。把反对倪氏之人的话收集起来，然后说这是对倪氏公平的分析，实在违反写历史的原则，一个人若事先设下立场然后作陈述，这不是写历史，而是造谣毁谤。

许梅骊在《警钟长鸣》里按着每一个她列的阶段对倪柝声都有描述和评语。暂且不讨论许梅骊的描述和评语来源可疑，以及她欠缺资格评论倪柝声，（她并不认识倪氏，在地方教会里只有三、四年，从16岁到20岁左右，没有受过历史研究训练，对圣经更是缺乏认识，）以下所列许梅骊书中的例子明显指出，不论是关于倪氏的著作或工作，许梅骊的箭靶指的都是倪柝声的人品。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方向，让人觉得许梅骊所采取的角度有个人因素，并不客观。许梅骊并不认识倪柝声，和他也没有任何个人关系，可是她似乎觉得必须把倪柝声的人品批评的一文不值才能建立她的可信度。

例一。倪柝声1926年参与《司可福圣经函授课程》的校对，后来倪氏在《基督徒报》里郑重介绍该出版品。许梅骊的评语是：“为何倪氏要说我们很喜欢呢.....那时他23岁得救仅6年，而对自己如此自信，俨若自己是与司可福平起平坐的圣经学者.....他把自己与著名的圣经学者相提并论。”（页27）

例二。对于倪柝声早年时期的工作，包括他在病中写成的《属灵人》头四卷，许梅骊的结语是，他有“地平线上的隐忧”：

倪柝声在重生得救以后，竭力追求，积极事奉。他受到和受恩教士的提携，善于吸收西方的神学精华，又敏感地觉察宗派教会的一些不健康现象；但是他喜于单独行动、过分自傲而缺乏谦逊，又把自己的著作当为真理。这些都成为他今后事奉的隐患。”（页32）

换句话说，许梅骊认为倪柝声从年轻时就自信自傲自以为是。她的这个评语持续贯穿，一直到倪柝声被中国政府监禁判刑，她才满意，认为她的看法得到认可。

例三。关于倪建立地方教会的工作以及倪氏对于宗派的教导，许梅骊断章取义，只提倪批评的话，其实倪氏对西教士来中国的劳苦十分肯定（参“倪氏家族与近代福州基督教差会教育”，何子建，2022）。许梅骊这么说：

倪柝声把传教士和宗派说得一无是处，似乎非得把一切推倒重来不可。他虽然说是“一切根据圣经”，却常常把细节当原则，且予以极端化。由于他十分自信和振振有词，很多神的儿女就趋之若鹜，而未能按照圣经教导，加以认真辨别。

倪氏的批评过激与他的自大个性有关。他虽然十分聪明，但是他的偏激自持却使他容易跌落到损人损己的陷坑。（页59）

许梅骊只讲倪柝声自信，不讲倪氏因看见圣经真理而执着，她甚至说是倪的自信吸引许多基督徒，而不说是倪氏的看见吸引他们，她这样坚持自己的看法令人觉得她别有目的。

例四。关于地方教会里弟兄姊妹们的成长，许梅骊先引倪柝声的话然后强硬加上自己的观点：

倪氏说：“要查看神的儿女是否有道德上的腐败，像犯奸淫……活在圣灵里，不给肉体留地位，这是最重要的。”后来神显露出倪氏长期犯奸淫的罪。在1935年说这话以前，至少已经犯过两次，而且从未向教会认罪。在倪氏的属灵讲道里，常常教训别人，却把自己当作例外。纵观在《倪柝声文集》中倪氏的全部讲章，他的抽离自己作为例外是很明显的。（页82）

在许氏对倪柝声的评语里，最重要的个人人品指控，除了倪自信自大之外，另外一点就是道德罪。如上所录，她用倪非常清楚关于犯奸淫罪的教导说倪把自己“抽离”。这种论点极其不合理而且牵强。倪柝声的教导清楚说明他对这种罪行的看法。1956年肃反运动正热烈进行时，政府在上海办了一个倪柝声罪状的展览会，陈希曾在他的书《晒熟的美果》里，对肃反里控告倪柝声的五大罪，有一个看法，他说：

在所列的五大罪状之中，有四项是政治性的。奇怪的是，人们不大相信政治方面的罪状，却对那一则道德的罪状深信不疑。（页340）

许梅骊在她自己的书里提到陈希曾的话（页360），证实她也是其中一个。关于展览会里所陈列的不道德“证据”，许梅骊在她另外一本书里提到倪妻张品蕙的回答。张说：“将来在天上还有更高的审判”。许梅骊认为这是张品蕙承认倪的罪状，所以“张的话就在弟兄姊妹当中传开了”（《难泯岁月》，页111）。有趣的是，认识神主宰权柄的人读到这句话却看见张品蕙的智慧。她知道神的宝座远远高于当时的政府，她所服的是神的宝座，她也相信神会有更公正的审判。换句话说，张品蕙认为有一天在神的宝座面前，所有对倪柝声的控诉会得到平反。

例五。许梅骊的箭靶指的是倪柝声的人品，可是她也用极大篇幅讨论倪的教导（参十五~十六章）。俞承恩是她对倪柝声个人道德攻击的资料来源，但是谁是她讨论倪教导的来源呢？她书中这两章里面讨论倪的教导，从所谓倪剽窃、到倪的神学错误、以及倪发展地方教会的缺点等等，读者难免会想她怎么有能力研究这么多论题还写得振振有词好像真的一样？我们怀疑梁家麟是她背后的支持者，虽然梁只为她写序，她也很少直接引用的梁。其实如果参考梁在他自己编辑的建道学刊里面所发表的文章（1999）和后来梁所写的《倪柝声的荣辱升黜》（2003），就可以看出她的讨论和描述大部分是梁家麟的，可是她却不提名带姓。值得一提的是，梁在他的书里所引有关倪的“罪证”都是从李文蔚（1998）而来，李文蔚的文章特点为何？李文蔚把许多不同作者关于倪柝声的正面资料用牵强无理的办法说成负面。由此可以看出许梅骊延续这个手法，不管她引的是正面或负面资料，最后都要配合她已设定的目标，批评毁谤倪柝声。

总而言之，许梅骊这近八百页的巨作，不管是讲个人历史、教会历史、或神学讨论，其内容不是美化自己的历史就是“借用”别人的文章做一个她不能告人的目的，就是摧毁所有关于倪柝声的正面史料。这个可以用她对倪柝声在狱中亲笔遗言的评语看出来。据倪妻的大姊，张品铮的见证，倪柝声离世时的亲笔遗言是“我信基督而死”，可是许梅骊对这个遗言有许多负面的话，她说倪氏“不堪回首，不愿反省，宁愿失亿、负债”（页520）。对这种话我们只能揣

摩这说话的人自己才是不堪回首不愿反省，为了为自己辩护不惜用谎言、阴谋、人身攻击来摧毁一个神在二十世纪所兴起并大大使用的弟兄。

注：

- [1] The full name is China BioChemical Laboratory, abbreviated as CBC Lab.
- [2] The two books by Lily Hsu are 难民岁月 (My Unforgettable Memories: Watchman Nee & Shanghai Local Church, Chinese version 2011, English 2013) and 警钟长鸣 (For Whom the Siren Wails, 2018 Chinese only).
- [3] See *CWWN*, vol 57, ch. 17, p. 195.

李渊如姊妹的交通与见证并倪弟兄的回应

讲时：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周三上午六时半

讲地：上海哈同路

性质：同工见证交通发问题

李渊如小姐见证：

我说的话是事先征求过他们同意的。事情远发生在十三年以前。那时要得到房子，但是理由说不出所以然。近日我虽然消极，但是弟兄们还有供应。朱弟兄给我一万元，张子洁从青岛来的时候也有几千块。从那个时候起，我就从我自己所得抽下一分存下来。我从乡下回来的时候，看见教会里白发的人多了。再一次回来，白发的人更多。姊妹把所有的储蓄都摆出去了，有的姊妹在医院不敢回家。我所有的一点钱只会变得没有，不会变得更多。我所有的款只够接待一个人吃饭，到第二个月就没有了。我睡在地板上，把床让给别人是可以，但是这样叫别人睡得不安。休息要叫人休息得舒服。我觉得总要有一个地方像一个家，不叫人羞耻，不累着人，又要靠近教会，这样在灵性上就能帮助对人有帮助。人到了老的时候，有特别的脾气，人说是团契，其实是团气。所以我总盼望能有个地方，接待弟兄姊妹休息。李弟兄说，也许在烟台会豫备一个地方给我。

我今天请倪弟兄赦免我已往的态度和言语，我也请负责的弟兄赦免我已往的态度和言语。我对倪弟兄作生意这件事是表同情的。关于生化的话语听得多，叫我生气，所以到后来这些气都归到倪弟兄身上。倪弟兄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我不是倪弟兄，许多的话我不能替他讲。人家说倪弟兄错，我怎么能接受这个话？我不能把倪弟兄一个人题出来责怪，所以后来我又怪负责弟兄。他们答应说，这是神的旨意。那我怎么能阻拦其他弟兄姊妹？但是人家到我面前来，神经紧张，我没有办法不表同情。我今天没有发疯是神的恩典。事情如果百分之九十九是别人作的，我还要负一分的责任，何况这件事我的责任还不只是一分。

曾经有一个不对的人指责“工作的再思，”要求我说一点倪弟兄的不对。人是想要把我当作工具，来反对倪弟兄。

对于生化，我说生化乃是“生活。”我的存心对生化是不利的，对倪弟兄也是不利的。我不说我没有定罪，我的确有过不去的地方，人去了生化，不进则已，一进就倒下去。如果这几天早上的情形那个时候发生，这些话就不必说了。

我巴不得我今天流的眼泪是最末一次的眼泪。我盼望有一天离开世界的时候，打开我里面的箱子是空的。如果我里面的东西是满的话，是我的羞耻。我觉得与其拣选丰富，不如拣选贫穷。这些年间我有心意把所有的东西都变卖。我认不得我自己的东西。别人都劝我要买一点，但我总是给人左右为难。我很少自己买东西，买大衣是三个人把我绑票去买的。我自己的衣服我不在意。我不是把东西存在箱里，不舍得给人，我要抽出一千块现金都没有，黄金我一分都没有。为着良心的缘故，我可以作见证，我的东西都是不值钱的，都是买合式我自己用的。我的米油都可以拿出来，把我最后的一分摆在教会里也可以。

从前教会买地皮的时候，有人指责，有人观望。那个时候二十几条金子就可以办事了。只是因为一直等，等到钱都没有了，大家还在观望。就是因着这个缘故，事情一分都作不成。那是不应该的。今天如果大家都交出来，下文就是教会的事。我今天的发表是不得已的，我的话到此为止。（倪柝声文集，第三辑第十一册，220-221页。）

倪柝声弟兄：

胜利以后生化值得八十万，去年生化变成四十万，今年值一百二十万，但是我们欠了七十万，明年下去怎么样不知道。

我们买了赵老太那块地，有的人把所有的都变卖了来奉献，我觉得那个钱是血的钱。头一次我报告，第二次我再报告以后，就不敢再报告了。因为拿出钱来奉献的人，都是中等和中等以下的人。有钱而该拿出来的弟兄姊妹，却总是难得动。

经过第一次的失败，我就不敢再问人拿了。我说再盖会所的话我来盖，李小姐可能要怪我说，许多的工作不作，跑去作生意。但是如果工作要好好的作，就需要有人摆上。我今天能彀说这话：我也作了，也摆上了。我今天是在工作里有分的人，我也是在职业里有分的人。我是一个有感觉的人，你们作生意不羞耻，我作生意有羞耻。我知道有人在这件事上有话，我也知道有人来问。但是，我冒着在路上别人不点头的羞耻，我冒着寡妇出嫁的羞耻，到一个地步，儿子没有了，自己也不知道为着甚么在这里。手里好像抱着一个死孩子。我八年的工夫在弟兄姊妹面前抬不起头来，难道我今天不能说一句：“你们要摆上去”么？你们为何不摆上去？今天是在职业里的弟兄姊妹摆上去的时候。（倪柝声文集，第三辑第十一册，220-221页。）

李常受弟兄对当时事件的记录与说明

节录自《今时代神圣启示的先见》第十三章

结 婚

倪柝声弟兄年少时就爱上了一位年轻女子，名叫张品蕙。他们两家是三代的世交。倪弟兄归向主之后，张品蕙还未得救，有时还在他面前讥诮主。这使他感到为难。一个爱主的人，怎能娶藐视主的人为妻？当他寻求被圣灵充满时，主要求他放下这女子。他为此事挣扎了一段时间，至终，主使他不得不放弃她。那时，他把自己和自己的前途完全奉献给主。他实在地经历了诗篇七十三篇二十五节的实际，除了主以外，在天上地上都没有所爱慕的。

十年后，张品蕙大学毕业，也归向主，一九三四年开始参加在上海的召会聚会。那十年中，因着主的主宰，她一直没有结婚。至终，主把她带回给倪弟兄。但她的姑母极力反对他们的婚事。她认为倪弟兄不过是个穷传道。一面，这使倪弟兄对结婚的事裹足不前；另一面，他母亲却非常关心他的婚事，因为他已经三十岁了。一九三四年，他在杭州带领第四次得胜聚会，众同工都在那里。他母亲利用这机会催促他的婚事。结果，他们在特会过后随即举行婚礼。张品蕙姊妹的姑母对她侄女的婚事非常不高兴，她威胁说，倪柝声若不按风俗礼仪去拜访她，她就要找他麻烦。她若不是这样威胁，倪弟兄必定会去拜访她，但她这样一来，反而使他不肯去。他觉得不能在威胁之下遂她所愿的，别人会以为他在耍手腕讨好她，因此他拒绝答应她的要求。因着这样的冲突，在上海起了大风波，是张品蕙反对的姑母引起的，这使倪弟兄受了许多苦。然而，这婚姻乃是主给他的，张品蕙姊妹是他所需要，在病中照顾他的好帮手。在他受监禁的二十年间，她是惟一得允许去看望他的人。在倪弟兄去世前一年，主把她接了去。在神主宰的安排下，他们没有子女，使他们能不受牵累地经过长期的试炼。

作生意

倪弟兄的二弟是合格的药剂师，在一九三八年开了一家小药厂。他对于生产药品很有经验，但在经营上经验不足。倪弟兄的父母怪他帮助许多别的弟兄，却不帮助自己的弟弟作生意。因着家里有这种感觉，他就在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开始帮助弟弟经营药厂。这时，他也有供给同工的负担，他觉得借着作生意可以得一些利润，应付他们的需要。所以，他着手全盘经营并重整药厂。因着这脱不开的牵连，有些在药厂工作的弟兄对他不高兴。撒但借着这种情形，在上海的圣徒中掀起风波，反对倪弟兄，使他不能尽职。同时，上海被入侵的日军占领，迫使他把工厂迁至内地的重庆。重庆是中国对日抗战时的首都。他在那里继续经营药厂，同时也受雇于政府。战后他把药厂带回上海。借着作生意所得的利润，他不只照顾了好些弟兄姊妹的需要，还有能力在他家乡附近的鼓岭山上，购置了一个约有十二座平房的训练中心。一九四八年，在上海的召会有一次复兴，他也恢复尽职。同时，他也把药厂交出来给工作，作为对主的奉献。他这样作感动了许多弟兄姊妹，也把产业交出来给工作。

张宜纶弟兄的见证

以下是倪师母的弟弟张宜纶弟兄所作的见证，说到倪柝声弟兄作生意的事：

我在大学得了化学的学位，一九三八年加入药厂的事业，作倪柝声二弟怀祖（George）的助手。一九三九年底倪柝声开始经理药厂，从那时起，我与他共事，有十年之久，直到我在一九四九年离开中国大陆。

因着日本的入侵，我们的工厂从上海迁至重庆。一九四三年，倪柝声回到福州。那时，他打电报叫我到那里。我一抵步，他就告诉我有一位弟兄需要约一万块钱还债。那时，我对他这么慷慨，无条件替这位弟兄还清大笔债款，感到相当不解。但这事叫我清楚知道，他经营生意不是为着自己的需要，乃是为着别人的需要。

主有时供应倪柝声的需要，有时没有供应。没有供应时，他就亲手作工，供给自己的需要，也供给别人的需要。

后来，从海外购买原料的限制越来越严，以致无法大规模发展制药的事业。圣徒仍然需要供给，收入却有限。这种情形迫使倪柝声找了一分政府的工作，为的是不要负累别人。他的工作不只是为了帮助别人，也是要应付自己生活的需要。

战后他把药厂带回上海。他为这事业建立了稳固的根基，又有主的祝福，于是增加了另一家工厂，是生产颜料的。因着这两家工厂在财务上所得的祝福，倪柝声就有能力奉献大笔款项给在上海的召会，为着建会所之用；他也能以维持在福州鼓岭山上有好些宿舍的训练中心。

相信我是惟一在倪柝声作生意的期间，从始至终和他在一起的人。我能见证他的动机绝对不是为了致富。他是完全被主得着了。虽然有人批评他作生意，但我必须见证，他所赚得的，丝毫没有为自己的享受花费。他所得的钱都是为着主，是照着主的心意花费的。

因着他对主有丰富的经历，他与政府官员共事时非常有效率，长官都很欣赏他。他从来不会企图表现自己的优越；反之，他总是在顺服的灵里生活和工作，接受上级的命令。因此，战后政府迁回南京时，他得到很高的职位。然而，因着他与主的关系，以及他对众同工和众召会的职事，他不得不放弃政府的职位。

徐腓力对许梅骊不实叙述的回应

2013年7月2日

某老弟兄不止一次公开作见证讲，许多人跌倒了……。他是许梅骊著作《难泯岁月》的幕后支持者和后台（网上有多篇文章提及），有人两次告诉我他早就计划要写一本反倪柝声的书。

我和许梅骊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就认识，1952和1953两次在上海“基督徒大专中学聚会”时，她是大学部事务服务的负责人，我是中学部的负责人。

1983年夏，她在洛杉矶Pasadena写信给我，说：还是主的爱把我折服了。

九十年代初起，许梅骊数次寄给我关于倪柝声弟兄的负面资料，还有一列收件人的名单，有些是我认识的，大约一半是我不认识的，包括前上海杨绍唐教会的，上海灵粮堂的，还有洛杉矶其他教会的牧师等人，我感觉不对，是不是要拆毁倪弟兄教会恢复的工作，先造舆论，大造声势，扩大影响！

当时我就写信反对她，在爱中责备她所做的是得罪人，亏缺神荣耀的。在所谓“倪柝声反革命集团”事件中，所有受连累，被逮捕及殉道的弟兄姊妹，都是在主里的受害人。我们在世人面前静默无声，毫无怨言，因为知道我们的奖赏是在天上，那日在主的审判台前，我们要得荣耀的冠冕。我们多年在苦难中的祷告，如同启示录六章九节说，为所持守的见证被杀之人的魂——包括我岳父张愚之弟兄——在祭坛下的呼喊，都已经到达神荣耀的宝座前

有关1956年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罪证展览会的历史，我需要澄清一些事实。那个时代我们都被政府点名去现场参观展览。在许梅骊书中105页提到：

“后来他们又告诉我倪柝声的生活一贯腐化。倪柝声污辱了两个女同工（她们都是我久已认识，并且十分敬重的）。他们又将他为那女同工所拍摄的裸体影片（底片）放在玻璃板上（下面有灯光照射），指给我看。我还看了倪柝声亲笔供认的其他生活问题。许多确凿证据，尤其是那裸体影片和他亲笔所写的笔供，给了我一个当头棒喝，使我目瞪口呆。”

如果我有机会和许梅骊见面，我要当面问她三个问题：

1. 有关的影片，所有在现场的人都看见，底片上的女人是“无头”的。为什么许梅骊不清楚在书中交代读者，这些底片所照的是“无头”的女人，她为何能在宗教事务局官员指给她看时，一眼看出这是那个女人？
2. 同样无头女人的底片，后来也出现在上海高干第二书记陈丕显的罪证展览会中，此无头底片到处流传，毫无可信之实。
3. 所有在现场的人都看到笔供上的字，写的像蟹爬，不是倪本人的笔迹。由我个人亲身被洗脑质询的经历，那不是人过的日子。我相信1952-1956年间，牢里的生活不是人过

的。在许书中140页提到，倪在审判大会上“从始至终都是一一回答说：‘是的’”。我对当年政府所办的展览会和公审大会的结论有二：第一、不相信；第二、一切都可以造假。

有关许书中第十一章“上海基督徒聚会处的肃反”，第十三章“信徒学习委员会”，以及第十六章“教会的重建”，我想我绝对有资格替50年代所有同工 的儿女及我岳父张愚之弟兄有以下的交待：

1. 上海教会聚会处的实质已于1956年1月29日正式结束。那日晚上公安部门一下子就逮捕了上海聚会处的主要同工及长老，包括李渊如，汪佩真，张愚之，蓝志一，朱臣，陈本微等人。因为二月开始，上海市的教会聚会所已完全被架空，教会所有的行政及属灵带领全由“肃反检查队”控制下的“信徒学习委员会”来领导。
2. 学习委员会的成全可比“汪精卫控制下的伪政权”，把政治完全渗入神的教会。教会的实质是神的家和神的国，与政治没有任何的关系与牵连。
3. 这些学委会的成员都是向政府妥协，站在所谓“人民立场”上，完全代表一个政治组织，而不是“神的教会”。
4. 照美国的法律来讲，这些人在法官面前都是“污点证人”，其言不可信，其书不可读。所说的证词在法官及神面前都全数被法庭排除，不可作为任何的证据。

上海教会聚会处的历史该由我们这些流血流泪，为主忠心站住，不向政府及三自妥协的人自己来写，轮不到唐守临、任钟祥、左弗如、许梅骊这班卖主求荣的人来改写和主导。

1955年中国开始的“肃清暗藏的反革命运动”，已经区分了上海聚会处的真信徒和假信徒，从此就开始了谁愿意为主受苦的时刻。

许梅骊当年为了逃避受苦，不仅作了犹大，还放弃信仰24年之久。她没有真正悔改认罪，今天她仍在作拆毁教会的工作，还继续拆毁主借着倪柝声弟兄兴起的的地方教会恢复的建造。这一切主都知道。

张锡康对许梅骊不当引用其回忆录的澄清与说明

2013年6月19日

有关生化药厂的澄清

如许书中所言，她于第22章所写有关生化药厂的资料，多半是出于我早年的自传。倪柝声于1939年开始办生化药厂，许梅骊当时才只有八岁，是没有任何资格来批评倪柝声的药厂事业。她在书中第22章的末了，说倪柝声办厂的诸般弊端，批评倪自恃过强，我行我素，无视法纪，计谋多端，无商业道德，这些批评令我啼笑皆非。

我于1948年加入生化药厂，目前回想往事，倪柝声对我是绝对信任的，并盼望我能助他一臂之力。1948年正是他开始鼓岭训练的第一期。1948到1949年的两期鼓岭训练，是上海教会、全国小群教会的历史中的重点事件，所有的历史记载都是关于他所释放的属灵信息，对日后国内及海外的开展影响深远。但他在1948、1949年全力投入鼓岭训练之刻，也是他办生化药厂最困难之际，为了周转资金，不得不用金子借款，到了一个地步，银行及教会弟兄们都来逼债。他在1948、1949年往返鼓岭及上海两地，为训练经费筹款的痛苦心情与经历，是外人不能了解的。

以下是倪弟兄办生化药厂的过程与细节，记载在我于2012年正式出版之《张锡康回忆录》的第十四章“办生产事业的经过”中：

倪弟兄在生化药厂江西路办事处曾对我说过一句话：“别人点土成金，而我是点金成土”，这句话表示他所办的生产事业没有一个是成功的。

1948年倪弟兄将生化药厂交出来后，教会就安排我们六个人进生化药厂接收他弟弟洪祖、兴祖的权力。这在前面已写过。我们进生化药厂以后，在生化药厂的职工（多数是不信主的，弟兄姊妹没有几个）都说教会接收了生化药厂，我们是教会派进去的，是倪的代理人。当时在胶州路的生化药厂已有地下党组织，上海解放后生化药厂也去工商局登记并且成立了工会。生化倪氏化学实验室的化学师荣君实担任工会会长。地下党员徐镛汉组织工人学习政治，和资本家斗争。我们六个人是在一个工人斗争性强，濒于破产的形势下进这私人工厂的。倪弟兄当时是生化药厂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百分之九十的股份是他的，他差不多是独资老板了。他以为开生化药厂的资金是主工作的钱，赚出来的钱应当为主的工作和教会用。可是生化药厂是一个股份有限公司，厂赚了钱老板不能自由从厂里取款。抽调资金更会被工会加以监视的。所以，倪弟兄要从生化取款就受限制了。不过生化药厂在账上（汪素记）欠倪弟兄从重庆生化药厂结束后运来上海借给上海生化药厂三万余元美金的滴滴涕原料。倪弟兄盼望我们将这些原料都作成成药，销售得来的钱从欠他款的账户中付出，交给他为办二期鼓岭训练班经费之用。

我们进厂后，托生化工人、教会中弟兄张克兰、查步光和李明华等作滴滴涕成药，一面在市场上大作广告，一面向银行和个别富商弟兄借款。但是，弟兄们都要将借款作成金子借给生化，以后也要还金子，因为币制下跌，没有人肯借现金。在不得已的形势下，我们就冒了一个风险用了金子借款。可是滴滴涕无论如何涨价，涨不过金子，又加赚来的钱，除日常开支，发工资外，还要还倪的债，钱只有流出，原料一天天少下去，到了一个地步银行来逼债，要求拿药品作抵押，弟兄们也来逼债，要药厂还黄金。工会会员把守原料仓库门，不许出卖原料。到月底工人们开卡车到江西路要和总经理交涉如期发工资，不能少一个钱，并声称要斗争总经理马葵春。马就偷偷地逃往台湾去了。副总经理单亦胜，怕工人斗争他，也逃往香港去了。厂长孙务信因监视地下党员的活动，怕工人报复也溜掉了。在江西路生化办事处只剩下沈荣庆、江睡悟和我三个人。沈荣庆将他亚光药房的药拿到银行去作抵押，而我一天到晚和银行打交道，从这家银行借来还那家银行，从那家银行借来还这家银行。我跑到银行，银行要把生化的原料抵押。生化的公会就出来说，原料不能抵押。工资要照发。他们替工人开汽车到江西楼办公室围住吵，要发工资，原料不能抵押。另一面，虽然银行要把药品拿去抵押，但是药品卖不出去，因为美国本身制的药品到了。市面药的价钱都跌了，卖不出去。弟兄们又拿着单来逼债说，要还多少黄金，因为那时他们是以黄金借给生化，说明要以黄金还，而黄金一下子又涨起来。他们不单到厂里追债，还跑到我家里来逼债。到后来银行不肯借款了，天天上门来逼债，弟兄们到我家来逼债，我既不敢到厂去，又不敢回家，整天在公园里过日子或荡马路。

正在此时，倪弟兄结束第一期鼓岭同工训练回沪，在1948年7月间，我父亲去找他，把我的处境告诉他，并说不能将生化经济重担压在我这孩子身上。倪弟兄说，这事由他一个来挑，并叫沈荣庆、江睡悟和我关闭江西路生化办事处，迁到胶州路生化药厂办公，并清理一切债务，由他想办法从别处弄钱来还掉一切的债务，我就辞掉生化药厂审核主任之职回家休息了。沈荣庆和江睡悟也先后辞职，倪就另外聘请教外人邵仲伦、史济汤两人作总经理和副总经理，又请徐镛汉作人事科长。倪弟兄在重庆时认识了前上海人和药厂（即今第十七制药厂）资本家王素封先生，这人帮了倪许多的忙，史济汤也是王介绍来的。邵和史两人很能干，由他们来经营生化药厂。至此，弟兄们已完全退出生化药厂了。

倪弟兄自1940年办生化药厂开始历经波折，许多弟兄们先后退出生化药厂，以后他去重庆将上海生化药厂交给他两个不信主的弟弟经营，亏损累累。1948年他将生化药厂交出来，让教会安排交出来的弟兄去经营，又是弄得焦头烂额，弟兄们又退出生化药厂，他再交给不信主的人去经营。所以，他对上海生化药厂已经失望了。

1949年春上倪弟兄准备要办第二期鼓岭同工训练班“执事之家”。经费又成了一个问题，他知道从上海生化药厂取出钱来是没有希望的了。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在江西路322号生化办事处空屋内办起一个生化渝厂来。生化渝厂即重庆生化药厂，当倪弟兄1942年去重庆时和上海生化药厂董事会订了一份协议，同意倪在重庆用生化牌号开药厂

，但是产品要和上海的有别，且在商标上要加一个“渝”字。上海生化生产“史太安”、“苏法德”、“广陵散”、“红汞水”、“得势雄”、“长效西林”、“玻璃药膏”等，重庆生化就不能生产；重庆生化生产“滴滴涕”、“避倦丸”等，上海生化也不能生产。开办重庆生化药厂时，倪弟兄从上海聘请了李琼明姊妹去作药剂师，马承彦弟兄作经理，在重庆的同工陈希文和他的师母都在重庆生化药厂作事。倪的内弟张宜纶也在重庆和倪合办一个“峨嵋科学社”专为经营化学原料的商行。胜利以后，重庆生化药厂和峨嵋科学社都结束了。滴滴涕原料和避倦丸原料都运来上海交给上海生化药厂生产，因上海生化付不出这笔原料钱就作为欠倪的款项。但现在又怎么在上海重开起来呢？因为倪弟兄听见他内弟张宜纶从香港写信给他，美国新出了一种肺病特效药名P. A. S.，他在香港重开峨嵋科学社和生化药厂，经销美国一家化学原料厂的出品，这种P. A. S.粉剂装成小瓶出售可以赚大钱。关于资金问题倪向阳本公司香港分公司陈子万弟兄的姪子陈锡日（又名树林）借来几万美金，但言明要还美金的。倪就托张宜纶在香港将P. A. S.原料运来上海，由上海生化渝厂托上海生化加工作成粉剂和片剂，运来江西路销售，定价粉剂每瓶五百克要美金四十美元。有一天，倪弟兄召我、孙务信、江睡悟三人去江西路说明他的计画，要我们参加生化渝厂工作，将江西路生化门市部改换一新，一面大作广告，一面在门市部设肺病诊所，请一位医生每天来看病，解答服用P. A. S.后的一切问题。P. A. S.制成成药取名“生化鄙雅士”。第二天，我们三人就开张营业，许多人排队来买“生化鄙雅士”，生意很好，头几天就赚了许多钱。倪很满意就到鼓岭“执事之家”去开会了，叫我们定期将款送福州转交他，在账上设了一个“美金借款”户，交给倪的钱算是还陈锡日的P. A. S.原料借款。倪弟兄一走了事，关于生化渝厂注册登记的问题，“生化鄙雅士”要经卫生局化验后才能批准出品销售，谁作经理等一系列问题，他都不管。因为已经正式开业了，外人还认为是老的上海生化药厂门市部重新开张，银行、广告公司、包装材料厂等都找上门来要我们开户和他们有商业往来，那么对外就需要一个人作经理了。我们三个人就商量，因为我过去对银行界比较熟悉，所以他们俩推我作经理，孙务信作副经理，江睡悟管账和财务。后来又请何广蕙来作会计，何广蕙和孙务信结婚后，又请谈国兴来作会计。“生化鄙雅士”生意日兴隆，门市部人手不够，又请周强华、黄惠理来作营业员。以后又请蒋珊珊来作美金账。生化渝厂赚了很多钱，但只给上海生化一点制造费用，这就引起上海生化工人的嫉妒，认为这是倪虚设字号，逃避账外资金等。1949年底倪弟兄结束第二期鼓岭同工训练班回沪，叫我到工商局去登记“生化渝厂”字号，工商局说要工会盖章，我们就刻了一个生化渝厂工会的图章，将登记表缴了上去，但一直没有批准营业执照。倪为要大量自制P. A. S.原料，托史济汤从一家颜料厂买来一个高压锅，定价三万美元。高压锅买来后放在上海生化药厂内，由倪指定几位弟兄制造P. A. S.，但出品又不属于上海生化的，为这事生化工会几次要斗争他。倪因P. A. S.赚了钱急于要还香港陈锡日的美金借款。有一天，他叫我拿二万美钞交给一个商行，但我不知这就是私套外汇。作P. A. S.的原料Amifeno从香港运沪，用付行商税的方法入账，可以在账上多拿出一点钱来，这后来又被算作逃避资金。倪叫我们按月送钱给俞成华师母吴焕音，因为俞将要去参加鼓岭第二期同工训练班，又叫我按月送钱给李渊如。我们问他，这些钱付出如何入账，他

说在工资名单上加两个顾问，称俞成华是生化渝厂的医学顾问。顾念同工是对的，但这样的作法在账上出现，后来又被定罪为“巧立名目”，偷漏资金。

1949年10月10日我和蒋珊珊结婚，过了两个月她怀孕反应很厉害，因此也辞掉工作。“生化鄙雅士”粉剂，价太昂贵，长吃的话代价太大，许多人吃不起，酸性反应强，况且信谊药厂已出了“百生”，即信谊P. A. S.，是钠盐，反应小，且是片剂，许多人去买信谊的P. A. S.了。“生化鄙雅士”营业一落千丈，被逼跌价，改作钠盐片剂了。1950年上半年生化工会数次派代表和倪谈判要加工资等，正在这时东北药厂龙厂长来上海参观信谊药厂时，也来参观胶州路生化，倪就和龙厂长商量达成协议，由生化支援技术力量，将生化和东北药厂合并，生化的工人、职员，技术人员，连同机器、原料，一并迁往沈阳，不愿去东北药厂的发给三个月解散费，上海生化进行清理。生化渝厂也结束，机器、原料也卖给东北药厂，但渝厂的弟兄姊妹留上海。这样生化药厂的经理邵伸伦、副经理史济汤、陈广陵和许多工人、职员，有一些是弟兄姊妹也一同迁往东北。上海生化药厂成立清理委员会，由顾孝颐弟兄负责清理账目。这是第三次弟兄们退出生化，生化与东北药厂合并用东北药厂的名，老生化完全由国营药厂经营了。

倪弟兄认为生化有不信的人在作梗，所以经营不顺利。现在生化已解散，可以完全由弟兄们自己来办厂。所以，他有一次在福音书房编辑部楼上召集唐守临、王大和、倪怀祖和我商量如何开弟兄药厂事。厂址租用胶州路生化药厂旧址，资金由他出，而弟兄们顶名作股东，像老生化也有许多顶名作股东的弟兄姊妹一样。出品是肺病新药“结核安”。人事方面请唐守临作经理、顾柏涛作副经理、王大和作营业经理。倪怀祖是化学师，他一直主持一个倪氏化验室，有几位有技术的化学师和药剂师，他都留下保持技术力量。同时叫我去弟兄药厂作采购主任、谈国兴作会计主任等。“结核安”作出来了，营业执照也申请出来了，卫生局也批准了，但是没有销路，因为该肺病新药毒性重，临床试验没有把握，但是国外已有出品，在国内的医生还不敢用。倪认为商标品牌很要紧。弟兄药厂是新办的，许多人不信任，而“生化”是名牌，为“生化”两个字花了几万美金的广告费。他动脑筋去和东北药厂龙厂长商量，由弟兄药厂租用“生化”的牌号出品。龙厂长同意了。倪弟兄从沈阳回沪后，马上召集弟兄们开会，胶州路生化药厂可以重新开起来。生化也不必清理了，账册再接下去作。生化牌号的几只名药仍可生产。于是“长效西林”、“爱美纳真”、“滴滴涕”、“史太安”等药又重新生产了。至于制药工人是雇用了一批从青岛来沪的青年弟兄姊妹，还有本地的和别省的。从青岛来的有杨有道、石玉琛、荆绍仁、翟宗沛、许美达等十几个人，从北京大学来的有孙凯弟兄，从弋阳来的有李曰绪，还有上海交大的几位弟兄和其他的弟兄约有数十人。他们进厂后在倪氏实验室学习几个月就参加生产岗位了。老生化工人中未去东北的也都请进来了。生化药厂又死灰复燃。这是1951年的事。

1950年生化药厂迁厂东北，龙厂长要买生化渝厂的一个高压锅。倪开价三十万人民币，他说这只高压锅是用三万美金买进来的。他这笔钱是向香港阳本公司借的，言明将来要还美金的。现在美金官价结不到，只能照黑市一元美元合十元人民币计算，这个高

压锅因此要三十万人民币。龙厂长居然也同意这个价格，就将高压锅买下了。倪得款后托东北一位弟兄买了几十桶甲苯原料，准备在上海开一个“锦绣化工厂”。他又将一部分钱投资到汉口去开珞珈药厂，请孙务信和何广涛去经营。在上海又开了翠华颜料厂请谷羽苍作经理，邵圣清、裴恩荣等去作技术员。将他们的薪金提得很高，目的是要他们从工资中每月拿出十分之一来奉献给教会。他又托江睡悟通过上海银行的宣常铭弟兄将多余的款开了许多户头。在生化五反运动时，这些行动都被定为是严重盗窃国家资财。

1952年2月东北药厂进行五反运动，倪弟兄被定为犯了严重盗窃国家资财的罪，由东北沈阳公安局到上海将倪押往东北药厂批斗。1952年7月上海生化药厂进行五反运动。那个时候，我们都在江西路厂门市部。我们做账的几个人，如谈国兴、顾孝颐、江睡悟等，他都称我们是高级职员。邵洛羊担任队长，他过去是老干部，在苏北，和陈毅都是新四军的老干部。后来又是大学里的教授，这个人很能干的，也有学问，他做领队。他这个五反检查队的成员就跟一般的不同，是由上海卫生局、上海宗教事务局、东北药厂、上海公安局、税务局，还有东北药厂来的干部等单位组成的。他们先开到江西路来。邵洛羊就先搜查，另一方面叫我们交待，说政府的政策是抗拒从严，坦白从宽。他叫我们检举揭发倪弟兄的五毒罪行。同时也不让我们回家，一个人一个房间。我们几个高级职员都是个别检查。我被认为是资方代理人，要我交待、揭发、归队，但是我不承认高压锅出售给东北是为盗窃国家资财，也不承认把生化渝厂的账册迁到仓库里去是抗拒交代。他们问我关于渝厂的账目。我说交给香港的股东张宜纶拿去查账了。他有点不相信，对我说抗拒从严，坦白从宽。我也写了一点偷税漏税等事。他们说这是鸡毛蒜皮，重要的问题没有交待。他们还说我们这些高级职员要归队，后来叫我们回到厂里。他们就发动厂里的工人。这时厂里的工人都是弟兄们，他们就发动弟兄们起来控诉倪弟兄，同事也要检举揭发我们，叫我们归队。他们又检举，又喊口号，轰轰烈烈的来了一场。荆绍仁最起劲，还有李曰绪，他就说我们要像利未人，拿起刀来杀自己的弟兄。我们在胶州路关在一个房间里进行交待，以后他们就去审查，一定要我讲出账簿的问题。当时有一个职员叫陈昌瑞，倪弟兄对我们说到账簿的事时，他偷听到这件事，他早就检举揭发说我把账簿放在仓库里。这人是福建人，倪弟兄把他请来住在江西路322号生化办事处。以后我感觉我应该交待这个问题。我就跑到检察队那里，说我的账簿放在仓库里。他们说不用我交待，他们早知道了，并说我为什么早不讲，我是在抗拒。他们一查账就查到一些“美金借款”账号，还有一些账里的问题，他们要我交待偷窃国家资产。他们说我是倪柝声的狗腿子，是他资产阶级的尾巴，指我抗拒交待。以后他们要我们几个管账的签字，说从香港来的钱中间有帝国主义的钱。为什么呢？他们主要查有没有钱到教会里面去。因为过去他们要教会填接受帝国主义津贴，我们就说我们是自养的，我们没有帝国主义的钱，他们不相信，他们要借着五反运动，从生化的账里查出有没有从香港进来帝国主义的钱经过生化再到教会，他们要从生化打开缺口，否定我们早就自理、自传、自养的说法。邵洛羊1956年作了南阳路基督徒聚会处肃清反革命运动的队长，生化五反的队长怎么会作了教会肃反的队长？所以可以说生化的五反运动就是教会的肃反的前奏，他们总是要从经济方面打开缺口。

我于1952年10月10日就被逮捕，在华东公安部收容审查了二年多，最后被判了三年徒刑。生化药厂被判犯了五毒罪行，最严重的是当清理不清理，又重新开业，为要偷漏所得税，罚款数字甚大，将生化药厂都没收了，后改为国营第三制药厂的一个车间。倪弟兄因另有政治问题未解决，一直到1956年上海教会肃反以后才公开宣判徒刑十五年。上海教会肃反队长就是生化五反队长邵洛羊，以后作了上海宗教事务处处长。所以生化五反运动是教会肃反运动的前奏，为要弄清倪弟兄经济的来龙去脉。因为我们始终不承认我们和帝国主义有经济上的关系，他们认为关键是在倪弟兄身上。为要弄清倪弟兄的经济来源，先要弄清他所办的生产事业的钱是从那里来的。我管生化的钱，是首当其冲，又加上我始终是站在倪弟兄一边，在五反运动中表现不好，所以对我从严教育。这一切都有神的美意。可惜的是为神工作的钱全被没收了。倪所办的一切生产事业也全都完了。

我从1948年进入生化药厂，到1952年10月10日因生化药厂被捕，在华东公安部审查了两年，后被判了三年徒刑，一直到55年才放出来，是全程参与生化药厂的现身历史回忆纪录。1956年1月29日，公安对上海聚会处发动大规模的搜查逮捕。1月30日，许梅骊等人在天蟾舞台控诉倪弟兄。2月2日，许和其他几个人到我家里来，要我在2月3日晚上控诉倪柝声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我同意并写下了控诉稿，上台控诉倪弟兄。控诉后我里面很不平安，但我当时认为自己是服从政府的优良公民。后来我在1981年，在一次大会中，公开承认我控诉倪弟兄的罪，承认我是受了撒但的迷惑和诡计。我未能在倪弟兄属灵及创业最艰难的时候尽力扶持他，到今天在主面前觉得非常亏欠。许梅骊从我书中抄录一些历史过程，再加上自己的负面批评，是极其不合适的。她出这本书时应该征得我的同意及认可，或是跟我讨论一下书中事实。在她评论倪弟兄无商业道德的同时，自己也犯了抄袭修改的无耻之过。

我去年收到许梅骊来信，附上她写的“《难泯岁月》出版一年来的回顾”，写信的时间是2012年3月12日，信中提到该书：

1. 得到从地方教会内部来的鼓励和认同。
2. 倪柝声亲属的认可。得到当年上海地方教会同工们子女的认可。
3. 当年同时代年轻人的回响。

我要在此郑重回应，以上三点都不属实。我来美国已将近二十年，一直在圣地牙哥的地方召会聚会，也经常到加州安那翰水流职事站，与地方召会主体负责的同工们保持直接的联络与交通。每年几次从台湾来的台湾福音书房负责人及同工们也经常见面。就我所知，他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同意许的出书及阴谋。有关倪是亲属认可之言更是谎言。目前能真正代表倪家亲属说话的是倪柝声小弟倪兴祖的夫人倪徐恩秀女士。她今年100岁，全然否认许对倪柝声一切消极的控诉。许信中第二页引用倪氏亲属的话：“我从你所述的事实来看问题，最后审判的是神。事实重要，评价个人可以有自己的”。你的读法是为倪氏亲属认同你所说的事实，我的解读是这为倪氏亲属清楚说明，许书中所说的一切并非事实，真正的事实才重要，你可有自己的评价，但最后审判者是神而非许或其他人。

许书中有关生化药厂的纪录都是出自我二十多年前所写的《六十年来回顾》。此纪录从未正式出版，当时所写的只能代表我二十年前的心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和长期缺乏属灵供应的情形下，我当时的认知，就好像中国人所说，在大蒜房间待久了，只知道大蒜味道。来美后，在属灵正常的教会生活中，我重新呼吸到了新鲜的空气，因而重新整理了原来的手稿，于去年正式出版成《张锡康回忆录—上海地方教会六十年来回顾》，希望许能好好读一读。

最令我困扰的是我在《六十年来回顾》那本手稿中所写的关于生化药厂的事，都是历史的事实，许却一点一点的把这些事实，加上从别处抄来的不实的传言，归纳出她自己负面的结论，用我从来没有讲过的话作为我的结语，例如：“张锡康说，一开始生化药厂的产品质量还是好的，到后来就问题百出了”。我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倪弟兄对生化药厂产品质量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他说我们应该生产质量高，价钱低的产品，让医生可以放心使用。有一次因为我们新买了一个高压锅，弟兄们学习制作P. A. S.，因机器不熟，没有烧透，刚做出来的几锅里面有毒性，有人吃了有反应。当时倪弟兄人不在上海，我们弟兄们赶快将药品回收，重新做几批送到卫生局检验，许可后才重新上市。许梅骊用我的名字做这样的结论，是不道德的。

许梅骊用我写的生化药厂历史，加上她自己的意见，最后作出了倪自恃过强，我行我素，无视法纪与商业规条，大胆而计谋多端，无商业道德等批评，并且结论倪办厂的目的是要以前赚钱。许梅骊当时只是个大学生的，从头到尾没有在生化药厂工作一天，对当时在政权交接，金融混乱的情形下营业的艰辛一无所知，怎有资格在此大肆批评。而且许大量引用我的资料，事先并没有取得我的同意，出书前也没有让我看过。她的书出来后，看见倪弟兄办厂为了养活同工及眷属的艰辛历史，被许误导成面目全非的结论，实在像吃下一只死苍蝇一样，非常难受。我也在事后写信给许梅骊，把书中错误告诉她，无奈她成见已深，不肯接受帮助。但我必须在这里澄清，许书中关于生化的一切结论都是出于许自己的想像，不是我的结论，也不是当时实际的情形。以下是我在《张锡康回忆录》里所写的引言（部分摘录），记录了我如何从对于当年历史的回顾与反思：

1986至1987年间，我还在中国大陆时，曾写了一部《六十年来回顾》，记下我前六十年的历史。我在该书的引言中说：我回顾这六十年来我是怎样听见的，怎样领受的。我先从听见我父亲对我说他的蒙恩和蒙召作主工的见证，说主的恢复在中国的开始，和我们一家怎样到了上海，怎么进入主的恢复里开始，再讲到我是如何得救的，如何在教会中事奉神的，我是如何领受这历年以来主在我们中间所恢复的真理和这历年以来主在我们中间的复兴和我们失败的教训。以后我就谈到我们的堕落和主对我们的怀念和看顾，主在我身上的工作等。我也回顾了一下各段时期宗教政策的演变和有关“三自”的一些文件，教会肃反后的一些文件，以便参考。

这本「回忆录」可以说是1986年所写的《六十年来回顾》的补充与增订版。《回顾》一书有些记载是有其主观因素和历史色彩，在我写作的过程，政府当局听到我在写回忆录，我亦将我所写的向他们详实报告。今天离开那环境后二十年，我的看法和说法都比较自由与客观。所以，我感觉需要在有些资料上加以修正。

除了1986年写的《回顾》外，我1990年抵美后又曾录了十二卷录音带，记录“主的恢复在中国上海的拾零”，我也把其中补遗资料加在本《回忆录》中。

最近二十年，我都定居在美国圣地牙哥（San Diego）女儿和女婿家里。在这段日子中，我不断享受教会生活和主生命的供应，其中点点滴滴，我在不同时间也记录下来。这些晚年教会生活的记录，我也加在这《回忆录》中。

感谢主，主耶稣是我的好牧人。祂牧养我一生。一切都是主的怜悯，叫我到现在还在主的恢复中，这是我最喜乐的事情。我再一次回忆我的一生，我的一生都有主的恩典、怜悯随着我，我的祷告乃是我能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阿们。
（张锡康回忆录引言，2012版，光荣出版社）

后记

2022年，也就是倪柝声殉道的第五十周年，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圣经博物馆推出了“倪柝声”个人故事展，展期从2022年3月6日至2023年3月6日，长达一年。展览旨在探索倪柝声的生平和对后世的贡献，内容包括倪狱友亲自口述的录影、照片和私人信件。圣经博物馆首席策展人克洛哈博士（Dr. Jeffrey Kloha）表示：“本次特展以传记的形式呈现倪柝声非凡的一生，包括一些从来没有展示过的文物，并分享倪如何用圣经影响世界各地之人的故事。” [1]

圣经博物馆的官网介绍：“倪柝声在中国开始“地方教会”运动，这是中国第一个本土的基督徒运动。这个群体至今仍是最大的本地基督徒的教会运动，估计有两百万人能将其基督徒信仰追溯至倪柝声。2009年7月30日，美国国会表扬了倪柝声对中国基督教的贡献。今天，在中国之外据估计有3000处教会，仍跟随倪柝声的教导。” [2] 博物馆的商品店更提供参观特展的英语读者一本免费的倪柝声经典著作《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并提供中文读者一本由倪柝声的同工李常受主译，延续倪对圣经翻译之负担的中文《新约圣经恢复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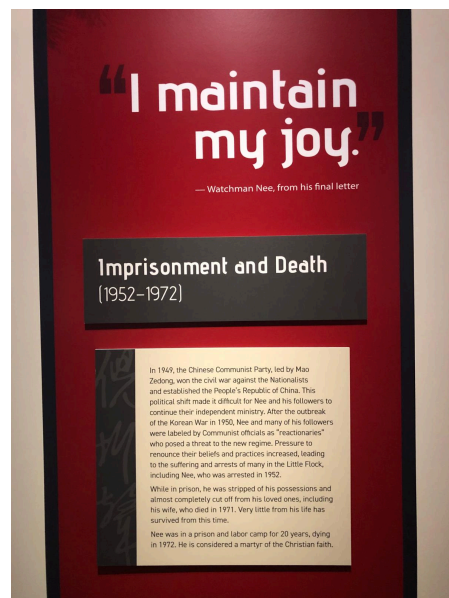
以下是2022年3月19日特展开幕仪式中的致词：

John Harvey:

倪弟兄在1952年到1972年这二十年时间里，受了许多“许多的苦。举个例子，他被监禁的头四年里，无法与家人有任何联系。每天要作八小时的苦役，牢房只有长九英尺，宽四英尺半，唯一的家具是一个睡觉的木板箱。他穿着自己的衣服，破烂不堪。寒冷的监狱里没有暖气，每天只能吃一顿饭，末了他的体重只剩下100磅。他没有圣经，也不能阅读圣经。尽管受苦至此，但有人说他早上会用他好听的男中音，背唱他记得的诗歌。

吴弟兄说，1970年，67岁的倪柝声在被要求放弃信仰时被狱卒殴打。然而真正令他心碎的是，他的妻子张品蕙在等不到与他团聚的情形下，于1970年11月去世。在他写给张品蕙大姐的最后一封信里，他说：“病依然在身上……但我维持自己的喜乐”。如同使徒保罗在腓立比监狱中，倪柝声在这一切的患难之中，维持他的喜乐。这与他的诗歌“葡萄一生的事”最后几行所说的一致，那里写道：“谁不熟练损失、剥夺，谁就仅是响钹、鸣锣；谁能拯救自己，谁就不能乐极”。

在哥林多后书四章里，我们看见新约职事的原则，就是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命却在你们身上发动。经过这些受苦，先是倪弟兄，后是李弟兄，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打开了圣经。他释放了关于生命树、生命的重生、生命的分赐、生命的长大、生命的变化，以及末了神在信仰里分赐生命的经纶等真理。



我是这份职事初到美国时，在一九六零年代第一批在召会里出生的孩子。我的父母、家人、朋友以及成千上万的人，都是这份职事的受益者。过去50年里，亲眼看见许多有能力、有智慧的人，因这份职事带来的真理和亮光感到惊奇，并献上自己推广这份职事。我，或者我该说我们，过去五十年都见证了这份在诸多苦难中诞生的职事，所产之洋溢的喜乐，生命的涌流，以及丰富的祝福。它在全球各地产生了数以千计的召会。我也见证许多人在召会生活中重生，有生命的长大、变化，是现今活的得胜者。这乃是这份职事的果效，这职事就是神新约的职事。我们不想将本次展览政治化。在中国的召会向来是纯洁的，他们从不沾染政治，单单纯纯为着基督。倪柝声总是尊重政权，认识神在他身上行政的管治。他从未放弃信仰，但他从未为此争斗。这不是人的方式，而是神圣生命的方式，爱我们的仇敌并为那些逼迫我们的祷告。当约瑟跟他的弟兄们说到他们所做的恶事，包括他自己多年受到不公的监禁时，他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使许多人存活，成就今日的光景”。

说到纪念倪柝声，倪弟兄自己说，使徒保罗在十四年后，才向人说到他曾上到三层天上的经历。许多属灵的见证，在披露之前，应该先经过一段适当时间的沉淀。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在他殉难14周年，而是他殉难50周年才来到这里。

最后，李弟兄在他自己所写的《今时代神圣启示的先见》的介言中写到，“我有负担为他写传记，使主这样一位见证人的生活与工作，不至向后人隐没，而得好好保存，照着神的愿望，供应基督给后来的世代”。谢谢大家的到来，也谢谢大家的纪念。

Bill Lawson:

我想这样开始，1969年底，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就读，第一次有人跟我说到倪柝声弟兄的职事与著作，就是他的《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在各个意义上说，这本书都是全球经典。当时我正寻求主的带领，寻找基督徒生活的方向和目标，这些信息彻底改变了我的基督徒生活。大约四年后，一位主里比我年长的姊妹赖教士(Elizabeth Rademacher)，在纸上写了一首1930年代倪柝声的诗，作为我婚礼的留言。赖教士年轻时曾在中国作传教士，在1936年至1943年期间遇见并认识了倪弟兄。这些年来这张字条一直在我的皮夹里。这诗的开头是：“让我爱而不受感戴”，对我而言这是个不平凡的见证。这首诗说出他的生平和职事，我要读一下这首诗，它深深地触动了我。

让我爱而不受感戴，让我事而不受赏赐；
让我尽力而不被人记，让我受苦而不被人睹。
只知倾酒不知饮酒，只想擘饼不想留饼；
倒出生命来使人得幸福，舍弃安宁来使人得舒服。
不受体恤，不受眷顾；不受推崇，不受安抚；
宁可凄凉，宁可孤苦；宁可无告，宁可被负。
愿意以血泪作为冠冕的代价，愿意受亏损来度旅客的生涯；
因为当你活在这里时，你也是如此过日子。
欣然忍受一切的损失，好使近你的人得安适。

我今不知前途究有多远，这条道路一去就不再还原；
所以让我学习你那样的完全，时常被人辜负心不生怨。
求你在这惨淡时期之内，擦干我一切暗中的眼泪，
学习知道你是我的安慰，并求别人喜悦以度此岁。

几年后我才知道，1938年10月，倪柝声弟兄在丹麦赫尔辛基的一次特会里讲到罗马书五至八章，这些和其他一些信息，被一位到印度作医生的传教士金弥耳(Angus Kinnear)收集成《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一书，于1957年在印度孟买出版，如今西方的基督徒也可以阅读。倪弟兄的讲道和著作强调神圣生命的事，这与他强调教会的异象和正当教会生活的实行是相配的，他的职事论到教会的地位和神永远计划也是一样出色。因此，他的一本传记作者称他为“今时代神圣启示的先见”。

过去51年里，我阅读、研究、讲说、收集并整理倪柝声的文字和诗歌，这对我是真正的快乐和满足。大约在2020年9月，我听圣经博物馆工作人员说他们要办一个倪柝声的特展，以纪念神在这个人的一生里所做的工作，我非常受感要参与这样的展览。我很荣幸能出席这次的活动，和大家一同纪念他。特别感谢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戴克(Amy Van Dyke)和克洛哈(Jeff Kloha)等人，让大众有机会认识这位神所拣选的器皿，他的生活、传承和著作，对东西方的基督徒有着不可思议的属灵影响。我们不高举人，也绝不过度尊崇人，但我们宝贝主在这个神大用的器皿身上所做的工作，作为给我们这一代的见证。

我想以两件事作为结语。第一个出自他在1936年所作的得救见证，他说：“从我得救的那一夜起”，这是1920年4月29日，“我开始过新的生活”。另一个是他在中国的劳改农场里殉道之前，用颤抖的手写下的字条。他是1972年5月30日去世的，到今年2022年5月30日，正好满五十年。字条上写着：“基督是神的儿子，为人赎罪而死，三日复活，这是宇宙间最大的事实。我信基督而死。倪柝声”。

Chris Wilde:

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我很欣赏John，特别是Bill，你们表达的方式，因为我们在这里是为了正确、恰当地纪念倪柝声，我们不是在这里荣耀他。圣经说我们应该纪念那些从他们学到很多的人。我们肯定从这个人身上学到很多很多东西。但如果有人会对这个展览不高兴的话，那就是倪柝声了，因为他绝不想把注意力集中在他身上，而是集中在他所爱的主身上。因此，为了正确地纪念他，让我们记得所有的尊敬和荣耀都只归于基督。

我学到的另一件事，请原谅我，这有点个人化，因为固然我在这里，我很高兴，很高兴能和你们大家和这个展览在一起，但是我的心不和你们在一起也不在这个展览里，我的心不在这里。我想你们大多数人都知道，或者说你们很多人知道，我现在住在德国。主为了祂在那里的丰富地赐给我们位于德国中部的一块土地。这地有25英亩，包括树林、溪流、步道小径，以及10座德国的历史建筑，我们将其修建为信徒聚集中心。两天前的晚上，我们接待了第一批自乌克兰抵达的难民，这些半夜逃亡的信徒、母亲，其中大部分是带着小孩的年轻母亲。我的妻子原本准备和我一起来的。我们本来要来这里，但是她不能来。她和许多忠信的圣徒留在那

里一起照顾这些人，因为还有更多的人即将抵达。明天有一批要来，下周还会有更多人。所以我的心在那里。

但是我从倪弟兄和他的著作中学到一件事，这也是我50年前作基督徒所读的第一本书，就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其实再过10天就是我成为基督徒50周年，不过我在很多年后才学到这个功课，但在过去的10天里这对我特别有帮助。你们可以想象得到，整个欧洲目前都被席卷于正在发生的事件之中。这是人们唯一思考、关心、祈祷的事情。而且，你会先为他们的痛苦而流泪，然后想到背后的原因而愤怒。我们很容易就陷入这样的情绪里。但倪弟兄教导我们一个功课，帮助我们留在信徒应该关心的事情和应该关注的焦点。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临近年底，他们占领了南京。不管你读的是什么记载，有20万或是40万的中国人被日本人屠杀了。那确实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就在几个月后，倪柝声应一位属灵朋友史百克（T. Austin Sparks）的邀请，参加了在英国举行的开西大会，那是一个属灵的特会，目前仍有，只是不知道现在是否还每年举行。我和几个弟兄去过那里，把那里的地点什么都依年份记录下来。1938年战争正熾，倪柝声受邀参加，当然，那时他在西方已经相当有名。大会开始时，会众里碰巧有一位著名的日本基督教领袖，大会的主办人知道这两个人都在那里，一个来自中国，一个来自日本。倪柝声所在的背景和环境与我们现在在欧洲的情况没有太大不同，在这个背景下，他受邀做开頭的祷告。气氛非常紧张，你可以想象当时会场的空气紧张到可以用刀劃開。他停下来沉思了一下，没有很快接受邀请，但在史百克弟兄的鼓励下，他开始祷告：

“主啊！你在掌权，我们坚定地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一切事上掌权，祂是万有的主，没有任何事物能动摇祂的权柄，这时来自灵界的邪恶权势正倾其全力，意图损害神在中国和日本的权益。故此，我们不为中国祷告，我们不为日本祷告，我们乃为神的儿子在中国和日本的权益祷告。我们不指责任何人，因为他们只是神的仇敌手中的工具。主啊，我们为你的旨意的成全而站住！哦，主啊，粉碎黑暗的权势，它们迫害你的教会，实际上是在迫害你。阿们。”

弟兄姊妹们，这个祷告在过去一周里拯救了我。我原有发怒的倾向，甚至帶著情绪向主说话，但这个祷告穿透了我。我们在这里不是为了人类政權，无论是国内的分歧，还是國際的冲突。我们向我们的弟兄学习，我们在这里只是为了主的权益。阿门。

Hank Hanegraaff:

我们现在在圣经博物馆，所以我可以提醒各位，倪柝声所承受的經歷并不是他独有的。我想起保罗向以弗所长老们告别时所说的话，他说：“现在我灵里受捆绑，要往耶路撒冷去，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只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郑重见证说，有捆绑与患难等着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郑重见证神恩典的福音。我曾在你们中间来往，传扬国度，看哪，如今我晓得，你们众人都不会再见我的面了。所以今日我向你们见证，我在众人的血上是洁净的。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告诉你们。圣灵立你们作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召会，就是祂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我知道我离开以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

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勾引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警醒，记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地流泪劝诫你们各人。”（徒二十22~31，恢复本）

使徒保罗知道有患难和殉道等着他，同样的，倪柝声也知道他将面临殉道和患难。1972年，在一场艰巨的文化大革命中，倪柝声下监20年后去世。当他的亲人来领取他的骨灰时，一名狱警给了他们一张在他枕头下发现的中文字条，上写着“我信基督而死”。但倪柝声的职事并没有随着他的死而结束。我最近才去世的一个好友余洁麟（Andrew Yu）曾不断地提醒我，2003年8月4日，我遇到了倪柝声的传承者，他是一根枝条探出了监狱的墙外，确定地绕了世界一圈，並触及我的生命。我学到一个极大的功课，就是，真理很重要，生命更重要。个人的经历若是脱离教会所持守的真理，就会失去确定性和客观性，成为真理與假象和幻觉的混合。所以真理确实很重要。但是生命更重要。这个更重要的生命并不是阻撓知识止，而是超越知识。它超越所有哲学的思辨。基督教的神学至終乃是一个方法，它将知识结合起来去服务一个超越一切知识的目的。这个最终的目的就是与神连结，或者说成为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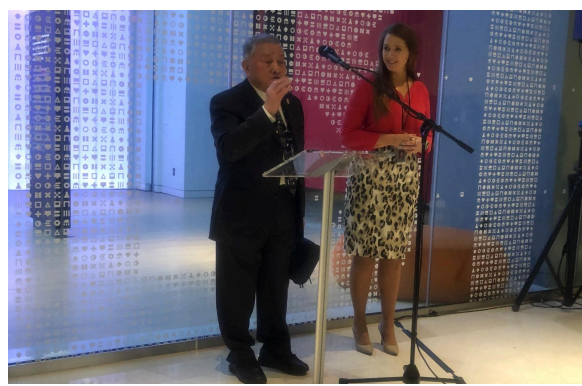
亚他那修说，神成为人，为要使人成为神。或者用路德的说法，话成为肉身，为要使肉身能成为话。这个真理借着倪柝声的传承者已经在西方乃至世界各地恢复了。这个真理也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我今天在经历这个生命，完满地经历着。这不仅是我们个人所经历的，而且诚如我的朋友 Chris Wilde 动人的指出，这是我们可以与世上很多人分享的东西。Chris 不是光说这话而已，他也走这路。因此，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脱去各样的重担，和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凭着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赛程，望断以及于耶稣，就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与成终者；祂为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願這話成為我们每一位被接入永遠裡時，所留下的見證。

Amy van Dyke（圣经博物馆策展人）：

感谢大家来到这里。在过去的一年里，我很高兴，也很荣幸在这里研究并策划倪柝声的生平特展。在过程中我有幸遇到一些很棒的人，一路上教了我很多东西。我想借此机会感谢吴友祺弟兄，一年前我获允到加州去，坐在他面前三个小时，听他不可思议的见证。你可以会到展览中看见并听见其中的一部分。我必须说，要把一个满了内容的三个小时访谈浓缩成八分钟，实在是件难事。虽然这个展览视频还是有点长，但已经浓缩成八分钟，他的故事确实精彩。我们也为他计划了另外一个特别的时间，吴弟兄你愿不愿意上到这里来？

吴弟兄今天带来了特展即将展出的最后一件文物。所以不只是一箱。等下我们回到展厅时，他会为将这件东西放进陈列柜中，然后上盖。那是两人一起被监禁时，倪柝声有的最后一个东西，他将它给了吴弟兄，吴弟兄把它带出了监狱，在我们的访谈里说到了这个有趣的由来，我们根本不知道他有这件物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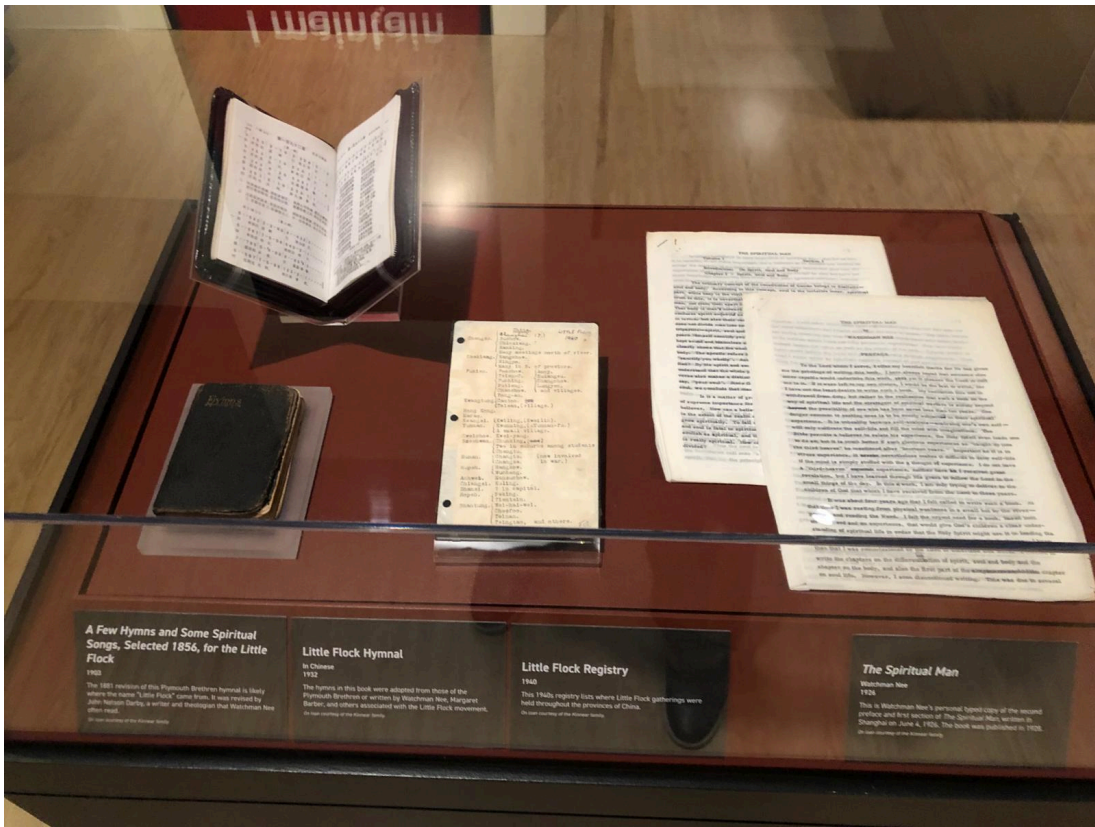
吴友琦：“感谢主耶稣基督给我这个机会。感谢主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让我能来这里与大家见面，看看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我爱你。阿门。我是在1963年到1972年和倪柝声在一起九年



的时间。现在见过倪柝声的人不多了，越来越少。首先，我自我介绍，我的名字是吴友琦，今年85岁。倪柝声离世五十年了。我非常感谢圣经博物馆举办这次聚会。半个世纪过去，我们仍然记得倪柝声，这对我而言非常珍贵。谢谢圣经博物馆。五十年过去了，很多弟兄姊妹也过去了，为什么我还没过去呢？为什么我还在这里？弟兄姊妹们，这就是见证。我提到了倪柝声给我一只笔。原本圣经博物馆向我借这只笔展览一年。但我说，不，不用借，我捐给你，永久捐赠。我从灵里知道，耶稣基督给了我这个使命。这支笔放在我这里不是太合适，只有在这里才合适，所以我必须把这支笔送给博物馆。这支笔我已经保管了50多年，可能有52年。今天，我很高兴这支笔终于到了它该在的地方。我很高兴今天我终于完成了我的使命。我再告诉你们一件事，是关于倪柝声的行事为人。他不喜欢别人剪他的头发，也不让别人剪他的头发。他都是自己剪头发。我问他你怎么剪自己的头发，他非常有智慧，他用这个东西来剪头发。我很惊讶，问他为什么这么作。他说，耶稣基督是我的头发。阿门。耶稣基督是我的头发。这个东西我也保管超过52年。今天我也把它送到它该在的地方。请你们收下它。谢谢你们，谢谢弟兄姊妹，谢谢圣经博物馆。阿门”。







Words and Legacy (1972–Prese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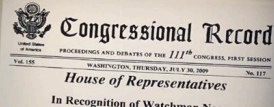


The ministry and teaching of Watchman Nee continued through the leadership of his friend and co-worker, Witness Lee, who fled to Taiwan in 1950 and eventually to the United States.

Following Nee's arrest and trial, Lee and others gathered notes and testimonies from his closest companions and published them under Nee's name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sparking widespread growth in the West of the Little Flock movement. His most popular book was, and still is, *The Normal Christian Life*, first published in 1957 by Angus Kinnear while Nee was in prison.

The contribution of Watchman Nee to the indigenous Christian church in China has been recognized around the world. He advocated for his people and urged them to follow his idea of the Christian life, based on 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Bible.

The Little Flock movement is still active and remain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hinese church and the story of global Christianity.



Congressional Record
 PROCEEDINGS AND DEBATES OF THE 111th CONGRESS, FIFTY SESSION
 WASHINGTON, THURSDAY, JULY 9, 2009 No. 117
 Vol. 145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In Recognition of Watchman Nee

Mr. SMITH of New Jersey.

Madam Speaker, I rise today to acknowledge the immense spiritual achievement of Watchman Nee, a great pioneer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Christians Today magazine recently honored Watchman Nee as one of the 100 most influential Christian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Watchman Nee died over thirty years ago but his life and work continue to influence millions of more than three thousand churches outside of China, including several hundred in the United States, look to him as one of their spiritual and theological founders.

Watchman Nee was an astonishingly cerebral and pragmatic man, which I think can be seen from a speech he gave in 1922. He became a missionary of his faith. He became a Christian in 1922. In the 1930s, he traveled to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where he delivered sermons and speeches. Later his sermons were collected and published as books. By the late 1940s, he had become the most influential Chinese Christian writer, evangelist, and church leader. In 1952,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mprisoned Nee and many other Christians in the Little Flock. Nee was never released, though during the 1960s and 1970s, several of his books continued to grow in influence and popularity, particularl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his best-known book, *The Normal Christian Life*, sold over one million copies world-wide and became a twentieth-century Christian classic. In 1972 he died at the age of 71 in a labor camp, his life surviving longer than that he remained faithful to God until the end.

Madam Speaker, it is estimated that China has more than one hundred million Christians, and millions of them consider Watchman Nee. Millions more are rightly proud of the contribution Watchman Nee made to global Christianity—he was the first Chinese Christian to exert an influence on Western Christians—and indeed of his contribution to world spiritual culture. It is not that the works of Watchman Nee are officially banned in China—more they are being discovered abroad by a new generation of Western Christians. It is my hope that Watchman Nee's collected works can be freely published and distributed within China.

After Watchman Nee's death, when his close friend collected his possessions, she was given a scrap of paper that he found in his briefcase. It was written in his hand, and it says: "Christ is the Son of God who died for the redemption of sinners, and was resurrected after three days. This is the essence of my belief in Christ. Watchman Nee."



Congressional Record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ROCEEDINGS AND DEBATES OF THE 111th CONGRESS, FIRST SESSION

Vol. 155

WASHINGTON, THURSDAY, JULY 30, 2009

No. 117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In Recognition of Watchman Nee

新泽西的史密斯先生发言:

议长女士,我今日起立发言,以肯定中国基督教界一位伟大先驱—倪柝声其浩瀚的属灵成就。

《今日基督教》

(*Christianity Today*)杂志近日将倪柝声评为二十世纪百位最具影响力的基督徒之一。倪柝声虽已逝世三十多年,但他的为人和事工仍然持续影响着中国上百万的更正教基督徒。如今中国境外有超过三千处的教会,包括美国国内的几百处,都将倪柝声视为他们属灵和神学上的创始人之一。

倪柝声一生全然奉献,不遗余力,这从他的生平简史可见一斑。他于一九二二年成为基督徒。三十年代,他至欧洲和北美洲访问,在那里讲道演说。他的信息之后被汇集成册,出版成书。四十年代晚期,倪柝声已成为最具影响力的中国基督教作者、宣道者和教会建立者。一九五二年,由于信仰的关系,倪柝声和其他许多基督教领袖遭中国政府监禁。倪柝声从此未被释放,尽管如此,他的一些书籍却

在六、七十年代大受欢迎,影响越发深远,在美国尤为如此。他的《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在全球销售超过一百万本,成为二十世纪的经典著作。一九七二年,他死于中国的劳改农场,享年七十一岁。他遗留的数封信函表明,他向神忠信直到路终。

议长女士,据估计,中国有一亿以上的基督徒,其中有数百万基督徒认为自己是倪柝声的属灵后代。另有几百万基督徒因倪柝声对全球基督教的贡献(他是第一位对西方基督徒具有影响力的中国基督徒),和他对全球属灵文化的贡献为荣。据称,倪柝声的著作在中国遭正式查禁;与此同时,其价值却为新一代的西方基督徒重新发掘。我希望有朝一日,倪柝声的著作能在中国自由地出版发行。

倪柝声死后,他的侄女前去领取他的遗物;狱卒交给她一张在他床边发现的纸条。纸条上所写的字,可看作是倪柝声的信仰声明:“基督是神的儿子,为人赎罪而死,三日复活。这是宇宙间最大的事实,我信基督而死。倪柝声”。

This translation is not an official US government translation or from Rep. Smith's office.